

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报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年创刊 双月刊
2024年第1期
(总第185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胡金焱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潇

主编：孙继国

副主编：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4

东方论坛

1

双月刊

总第 185 期

□ 东方文化·中国智慧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常建华·1·

放水灯的源与流

姜守诚·25·

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刘芳·33·

“美”的转向与超越：庄子“悲态”美学思想阐微

王康宁 薛振宇·43·

□ 新时代中国金融学

税收激励与企业资本结构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证据

谭小芬 王可心 朱梦珂·54·

银行竞争与公司价值

——基于银行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

高昊宇 谢秉原 李梦·73·

□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京会”辛亥革命救援行动述论 池子华·86·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张登德 宋均荣·95·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兄弟之邦”：现代中国的朝鲜想象 韩 琛·106·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

——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李 伟·119·

□ 经济研究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演变的理论机制和路径选择 韩永辉 彭渤扬·128·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研究 王 娟 张 翔 李 燕·141·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1st Issue for 2024

Research on Jiangxi Genealogy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Jiang Shoucheng(25)
The Logic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Rule by Rites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Liu Fang(33)
The Turn and Transcendence of "Beauty":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s Thought on "Sad State"	Wang Kangning Xue Zhenyu(43)
Tax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Based on the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Tan Xiaofen Wang Kexin Zhu Mengke(54)
Bank Competition and Firm Valu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Banking Deregulation in China	Gao Haoyu Xie Bingyuan Li Meng(73)
On the Rescue Op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i Zihua(86)
A Study on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Adam Smith's Theo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Dengde SongJunrong(95)
"A Brotherly Nation": Modern China's Imagination of North Korea	Han Chen(106)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aptation of Classic Literary Works: From <i>Life</i> as a Novel to <i>The Road of Life</i> as a TV Drama	Li Wei(119)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ath Choice of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n Yonghui Peng Boyang(12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Wang Juan Zhang Xiang Li Yan(141)

编者按:本刊一向重视东方文化研究,办刊宗旨强调,刊物“立足东方,面向世界,有旨突出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研究,也全方位向各领域文明成果开放;有旨在当代高度上弘扬国学,也鼓励在任一智慧的前沿探索。”基于这一理念,本刊不定期地推出有关东方文化的栏目或专题,如1991年第2期曾推出“东方文化的现代使命讨论”专题,刊发了刘慧晏、赵敏俐等四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来探讨东方文化的特质与当代使命。2004年第5期又创设“东学西渐”栏目,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亲撰大作《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以支持,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虽历时代变迁,本刊弘扬东方文化的初心不改。当下,国家正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学界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凸显。为了阐释和弘扬东方文化的价值意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智慧,本刊决定从2024年第1期开始,创设“东方文化·中国智慧”专栏,并将其作为常设栏目,欢迎各位学人关注、支持并惠赐大作。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摘要: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关键词:一本万殊;欧苏谱;何乔新;罗洪先;吉安

中图分类号: K820.9;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01-24

江西在中国族谱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倡修族谱的欧阳修就是江西人,明代江西的族谱修纂发达,值得研究。学者已对明代江西族谱学关联的乡族建设^①、修谱与谱论^②有所探讨,属于个案研究。本文尝试利用明人文集中的谱序等资料,结合现存明代江西族谱,^③较为全面地论述明代江西族谱学,以就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常建华,男,河北张家口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明清史研究。

- ① 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第8卷第1期,1997年;周玺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 ② 常建华:《明代族谱研究》第八章《杨士奇之族谱序跋所见宗族与修谱》,第九章《罗钦顺的族论与谱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讨论了江西泰和及吉安的族谱问题。
- ③ 《鄱阳洪氏统宗谱》8卷,首1卷、末1卷,洪璐纂修,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罗宪通等纂修,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族谱修纂的思想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基于以下的认知:家族历史犹如国史般必要,欧苏族谱学的影响,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一本万殊”与“民胞物与”观念下的知本所需。

(一)“一本万殊”与“民胞物与”的观念

南宋程颐认为,北宋张载《西铭》的主旨是“理一而分殊”,《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语,后世学者概括为“民胞物与”。江西学者聂豹认为:“《西铭》一篇为天下古今之全谱,即谓撰述,叙为《西铭》之绪传可也。”^①高度评价《西铭》里的思想乃是天下修谱的宗旨。^②

曾荣(1372—1432),字子荣,号西墅,江西永丰人,明永乐二年(1404)状元。有人欲修谱向曾荣索序,曾荣说:“君欲知而谱,盍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乎?夫万物本乎天,则凡物之以生以育,以长以成,皆归于大造之赐。矧伊人之生而且灵于物者,而可不知其所自耶?欲知其所自,则当于其祖焉思之。何以当思乎祖也,盖祖者吾先代之所自出,而后人之所由传者也。由一本而十百,由十百而千万,皆自此而散殊也。知一本散殊之义,则当思是谱以为尊祖敬宗之器。”^③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是一本散殊,修谱可以尊祖敬宗。

何乔新(1427—1502),字廷秀,号椒丘,江西广昌盱江镇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孝宗时官至刑部尚书。何乔新更从人的祖先与子孙的分衍的角度谈“一本”的重要性与修谱的必要性。他说:

夫万姓之繁,其始一本耳。邃古之时,若风,若姜,若姬,若嬴,其初兄弟也。兄弟之身,其初一人也。一人之身,其初一气也。果孰亲孰疏,孰同孰异邪?先王因生赐姓,所以别生类,慎婚姻,崇本始,使人知亲亲尊尊之道焉耳。亲亲,仁也。尊尊,义也。厥初生民,安知姬之与鄩不出于一家、不同乎一气邪?惟明其所自出而不附会焉,仁义之道在是矣。^④

即“一本”实为“一气”,各姓氏皆有祖。山西按察副使江西吉水人王充献出其所修族谱,属何乔新序之,也说到:

吾宗人家吉水者数千指,其初一本也。源流而未益分,于是乎有菴功之属焉,有緦麻之属焉,有袒免无服之属焉。世之薄者,于其疏属相视如途人,繇无谱以稽之也。使有谱焉等而上之,则出于一本,旁而推之,则分为群支,虽百世之远而祖考不忘,宗族不散,尊祖敬宗之心将油然而兴矣。此吾谱之所以修也。^⑤

① 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3《秀川罗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2页。

② 关于《西铭》的宇宙观与族谱的关系,参见常建华《明代族谱对“一本万殊”“民胞物与”观念的诠释——兼及中西文化比较》,《江汉论坛》2024年第3期即出。

③ 曾荣:《刻曾西墅先生文集》卷10《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242页。

④ 何乔新:《椒丘文集》卷12《安沙游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明嘉靖元年余莹刻本,第50册,第316页。

⑤ 何乔新:《椒丘文集》卷12《吉水王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7页。

试图通过利用一本观念修谱,凝聚涣散的宗族。何乔新批评追述祖先不准确的行为是“二本”,对祖先不尊,他说:

嗟夫!人本乎祖,犹木之本乎根、水之本乎源也。世之昧于一本之义者,往往妄附于名贤华胄,以为光耀,殊不知自陷于二本矣。松柏苍寒,而缀芙蓉于其颠,君子固识其非类。流水东入于河,虽清而为一,其清浊固自可辨也。人于其祖而可以二本乎?二本者亦何益之有哉!故欧阳子之谱其族,中间失其世次者再。苏老泉之谱其族,由一世之上失其次。以二子之学识绝人,犹且缺所不知,而不敢诬其祖也如此,而况于它人乎!若参政君兹谱,盖深明一本之义,而得欧、苏之遗意矣。^①

“二本”混淆了水之清浊,是“诬其祖也”。

与“一本万殊”相应的是“民胞物与”思想,也给与明人以很大影响。

江西泰和人王直(1379—1462)为家乡宗族撰写了多篇谱序。他说:“德莫重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废,祭法不明,故家大族所以著其本、联其支,而亲亲之道行者,谱牒存焉耳。是故伦理正,恩谊笃,油然仁爱之施充之,以及于民物皆吾亲亲之余也,则其德岂不亦盛哉!为子孙者世勉之,其盛岂有已耶?”^②认为谱牒接续宗法、祭法遗意,使人知本,行亲亲之道,产生仁爱之情,推及人民之间,加强道德伦理。

新淦周虚白重修族谱索序,福建晋江人蔡清(1453—1508)称赞说“大抵先生心事,真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况于所谓其初一人之身者乎!君子善推其所为,必自亲亲始,此先生于族谱之修所以愈加详密而不容已也。”^③将周氏的修谱行为归结为同胞物与之心影响所致。

罗洪先编修本族族谱数十年,他的《秀川撰述序》记载修谱经过,讲述对于修谱的认识过程,是重要的有关修谱思想的文字。他说通过修谱,对于撰述得到“大悟”:

盖尝泛而观之,有以一身而繁数百十指矣,有以编氓而食禄且数世矣,有亲执作业而富埒封君矣。为之跃然喜曰:“是非駸駸亢宗者耶?”已而,考其下方墮为沟瘠者,昔之家余万石者也;旅寄而道蹙者,昔之衣冠诗礼者也;中斩而渐微者,昔之倚众擅力者也。则又为之蹙然以悲。其始以为偶然耳,比其久也,校之上下数百年间,莫不皆然。乃抚卷而爽然曰:“兹非屈伸往复之相寻,所谓天道者耶?其有不尽然者,非系其志与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弱而贱贫,犹将有所遗于后,矧其强盛而贵富者耶?”然其人往矣,不可得而尽诘矣。已而,视吾之族人,其强盛而贵富者,不徒为之喜,而继以惧;而于弱孤贱贫者,不徒为之悲,而幸其有遭。夫为之惧,则无健美之心而保诲不忘;有所幸愿,则无狎侮之心而休戚相系。虽有疎戚不齐,其为喜与悲、惧与幸无有乎弗同,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与之义。起而嗟曰:“是固先大夫所为弗皇者乎?小子乌足以承之?”^④

①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瑞安钟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8页。

② 王直:《抑庵文集》卷5《桃源萧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8b—9a页。

③ 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新淦周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第675页上。

④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558页。

他曾观察族人,见由民而官、因业致富则喜其亢宗,知富而贫、贵而贱、盛而衰者为之悲,纵观数百年间,人生上下、屈伸往复,悟出对于强盛而贵富、弱孤贱贫的族人,其为喜与悲、惧与幸没有不同,“以是知民胞物与之义”。他又悟到:

凡书于谱者,其必有在也。在吾之上,则皆父祖之列,未有见吾父祖而弗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于吾者乎?在吾之下,则皆子孙之列,未有见吾子孙而弗慈者,推而下之,不有卑于吾者乎?在吾之前后,则皆兄弟之列,未有见吾兄弟而弗爱者,推而广之,不有大同于吾者乎?在吾之上下前后,虽有疏戚不齐,其为可敬、可慈、可爱者,无有乎弗同,又不止于可喜而悲已也。是故尽吾之敬,可以事人矣;尽吾之慈,可以使人矣;尽吾之爱,可以与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与,此其志与行为何如耶?则又何计夫盛衰贫富贵贱之有?吾以是知尽己之性不为近,尽人物之性不为远,各亲其亲不为异,万物为体不为同。小子固未能也,愿学焉。^①

即族人虽疏戚不齐,其为可敬、可慈、可爱者,没有不同,所以要敬以事人、慈以使人、爱以与人,再不计较盛衰、贫富、贵贱。

(二)谱补宗法统合宗族

元末明初的士大夫多有从宗法论述修谱必要性的。陈谟(?—1388)字一德,号心吾,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年曾主奉新清节书院讲席。他认为:“自宗法既废,而族谱盛行,亦人心世道之一助也。古者宗法之明,有百世不迁之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小宗。继祢、继祖、继曾祖、继高祖者,小宗也。小宗虽不一,然皆管摄于大宗,冠娶必告,死亡必赴,祭祀不敢尸。故自源徂流,条理分明而脉络有序也。然此法不举久矣,于是士大夫之家莫不有谱焉。谱上至始祖,则宗法立大宗之意也。下至高祖,则宗法立小宗之意也。合大小宗而存其概于彷彿,合千百年之统绪而归于一叶之楮、惨淡之墨,呜呼,亦士大夫能之,流俗人则不屑矣。”^②这里的宗法,强调大宗、小宗制度,比拟于族谱中的始祖、高祖。

江西泰和人梁潜(1366—1418)更认为自宗法废而祭法不明,可以谱牒统宗而合族。他说:

古者诸侯自嫡子而次,有大宗以重其本,小宗以联其支,而四时之祭于庙也,则子姓昆弟无不在焉,所以统宗而合族者周且详如此,故其民亲亲而重本,趋于厚而不薄者,有以然也。自宗法废而祭法不明,民始离析涣散而无所统,疏其亲而忘其本,故士大夫于其时也,不可以无谱牒,以谓统宗而合族者,庶几其近于古,而重本亲亲之道诚在于此也。於乎!古之法不行于世久矣,萧氏在新喻者最显且盛,而谱又详统其宗而合其族者,良有以也。书以序其后,苟有志于古而不忘其先者,可考也。^③

①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8—559页。

② 陈谟:《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9《书萧天与族谱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清光绪二年柳谿书屋刻本,第4册,第424页。

③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新喻萧氏族谱后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393—394页。

将修谱作为“重本亲亲之道”之举。梁潜另外强调修谱的统合之道源于古代的宗法与祭法。他说：

惟古之人，于其生之众也，常有以统之，而于其分也又常有以合之，故有宗法焉，有祭法焉。居而统其众于宗，祭而合其族于庙，由是其族虽众，而其序不紊，其势虽分，而能相与恭敬悲慕于夫灌献祝嘏奠荐之际，盖常有以启其敦宗重本之心，未尝有已也。自夫宗法之废而祭法不明，岂惟浅陋苟简而失其礼之甚？生者之众至无所统，分者之势至不可以合，于是欺诈暴慢之习日益长茂，而仁慈忠孝之心日益寡少，其俗之偷、教之悖实由此矣，其可悲也已！夫如是，宜乎士君子于其谱之修有不可缓者，盖庶几乎统之合之之道少有契焉耳。^①

修谱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吉安泰和人，嘉靖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始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问学，又拜罗洪先为师，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胡直认为：

儒者之治谱也，鲜不以宗法言，此特歆其名耳，而非实也。古之宗法有世爵以临之，夫是以导则率，禁则齐，而理在其中。其在庶人两贱之，势不以相使，而况为大宗者？或颛愚而售诟，则又将孰导而孰禁之？是故先王之于庶民，家有庙以萃涣，党有塾以发矇，而导善禁不善之为理者寓焉，乌在乎宗法之举与废也？至于后世，则又有谱以为著，代叙齿之辨。自谱作而庙之萃益笃，塾之教益明，推诸先王所为理者益周以洽，故谱足尚也。而谱之行，不患无宗法，而患其家无老成之人、誉髦之士，不足以观磨申飭，则虽其谱牒不轨于宗法，亦奚以裨？虽然，古者又有比闾族党，相翊于导善、禁不善，故能一道同风，虽在环堵之中，咸有老成与誉髦者相望而骈起，此先王所为必世而仁者也。乃若以今之世而责以昔之人，而欲其旦暮遇也，不亦北首而南辕乎？嗟夫！此岂独一家为然哉。^②

治谱并不就等于宗法，而应配合祠庙祭祖与家塾教化，还需老成与名望之人推行。

修谱的作用基于使得族人关系和谐，增强凝聚力。杨荣为江西泰和人、翰林侍读学士李时勉族谱作序，开宗明义，指出：“宗族有谱，实伦理风俗之所关，而仁人君子所宜重者也。苟不之修，则服尽情尽，不相视如涂人者几希，乌知夫水木本源之义者乎？”接着说到李时勉的修谱动机：“虑宗姓之蕃，富贵贫贱之不齐，不因谱以明尊卑，则富而凌贫，贵而轻贱，其能喜而庆、忧而吊、孤而字、患难而相恤者鲜。”^③将修谱作为改变伦理风俗之事。

王直也讲到宗法废，依赖族谱治理宗族。他说：“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以端其本，联其支，则伦

①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庐陵曲山萧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395页。

② 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10《爵誉康氏重修族谱序》，张昭炜编校：《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上册，第224页。

③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5《李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明正德十年刻本，第29册，第481页。

理正,恩谊笃,而可以久且大矣。自宗法废,族无所统,于是有服尽亲尽而相视如途人者。君子病之,此谱牒之所以作也。谱牒之作,凡同本者皆录焉,明其所自出而谨其所由分,尊卑疏戚,粲然甚明,是宗法虽废,而伦谊不悖者,赖谱以维持之也,是以君子重之。”^①

修谱治理宗族,即是改变风俗。罗洪先论之有言:

儒者论风俗,必先立宗,顾未有原其所以为宗者……吉安多巨族,各以闾閻相侈竞,又能严祠祀以萃睽离,辑谱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论,将以补宗法之不及而维持之,非不勤也。然观风俗,惟万安横街刘氏称最善……嘉靖己未,刘氏长老咸思知县璜,惧谱牒不续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谋于群从,分任其事,以庶几所谓补宗法者……“古之宗法,不行于今矣。然今之为谱者,统于上而为父母、祖父母,以至于高曾,孰非五世之宗;联于旁而为兄弟伯叔,以至于曾祖伯叔,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视听之所习,趋向之所归,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遗,而不至于涣散,惟刘氏则然,郡邑诸族,不可得而同矣。”^②

罗洪先现身说法,以万安横街刘氏修谱为例,说明谱牒可补宗法,称赞其修谱行为。

南昌万时华将修谱作为实践宗法。他说:“今日之事,寓宗法于谱牒,一以尊祖,一以敬宗,一以收族,一以传远,一以纪朝廷恩泽之隆,一以志祖宗功德之厚,一以著子孙官守之明与宗教之肃甚盛。”^③借助修谱尊祖、敬宗、收族、传远,纪朝廷恩泽、志祖宗功德,著子孙官守与宗教,实现“寓宗法于谱牒”。

(三) 欧苏谱的影响

北宋欧阳修、苏洵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书法在明代影响很大。很多明人修谱都要参考欧、苏谱。江西泰和人萧铤指出:“自唐以来,作谱者非一人,所以作者非一例,而世之所称者,惟欧阳公、苏老泉为有据。老泉主宗法,止于五世而已;欧阳公则仿郑玄诗谱、《史记》年表之意为图,自始祖以来迄于五世,五世既尽,复揭之为一图,衍而下之,至于无穷。今之为谱者大抵皆欧阳公之例也。”^④吉安安福人吴节还指出:“惟前宋欧苏两大儒制为谱牒,止尊本派,不屑远引,深协人心。欧阳之谱,则取法史传,苏氏之谱,则仿世系图而为之,制虽不同,而切于尊祖敬宗之谊,则一也。今举世仿之,不宜宜乎!”^⑤吉安永新人尹襄则认为:“予观昔之为谱者,莫若欧阳氏、苏氏,厥谱所记不过八世。苏谱所知惟得六世,何其近且少也。然天下言名家者,必以二家为称首。今士大夫作谱者,皆以欧苏为法。”^⑥临川陈氏重修族谱,其世系记载方式如下:“今闽郡守自勉君复会诸宗派,踵而成之。其谱每以五世为一图,大概仿欧苏二公之法,以世为经,以人为纬,纵之则某某父子也、祖孙曾玄也,衡之则某某昆弟也、再从三从也。一本众支,灿然如示诸掌。而郡守君复以其所得褒封之勅弁诸篇端,将钺梓以示其

① 王直:《抑庵文集》卷6《南溪曾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7a页。

②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万安横街刘氏族谱〉序》,上册,第547—548页。

③ 万时华:《溉园二集三》序《曹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4册,第385页。

④ 萧铤:《尚约文钞》卷4《三溪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5—46页。

⑤ 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金溪王氏总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13页。

⑥ 尹襄:《巽峰集》卷8《南唐吴氏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册,第220页上。

族之来者。”^①即采取欧苏五世为图的小宗谱法。有的宗族比较灵活,如豫章罗氏,“吾族之有谱也,仿欧苏之意,而不尽用其例,奕世彬彬,号称作者。”^②只是一定程度的借鉴而已。

修谱者在欧、苏谱之间,也会有所选择。江西吉安安福人吴节说本族谱,“其弘纲大要,皆取法于欧谱,而细书出处,则苏公之遗意也。”^③结合了欧苏二家谱法。吉水人毛伯温为王氏族谱作序,说王庆余命其子基定暨以达、选贤任修谱之责,族人问谱将谁仿?选贤说,“仿欧吧?”以达说:“我听说,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自宜说:“要不仿苏吧。”基定说:“苏善矣。然惟详其自出,君子病焉。”庆余说:“苏谱是仿,详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缺焉。”^④于是合族议,均表示赞同。该族的讨论谱例,从最初的选欧,改为选苏。

江西吉安吉水泥田周氏修谱,请罗洪先作序。罗洪先对于欧苏谱的议论颇可注意:

往见故家诸谱,咸祖欧、苏两公。苏谱主服制,服以五,故止五世,上杀下杀,世至于九,则服之变极矣。欧出吉水,喜远胄,胄远者,世多不续,故尝揭系立之传以间之。泥田始沂滨,下逮所生,列图以九,盖苏例也;图首汾翁,揭房之派,而不立传,杂欧例也。长老则曰:“注而复揭,赘矣。曷尽从苏顺乎?”乃损之,附以各文,文与世增,越几月而竣事。尝谓诸长老曰:“而知而谱之类于苏,亦知苏之用情矣乎?夫服之有五,本乎一身,至于曾、高、孙、玄而旁极于亲尽,固苏子所谓势莫如之何也。彼出于亲疏远近,而无有乎贫富众寡之别,原所禀之良,靡所加损,其休与戚,通为一体,五服有所不能限,则其情也。”^⑤

罗洪先所见“故家诸谱”,应当主要是江西特别是吉安的,注意到这些宗族修谱都依据欧、苏谱。认为苏谱主服制,欧谱喜远胄。泥田周氏谱主苏例而辅欧例,修谱过程中周氏长老以谱名下有注外还立传为赘,改为尽用苏例。洪先更指出,苏谱重视服制其实认为服制不能阻隔休戚与共的一体观念,应体察其用情至深。于是,他进一步指出:

故能同于族者,必能同于天下,而无有乎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之分,是治谱之学也。而其毋以苏谱治谱而善体之,其体之已者,能推乎人,而靡有间于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使他日日出是谱也,咸有所放,而不敢以载名之书视之。其于大姓先世,固皆不负矣乎?^⑥

修谱的要义在于不仅要超越服制内外的亲疏观念,而且要超越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之分,苏谱的这一深意需要好好体察。可见,罗洪先对于修谱的认识类似于“民胞物与”、“一本万殊”观念产生的意义,将亲情由个人、宗族推及天下之人。

① 黄仲昭:《未轩公文集》卷6《临川陈氏重修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第49页。

②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③ 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17页。

④ 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卷3《王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3册,第253页下。

⑤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泥田周氏族谱〉序》,上册,第552—553页。

⑥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泥田周氏族谱〉序》,上册,第553页。

还有人批评欧、苏谱略、隘。江西谱学发达,江西人不满欧苏者也较多。吉安永新人尹襄为湖南茶陵谭氏族谱作序,指出:“程子常言,管摄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莫若明谱系立宗子法。夫宗法之废久矣,溯源以详委,秩伦以著恩,惟谱系焉。系则今之谱,犹有古宗法之遗意焉。异哉,苏氏之言谱也,曰‘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然则先王之为宗法,系之一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至于百世不相忘也。而谓五服亲尽遂可以已乎?”^①所谓程子言,实为张载《宗法》所说,尹襄认为这是主张复兴宗法,而苏洵的途人之势无可奈何,是能够以宗法睦族、会族克服的,不能说五服亲尽就束手无策了。对于苏洵之语持保留态度。

有的对于欧谱情有独钟。江西人梁潜笔下多同省人族谱序,多参考欧谱,临川胡氏重修宗谱,梁潜称赞该谱:“其法本欧阳公小宗之制,而尤精密,仕止、生卒、葬娶、分合、行义之大概,无不备见。伯广又以其先世遗文可传于世者系于谱后。”^②洛阳刘氏修谱“乃用欧阳氏例,为谱图而传之,且引于其端。”^③乐平乔氏族谱“其法简义实,断自其所可知者,其间叙次纪载,悉放欧阳氏。”^④金溪吴氏族谱“乃仿康斋先生所为谱,质诸欧阳氏之法,博采旁证,以足其所未备。”^⑤所谓“康斋先生”是指抚州之崇仁人吴与弼,其号康斋,是著名学者。该谱仿照吴与弼所修谱,但参考欧谱而成。^⑥因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故江西人修谱多参看欧谱,反映出一定的同乡感情。吉安人尹台的谱序就更直接地反映出这种情感:

吾郡世家知重谱牒,盖自宋欧阳公开先焉。其法既播之天下为式程,后有作者不能或加矣。是故考泝百世,则推大宗之统同;更端五世,则参小宗之辨异。由之可以管摄人心,正伦理,厚风俗,巨室右族效为之不懈,其以辅翼世教岂微哉!^⑦

尹台还将欧谱的意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为可以“辅翼世教”。

也有人更喜欢苏谱。梁潜为福建福安县察洋陈氏所修族谱作序,指出:

昔老泉为苏氏谱,因其可知者而纪之,才五世。五世之上,亦一世而止。然自今称为谱之法,必取之苏氏,盖以其立法之善,纪例之精,尊尊亲亲,隆杀之节,有宗法之遗意,非深于《礼》者不能。故在当时,苏氏与欧阳氏之谱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今陈氏之世次与苏氏无异,其阙疑谨审不妄之意,又皆有得于苏氏之遗法。於乎!世之失其先世之系者常多矣,然必欲旁求强附,必不肯如苏氏五六世而止。及其为谱,求其能几于苏氏者,则未尝有,何其见之谬耶?然则如陈氏之谱,有足尚者矣。^⑧

① 尹襄:《巽峰集》卷8《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册,第217页下。

②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7《临川胡氏宗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70页。

③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2《洛阳刘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935页。

④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乐平乔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册,第967页。

⑤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金溪吴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册,第968页。

⑥ 关于吴与弼,可参考许齐雄《吴与弼的宗族观念》,《明代研究》第27期,台湾明代史研究会,2016年。

⑦ 尹台:《钦定洞麓堂集》卷1《泰和康氏族谱序》,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嘉庆五年尹氏刻本,第67页b。

⑧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察洋陈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07页。

察洋陈氏所修族谱参考了苏谱,记载世系不多,保持“阙疑谨审不妄”态度。而梁潜肯定“苏氏与欧阳氏之谱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并指出苏谱“立法之善,纪例之精,尊尊亲亲,隆杀之节有宗法之遗意”。安徽全椒陈氏宗谱亦本于苏谱,王直序言评论道:

夫谱所以明其所自出,使后人知本源之盛而思不辱焉,故著其所可知而阙其不可知,所以传信也。眉山苏氏出于唐眉州刺史味道,然皆失其世,老泉为谱,断自其所知者而录之,不敢加一辞,惧不信也。此作谱之法也。陈侯为此谱,本于苏氏,异乎人之牵合附会,乱其所自出,以取讥于君子者,贤矣哉其用心也!谱所著者六世,而文武之才备,它姓所罕及也,要在子孙善继而已矣。^①

全椒陈氏宗谱如同苏谱亦记载六世,继承了苏谱传信之意,有别于社会上“牵合附会”的作法。

(四)修谱犹如修史

族谱就是一家之史。南安府大庾人刘节,对于谱与史的关系多有论述。他为蔡氏族谱作序:“蔡氏族谱何?家乘也;家乘何?一家之史也。一家之史何?载一家之事者也。载晋国之事,盖晋史也。是故,载一国之事国乘也,国之史也。载一家之事,家乘也,一家之史也。”^②他以家乘同国史一样载事,晋国史既然可以称“乘”,家乘自然也是家之史。丰城鹤村杜氏修谱,其目次有:例义、世系、善行、女德、原始、外传,这是上卷;下卷之序为圣制、祠堂、丘陇、祭田、军田、牌额、书屋、井路、池塘、形势、条约、文艺。刘节的谱序说:“予惟谱一家之史也,故曰家乘。乘者载也,史以载事,家史载一家之事者也。是故观于杜氏之谱而知其所载矣。”^③该谱内容以类相从,分为18项,故刘节认为谱乃一家之史。刘节为筠州独城(江西高安)陈氏重修族谱作序说:“予惟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作史者有表、有志、有书、有传、有论赞评,体裁不一,义有攸当。……而筠州之派自江州始……修谱者详书而笔录之,叙之为谱,述订之为谱法,约之为谱系,衍之为谱图,纪之为谱传,广之为谱附,而世规终焉。统同合异,繁庶盛大,视迁、固、晔、寿诸史虽不能尽为比拟,而古今名家世族,如太原之王、彭城之刘、陈留之谢,殆相伯仲矣。”^④通过比较史书与谱书的体裁,认定族谱犹如国史。其实,刘节在作此判断前,先介绍陈氏族人合谒宗祠,具燕读谱行礼毕,族尊倡言修谱,得到众人同意。于是命族之“文学”者14人商议,乃推让贤且尊者主修,选出八人,而应雷则司其成。这样的组织,颇似修史任命总裁,设立史馆。

吉安永丰人宋仪望(1514—1578)对于谱与史的比较也颇为细致。宋仪望,字望之,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年间官至大理寺卿,师从聂豹,其学以王守仁为宗。陈氏置谱局修谱,宋仪望告诉陈氏:“家有谱犹国有史也。史纪国都、沿革、兴衰、治乱、山川、疆域、土田、氏族、风俗,典章制度罔不殚载,故其体繁,其事该;谱则考载止于其家其世,贵核,其事尚质,其文崇简。自昔史称迁固,谱推欧苏。议者犹谓迁涉远诞,固喜谀辞;欧病类迁,苏详所自出。夫涉远则近诬,喜谀则亡实,详自出则

①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全椒陈氏宗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4—495页。

② 刘节:《梅园前集》卷19《高州蔡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413页下。

③ 刘节:《梅园前集》卷22《鹤村杜氏小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460页。

④ 刘节:《梅园前集》卷25《筠州独城陈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524—525页。

遗疏。甚哉!史与谱之不易言也!史姑置勿论,厥谱要夫考年以著代,世次定矣;据事以论世,善恶辨矣;彰往以训来,劝惩行矣;假辞以尽意,性灵昭矣;创例以明变,书法见矣。然或贪附以眩俗比于无耻,侈词以诋众陷于诬亲,故谱有无要二戒。”^①提出史书体繁事该,谱书考载家世,贵核尚质而崇简。比较史学大家司马迁、班固与谱学大家欧阳修、苏洵,他们各有不足之处,殊为不易。就修谱而言,要定世次、辨善恶、行劝惩、昭性灵、见书法,戒除贪附与侈词。

还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家谱犹如国史的必要性。王直(1379—1462)认为:“古者受性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孙。故国必有史,家必有谱。”^②从分封制的角度论述诸侯国有史,诸侯之家有谱。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安福人彭时,自序《梅下彭氏家乘》,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岳正应约作序,就此话发挥,认为谱与史在齐家、治国上的一致性:“盖内外小大,家固国殊。至如齐治之本,所以笃近而举远者,未始异焉。”^③修谱可以“假谱垂训”。蔡清认为:“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是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间有聚焉。聚之大者为国,小者为家,虽与群物同一生育于天地之间,同一归尽于大化之内,然迹往而声存,事过而情系,自有不至与群物类者。此国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谱也。国有史则可以昭监戒,维世道;家有谱则可以序昭穆,厚人伦,小大虽殊,理则一也。”^④即谱与史的惩劝功能是一样的。罗玘认为:“虽然谱国史例也同一备遗意也,古者有功德者有天下,其次有国,又其次有家,特国大而家小焉尔,而备遗之意因之。”^⑤认为家谱与国史一样目的在于“备遗”,即是历史记忆的存在。明宗室朱诚泳的看法将族谱比拟国史:“族有谱,犹国有史也。予生宗室,未尝见民间所谓谱者,恒见史不知何以类谱邪,间与长史游邦贞论之,邦贞曰:‘史,国谱也;谱,家史也。二者正相类。’因取其谱以呈。予试阅之,见其卷首详次世系,犹年表也;末述行实,犹列传也。”^⑥认为族谱世系、行实相当于史书的年表、列传。

也有强调家谱与国史的不同。吉水人胡广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载事,谱以檄族。无史则国之政绩不见,无谱则家之世数不传。二者虽有大小,然其所系綦大矣哉!”^⑦认为史以载事,呈现国之政绩;谱以檄族,传承家之世数。嘉靖二十三年洪福为德兴洪氏谱作序称:“尝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所以明王制,详年例,立大防之典,谱所以统宗属,昭世系,秩彝伦之道,二者事殊义同。”^⑧该谱在《凡例》还强调:“家谱有劝无惩,非国史有惩无劝比。”^⑨

《豫章罗氏重修宗谱》的两篇跋文值得注意。隆庆跋文开宗明义:“族之谱,犹国之史。皆以纪载当时行事之实,三代而下,历历不泯,故家巨族,子孙万亿,未始不本于一人,号千万世之子孙,犹一气

① 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3《衡背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6册,第324页上。

② 王直:《抑庵文集》卷4《皋兰黄氏宗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19a页。

③ 岳正:《类博稿》卷6《梅下彭氏家乘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明成化刻本,第44册,第274页。

④ 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凌云叶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第674页。

⑤ 罗玘:《文肃公主峰罗先生文集》卷7《李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罗氏代文堂刻清钱陆灿批点本,第5页a。

⑥ 朱诚泳:《小鸣稿》卷9《丰城游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335页上。

⑦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12《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第50页。

⑧ 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德兴万下洪氏家谱序》,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木刻活字印本。

⑨ 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首《凡例》,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木刻活字印本。

也。能推一气之念,辩亲疏之等,则尊祖敬宗之心油然而生,风俗自底于厚矣。苟非子孙之纪录,未有不残阙焉,此世之系图非细务也。”并且寄希望于该谱“庶与国史相悠久也”。^①万历时的跋文在史与谱之间还提到志,“在国为史,在郡为志,在家为谱。”^②修谱犹如修志也是明代的一种看法。

二、族谱的名称与内容

(一)族谱的名称

明初承袭元代传统,宗族谱系之书多称“族谱”,此外还有其他名称。即以本文第一部分谱序提到的谱名而言,除了5例宗谱、2例家乘以及总谱与家谱各1例外。其余皆是族谱。这些名称有时可以混称,有时比较讲究,不同的名称其内容有别,分类有异。

家乘包括宗族世系与文献。如泰和人翰林学士杨士奇所修《杨氏家乘》:“自其所修家谱,以及其曾大父翰林待制而下,累世之遗文,与凡当时名公大贤之所撰次、史氏所书、碑刻所纪、通家文献之所可征,以至于咏歌往复、简牍之间有不可弃与不忍弃者,皆录之于此,以遗其后人。又以其皆有关于杨氏世德也,以属予序之。总之凡二十卷。”^③由于收集资料广泛,《杨氏家乘》有二十卷之多。庐陵进士杨黻所修的家乘也很丰富:“其先世行事之实,自几世祖忠襄公邦乂、几世祖文节公万里而下之遗像,及史传所书、墓碑铭文所纪,与夫一时追封褒卹之典,合为一帙,而类分之,为若干卷,题之曰《杨氏家乘》。”^④何乔新续其父何渊所辑《何氏家乘》,“分为六卷:一谱序,二族谱图,三宗谱图,四家传,五妇德,六先茔志。而附载地封制书、赠送诗文,而终以先世遗事。”^⑤

家谱与族谱的区分以高祖为界。江西南城人邓元锡家谱,因旧谱已亡,存碑独著五世,据碑而谱自高祖考所知而下,“其上杀、下杀、旁杀,即亲尽而恩存,故著其系牒,论次其遗事,曰家谱,明不敢标族也。”^⑥该谱世系为高祖以内,故名家谱,内容包括世系、事传、祠墓、祭田、遗文等。换言之,包括高祖之外世系,则称之为族谱可也。

宗谱记载始迁祖以来世系,以统不同支派。如现存《鄱阳洪氏统宗谱》,即以“统宗谱”为名,有的还在谱名上区分大小宗。又有其他谱名,如大同谱,吉安杨氏为宋代杨辂之后,嘉靖时所修之谱“名之曰《庐陵杨氏大同谱》,盖欲以是统诸族,使诸族据以为谱者,皆得不失所原。”^⑦房谱、支谱,《永新炎村刘氏石泉房谱》。^⑧还有“称本支族谱者,别本支前乎此者之冒也,称胡里胡氏者别所自出也。”^⑨

世谱。如岳正为安福《梅下彭氏家乘》作序称:“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公,自著世

①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罗氏世系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②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宗族谱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③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杨氏家乘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391页。
 ④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杨氏家乘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08页。
 ⑤ 丘濬:《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卷10《广昌何氏家乘序》,内阁文库藏明天启三年刻本,第4页b。
 ⑥ 邓元锡:《潜学编》卷6《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册,第497页上。
 ⑦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庐陵杨氏重修大同谱〉序》,上册,第526页。
 ⑧ 杨寅秋:《临皋文集》卷1《永新炎村刘氏石泉房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616页下。
 ⑨ 靳学颜:《靳西城先生集》卷16《胡里胡氏本支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2册,第647页上。

谱曰《梅下彭氏家乘》。”^①浙江有《东嘉王氏世录》，莫如忠称：“东嘉王氏之为家录、世录也，亦犹国史之遗焉。夫曰世录，录其世系者，凡详于记事，则左史法也。曰家录，录其家藏者，凡详于记言，则右史法也。”^②此“世录”录其世系，详于记事，以别于录其家藏、详于记言的“家录”。不过，泰和冠朝郭氏有《“家录”一卷，载世系诰词诸作。”^③亦称作“世录”。

有的将谱、乘合一命名族谱。如《方氏谱乘》方凤说：“夫水木本源君子知重焉。故考姓氏，别世系，则谓之谱。谱者录也，录其可传者以传也。有闻人别为立传，及纪其著作与其志铭焉，则谓之乘。乘也者，如车之能载也。皆君子重本崇源之意也。……我方氏自宋元来，可考者凡十世……手笔是册，先世系而文字继之，盖兼谱乘之意，而为之者也。”^④

还有一些特殊的谱名，多属于族谱文献类。泰和人梁潜谈到两部谱名较为特殊。庐陵新安罗西樵所录先世铭文一帙，名之为《罗氏先德记》。同乡萧氏族谱名称是《萧氏庆源录》。^⑤王直为人作序，“浮梁冯诚录其世系事实为一卷，名曰《世德渊源》。”^⑥梁潜同乡萧北辑录《萧氏流芳集》，其子工于绘事，图绘祖先像，又请名人将“先祖之美而形于赞咏”，希望“将与其世系通类而传之”，^⑦可见这是记载先祖德行、配图赞美的书。

(二)族谱的内容

明初经历过元末社会动荡，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林弼为江西人所作谱序中谈到，居住在江西丰城竹山的黄氏，“序族之世次，厘为谱图。”^⑧丰城朱公路“持其所谱族系”请林弼作序。^⑨这些“族系”、“谱图”当是简短的记载世次的谱牒。

明初族谱也有较大者。江西泰和多历史悠久的大族，如月池彭氏“以修谱为务，考而订之，辑而续之，取累朝诸先辈之文而系之，求当时名士夫之言以发之”^⑩。由于收录先辈文章，内容比较丰富。吉水解缙宗族之谱则颇为可观，解缙(1369—1415)，字大绅，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永乐初官翰林学士，谥文毅。解缙介绍自家的族谱，称解氏系出山西平阳府解州，几经迁徙，唐代解氏家于吉安庐陵，北宋仁宗时解希孟、解安父子定居于吉水县东鉴湖书院。解缙说他上距濮州公解安才十世，“家谱之传，中更大乱，收拾幸存。世有纂续，而其世年表、姻家、别录、先垄图志、宗支图记、姓原记、画像

① 岳正：《类博稿》卷6《梅下彭氏家乘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44册，第274页。

② 莫如忠：《崇兰馆集》卷10《东嘉王氏世录总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册，第517页下。

③ 王直：《抑庵文集》卷13《题刘先生高所书冠朝郭氏世录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1a页。

④ 方凤：《改亭存稿》卷2《方氏谱乘小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1—312页。

⑤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16《题罗氏先德记后》《跋萧氏族谱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542—543页。

⑥ 王直：《抑庵文集》卷23《冯氏世德渊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881页上。

⑦ 王直：《抑庵文集》卷23《萧氏流芳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891页。

⑧ 林弼：《林登州遗集》卷14《竹山黄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清康熙四十五年林兴刻本，第11册，第302页。

⑨ 林弼：《林登州遗集》卷14《航溪朱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11册，第303页。

⑩ 周是修：《乌菟集》卷6《题月池彭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清道光三年泰和周氏桂林使署刻本，第23册，第336页。

记、显扬记,委曲详尽,比于他谱,似为尤胜。又出于欧苏之谱之先,而世未能尽见也。”^①该谱除了世系之外,还有“年表、姻家、别录、先垄图志、宗支图记、姓原记、画像记、显扬记”八项,内容丰富。安福彭氏“谱之例一仿欧阳氏小宗之制,每五世别而为图,图之后又创为各世小传,以著其行事始终之概。其有功德显著如宝谟君者,史氏既有传,则抄附于图之次。或在当时得为铭志者,亦以类附焉。”^②彭氏族谱有谱图,附以小传、铭志。

何乔新为本省多部族谱作序,丰城游氏家谱重修,“凡若干卷。先之图以表其世系,次之谱以纪其行实,而历朝之诰勅暨名卿峻儒之词章附焉。”^③有图有谱,还有文献。庐陵陈时庄,“复取旧谱而增修之。自七世以上,则仍其旧,不敢辄有损益。八世以下,则详考而具录焉。名卿伟人之诗文为陈氏作者,各以类附录于后,总题之曰《庐陵陈氏续修族谱》。”^④也有诗文等文献。南丰曾氏族谱:“首谱序,得姓之由著矣;次家训,正家之道严矣;又次之宗图,世系昭矣;又次之家传,世德详矣。附以前代与当世名贤之文,所以光昭世美者备矣。”^⑤分为谱序、家训、宗图、家传以及文献。南昌梓溪刘氏族谱“其立例甚严,其考核甚精。自允迪而上,推本于陶唐氏,系序不紊,溯流而源也。自从礼而下,或居或徙,备录无遗,由本而支也。名讳字行各从其类,所以辨昭穆也。生卒娶葬具著于谱,所以纪终始也。附以诰敕之词,昭宠贲也。次以碑铭表碣之文,表善行也。其尊祖睦族之心,藹然见于斯谱矣。”^⑥除了谱系,也收录诰敕以及碑铭表碣之文。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天顺八年(1464)举二甲进士第一,弘治八年(1498)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预机务。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所作谱序也多反映族谱内容。江西抚州人吴懋贞请李东阳作谱序,介绍其父所修族谱:“又冠以宗图,附以世德、仕宦、墓田、家范及团拜、合祭诸仪,八年而后成。乡之为谱者莫加焉。”^⑦除了宗图还有世德、仕宦、墓田、家范及团拜、合祭礼仪。

上述谱序反映出一些族谱收录了宗族制定的家训以及家族礼仪。如江西南丰曾氏有“家训”,江西抚州吴氏有“家范及团拜、合祭诸仪”。

明中期的罗洪先所作谱序,更反映出宗族规训的内容在增加。如永丰人著名学者聂豹的族谱,强调“于谱之末,必附劝戒之辞”,并征询罗洪先的意见。罗非常赞同并受到感动:“附劝戒于谱者,盖将有以感动之,曰‘吾之所以为是劝者,非独举吾之爱也,即汝之所愿于祖考,亦欲汝之善为人之祖考者也;吾之所以为是戒者,非独举吾之恶也,即汝之训于子孙,亦欲汝之善为人之子孙者也。’先生以身率,而导之以情,又复若此,聂氏子孙有不全其爱者哉!”^⑧聂氏以劝戒表达对于族人的爱。庐陵贺氏:“作谱序、凡例、世系者三,曰内篇;贵贵、贤贤、稽实者三,曰外篇。于意若曰:凡为父子夫妇、兄弟叔

① 解缙:《解学士文集》卷5《吉水解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第27册,第533页。

②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彭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20页。

③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安沙游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5页。

④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庐陵吟溪陈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6页。

⑤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南丰曾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7页。

⑥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南昌梓溪刘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318—319页。

⑦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金溪吴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第3册,第968页。

⑧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永丰聂氏族谱〉序》,上册,第525页。

侄以至于群从者,必求其慈孝和义、友恭爱敬,而非徒以父子夫妇、兄弟尊卑之名为也。贵贵者为其能达乎此,贤贤者为其能守乎此,而皆有实可稽,亦非徒以其贵、以其贤之名为也。”^①该谱分内外篇,内篇是通常的族谱世系,外篇是为了教育所设,起到教化的作用。丰城《鹤村杜氏小宗谱》分上下卷,上卷内容包括例义、世系、善行、女德、原始、外传,下卷有圣制、祠堂、丘垅、祭田、军田、牌额、书屋、井路、池塘、形势、条约、文艺。有18项之多,分类细致,其中“条约次之,端谟正范,严家训也。”^②明中期江西族谱分类更加细致,条约的出现表明宗族加强了对于族人的规训。

明后期,江西族谱内容更加充实,强制性族规进一步增加。嘉靖时,吉安《庐陵下村周氏谱》“首之以宗图,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规,终之以家乘。”^③陈九川为江西抚州《乐安招携谭氏重修族谱序》说:“今观董子燧之为谭氏谱也,其亦思变乎?系远祖而谱始迁,录显功而刊繁博,又道之族约,而惟祭田、坟墓附焉。”^④赣州甘氏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修谱百余年之后,时当万历中叶,“大中丞虔南甘公开府浙中,卓然以明教训俗、兴复古道为己任。……凡祠墓志传、宸章公檄、艺文族约之类,靡不具载。”^⑤抚州府乐安,“三原之毕徙自唐方,自三原徙者,若钱团,若杭村,若流坑。……谱始静翁,重始迁也。五世一图,溯承系也。图各一传,表行实也。凡生者、歿者、歿而葬者、妻人者、妻于人者、后人者、后于人者、与无后而止者,举详图传中,惧愆忘也。统之以谱例,申之以宗约,示信守、严彰瘕也。人贤有传,忠孝节义有传,文献有纪,昭显扬,阐幽芬,树气风教也。”^⑥《毕氏族谱》有图有传,有谱例、宗约,还有传记、文献。其中“宗约”起着“严彰瘕”的扬善斥恶作用。吉安安福人刘元卿本族的《密湖刘氏族谱》分为原乘纪、原世纪、世系纪、爵名纪、祠墓纪、迁徙纪、徵翰纪七类,其中祠墓纪内容有:“于烁祖祠经之营之,惟众力是赖;增定祀仪,编集家范,小子元任之,父更参定焉。”^⑦晚明瑞州府新昌天宝徐氏“先是两派各有谱有祠,几欲合未果。今合焉,而族之支庶可次第已。然犹以欧、苏两谱第谱其世系,今族繁且远,则墓碣多,恐或庀废,于是次以世墓。且也祖先披草莱,立门户,思其笑语,思其饮食,不可忘也,于是次以祠堂、祭田、祭仪,遵王道,守圣训,以保世亢宗,聿修厥德,于是次以家规十条。仕者矜名节,处者修行谊,及闺房贞烈,如金如石,于是次以仕籍、恩例、隐逸、内则。至于累世铭传,与名公卿大夫、硕德巨儒诗文赠贻,诚传家之天球大训也,于是又次以世章。兹则于欧、苏二谱外另有其美,卓哉太史公家法已!”^⑧徐氏族谱合两派支谱,世系之外还有世墓,祠堂、祭田、祭仪,家规十条,仕籍、恩例、隐逸、内则,铭传、诗文,世章。形成自身特色。由上可知,嘉靖时,吉安、抚州的祠规、族约,万历时赣州的族约、抚州乐安的宗约、吉安安福的家范、瑞州新昌的家规,这些祠规、族约、宗范、宗约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宗族强制性规范的加强。

①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庐陵贺氏族谱〉序》,上册,第534页。

② 刘节:《梅国前集》卷22《鹤村杜氏小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717页。

③ 邹守益:《东郭邹先生文集》卷2《庐陵下村周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第648—649页。

④ 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7《乐安招携谭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第104页。

⑤ 申时行:《赐闲堂集》卷10《甘氏续修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第200—201页。

⑥ 董裕:《董司寇文集》卷2《毕氏族谱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68—569页。

⑦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107—108页。

⑧ 胡维霖:《胡维霖集·长啸山房稿》卷2《天宝徐氏族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85—686页。

三、族谱的体例

江西的谱例值得注意。蔡清还记载了江西新淦周氏族谱,“首凡例,次图志,次先茔表,又次文翰,卷数不一,视故族谱详且密矣。”^①该谱有凡例长兴曾氏谱例较为特殊:

先之曰小宗谱。自洪而上,距孟昭凡五世,凡孟昭之所出皆与焉,大概从眉山谱也。次之曰通谱,自洪之孙而上,距荣凡十八世,凡荣之所出在长兴者皆与焉,大概仿庐陵谱也。又次之曰源流、曰会谱。有二,其一为陶原,祖南丰;其一为南丰,祖抚州吉阳南武城。自千而上,距受氏之始,凡若干卷。而受氏以来,迁徙开闢,留其大都焉。大概述陶原、南丰谱也。^②

该谱体例有小宗谱、通谱、源流、会谱。江西分宁周氏用欧、苏二家例,以谱十有三世之可知者,“又手分为内、外二编。内编以详派系,外编则文献存焉。”^③《丰城觉溪徐氏族谱》:

徐之先源于丰城觉溪,一徙郭内火巷,一徙郭外斗门。……猷和复与桐城君、二省元及族之彦者合而谱之,首据旧谱名讳,绘宗系于前,析郭外者题曰《斗门支谱》,郭内者题曰《火巷支谱》,总题曰《觉溪徐氏族谱》。为志四,有《恩纶志》《家政志》《艺文志》《坟墓志》。为传三,有《仕宦传》《耆逸传》《内德传》。共若干卷。^④

四志三传的谱例,近似史书。

修纂族谱,有一定的叙述法则,称之为书法,或曰书例。永丰郭汝霖(1510—1580)所修《层山江边郭氏族谱》的《族谱例义》留存下来,其内容是:

汝霖曰:家之谱,其国之史乎?夫创制者必陈其意,观往者宜据其要,作例义。

夫郭氏谱凡数修矣,然体制多未精当,予因是录作者之序文而定其制。

夫郭氏居层山自定功始,然保姓受氏必有所自,叙派源。

夫谱必有系以著代也,必有传以征实也。由一而二,而十百千万,由十百千万而本于一,其系乎君子可以合爱矣。由名而字,而行而号,而生歿葬嗣,而行实大略,其传乎君子可以论世矣。

夫郭氏自定功至于今,录者凡二十一世,自一世至十三世,总为一传,其下则又为变例,盖吾郭氏七世祖兄弟凡六人,其三祖之子孙至十三世多不嗣,嗣而传者,惟德明、德昌、德茂三宗之后,至十三世而族繁矣。于是自十三世以下则各自为传,而以三宗提其首。呜呼,稽考者其便矣。

予观李子谱有外传,而今不作者众也,繁也,妻列于夫传,夫为妻纲也。其姓族之大而显者,

① 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新淦周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2册,第675页。

② 罗玘:《文肃公主峰罗先生文集》卷7《长兴曾氏族谱序》,第14b—15a页。

③ 陆深:《伊山文集》卷38《分宁周氏族谱后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影印明嘉靖陆榘刻本,第1册,第483页。

④ 郭子章:《蟪衣生黔草》卷11《丰城觉溪徐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册,第365—366页。

则详其出,详其处,次惟著其氏,严婚媾也,女之适人者同乎是。

夫礼谨婚配,其继娶而得室女,必详其出,而又出于名族,则详其处其得改适者,惟书其氏,而或出于名族,亦必详其处,不详其出,至庶室惟氏而已,於乎,名分之际,其严乎!

夫纪行所以表贤,表贤所以贞教,是故孝子弟、弟贞妇不可无识也。然古谓盖棺事乃定,今自十七世以下,即有贤行弗录,阙生存也。要之以俟后世大雅之君子。^①

交代了派源、总传、分传、外传、女性、贞孝的体例、书法。郭汝霖在族谱女性传记的编纂上,也考虑了李子谱(李梦阳)专设外传的谱例,只是鉴于因为本族女性众、繁而未作。

广信府铅山费元禄(1575—?)修族谱,文集载其《族谱四篇》,其中《例义第一》也反映出对于李梦阳《李氏族谱》的借鉴:“李空同之谱李氏,褒然名家,其称欧苏之谱谬,详远胄非纪名实,名实者子孙之所以录其先人,恶可无征乎!……(余)聊以其暇而辑录之,始图,叙世次,列名讳、生歿、丘墓,盖原始要终,人道之成,有夫妇而后有父子,礼义始有所施,书姓氏生歿,以著偕老之义。丈夫有封爵、善德、功烈、勋劳,文章质行较著者,则传表而出之,妇有改适者削之,妾有子者附之,女嫁者则列之外传,而终之以谱序。列明本义,其取法自周,取裁自史,自本二公起,讫余兄弟而止。然录其大者,要不能尽收也。当别有宗谱。”^②认为李梦阳是修谱名家,重视其纪名实的主张。费氏谱也是“讫余兄弟而止”,与李氏谱例义相同。费元禄书例对于女性也比较在意。

四、族谱的修纂

明代族谱修纂盛行于江西,族谱修纂依据宗族、聚落的民间文献,注意族谱求真防伪,筹措经费,不断续修,保存族谱。

(一)修谱盛于天下

中古时期士族由于婚宦需要,盛行谱牒,世家大族集中在北方。宋以后士族瓦解,科举制下的士大夫虽有私谱修纂,主要流行于南方。江西人彭韶指出:

唐宋以前,北方世族专尚谱牒,后有狄难,遂至散逸,而南方代兴,谱家有之。然文山谓: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一二。岂不以窃附先贤、杜撰似续者众欤!噫,此其意云何而得谓之善谱乎?今公之修,独异乎此,不冒荣显,不遗窳贱。要之虽不及前代北方之谱之盛,而亦非今世南方诸谱之所及也。^③

即认为中古时期北方谱牒盛,宋以后南方谱牒兴起。罗洪先指出战争是造成谱牒修纂北方衰落南方

① 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第491页。

② 费元禄:《甲秀园集》卷2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2册,第428页。

③ 彭韶:《彭惠安公文集》卷2《三原王氏族谱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影印明万历彭继美刻本,集部,第351册,第34页。

兴起的原因:

江北古来战争地,滁和以东,五代至国初,尤当兵冲,蹂践抄掠,莫计启辟。夫土无宁宇,人无强宗,转徙靡常,见闻弗逮,厚本敦爱,感无缘生。士人非甚好古,视谱咸若赘余,其势固然也。惟江以南,中原限绝,祸非难首,定自传檄,间入割据,败不旋踵,宋元遗构,僻隐宛存。故谱牒莫盛于江南,而附援亦惟江南为甚。^①

南宋元明江南谱牒兴盛。

明代修谱盛于江西。著名学者丘濬说:

今天下分两畿、十二藩服,而人家谱牒之作盛于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盖有四焉:江乡土绵地瘠,季世割据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图籍不尽毁于兵火,一也。习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仓卒变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门地,崛起之家虽盛显,物论终不之与,所谓故家右族恃谱牒以为文献之征,三也。人以读书为业,虽田夫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猎书史,丧乱之余,文籍散失无所于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忆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谱牒所以能独盛于他方。^②

江西修谱吉安府尤甚,他分析原因有四点。吉安人罗洪先也讲到当地聚族而居,族系清晰:

惟江以南,人无远徙,群其族而居,寡弱者不下数百人。仕于朝,虽位卿大夫,不忍去其乡,其尊卑之叙,历数十世可不紊,又惟吾吉为最。吉之著姓,彭其一也,而族皆不同。为南唐中丞嵩之后,徙自金陵者,曰吉州司马仁贞,子慕庆为安福兵马团练使,四世为宋进士德全,始居安成邑城中,当时号为华秀里。华秀里人既繁盛,而嵩之别子亦多散处郡邑中。^③

以彭氏为例,就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文中的“安成”即安福县的别名。

江西修谱甚有传统。郭子章指出:“豫章故家多重谱牒,说者谓昉于欧阳永叔。予谓欧谱例也,谱之实不自欧始。当宋之初,德化之许、奉新之胡累叶聚居,至数百口。江州陈氏宗族千余,世守家法,肃于公府。南康洪氏六世同居,室亡异爨,太宗至飞白‘义居’字旌之。此谱之实也,而亦非自宋始也。”^④在郭看来,虽然宋代欧阳修倡导修谱,仅是提出谱例,宋代还另有修谱者,江西修谱既不始于欧阳修,也不始于宋。

江西与徽州盛行族谱,而江浙不及。徽州休宁人程嘉燧指出:“自唐衰谱牒沦废,士大夫不讲久

①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滁阳胡氏族谱〉序》,上册,第550页。

② 丘濬:《琼台诗文集重编》卷10《吉水龙氏族谱序》,第1页。

③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安成华秀彭氏族谱〉序》,上册,第523页。

④ 郭子章:《螾衣生黔草》卷11《丰城觉溪徐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册,第365—366页。

矣。今新安、豫章山谷间故家遗俗,其载籍犹有存者,吴越废著,迁徙不常,虽公卿巨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①他将江浙人迁徙不常、不知所自作为谱废的原因。

(二)修谱的依据

明人修谱,往往依据一些前代遗留的各类文献。泰和南溪曾氏的修谱经历较为详细。据同邑王直介绍,南溪曾氏:

自宋元以来,屡经丧乱,谱牒失亡,不知其所以徙。族之故老相传,宋淳祐中始祖和甫以儒业,教授南溪罗氏。罗氏赏富甲一乡,爱和甫才行异常人,以女女焉,于是遂居南溪。生子一,曰南山,字镇重。镇重生四子,曰可翁、祥翁、仁翁、元龙。可翁、祥翁、元龙之后皆失传,独仁翁四子以德、以观、以敬、以礼。盖自和甫至是四世矣,其子孙日益众。然水木本源,尚弗克究知。洪武中,以德子文昇与诸弟允昇、远昇始得和甫先考之墓于蕨原,墓前之石则和甫所题署,然后知自蕨原徙。乃封表其墓,而买田祀焉。属其塾师梁子瑗先生为作谱,而终恨失其详。文昇三子某、某、嗣宗,允昇子梦浙,远昇子季宗,与诸兄弟逊宗、沂宗辈皆注意求之,阅陈年簿书,得元龙分产契约,其所载甚明,乃知分自蕨原无疑。^②

据此,关于该族始祖和甫,原来只有故老的传说,洪武中发现始祖父亲之墓,有始祖和甫的题字,得知迁出地。又请塾师作谱。后辈子孙“阅陈年簿书,得元龙分产契约”进一步证明分派的迁出地确凿无疑。可见除了坟墓资料外,契约文书也是修谱很好的参考资料。

修谱者也参考亲戚家的族谱校对、互证。如泰和人梁潜为廖氏族谱作序,他说:“廖之先,始自金陵迁泰和,至今海康教谕潜仲,凡十有五世。为之谱者,潜仲之大父愚寄先生,自强父也。其后复系一图,特详于本宗,则先生之曾大父梅涧所作。……梅涧娶梁氏,盖吾六世祖凤翔公之女弟也。因以吾家谱合而参之。”^③通过考证,解决了不少疑惑问题。

修谱往往在祠堂设谱局,历时较久,诚非易事。豫章罗氏“设局于官庄报本堂,搜各宗旧存往牒,某也从某处徙某地,某也自某处赘某宅,溯本寻源,辨分明继,一脉如众派之汇海,越八年始克告成。”^④鄱阳洪氏修谱“凡预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裹粮有会,有一再往返者,有三四往返者。订正同异,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稿者。”^⑤

(三)世系分合问题

明人修谱,最困惑的是世系问题。这其中既包括始祖或始迁祖以来的世代传承,也包括祖先以来分衍支派的通谱合族。我们考察一些族谱修纂的具体处置情况,以便了解宗族的聚合与分离,有

① 程嘉燧:《松圆偈庵集》卷上《侯氏世略序》,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5页上。

② 王直:《抑庵文集》卷6《南溪曾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9页。

③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廖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00—401页。

④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宗族谱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⑤ 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告》,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木刻活字印本。

助于认识宗族形态。

吉安吉水泥田周氏,杨荣概括该族状况:“吉水泥田之派,其先盖出吴将瑜之子都乡侯胤,始家庐陵之乌东。唐长庆中有曰沂滨者,来居泥田。沂滨生整。整四子,其后遂分为四大族。由四族而分者,又不可以一二计。”^①梁潜的介绍更为详细:“由沂滨距今四百余年,凡二十有四世,其族益繁,其分而自为派者十有八,若卢兜、网村、官洲,若长沙、安福、永新。虽既分,或犹详其系世,或止著其始分之由,是皆因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详于所分之派,使可参而见也。然泥田之族尤盛,联比以居者常千余人。”^②该族自唐至明二十四世、十八派,修谱时各派记载详略不一,聚族而居于泥田的族人达到千人之多。这十八派是以四大族即四房为基础的,金幼孜对此有介绍:“整生四子,曰庭显、曰庭光、曰庭实、曰庭充。自是子孙蕃盛,遂析而为四。其居水边、安福、永新者,则为第一房。居上冻者,则为第二房。居楼下、卢兜、天柱冈者,则为第三房。居下冻、高屋、大安、网村者,赋罗坊、官洲、长沙者,则为第四房。夫以四族之众,其地非一处,其居非一乡,其系非一世,其传非一人,而其戚疏之等、远近之分、系序之承传、支派之分合,可指而定焉。”^③在金幼孜看来,周氏宗族属于“故家大族”。

吉安泰和南富王氏为世家大族。泰和人王直谱序介绍该族:系出太原,唐季王该避乱来江南,始居庐陵何山,又徙居安城之连岭,族日以蕃。其后有讳宸字明远者,始来居南富。明远生师儒,师儒生明道、美道、乐道。乐道之后无传,而明道、美道子孙皆蕃衍。明道之后存德居南塘为一族,美道生元功、元承。“子孙之多,故址不足容,乃析异而居,势也。此谱之作,著美道之所出,所以合异而为同也,故特致详焉。盖元功子经之居枣园,为枣园族。其后四世孙曰敬翁,居池头,为池头族。五世孙曰用中,居石滩,为石滩族。经之弟建之居槐下,为槐族。元承子益之好楼居,则为楼下族。孙庭冕析居下塘,又为下塘族。自美道一人之身,而分为六族。”^④所谓六族,出于子孙不同时代的迁居造成。

吉安安福瓜畚邓氏也是大族。刘球指出:“安成多大族,而瓜畚之邓最盛。盖自梅魁翁开业垂荫以来,非惟发科登仕连世有人,其以人庶而地不足为容,析居横石、金谿、下店、汉江、横店、斗塘、清陂、安田、枫林,凡十数派。所至未三四传,则又以地之小而谋他析者,不可以数计。其生之蕃也,他族歉克俦。”^⑤该族也有十数派,不断析居,多是未三四传,又以地小而谋他析,据此徙居分派的原因是地小人多而另谋聚落。再看安福刘氏。刘元卿说:“自家安成来,历世三十有奇,历年七百六十,为大派者十八,为小派者数十,而其初固一人之身也。”^⑥分派林立。

安福的宗族还有院派结构的古老大族。安福人吴节的两篇谱序谈到“院”,天顺三年(1459)谱序说:“吾邑西九十里,地名洋溪,刘氏世家焉。余与刘氏分属外甥,当弱冠时,得睹其族姓旧谱,乃知创基者自唐太和安成令讳富字礼尚号三致公始……后传三子,分东西中三院。……倾以表兄资输推安成赋税长,来京谒余于官舍。……今归梓意必遵欧苏谱例,斟酌重新……吾闻吉州之刘共宗虽

①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5《周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第29册,第477页。

② 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泥田周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册,第403页。

③ 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7《周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四年金昭伯刻弘治六年卢渊重修本,第43页。

④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南富王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512—513页。

⑤ 刘球:《两谿文集》卷12《瓜畚邓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年影印明成化六年刘钺刻本,第38册,第419页。

⑥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107—108页。

一,而其派有三:一曰楚元王,一曰中山靖王,一曰长沙定王。洋溪远祖则长沙分封之安成侯,近祖则大唐莅治之安成令也。”^① 据此,刘氏在唐代分为三院,吉州之刘共宗为一,其派有三。吴节为本族所作谱序,记载更细,他说:“天顺初,焕文之孙纯夫与道贯之子嘉绩,乃遍游诸邑,得各房源流之自,并生息葬娶之详,汇为一大帙,题曰《吴氏重修宗谱》……大抵皆因嘉定、咸淳之旧而疏之。自主簿公而下至通议大夫瓘,凡六世,以上中二院为一图,所以总众房之祖也。自六世以下九世为一图,中院则有里、西昌、白沙之派,上院则有烟冈、桂江、横路、安成、庐陵、永宁之派,而古攸、酃邑、增城等派,则又诸派中之所分也。”^② 该谱依据南宋旧谱修纂,有上、中二院,院下有派,此外还有房。

将不同支派的谱系统于一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如宁都南团曾氏族谱,该族修谱颇为反复。洪武中曾国良之谱,被认为是贗谱。后来发现元代乡贡进士光贤的旧谱,与诸墓之碑合。然而下村、临池、小源同县,会谱也易,“市山隶南丰,其府今为建昌也。望仙隶乐安,后湖隶金谿,其府今为抚州也。睦陂、新陂、龙潭隶永丰,其府今为吉安也。凡为府者四,皆远数百里,其会谱也难,然亦无不历也。始于弘治元年,迄今有成,于时实五年也。”^③ 历时五年修成的该谱,联合了四个府的不同支派族人。

(四)修谱的求真与作伪

明人所修谱力求克服时弊,修出可信族谱。龚敦《书泰和袁氏族谱后》指出:“余阅人之族谱多矣,往往痛系牒之不存,而以古人之显者旁蹊曲径,剽窃绪余,牵合世次,美则美矣,其如是非莫辨何?有识者观之,不直一笑。如袁之得姓亦久矣,始于春秋之陈轅涛涂,至汉之邵公,晋之彦伯。逮六朝以来,名贤辈出,本初公路亦一时人豪,在他人则祖之宗之。彦政乃独断自金陵八世祖以下,以迄于今,盖不忍弃其亲而求其疏,舍其真而取其伪也,使郭崇韬闻之,宁不大愧于心乎?”^④ 称赞袁氏族谱舍弃春秋时陈国的得姓之祖轅涛涂,从始迁祖记载谱系。批评不少族谱为攀附古代名人“剽窃绪余,牵合世次”。

吉安修谱盛行,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丘濬指出:“然其间亦不能无积习之弊,失在于好攀援古名贤显宦,以粉饰其家世,张大其闾闾,凡刘姓者皆长沙定王之后,张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无一族无所自来者,此虽天下通弊,而于兹则殆甚焉者也。”^⑤ 吉安存在“好攀援古名贤显宦”的现象。泰和人陈循说:“乡邑鄙人有与(郭)侗同姓者,往往冒其支裔,以为所从出。至诬名卿大夫求一言以取信于后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论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谱之所载,不可以不谨也。”^⑥ 郭姓有冒其支裔的情况。泰和人萧铤也说:“窃怪世之为谱者好为夸诞以欺人,往往旁证曲引,牵合他族之显者为美谈,而由君子观之,盖不在此也。”^⑦ 反对牵合他族之显者的夸诞行为。吉安府的一些宗族为了防止他人冒认,于是有烧毁旧谱的做法。吉安安福人刘元卿说:“余读湖谱所载南溪谱序,寥寥数篇,恨不能知先世作谱者次第,欲覩得旧谱观之,而已毁于火。先是湖谱既成,虑旧谱落在人间,或为私鬻冒认者之资,遂搜而尽付丙丁。”^⑧ 可见族谱一般是不愿外人阅读的。

① 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洋溪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15—416页。

② 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17页。

③ 罗玘:《文肃公圭峰罗先生文集》卷7《南团曾氏族谱序》,第8页。

④ 龚敦:《鹅湖集》卷6《书泰和袁氏族谱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第684页。

⑤ 丘濬:《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卷10《吉水龙氏族谱序》,第1—2a页。

⑥ 陈循:《芳洲文集》卷5《西昌冠朝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174页。

⑦ 萧铤:《尚约文钞》卷4《浮山李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第47页。

⑧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溪谱举要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108页上。

江南重视谱牒,但附援名宗问题严重。罗洪先笔下有这样的描述:“江南重谱牒,多推原世系所由起,与何代相准,自始封迄今几百年,少亦不下数十世,其真贋不可穷诘,而父子承传,祖孙分聚,莫不凿凿可据。至举他书相证,或疏或密,或增或损,即彼此不能吻合也。故江南谱牒,率远胄而多贵种,任割截而轻附援,概之名宗得免者鲜矣。”^①即江南谱牒祖先多追远前代贵种名宗,族谱存在割截、附援之弊。这里的江南应当也包括江西。类似的告诫还有豫章罗氏:“昔狄青不敢轻附梁公,而崇蹈遂拜子仪之墓,一为美谭,一所羞称,故本宗尚有阙文,而非族宁容紊乱,则冒插之禁尚严也。”^②

(五)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

修谱需要筹措经费。族田如有盈余,可以用于修谱。如果宗族无专门修谱经费,则往往通过众筹或捐献筹措。江西王师仁万历时,“首出六十金,始议谱其族。”^③是士大夫捐金修谱。鄱阳洪氏统宗谱“鸠金刻梓,有捐数两者,有捐数十两者。”^④花费了二百余两。

修谱防止经费冒费也就变得必要了。豫章罗氏要求:“各族繁简合用梨板、纸张、镌工等费,充用而止,工完仍揭传众知,以后真正仁人孝子,必出而任事,其一切图尝齑之辈,必退而敛迹,亦可为家教之一劝,则冒费之源当清也。”^⑤

族谱纂修的间隔时间不一,民间有三十年修谱的说法。宋代苏洵的《族谱后录下篇》已有“以三十年而一易世”的三十年一世的计算方法。^⑥明初抚州乐安人萧仪说:“乐安旧家诸谱,所载率不过二十余世,有断自可知者,有始自始迁者,其间不及二十世者加多,其过之者加少。世以三十年为率,为世二十则为年六百,五代之乱,谱牒散失,诸增修之于宋,由宋初迄今,未五百年,而谱所载率六百余年,其百余年盖多故家遗老之所追录也。独同邑罗溪陈氏之谱,所载三十余世,盖脱于五代之厄而存盛唐时所录也。……国朝承平五十年,谱学复兴陈氏者……旧家诸谱荡尽于五季,微于宋元之乱,而陈氏之谱完具如故。”^⑦可见三十年为一世是当时计算世代的一般标准,乐安旧谱所载通常是二十余世,个别如陈氏则有三十余世。顾大韶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指出三十年的重要性:“大约十余年而为纪,一纪而子姓一倍。三十年而为世,一世而子姓再倍,推而论之,固有大父未死而孙息盈十;五服未斩而宗枝盈百者矣。”^⑧可见明人对于三十年为一世,有自己的看法。魏禧认为:“族谱之作,上以纪祖宗世次,久而不忘;下以合其宗人,世远人众而不失亲。古之言者备矣。人事十年一变,三十年为一世,世凡三变矣。故家谱率宜三十年一修,远则二世六十年极矣。六变而不修,则先世之事必遗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献必散失,丘墓多亡。”^⑨这是从人事变化的角度论证的,认为宜三十年一修谱。

不过在故家大族强盛有修谱传统的地区,修谱间隔时间较短。如吉安地区,王直说:“今宗法既难

①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高安云冈况氏三修族谱〉序》,上册,第554页。

②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③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金滩王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108—109页。

④ 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告》,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木刻活字印本。

⑤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

⑥ 苏洵著,曾枣庄、金城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14《族谱后录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84页。

⑦ 萧仪:《袜线集》卷5《罗溪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434页。

⑧ 顾大韶:《炳烛斋稿》不分卷《陈氏族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第551页下。

⑨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8《阎氏本支录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册,第584页上。

复矣,士大夫家犹幸有谱牒可以正其本而联其支,虽宗族繁盛势不得不分,然至于久犹能知其所自出与其所当亲,则谱牒维持之力也,故君子尚之。”^①他以吉水泥田周氏为例,说明士大夫对于修谱的重视,“泥田之谱每一二十年而一修”。^②如此勤修族谱,还可以得到另外的事例证明。罗洪先说自家族谱:“谱始宋淳熙,尝限十年而一书,今可考者五书于元者,三书于明者,二此皆先吾而有意于族人者也。”^③十年一修谱是很密集的。罗洪先修谱不辍,他说:

昔在丙戌,先大夫以谱授小子洪先,命之曰:“谱不续百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播迁,未能卒业,汝勉哉!”洪先受而藏之。当是时,年才弱冠,未知斯言之难也。嗣是收辑散亡,岁有所书,志行弗加,颓焉就老,常恐奄忽无以光先大夫遗命。戊申,集《世系图》《内外传》《名位表》。己酉,草《居徙考》。丙辰,《传》《表》成。癸亥,《祠墓志》始就。将以告于祖庙,授之族人,而先大夫背弃盖已三十余年于兹矣。^④

可知该族谱修纂持续时间较长,族谱修成距离开始修纂已经三十年以上。所以罗洪先宗族早期的“限十年而一书”,后来也难以做到。吉安修谱间隔时间较密较疏的事例都有,隔几十年修谱者,如泰和人郭子章说:“夫人子孙所以事其祖宗者,其道有三:一曰营宗庙,二曰丰粢盛,三曰飭谱牒。夫宗庙、粢盛得之有财,皆用之,惟谱牒最难。……吾吉自欧阳文忠公以来,创为谱式,乡人宗之。”^⑤他介绍浣溪郭氏谱始修于宋嘉泰枢密公自撰《源流记》,再谱于元至正间,遭兵燹,流传仅十一。三谱于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四谱于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五谱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万历时则六续矣。可知从三谱到四谱隔了三十七年,四谱到五谱则隔了六十八年。永丰汤氏“起于宋平叔以来,几二十世,谱凡五六易矣。”^⑥间隔时间较密者,如安福人刘元卿说:“吾刘氏世族谱修于梁者一,续于唐者一,修于宋者三,于元者八,于国朝者二十有四,亦可谓勤矣。”^⑦

修谱确实有难度,一般来说间隔时间不太稳定,需要几十年。乐安人曾维伦,万历八年(1580)进士,他为象峰原氏族谱作序,说该谱“入我明一修于永乐己丑,再修于宣德甲寅,三修于嘉靖己未,合今谱为四修。”^⑧即一修于永乐七年(1409)再修于宣德九年(1434)三修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一修与二修间隔25年,二修与三修间隔125年,三修与四修间隔约在几十年。二修与三修间隔时间太长,其中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族谱的保管也很重要。杨士奇族谱由宗子房掌管:“祖宗所遗一应碑铭行述、诗文稿草,片楮只字,及家乘谱牒之类,并委鹄收掌爱护,不许损坏,但略有损坏,即是不孝。盖此系吾家传世之宝,子

①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497页下。

②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498页上。

③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9页。

④ 罗洪先:《罗洪先集》卷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7—558页。

⑤ 郭子章:《贻衣生传草》卷1《浣溪郭氏续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册,第586—587页。

⑥ 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2《吉永丰家族文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册,第15页上。

⑦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107—108页。

⑧ 曾维伦:《来复堂遗集》卷9《象峰原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9册,第414页下。

孙所当谨守为是。鹄继伯威兄之后,系宗子房下,故当掌之。”^① 鄱阳洪氏“今以千字文编号,每族止以一字为记,然宗派寡众不等,或该一二本者,或该三四本者,或该五六本者,于各号不填写数目第几,乃以条印逐篇钤记钤之,庶俾奸弊不生,而各族知有稽焉。”^② 该谱共印 52 部,谱中列出持有者。

族谱是宗族的珍贵文献,自然非常珍视。在社会动荡时期,宗族千方百计保护族谱。如泰和周氏宗族族谱的事例。周是修说:

吾祖由金陵来止泰和爵誉里,历西台御史、仆射、朝奉大夫,至潭州主簿,自爵誉徙居灏江。再传至高祖月溪,徙桐山。又三传至先考君邦贤,徙阳冈里举子冈。既于兵燹,宝藏吾氏之宗谱惟谨。谱有燕山窦禹钧子俨为之首序,有益国文忠公为重修序,有太祖夫人金花封诰二。庚子秋,挟厚贲避地五云,寓大原里。有仝姓富室愿以百金买诰而叙同宗之好,先君怫然曰:“而欲以百金鬻先世之封赠于他族之不肖子乎?是何卑我之甚也!”其人赧而退。乃别制帛囊,贮谱诰,加于荷檐之上,意有急则弃檐携此以窜。荷者弗之知,至地名分水,愈不堪其重,揣帛囊,疑卷轴为绘像,即恚曰:“命且不测,犹荷绘像乎!”解而弃之。去十里行,始相及问其囊,以实对。亟反而求之,留月余,竟不复得,忧愤成疾以卒。

呜呼!先君值艰世,而保护宗谱若语如是之至,盖将以遗于后之人也。不幸为荷者所弃,致疾而终,其志固可悯矣。^③

其父保护族谱颇费心机,因丢失帛囊中的谱诰忧愤成疾以卒。

万历三十八年(1610)罗相告诫豫章罗氏族人:“语又曰:善创不如善守,善守不如善藏。余忆万历戊寅,忧栢林所携老谱仅二本,高尺六扩一尺许,而以竹纸,四角皆脍揉垂朽,力不胜展,阅其故物也,余留之祀。乙卯初夏,斗山公亲来追索以去。迨辛丑奉差还里,谒祠堂哉,索观前诸而不可复见矣。吾族所藏文墨,独栢林最富,而此一节不无可惜,则珍袭之计当图也。”^④ 保存旧谱与宗族文献,尤为重要。

五、结语

北宋思想家张载《西铭》是宗族史上的重要文献,程颐概括其主旨为“理一分殊”,以仁止私,推行即为用。《西铭》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胞物与”。明代学者邹守益用“全谱”高度评价“民胞物与”思想乃是天下修谱的宗旨,这一思想在族谱编纂中就是强调人要知本,谱序多有宣扬,谱系追寻本源。“一本”观念常表达为江河源头为一的比喻,也用“一气”来表达。

明人修谱往往将谱系之法作为先王宗法遗意,认为族谱继承了宗法精神,以维护等级社会秩序,

① 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 53《训东城诸侄(十三事)》,明嘉靖二十八年黄如桂刻本,第 5b—6a 页。

② 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号》,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

③ 周是修:《乌菟集》卷 5《周氏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23 册,第 318 页。“荷檐”“弃檐”,四库本、《乾坤正气集》本作“荷担”“弃担”。

④ 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

因而按照宗法原理编纂族谱,强调立宗、大小宗法,族谱与宗法相表里,谱牒具有统宗而合族的作用。修谱为了“亲亲”,可使族人关系和谐,增强凝聚力。由于宗法废而依赖族谱治理宗族,故修谱意义重大。

明代族谱内容渐趋丰富。明初的族谱一般比较简单,中后期内容增加。明中期何乔新的谱序反映出一些族谱收录了宗族制定的家训以及家族礼仪,罗洪先所作谱序更反映出宗族规训的内容在增加。明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强制性族规进一步增加。明代族谱类别多,族谱名为“家乘”者较多,表明族谱中的族人文献增多。

明人注重考查族谱、史书与方志的关系,认为族谱就是一家之史。不少人认为编修家谱有助于国史的完善,或论证家谱犹如国史的必要性,也有一些人强调家谱与国史的不同。明人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尤以江西突出。

欧阳修、苏洵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书法在明代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明人站在当时合族的立场,有人认为欧苏谱有些简单。修谱的思想,也受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影响,二程的学说对于修谱也有影响。

明代江西族谱存在为攀附古代名贤显宦而“剽窃绪余,牵合世次”的夸诞行为,为防止割截附援,纂修族谱时也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宗族通过众筹或捐献筹措经费修谱,三十年为一世是当时计算世代的一般标准,强调以此作为修谱的间隔时间,故家大族也有一二十年修谱者,超过三十年修谱也较多见。重视族谱的保管。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search on Jiangxi Genealogy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ureaucrats and scholar-officials in Jiangxi compiled genealog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s of "derivatives from the same origin" and "love for living things and people". They also regarded genealogies as the use of patriarchal ideas to govern the clan, and influenced by the genealogical models set by Ouyang Xiu and Su Xun, considered genealogies as compiling histo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genealogies were relatively simple.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years, they were full of content, includ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clannish people. Genealogical compilation was popular, especially in Ji'an Prefecture. There were some who sought truth by compiling genealogies, and there were some others who engaged in impersonations. Through the careful compilation of the former, some precious genealogies are preserved to this day. Thus, a thorough discussion is given of the cost, interval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enealogies.

Key words: derivatives from the same origin; Ouyang Xiu's and Su Xun's genealogical models; He Qiaoxin; Luo Hongxian; Ji'an

放水灯的源与流

姜守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放水灯是近世中国社会十分流行的宗教仪轨与民俗活动。此举意在照亮幽路、接引溺毙于江河湖海中的水下孤魂,亦包含禳灾祈福、敬奉水神等功用。放水灯始见于北宋,乃系在中秋节夜间举行的祈福、禳灾之行为,属于节庆礼俗的一部分。后来,随着普度施食、赈济幽爽之信仰在民间社会的渗透与流传,放水灯接引溺亡孤魂的观念得到不断加强,遂成为道教普度醮、佛教盂兰盆会中惯例举行的宗教仪式,进而演变为中元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清代,台湾岛内盛行放水灯习俗,中元普度前必有放灯之举,采用佛道二教的仪轨实践,彰显出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放水灯;设孤施食;清代台湾

中图分类号: C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25-08

放水灯是近世中国社会十分流行的宗教仪轨与民俗活动。放水灯又称“放河灯”“放江灯”,通常在濒临江河、湖海、溪涧、池塘等处采用漂流或燃放等方式,将纸、竹等材料糊制成的各式灯烛推送入水、逐波而去,藉此照亮幽路、接引溺毙于江河湖海中的水下孤魂,亦包含禳灾祈福、敬奉水神等功用。宋代以降,放水灯被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在基层群体中广泛传播,堪称是宗教信仰演变为社会民俗的一个经典案例。

一、放水灯的滥觞与流传

燃放水灯的做法,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1101)酬答其弟苏辙(字子由,1039—1112)的《中秋见月和子由》诗中有“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之句,且自注曰:“是夜,贾客舟中放水灯。”^①诗文描述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的晚上,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附近的汴水(即汴河)沿岸,众多商贾停靠船舶、施放水灯,多达千盏。这些商人施放水灯的用意,想必是为了禳灾祛害、祈求平安,财源广进、人船顺遂。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宗教礼俗的探索与创新:宋元道教拔度科仪研究”(22JJD730009)的阶段性成果;本成果受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姜守诚,男,山东烟台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玉章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道教文献及道教史研究。

^①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十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到了南宋,放水灯则成为中元节的活动内容,并与佛、道二教的普度施食、济幽度亡的宗教仪式建立起联系。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四“解制日(中元附)”条谈道:每当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都城临安的诸多宫观、寺庙广设普度醮或盂兰盆会,荐拔孤爽。皇帝赐钱并差遣内侍前往龙山(今杭州市淳安县境内)“放江灯万盏”,地方州府也委派官员赴浙江税务厅设斛施食以祭祀沉溺于江海中的亡魂:

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诸宫观设普度醮,与士庶祭被宗亲。贵家有力者,于家设醮饭僧荐悼,或被孤魂。僧寺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家。……此日都城之人,有就家享祀者,或往坟所拜扫者。禁中车马出攒宫,以尽朝陵之礼,及往诸王妃嫔等坟行祭享之诚。后殿赐钱,差内侍往龙山放江灯万盏。州府委佐官就浙江税务厅设斛,以享江海鬼神。^①

万盏水灯漂流于钱塘江面上,堪为一时之盛举、美谈!正得益于皇家、官方的支持与提倡,中元日放水灯习俗在民间社会迅速得到普及和推广。

尽管如此,中秋节施放水灯以祈福供养的传统仍得以保留。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或1308)撰《武林旧事》卷三“中秋”条谈道:八月十五日的傍晚,钱塘江燃放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犹如繁星璀璨、蔚为壮观,吸引众人驻足观赏。当地人相信,燃放水灯乃系取悦江神,并非仅为了世人观赏。兹抄录原文如下:

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②

此外,周密撰《癸辛杂识》续集下“四圣水灯”条又谈道:位于京城临安(今杭州)西湖孤山的四圣延祥观前,每日傍晚有一盏灯摇曳于水面上,从施食亭往南漂浮到西陵桥返回。这盏水灯为青红色,遭逢风雨时灯光尤为明亮,月光明朗时稍微黯淡,雷电交加时灯光闪烁、与电争光。时人金一之居住在积庆山巅长达二十多年,每晚必看此灯,灯影摇红,别具风味。

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金一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看二十余年矣。^③

需要说明的是,西湖四圣观前的这盏水灯并非为召引水中孤魂而设,乃系为夜行的船舶指明航向,属于航标灯、灯浮标之类物品。严格说来,此水灯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

元代道士张雨(1283—1350)撰《西湖放灯》诗中也描述了作者在西湖上泛舟、放水灯的观感体验:

共泛兰舟灯火闹,不知风露湿青冥。如今池底休铺锦,此日槎头直挂星。烂若金莲分夜炬,空于云母隔秋屏。却怜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灵。^④

入唐以后,各地盛行上元节放灯之习俗,通常的做法是在街衢、广场上张挂彩灯。然而,嘉陵江

① 闾海娟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四,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53—54页。

② 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三,杭州:西湖书社,1981年,第44页。

③ 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6页。

④ 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元诗纪事》卷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3页。

沿岸的民众则燃灯后放逐于水中。元代张之翰(1243—1296)撰《西岩集》卷十一《词》收录《南乡子·元夜嘉陵江观放灯后作》云:

灯夕在江阴,绿酒红螺不厌深。醉眼清江江上看,更沉。放尽春风万炬金,流到碧波心。小竹连舟尽自禁,此夜此情谁会得。如今,都付青崖马上吟。^①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燃放水灯还具有禳除海难、船灾之功效。元代汪大渊(1311—?)撰《岛夷志略》“灵山”条云:“舶至其所,则舶人斋沐三日。其什事,崇佛讽经,燃水灯,放彩船,以禳本舶之灾,始度其下。”^②灵山位于越南中部最东端的华列拉岬(Cape Varella),即今越南富庆省槟榔湾达约港。由此可知,燃水灯、放彩船以禳灾的做法,至迟元代时就盛行于地处南中国海的越南灵山等地。有关灵山“燃放水灯彩船”的记载,亦见于明人所著文献中。明代张燮(1574—1640)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撰《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西洋针路》“灵山”条引明人费信撰《星槎胜览》曰:

与占城山连接,峻岭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③

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太祖朱元璋特赐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建广荐法会,十四日敕令近臣在都城南京的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枝,次日(上元节)夜半方毕。明初翰林学士宋濂撰《蒋山寺广荐佛会记略》详细叙述了原委,并附《跋》曰:

(正月)十四日甲午大风晦,雨雪交作,至午忽开霁。上悦,敕近臣于秦淮河燃水灯万枝。

十五日夜过半,竣事,还宫,随有佛光五道从东北贯月烛天,良久乃已。^④

由此可知,本次“燃水灯万枝”属于蒋山寺广荐法会的一部分,当是为了配合普度设斛以享江海鬼神而进行的。无独有偶,明太祖还曾诏令高僧释夷简(又称南洲法师)在龙湾(今南京市下关宝塔桥一带)普放水灯,后者撰有《诏于龙湾普放水灯赋》(又称《应诏于龙湾放水灯因赋》《应诏放水灯因赋》)留存于世。^⑤

相传,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进士第一名的陈循(1385—1464)未发迹前、尚为秀才时曾作醮度幽、放水灯,一渔翁在前日夜半听闻江中孤魂称其为“陈状元”。^⑥有趣的是,祝允明(1461—1527)撰《祝子志怪录》卷五“放水灯”条讲述了河面下的幽灵伸手取灯、食饭的情节:

① 张之翰:《西岩集》卷十一,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集部一四三(别集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9页。

②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灵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③ 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第174页。此外,明代陆楫编《古今说海》卷十七《说选》引《星槎胜览》卷一“灵山”条云:“其处与占城山地连接,其山峻岭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山顶有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必于此樵汲。舶人斋沐三日,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陆楫编:《古今说海》卷十七,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子部一九一(杂家类),第357—358页。

④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五,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9册,史部一六七(杂史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1页;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二四七,《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67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⑤ 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濮小南审校:《金陵梵刹志》卷三,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

⑥ 《明状元图考》卷一“状元陈循”条云:“(陈)循家作醮度孤,有渔翁夜半闻云:‘明夜,陈状元家放水灯,我辈去看。’渔翁开蓬,寂无人。次早,果有陈秀才来叫渔船放水灯。渔翁言其事。”顾鼎臣:《明状元图考》卷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5页。

王经说其外母大言：顷因邻家作佛事，夜半僧放水灯，母亲见有一人手从河面上伸出，取灯并草把上饭食之，但不见其身首耳。^①

这则鬼故事虽不足信，却真实反映了民众对放水灯功用的理解：沉沦水中的孤魂滞魄，在灯光的指引下获取食物，从而顺利实现了施赈拔亡之目的。

明代中叶以后，中元节燃放水灯俨然成为重要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嘉靖时人田汝成(1503—1557)撰《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介绍说：杭州地区的僧侣在中元节建盂兰盆会，并在西湖及其周边的塔上、河中燃放灯烛。此举称为“照冥”，亦即照亮幽冥地府、接引孤爽之义。如谓：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传地官赦罪之神，人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考，摄孤判斛。屠门罢市，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厉邑厉坛。^②

田汝成之子田艺蘅(1524~?)撰《香宇集》初集《拾遗稿·诗》著录有一首《七月十五与美人泛月西湖观放水灯》，描述了作者在中元节的夜晚泛舟西湖、观看放水灯的情景。这些文人骚客基于亲身见闻，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客观叙述了中元节放水灯的场景，亦折射出此风俗在各地之盛行，可谓是不分贵贱、雅俗共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放水灯外，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市)民众还在中元节时燃灯于树或垒瓦塔燃灯。据《(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二《风俗志》记载：

七月十五日，古谓中元节，俗谓之鬼节。僧舍营斋供闾里，作盂兰会，祀先以素馔。浮屠燃灯，人家或燃灯于树，或放水灯间，喧以箫鼓，儿童则垒瓦塔然灯。^③

不过，天启年间发生的一件宫廷秘事，有力佐证了施放水灯对于超度溺毙者的重要性。晚明太监刘若愚(1584—?)撰《酌中志》卷十《逆贤乱政纪畧》记载：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明熹宗朱由校在方泽坛祭祀仪式结束后巡幸西苑，并与宦官高永寿、刘思源等人泛舟戏水。忽然，风起舟覆，悉数落水。熹宗获救，高、刘二人溺死。当年中元节，熹宗命在皇家道场大高玄殿做法事超度二人，放河灯追荐亡魂。阉首魏宗贤亲赴坛场瞻礼。^④该书还谈道：万历年间，每年中元节时，内府道经厂、汉经厂均会依例进行法事活动，并在位于干明门西边的玉河桥燃放河灯。^⑤与此同时，皇家园林西苑亦举办追荐道场、施放水灯，京城各寺院皆做盂兰盆并在临河处放灯。^⑥

此外，明代刘侗(约1593—约1636)、于奕正(1597—1636)撰《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水关”条描述了嘉靖年间北京城内各寺院僧人在中元节晚上举行盂兰会、放花灯的景况：

岁中元夜，盂兰会，寺僧集，放灯莲花中，谓灯花，谓花灯。酒人水嬉，缚烟火，作鳧、雁、龟、

① 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87页。

②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0页。

③ 萧良干修，张元忬、孙矿纂，李能成点校：《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④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

⑤ 《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規制纪畧》云：“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东西往来者，曰玉河桥。有坊二，曰金鳌、玉堞。万历年间，凡遇七月十五日，道经厂、汉经厂做法事，放河灯于此。桥之中，空约丈余，以木坊代石，亦用木阑杆。”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第141页。

⑥ 《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畧》云：“(七月)十五日中元……西苑做法事，放河灯，京都寺院咸做盂兰盆追荐道场，亦放河灯于临河去处也。”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第181页。

鱼,水火激射,至萎花焦叶。是夕,梵吹鼓铙,与燕歌弦管,沉沉昧旦。^①

此外,该书卷二《城东内外》“春场”条言及京城的两处最佳放灯地点是水关和泡子河:

(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最胜水关,次泡子河也。^②

事实上,北京地区的庵观寺院及世俗百姓在中元节建盂兰会,燃放河灯、超度孤幽,明季以降蔚然成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除京城以外,放水灯习俗还在南北各地广为传播,日渐炽盛、深入人心。这从当时的民间戏剧、文学创作中略见一斑。《水浒传》《金瓶梅》《拍案惊奇》《醒世姻缘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小说多次出现设孤说法、施食放灯的场景描写。

需要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张岱(1597—1680)撰《夜航船》卷一《天文部·春》“元夕放灯”条谈到上元、中元、下元均有放灯的活动,但三者的名称、内涵及燃放方式却存有差异:正月十五日是天官生日,放天灯;七月十五日是水官生日,放河灯;十月十五日是地官生日,放街灯。^③如此一来,“放灯”便成为祝寿三官之举,“放河灯”专为欢庆水官生日而设。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是宋元时期流行的放灯祈福传统之延续。

放水灯习俗在民间社会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流变,滋生出各种地方性信仰。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广东海丰(今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民众将水灯与生育联系起来:当地人在元宵节(上元节)纷纷到江边施放水灯,并争相捡拾之。若捡到白色水灯就是生男的喜兆,拾取红灯者为生女之兆。诚如明末、清初屈大均(1630—1696)撰《广东新语》卷九《事语》“拾灯”条介绍说:

海丰之俗,元夕于江干放水灯。竞拾之,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兆。或有诗云:“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④

海丰地区流行的元夕拾灯以占验子嗣风俗,其形成或许与施放水灯接引溺亡孤魂转世投胎的宗教理念有关,也是济幽度亡观念的世俗化表达。一盏盏水灯,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哀悼,亦饱含着人们对新生命的渴望。这一放、一拾之间,隐喻了生死轮回的终极命题。

二、清代台湾的放水灯习俗

清代,放水灯之习俗传遍大江南北,相关史料不胜枚举。就台湾地区而言,普度的当晚或前夜,通常会燃放水灯。康熙时人郑大枢撰《风物吟》收录一首描述台湾民众中元普度的诗词中有“纸灯夜静散波澜”之句,并附解说:“至夜,以纸为灯千百种,头家捐番钱或减半藏第一盏内,燃放水中;渔船争相攫取,得者一年主顺利”。^⑤雍正二年(1724),黄叔瓚撰《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习俗》介绍了台湾府城(今台南市)七月十五日盂兰会放水灯的情况:

更有放水灯者,头家为纸灯千百,晚于海边亲然之;头家几人,则各手放第一盏,或捐中番钱

①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②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第69页。

③ 张岱撰,李小龙整理:《夜航船》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页。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0页。

⑤ 余文仪主修:《续修台湾府志》卷二六,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台北:台湾银行,1962年,第984页。

一或减半,置于灯内。众灯齐然,沿海渔船争相攫取,得者谓一年大顺。^①

前述引文描绘出一幅热闹非凡的场面:头家作为孟兰会的轮流召集人,需要提前置办成百上千个纸灯,夜晚拿到海边燃放。几位头家各自亲手点燃第一盏纸灯,并将一枚番钱或减半藏于第一盏灯内。纸灯全部点燃后,漂泊于水面上。沿海的渔船争相抢夺头灯,若能获得就意味着可在一年中福佑康顺。

乾隆版《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六《岁时(附)》谈到七月十五日孟兰会,“是夜头家为纸灯千百,满路插之,名曰‘放路灯’;又先制灯盏,沿海浮之,众灯齐燃,灿若列星,名曰‘放水灯’:亦谓水陆会。”^②这里将中元普度的燃灯分为两种,分别是“放路灯”和“放水灯”。中元节的当晚,头家要将准备好的千百个纸灯沿途插在街衢、道路的两侧,叫作“放路灯”;头家又预先制作若干灯盏,点燃后推入海中、任其漂浮水面上,名曰“放水灯”。因此,中元普度又称为“水陆会”。

清代台湾志书文献中关于放路灯的记载甚少,放水灯则屡见不鲜。乾隆八年(1743)担任巡台御史的熊学鹏(1697—1779)撰《即事偶成二律》中的一首诗描述了中元孟兰会的当晚燃放水灯的情景:

台俗七月十五日为孟兰会,至夜分,放水灯;为纪以诗

楚人尚鬼习相仍,高会孟兰放佛灯。释氏金莲三十里,石家银烛百千层。……^③

此后,董天工撰《台海见闻录》卷二《汉俗》“孟兰会”条亦云:中元节当天的“夜分放水灯,谓‘水陆会’”。乾隆时人孙霖撰《赤嵌竹枝词》的诗注中也提及中元节普度“燃纸灯于海边”。嘉庆时人薛约撰《台湾竹枝词二十首》中有“海口红灯燃百盏,中元普度又喧阗”之句。

前述文献中谈及燃放水灯的具体时间,大多是说在中元孟兰会的当晚。然而,道光年间开始出现在普施前一天夜间放水灯的说法。譬如,道光元年(1821)刊行的《续修台湾县志》卷九《风俗志·汉俗·岁时》谈到七月间“凡寺庙皆有普施。先期一夜,燃放水灯”。道光十五年(1835)左右成书的《噶玛兰志略》卷十一《风俗志·民风》亦云七月超度、普施孟兰法食,“先一夕,各首事子弟皆捧一座纸灯,上书姓名、铺号,结队连羣,金鼓喧阗,送至溪头,名曰‘放水灯’,谓将引馁鬼以就食也。”在普度的前夕,每位首事(头家)的子弟皆手捧一座纸灯、上面书写首事的姓名或铺号,一行人整齐列队、庄严肃穆,沿途敲锣打鼓,最后抵达溪边,将其点燃后放入水中漂流而去,藉此接引饿鬼前来就食、享用供品。事实上,放水灯在普度施食的先期一天夜间进行,在道光以后遂成为台湾各地的通例。

丁绍仪撰《东瀛识略》卷三《习尚》谈到七月间岛内各处举行普度活动,尤以镇、道、府、厅、县衙署最为隆重,“日则啐经,夜放焰口,燃水灯。灯以千百计,锣鼓喧阗,送浮水面,有置钱于中者;渔人得之,谓一年顺利。”道光五年(1825)至十年(1830)任噶玛兰通判的乌竹芳在所撰《兰城中元》诗中有“明灭灯光随水转,辉煌火炬绕街旋”之句。林占梅于咸丰五年(1855)撰《与容谈及嵌城妓家风气偶成》中有诗注曰“各境七月孟兰会,夜放水灯”。上述作品中描述普度放水灯的场景大抵相同。

① 黄叔墩:《台海使槎录》卷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北:台湾银行,1957年,第41—42页。

② 刘良璧纂辑:《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六,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台北:台湾银行,1961年,第97—98页。

③ 范咸纂辑:《重修台湾府志》卷二五,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05种,台北:台湾银行,1961年,第781页;卢尔德嘉纂辑:《凤山县采访册》卷十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73种,台北:台湾银行,1960年,第441页。

道光、咸丰年间的郑用锡撰有一首七言绝句题曰《孟兰会》，其中有云：“姓氏编排各一行，先期觉路列灯光。喧天箫鼓鱼龙舞，举国今宵尽若狂。”文中首句是指送水灯时民众按照姓氏各自编队、依序排列。无独有偶，同治版《淡水厅志》卷十一《考一：风俗考》谈到当地在七月期间纷纷举行普度，“寺庙亦各建醮两三日不等。惟先一夜燃放水灯。各给小灯，编姓为队，弦歌喧填，烛光如昼……”。文中谈到在施食的前夜惯例会燃放水灯，每户发给一盏小灯，大家各执己灯，并以姓氏为编队，有序前往溪头、海边，沿途烛光通明，锣鼓喧天。耐人寻味的是，同治时人吴子光撰《台湾纪事》卷一“纪台地孟兰会”条谈到，台地民众在普度施食的前一天晚上“放水灯，或送王爷船”。这里所说的“送王爷船”应是针对王醮庆典中的普度施食而言。

光绪八年(1882)至十一年(1885)间，黄逢昶所撰的一首台湾竹枝词描述中元普度场景时有“夜夜灯花绕市阑”之句，其后附注曰：“台俗：中元家家灯烛辉煌，并结彩灯，多至千万；笙歌鼓舞，夜夜游街：名放水灯。”^①唐赞袞于光绪十七年(1891)撰《台阳见闻录》卷下《时令·中元》亦云：“台俗盛行普渡……家家灯烛辉煌，并结彩灯多至千百，笙歌达旦；名曰‘放水灯’。……又或剪纸为灯燃放，海边渔船攫取得者，一年大利。”^②这里将各家张灯结彩，民众载歌载舞、游行街市，说成是“放水灯”，显然有误，乃系将“竖灯篙”与“放水灯”混淆了。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二十九日的《监醮新竹县城隍，示贴建醮程序表》逐一列出当地城隍庙举行普度活动的日程安排：

阳月廿二日起，禁止屠宰为先。
一切介鳞畜类，不许排列市廛。
街道张灯结彩，同期降福延年。
廿三黎明进表，道场经忏扬宣。
廿四莲灯夜放，普照水陆幽泉。
廿五华筵普施，超拔极乐登仙。^③

这通榜文清楚地表明提前数天悬挂彩灯是为迎接中元庆典而做的准备工作，放水灯则在普施的前一天夜间进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新竹县城乡民众在七月普度时放水灯的情况，光绪版《新竹县志初稿》卷五《考一：风俗·岁时》有过专门解说，其描述的场景与前述文献中所言基本相同，如谓：

先一夜，城庄各结小灯成排，编姓为队；金鼓喧阗，灯光如昼。其首事各以纸为灯，送之江上，曰“放水灯”。^④

日据初期的安平县商业气氛浓厚，市肆店铺积极襄助七月普度的活动经费，放水灯的场面也比较隆重。据《安平县杂记·节令》记载：

作普度前夕，必先竖灯篙，放水灯，请大士(大士俗传观音菩萨化身)，各铺户皆出明灯一对。

① 黄逢昶：《台湾生熟番纪事·台湾竹枝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51种，台北：台湾银行，1960年，第26—28页。

② 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卷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30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年，第147页。

③ 《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95种，台北：台湾银行，1971年，第6页。

④ 郑鹏云、曾逢辰纂辑：《新竹县志初稿》卷五，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61种，台北：台湾银行，1959年，第180页。

董事乘轿,鼓吹前导,僧俗随后,到各处请水陆幽魂到庙受享。^①
普度的前夜燃放水灯,各家商铺皆捐出一对明灯。诸位董事乘轿而行,前有吹鼓手奏乐引导,僧人与民众跟随其后。一行人在辖境内四处巡行,迎请水陆孤魂到庙享受供品。

三、结论

放水灯始见于北宋,乃系在中秋节夜间举行的祈福、禳灾之行为,属于节庆礼俗的一部分。后来,随着普度施食、赈济幽爽之信仰在民间社会的渗透与流传,放水灯接引溺亡孤魂的观念得到不断加强,遂成为道教普度醮、佛教盂兰盆会中惯例举行的宗教仪式,进而演变为中元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

清代,放水灯在台湾岛内久盛不衰。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明末、清初以降,福建、广东等地民众为了谋生,远渡重洋、九死一生,抵达宝岛,开荒垦殖。无数先民在旅途中遭遇海难,尸骨无存。放水灯作为普度施斛的前导,就是要召请这些在水害、海难事故中遇难而沉沦于水下的男女孤魂。因此,台湾各地举行中元普度之前必有放水灯,并采用佛教或道教的仪轨实践进行展演。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Jiang Shouc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is a very popular religious ritual and folk activity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is is intended to illuminate the secluded road, greet and guide the underwater souls of those drowned in rivers, lakes and seas, and also serves to avert disasters, pray for happiness, and worship water gods.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first 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was observed on Mid-Autumn Festival nights to pray for happiness and ward off disasters, constituting part of the festival ritual. Later in the civil society, with the infiltration and spread of the belief of offering food to all in need and relieving dead souls, the concept of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to guide the drowned souls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n became a religious ceremony held at the Taoist Pu-du Ritual and the Buddhist Ullambana Celebration Festival, and then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olk activities of the Zhongyuan Festival.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ustom of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was prevalent in Taiwan, and lanterns must be released before the universal salvation at the Zhongyuan Festival by adopting the ritual practi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highlighting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secularity and holiness.

Key words: releasing water lanterns; offer food to lonely souls;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① (日据初期)佚名:《安平县杂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台北:台湾银行,1959年,第6页。

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刘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礼治作为传统社会的独特治理方式,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历史、现实及价值上的逻辑契合性,具体表现为礼文化蕴涵的丰富治理资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及礼文化蕴涵的独特人文精神特质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新时代推动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从发挥基层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重视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及健全乡村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四个层面进行路径探索,以文化“软治理”助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礼治;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B222;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33-1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精髓,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思想指引和价值遵循。揆诸历史,“礼”在传统中国社会发挥了规约个人修身、协调人际关系、塑造道德人心的社会规范作用,礼仪社会和礼治秩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传统。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礼治”文化中所蕴含的个体道德内涵、社会伦理规范及宗法关系网络中的公共理性等要素,对于推进当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展开了多学科讨论,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②、治理主体^③、阶段特征^④、建构瓶颈^⑤、实现路径^⑥及数字乡村治理效能^⑦等。但总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礼治融入当代乡村善治的契合逻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2021BSH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芳,女,山东青岛人,社会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 ①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2版。
- ② 桂华:《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
- ③ 陈文胜等:《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一)》,《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 ④ 罗兴佐:《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 ⑤ 赵秀玲:《乡村治理现代化瓶颈的破解之策》,《国家治理》2020年第16期。
- ⑥ 贺雪峰:《关于“十四五”期间推进乡村振兴的若干问题探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⑦ 沈费伟、杜芳:《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体而论,学界对社会治理传统方面相关的研究尚显不足,关于礼治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是零散和缺乏深厚积累的。新时代背景下,礼治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契合逻辑何在?如何全面发掘“礼治”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礼治”文化体系,使传统与现代相适应?以上诸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鉴此,本文试图透视传统礼治资源如何在开放性融合与现代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与“三治结合”现代善治理念的互补共生,以期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转化逻辑提供历史依据、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一、“礼治”的内涵及其治理意蕴

作为典型的“中国概念”,“礼”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祭祀天地、先祖等礼仪性活动,是一种宗教仪式规则,所谓“礼肇于俗,而生于祭”,其中“礼”指的即是祭祀的礼仪制度。《说文解字》亦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即行礼的器具“豆”,用来象征把各种祭品奉献给神灵,就变成了“禮”。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礼”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涵义引申为“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两周时期,“礼”被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而有了“礼治”的含义,其内容涵盖到刑法、理政、治军等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专论:“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①“礼”在整个传统社会运行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明礼正人心,教风俗,序尊卑,和上下,国家臻于善治。

纵观历史,“礼”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亦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对实现中国文明治理意义深远。绵延五千年的华夏历史长河,礼法兼备、宽猛相济,始终是安邦定国之要道。

首先,中国古代礼治思想在“经国家、定社稷、序尊卑”方面,为民众设定好了责任与义务,除了极少数违反纲常伦理、破坏社会秩序、罪不可赦之外,其他只要按部就班、安分尽责,就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道德阐释,把“礼”作为国家政治规范的重要原因。《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荀子·大略》云: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王霸》也把“隆礼贵义”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明确指出:“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认为以礼治国,“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管子·牧民》亦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清代学者阮元更是在《擘经室续集》中一言以蔽之,“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由此可见“礼”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和制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中央政府致力于以礼治的伦理相融性与教化宗教性内置礼治秩序于乡土社会的合法性根基,从而达致化育万民德性,培养忠臣顺民的目的。再加之庞大的乡绅阶层支持,中央政府得以推行“礼主法辅”的德治教化模式,这是一套适合传统中国小农经济、聚族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5—376页。

而居生产生活方式,且成本较低的社会管理方式。

其次,“礼”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体现某种价值取向并且持续发展的优秀的历史传统,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魂,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记·中庸》记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见其数量之多。“礼”的范畴涵盖广泛,大到国家体制、宗教礼仪、典章制度,小到个体生活规范、风俗习惯、行为模式,无不包含在内,无不受此文化约束。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唐代孔颖达疏曰:“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礼记·曲礼》写道: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冠义》亦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在古人看来,“礼”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传统价值观念,也是一种高度自觉自律、慎独修身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体系之重要构成。纵观现代世界各国众多重要领域,依然广泛存在诸多规范、程序、仪式、组织和活动,这与传统的礼和礼治在性质、结构、功能上十分相近,可称之为“现代礼治”。作为权力的直接统治机制亦或是现代法治制度,其覆盖面和穿透力仍是有限的,在人伦、宗教、教育、公私生活仪节等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难以全面触及,而礼治则是将权力延伸到这个广大领域的有效机制。学者姚中秋在对现代国家之结构性特征做了历史政治学的深刻剖析后得出,“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体系之构成性部分,现代国家仍然需要礼治……礼治通常不进行强制,而是采取‘修’的策略,即引导、矫正既有的组织及其规范。这种全面的柔性治理可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国家化’;反之,历史、情感、人伦等因素又可以反向塑造国家,使之成为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人民更好的‘家园’”。^②英国法学家赫伯特·哈特曾指出,“法律和道德不仅分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③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在其宏篇巨著《论法的精神》中亦写道:“中国的立法者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④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只有兼顾法治和礼治才是最为合理的治理模式。我们需要对传统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重新刻画,并以礼法兼容的国家治理理论来引领当代乡村的礼治社区重建。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0期。

② 姚中秋:《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

③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④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13页。

二、新时代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契合逻辑

近代以来,伴随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乡村治理也开启了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乡村社会的治理之道,先是建立起“政社合一”统一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1983年又以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作为基层政权机关。与传统社会内在孕育的“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不同,政府不遗余力地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从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诸层面试图加快推进乡村的法治化进程。但伴随着国家大规模政权建设的“送法下乡”实施效果并未如人们想象中那般乐观,对长久浸染在礼治秩序中的乡土社会而言,“送法下乡”还要克服“水土不服”的现实窘境。揆诸历史,礼治与法治尽管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交互递嬗而彰显出独立甚至对立的治理特点,但在真正的实践中,“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的生长点,法治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①,礼法治理结构的开放性互补才是治国理政的成功之道。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也可以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充分发挥乡规民约、乡俗民情等本土性软法治理的宝贵经验,拓宽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

(一)历史逻辑:丰富的中华“礼”文化资源

礼文化蕴涵丰富治理资源,在我国乡村社会中有着悠久的治理传统。张明提指出,在漫长的岁月,自诩世界文明中心的大中国,即以讲“礼仪”、重“礼教”、施“礼治”而著称于天下。礼治,不仅构筑起数千年不衰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更支撑起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②礼治历史悠久,长期维护我国古代社会秩序稳定。西周时期,礼治已经实现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礼治”统摄民法、婚姻家庭法、刑法等多个领域,同道德训诫相通。比如,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君主“德”要求下要求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家庭伦理道德,以此规范民众的行为,达到治理效果。儒家进一步丰富礼治内涵,以从属于亲亲、尊尊、伦常、性情、道德心性等范畴的德化为中心构建了一种整体的社会文化秩序,形成包括纯朴谦逊、孝敬父母、关爱他人、守望相助、扶危济困、忠诚守信等一系列孝亲文化、泛爱文化与忠诚爱国文化,统一伦理政治规范,整合家庭、社会和政治的空间伦理秩序,规定社会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

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建构的“礼”全面渗透进入中国社会,乡村社会由此形成具有强大稳定性的“宗族—礼治”的模式。这种“宗族—礼治”模式基于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以宗族为自治主体,突出道德教化在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以“三纲五常”为内部秩序和价值引领,规范乡村社会成员的行为。礼治在我国乡村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体。到近代,随着乡村社会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融合西方理念与礼治传统,我国乡村社会模式演变为“县政乡治”,客观上确立了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义的乡村自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农村政权的建设结合起来。^③从人民公社制发展演变至“乡政民治”模式,在乡镇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乡村居民依托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对本村公共事务行使自治权,推进乡村治理重心下移,致力于培育“民治”的自治功能。其

① 梁治平:《从“礼治”到“法治”?》,《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

② 张明提:《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努力建设新时代“礼治兴县”》,《吕梁日报》2019年3月22日,第7版。

③ 孙秀芳、邵琳:《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及法治化的现实思考》,《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第3期。

关键在于乡村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约束,离不开乡规民约、道德教化等传统礼治因素。可见,尽管以法律为准绳、法律立规矩、法制成方圆依法办事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准则,但在道德领域、思想领域,在一些“法鞭”所不及之处,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不能脱离社会基础与礼治秩序建立法治秩序。依“礼”相约、以“礼”施治,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依然不可或缺。

(二)现实逻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

新时代乡村由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法治化。法社会学家凯尔森指出,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规范逐渐制度化、程序化的过程。学界亦有研究表明,只有当法律在乡村社会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的、明晰化的社会约束力量时,乡村社会的治理才有了实现现代化的可能。^①但现阶段国家推行的“法治下乡”建设仍需尊重与延续乡土传统,仍需借助乡规民约等传统礼治的“软法”力量。

长期以来,“礼”涵盖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乡土社会治理及其秩序维护靠的不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而是对家训家规、乡规民约等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的“礼治”。费孝通也曾谈到,拥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生发了乡土社会的安土重迁、男女差异、差序格局与空间的不流动性,与乡土社会相适应的规范就是礼治。“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②礼治模式固定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伦理规范与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长期的言传身教把历史的、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规矩,人们做事不是受外界压力所致,而是依据内心约束行事。在礼治的塑形下,集体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村民为人处事、处理村务的基本标准之一。人们基于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以及邻里间亲密关系的考虑,更倾向于通过“礼”的手段来化解矛盾,而不是用理性僵硬的法律条例和繁琐的程序来解决纠纷。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里,打官司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再加之已有的成文法律法条冗长生硬,对于很多文化水平较低、法律常识有限、法律意识薄弱的村民来说,法律只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符号。受传统乡村社会“无讼”理念的影响,法治的舆论支持力量尚未成型,亦增加了送法下乡、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难度。总体来看,法治精神与法治话语还没有完全渗入被悄然改变的乡村日常中去。为此,当前乡村治理的法治建设应当充分吸取“礼敬尊长”、“兄友弟恭”以及“和睦邻里”等以习惯法形式表现出来的“礼治”规范的文化精髓,利用而非排斥包括“宗族”文化和“息讼”文化在内的礼治文化,重视其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性价值。确定习惯法的效力,将具有传统“礼治”当中合于中华美德和公共利益的成分与内容,融入当代的乡村法治建设,使广大乡村民众接受和认可,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三)价值逻辑:礼文化蕴含的独特人文精神特质

礼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其以人为核心的精神特质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对人及人伦关系的强调与重视是礼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之所在。儒家仁礼学说明确肯定人的本质与价值,并由此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① 唐惠敏:《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理论导刊》2020年第7期。

^②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在把握人的本质、协调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以仁、爱、义、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倡导孝悌、修己等为人处世之道。以人为本位,提升个人的修养,以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乡村治理现代化同样遵循人本位的思想,其治理离不开民众的参与,通过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现代化乡村治理过程中也需要以礼文化的人文精神来引领乡村价值的重构。随着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传统文化生长的土壤日渐荒漠化,传统价值体系受到一系列崭新的观念冲击,淳风美俗渐渐式微,用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的家庭秩序和乡规民约被打破,乡村社会矛盾频发。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也导致了部分村民过于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逐利过程中逐步摒弃了朴质的道德价值理念,导致乡村社会道德评判标准混乱和道德行为失范,由此影响到了乡村社会稳定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礼文化重视人生命中所蕴藏的追求理想的动力、反省、超升以成就生命的最高价值。如“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这种人文精神将个体命运同群体、民族、国家命运密切相联,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目标融入到家国目标之中,强调追求道德理想而宁可舍弃物质甚至生命的高贵精神。在礼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牺牲自我,使中华民族历经风霜仍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强烈的家国意识、责任理念与奉献精神,正是新时代乡村民众价值建构所需要的优秀给养。汲取礼文化的人文精神理念,重塑当代农民的责任观念、主体意识、家国情怀,引导个体参与现代化乡村治理之中,将个人的追求与家庭、国家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凝聚乡村集体共识。以礼文化规范个人行为,塑造和谐家庭、邻里关系,共建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加快乡村发展现代化进程。

三、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乡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务”,而自治、法治与中国传统的礼治理念密切相关。以下将从发挥基层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及健全乡村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四个层面,探索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及其运作机制。

(一) 榜样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上者,下之仪也。古代的礼学家及统治者不仅将理论上的礼乐教化由伦理领域巧妙地推及至政治领域,而且从实践上也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官员身体力行发挥表率与楷模作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达到治理目的。这一礼治实践路径,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同样适用。新时代,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要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纽带”和先锋模范作用,引领乡村治理见实效。

首先,基层干部要提升自身礼仪文化素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乡村振兴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行,而德治是乡村精神文明发展的根本保障。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是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也是他们感知和解读国家形象、形塑社会信仰的标杆和参照系。要做好“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工作,新时代的乡村基层干部思想上既要抛弃不合时宜的道德糟粕,也要传承和弘扬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精华,如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这对于当前改进干部作风、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及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具有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其次,基层干部要带头推动移风易俗。当前乡村,移风易俗主要是整治高价彩礼、人气攀比、铺张浪费等内容,整治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文明的一件要事,对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意义重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完善村规民约,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行移风易俗,对村庄的不文明行为和丑恶现象要敢抓敢管敢制止。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等场所,为群众提供多样文化活动。同时充分利用村镇政务场所、村务公开栏、大喇叭及村文化墙等直接面向群众的宣传阵地,多宣传报道村里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敬老孝老、勤俭节约的优秀事迹,引导村民形成健康向上的新风貌。

再次,基层干部要创新治理形式,探索多样化治理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基层干部,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多种形式,采取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互联网+等治理方式和载体,引导农民全程参与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同时,改变村委会在推进乡风文明过程中的组织单一性与力量薄弱性现状,大力引导与培育服务性、互助性、公益性自治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如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妇女协会、道德评议委员会等,充分激发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风气治理中的活力,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与乡村风气治理中来。例如,可通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服务传递互助互爱的精神,可依托红白理事会、村民道德评议会来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机制。

(二)道德约束: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

礼治内嵌于特定的治理模式,其重点在于对民众内在情感的道德教化,通过以民间习俗、乡规民约等为主要形式的“礼”育“德”。^①人们在传统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面前,表现出强烈的行为和心理认同。乡规民约仍然是乡民们基本的生存法则,也是乡间社会道德评判标准。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要发挥乡规民约的独特治理功能,营造向上向善的乡村道德舆论场。

^① 杨慧、吕哲臻:《融情于礼:孔子“礼治”思想对乡村情感治理的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首先,发挥乡规民约的秩序生成功能。在遵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前提下,充分发动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乡规民约的修订完善过程。营造民主协商、共同商讨的良好氛围,鼓励村民亲自参与到讨论、判断、决定的过程中,提升村民治理能力,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培养村民的公共精神,领悟乡规民约的精神要义,养成自觉遵守乡村公共规则的意识,维护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同时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健全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建立监督约束机制,民主考评乡约的实施效果,形成和谐有序的良好乡村风尚。

其次,发挥乡规民约的道德培育功能。聚焦除陋习、树新风,在尊重和掌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基础上,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的体系建设之中。结合区域性、差异性的乡村社会实际,及时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达方式,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条款内容。以主流价值观构建道德规范条款,强化道德认同;以道德实践,引导村民德业相劝、患难相恤、过失相规,使勤劳节俭、孝敬父母、乐于助人、团结友善、诚实守信等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乡村民众的社会意识与行为习惯。

再次,发挥乡规民约的文化涵养功能。乡规民约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最具普及性、实效性,也最接地气,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公理共议、亲爱和睦、守望相助、崇尚俭朴等优良传统美德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乡规民约的表达形式与宣传方式。譬如,充分运用智能时代出现的快手、微信、抖音等新兴媒介以及村级告示栏、广播、展板、海报等传统媒介,以短视频、漫画、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乡规民约的治理理念与精神;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干部不定期进门入户宣传;定期召开乡风文明茶话会,组织村民集中学习乡规民约等。以乡规民约凝聚人心、教化民众、淳化民风,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三)组织保障: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

中国传统礼治以集体主义为导向,其多元治理主体的倾向以及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符合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追求的善治目标。随着外部的治理资源和公共物品不断增长,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面资源和力量介入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公共治理的需求日益增加。^①在政府积极引导下,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主体能动性,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格局,提升现代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

首先,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各乡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乡村工作领导体制,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所处的地域优势、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引导乡贤群体、老年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等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之中。例如充分发挥乡贤群体在党性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活动中的教育宣讲作用,以乡贤自身的卓越事迹与突出贡献感化乡民,提升乡民的党性意识,增加乡民的法律知识,强化崇贤尚能的正确价值导向,淳化乡风;加强乡村老年协会建设,完善老龄工作组织机构的设置,发挥老龄群体在乡村社会治安、帮教调解、禁毒禁赌、经济项目引进、村容村貌整治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文明和谐新农村建设;健全妇女协会组织,维护妇女权益,引导农村妇女在新时代乡土文化培育、和谐家庭家风建设、人居环境治理、健康教育知识宣传等方面发挥其自身独特

^① 陆益龙、李光达:《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优势;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公益平台,多引进互益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助力乡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提质升级。

其次,完善政府对于乡村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文化类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政策、人才补贴政策以及技术指导,健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培育良性互动模式。新时代的社会组织以其公信力和凝聚力,可为乡村现代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道德规范建设提供引领,如一些敬老、济困、助学类社会组织,一些传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俗文化研究类组织等,特别是一些乡村的内生性社会组织还承载着部分“礼治”的功能,如村庄老人协会、宗族组织、乡贤理事会等。要强化各个公益性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明确各自权责界限,协同处理好乡村治理目标与治理方式、经济长效发展与村庄人文、社会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再次,发挥社会组织在联结各方资源、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及农业技术人员与普通农民等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构建城乡互通的机制与渠道,采取优惠政策引导大学毕业生、优秀乡贤、优秀企业家及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安居就业,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带动作用。2023年8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意在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下乡,畅通人才回引渠道,广泛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形成建设家乡的强大合力。方案的出台可令一批有情怀的退休人员由“报国无门”变成“老有所为”,客观上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

(四)形式创新:健全乡村多元纠纷调解机制

当下的乡村作为“熟人社会”仍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单纯依靠法治或礼治均难以达到预期治理成效。乡村治理权威性的增强需要以法治思维来推进,而现代法治思维则需要借助礼治加以融合贯通。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仍然要秉持依法治国和依礼治村在基层社会的融合实践,这也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为此,要推动法院跨域立案系统、人民调解组织、公安综合窗口、检察服务平台延伸至基层,让司法服务下沉到一线,提高响应群众诉求和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村两委要积极同地方法院展开合作,设立“法官驻村工作室”。法官须定期到工作室会同调解员统筹开展诉前诉中调解以及联络、咨询、宣传等工作,高效便捷地化解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分家析产、土地承包、民间借贷等传统类型矛盾纠纷,使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得到专业法律指导。同时,司法工作人员在调解、处理纠纷过程中既要依据法律和事实释明法理,也要讲明情理,以法理情的协调统一来提升司法的权威、可信度与可接受性。

其次,发挥乡村情感治理的作用。依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以村委会为核心,村民小组组长为基础,选取懂法律、辈分高、有威望的“乡村精英”组建成立乡村纠纷调解小队,从事理、情理等层面切入,以“讲理”“互谦”“给台阶”的方式化解纠纷、避免矛盾升级。乡村基层组织要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将调解方法、措施、效果较好的调解案例,及时通过官方微博、抖音、微信等媒体平台深入村居网格进行报道宣传,让“少讼”“无讼”的理念渗透进民众的生活实践中。此外,村干部、驻村

干部、农村党员、普法志愿者等可通过到村里走访、发放法律知识宣传册、举办普法知识大讲堂、邀请律师案例讲解等方式,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普法、法律咨询全过程,引导村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合理选择纠纷化解方式,营造守望相助、崇德修睦的和谐邻里关系。

再次,积极开展乡村数字治理创新活动。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给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当前全国不少乡村正在创建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可借此机会利用大数据创新多元化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手段。树立“数字+”理念,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基础构架,开发以“户”为单位的“数字门牌”,创新“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网络公共空间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之间的了解和互信,达到合作共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模式的套用和翻版。我们不妨以史为鉴,植根中国乡土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和经验,构筑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乡情与民情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方法,以文化的“软治理”助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Logic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Rule by Rites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Liu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s an important way of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rule by rites has a logica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value. Specifically, this means the rich governance resources contained in the ritual culture, the era deman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unique humanistic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ritual culture are in line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ites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can explore the path from four levels, namely, giving play to the vanguard role of grassroots cadres, giving scope to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ownship rules and people's agreements, promo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ng the multiple rural dispute medi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with cultural "soft governance".

Key words: rule by rites; rur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美”的转向与超越：庄子“悲态”美学思想阐微

王康宁¹ 薛振宇²

1.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2.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部, 北京 100020

摘要: 对“悲态”书写的淋漓尽致以及对待“悲态”的积极态度,共同促成庄子“悲态”美学的厚意深旨。理想人生的实现既以对“悲态”的消解为必然途径,也以对“悲态”的沉淀与升华作为根本凭藉。正视“悲态”并在其中找寻与安置自我,进而消减因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生存环境逼仄以及精神世界不断塌陷与沦丧的苦恶之果,是现代人实现个体和社会价值亟待面对与回应的课题。

关键词: 庄子;“悲态”;美学;美

中图分类号: B223.5;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43-11

美学中的“悲态”是一种审美意境,“悲态”之美在于人们能够超越否定性的“悲”本身,升华出令人愉悦和享受的精神体验。这意味着“悲态”中不仅有“消极”和“否定”,也有“积极”和“肯定”的成分,而后者是确证“悲态”哲学内涵与价值的重点。审美范畴中的“悲态”与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以及表征情感的“悲感”差别迥然。前者具有哲学思辨和形上追问的意旨,后者则主要关涉世俗人生的悲楚与痛苦。徐锴《系传》曰:“心之所非则悲矣。”^①“悲”以“心非”之否定情态为特性,统指消极否定的情感与观念以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有违意愿或意志的形态或状态。“美学悲的悲态,是一种偏离的悲,是感到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对立一面时的悲,是带有询问的哲学高度的悲。”^②“悲态”以“悲”为起点,是经由对世俗之“悲”的超拔与升华而达至的精神高境。其中富含的深旨妙义既可视作生存状态,也是现代人通达与实现自我的重要标志。

一、《庄子》“悲态”美学的理论溯源

“悲态”是贯穿《庄子》的基调与主旋律,庄子重“悲”且从中开出一条超越性的思维路向。以“悲”为中心概念或情感笔触,《庄子》中既有“悲感”的情态,也有“悲剧”的艺术内涵。司空图概括古体诗歌的“悲慨”道:“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抚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③“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是对自然之悲的描摹;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道家儿童观及其教育转型研究”(23CJYJ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康宁,女,山东临沂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教育史研究;

薛振宇,男,河南浙川人,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高级政工师,主要从事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研究。

^① 黄建中、胡培俊:《汉字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55页。

^② 张法:《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③ 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38页。

“适苦欲死,招憩不来”,是对人生之悲的叹息;“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是对生命之悲的揭示;“大道日丧,若为雄才”,是对社会之悲的揭露;“壮士抚剑,浩然弥哀”,是对个体之悲的阐发;“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是借景象之悲映射心理与精神之悲。司空图区区48个字将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个体—心理之“悲态”予以淋漓尽致的阐释。由是观之,“悲态”是个体生存的必然环境和条件,个体所处的时空条件和心理状态则是悲态产生的缘由。

(一)以“有涯”应“无涯”:无限宇宙与有限自我的矛盾

庄子“齐物”的前提是“天—人”的同源性,“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然而,“天—人”在存在形式上的非对等性也必然致使“合一”的有限性。在《庄子·养生主》中,造成这种有限性的根本原因是人之生存局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无涯”之宇宙自然的反衬下,个体人生之瞬时短暂尤为凸显,由此衍生的“悲态”注定是个体人生不可回避的必然。“正由于对自己‘此在’的珍视,知觉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与‘时间’处在尖锐矛盾以至斗争中。”^①面对有限自我与无限宇宙之间的鸿沟,人不免生出“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也”(《庄子·齐物论》)的迷思与慨叹,无以复加的悲态也似乎成为笼罩人生的主宰。“只有在人的有限性、暂时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背景上,失意才与哲学意义有联系。”^②宇宙自然之于人的不可违逆和抗衡性,以及人对宇宙自然的难以尽知尽能,时刻伴随着“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与“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庄子·齐物论》)的哀伤与无奈,而人在“悲态”中求突围又进一步渲染与强化“悲态”的主题与氛围,从而将人生与“悲态”紧裹。

(二)“道术将为天下裂”:对缺乏普世价值和共同伦理的哀叹

庄子以“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概括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虽然学界有关“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解读莫衷一是,但认为庄子以其表达“乱世”主张却基本无异。庄子对“道术将为天下裂”作过隐喻:“昔者十日并出”(《庄子·齐物论》)。“十日并出”既可视作庄子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论性描述,也是庄子对价值解体、秩序混乱、道德不一的现实社会的形象化摹写,其真正意旨在于揭露普世价值和共同伦理的沦丧。庄子详细阐释过“天下之乱”与“文化观念之乱”或“伦理价值之乱”之间相生相依的关系:“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好,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社会之乱”与“文化之乱”或“伦理价值之乱”之间,从来没有明显的先后彼此之分。当周遍之道尽毁而“一曲之士”遍存时,各有所持的观念与行为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造成人世社会的争斗与混乱。庄子之时的荒唐世道与险恶人心以“分”“裂”的形式淋漓尽致,“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浑然为一的宇宙秩序与自然法则,一旦被“有心”者做目的性的割裂与取舍,其结果只能如被凿出“七窍”的“混沌”般,走向“死”的末境是必然结局。诚如黑格尔所说:“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方面的辩护理由。”^③庄子对因伦理价值解体而导致的社会乱象痛心疾首,在其有关人事之分的书写中饱含着深重的忧思与悲患。

①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② 张法:《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③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6—287页。

（三）“丧己于物”与“失性于俗”：对众人生存悲境的嗟吁

成玄英先生疏解《庄子·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曰：“六国之时及衰周之世，良由圣迹，黥鼻无刑，遂使桁杨盈衢，殊死者相枕，残兀满路。相推相望，明其多也。”^①面对天下汹汹颠连无告的不堪境况，庄子之所以予其以深刻揭露与批判，究其根本在悲悯心。承袭老子的理论主张，自然人生观亦为庄子所秉持。在老庄思想中，自然畅意的人生以对自然本性的顺应与持守为原则。然而，“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皆有余”“昭昭”“察察”“皆有以”（《老子》第20章）以及“终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齐物论》）的“众生”沉沦样态与自然人性之间差之千里。“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民”或“蒙蔽之民”（《庄子·缮性》），以思想和精神的沉沦下陷为本质特点，以“滑欲于俗”为生存方式，服从于机心、巧智的干涉乃至宰制。“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间间’之知，‘詹詹’之言，无时不在伺察、交接当中。讳莫如深的提防，秘藏深因。与封闭提防相伴随的是各种形态的恐惧。‘心斗’和恐惧指向自我界限的强化和封闭，这一没有确定性的自我边界往往被执以为实。”^②疏离与违背自然本性的众人不得不承受自身非自然言行的戕害，“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无底线的纵欲和恣行只能导致更深程度的自我遮蔽和自我迷失，而人们对身陷彷徨与挣扎之悲境的全然不知或迷惑不解，实乃蕴藏在镜像之悲后的更为深彻的“悲态”。

（四）“独有”者的“独来独往”：怅然失落的个体心理

尼采对人之悲做过终极追问，认为悲之根本因由“在于其造物的状态”和“造物者的思辨冲动”^③。“思辨—悲态”既表明“悲态”之于个体人生的必然性，也表明思辨深度与“悲态”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悲态”之生成不仅取决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渲染，更取决于主观心理和思想。“思辨—悲态”之间“原因—结果”的直接关联，意味着个体越是具有哲人思维，其于“悲态”的体认和感触愈明彻。显然，庄子对悲态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远远超越一般人。毕竟，将“未来”和“过去”都纳入概念思考的范围，意味着认识将广大范围内的各种痛苦照亮，因而人的痛苦也就急剧增长^④。《庄子》的“悲态”哲学与庄子本人博古通今的开阔思维、达天入地的广大视野和上下求索的哲人精神密切关联。庄子对“独”倾注大量笔墨，视其为理想的人格特质和生存样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逍遥游》），“独来独往，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在宥》）。与其说庄子重“独”，毋宁说“独”是道家人格的核心特质。《老子》第20章中区别于“众人”的“我”，便是“独来独往”的典型代表。老庄所谓的“独有之人”，统指“独守道”、抱持不入俗流之“独特”人格者。这类“独有”者相比于陷于流俗的“众生”，思想和精神往往独立与“孤寂”。概观庄子之时“仁义之士”遍存的社会环境，庄子的“重独”在表达观点的“独特”性之余，也传递出自身理论为人们忽视或冷落的“孤独”境遇。“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第70章）。这种以自我为起点而衍生出的“悲态”，是庄子“悲态”哲学形成的深层原因。

①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8页。

② 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1页。

③ 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5页。

④ 刘兴章：《论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身体理论——兼评叔本华的悲情人生观》，《求索》2014年第4期。

二、《庄子》“悲态”美学的形式与内容

徐公持先生认为承继于先秦的汉代文学的“悲情”是弥漫整个汉代的文坛风气。“悲态”也是道家思想的一贯风格,其集中体现为老庄对“悲态”的哲学沉思与阐释。《庄子》的“悲态”有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经由呈现“悲态”而揭示浩瀚玄远的哲思与真谛,以及引发人们豁然通达的精神体验,既可被视为庄子“悲态”哲学的逻辑进路,也可被视作其特有的表达手法和书写技巧。

(一)难以逾越的天然局限:作为生存境域与心理样态的“无”

批判世俗之“有”而肯定“无”之“大用”,是老庄的一贯逻辑。“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庄子·刻意》)。“故”本为“有意而为”,可引申为“诈伪”^①。老庄揭露机心、巧智、物欲蒙蔽自然性的实质,主张人们经由“日损”“损之又损”(《老子》第48章)的功夫促成自然本质的“澄明”,从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无情”(《庄子·德充符》)的境界。然而,人们之于“无”的体认与获得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过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的方式实现“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通达“无”之妙境。由世俗之“有”与终极之“无”间的悬殊而导致的“求道”过程之艰难,极度渲染了“无”之境界的深晦,也为人生理想的实现增添了诸多困惑与艰辛。

“无”不仅被庄子视为理想的精神高地和生存高境,也被用作描述人的心理样态和情感体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在宥》)郭象认为:“窈冥昏默,皆了无也。”^②“愚菟”(《庄子·齐物论》)的圣人,“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20章)般纯真质朴,丝毫不受情感的牵绊和束缚。然而,人本质上是“有”,是立于天地之间的“实在”,有其难以避免的“阿喀琉斯之踵”。“人被毫无来由的‘抛’在这个世界上,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人因此陷入绝对的虚空。这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悲剧意识。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那也是悲极而乐(选择乐)的文化。”^③现实人生极难脱离“有”的范畴,“无”之深奥晦涩也较难与寻求安定执守的人类心理间形成真切关照。如同“罔两问景”(《庄子·齐物论》)中被动而虚幻的“影子”必须以实体为依据,“无”与“有”也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有无相生”(《老子》第2章),离开“有”谈“无”,意味着“无”之合理性的自动消解。虽然“罔两问景”有彰显本质之“无”而弱化个体之“有”的意旨,但也明确表明“无”与“有”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相生相依、相互证成的关系。此外,庄子对拥有“无”之心境和状态的“神人”“至人”“真人”的多维度刻画与描写,虽能为人们的超越性发展提供指引,但也真切地反映出其作为理想状态的难以企及,从而似乎在以一种反衬的手法强化现实中人不可逾越的“天病”——天赋局限。

(二)短暂而荒诞的人生:片段性和戏剧化的“生”

庄子重生,以“养生”为主题的“养生主”阐述的是合理之生的原则与方式。在《庄子》中,万物在“生”处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等同,“齐物”“齐一”的前提是对“生”的尊重与珍视。不同于世俗之人“厚生—养生”的生命观和生活方式,庄子基于对自然生命的倡导而极力反对“厚生”：“悲夫！世人之以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0页。

②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8页。

③ 冷成金:《“向死而生”: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为养形足以存生”（《庄子·达生》）。诚所谓“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庄子·天地》，由生命有限引发的“厚生”是盲目恐慌的表现，其不仅无益于生命本色的彰显，反而对人之生具有不可逆转的危害。这种对待生命的不当行为，在庄子看来只能导致生之悲。“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庄子·人间世》）不可企及的“来世”与“往世”将人逼促于短暂的“现世”之中。庄子的“重生—养生”以“生”之有限为思想和情感依据。“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①由生之瞬间和短暂，珍视生命与热爱生活也便显得“不可待”，而由此引发的诸种“厚生—害生”的观念与行为，复又使得本就短暂的生命附加不可承受之轻。

倘说庄子以生之短暂证成人生之悲态，进而由中生发出“生”的无限可能的话；以“生”之忽而与荒诞反衬人生之艰难与沉重，则体现出庄子“悲态”哲学的宛转进路。“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庄子·大宗师》）；“俄尔子舆有病，喘喘然将死”（《庄子·大宗师》）。生与死的界限只“莫然有间”与“俄而”，此不免令人悲不自禁。《庄子·至乐》中，庄子丧妻后“箕踞鼓盆而歌”，惠施道：“与人居，长、老、身死，不哭亦足以，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对此，庄子回应道：“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针对庄子对“鼓盆而歌”的“辩护”，人们多关注其中的“齐生死”观点，并因此认为庄子超越世俗生死观以至于面对至亲的离世并无悲感。然而，惠施以“礼”之“表”对应庄子的外在行为，不仅忘却“礼”之实质，也难以窥见庄子之真实心理。“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虽而哭之，自以为不同乎命”，通晓死之自然与必然而后止悲，定然离不开理性之于感性的强力克制。庄子的“欲悲而不能”反而隐藏着极为深重的悲痛。“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②看似荒诞的“鼓盆而歌”，何尝不是庄子之悲的极端表现形式；庄子之歌，又何尝不是如泣如诉的大悲歌。

（三）复杂而有待的自我：受限与无力的“身心”

庄子“悲态”产生的根源性动因是人对自然天性的悖离，以非自然方式生存的必然结果是“有待”。在《庄子》中，世间万物绝大多数都“有待”，就连“御风而行”（《庄子·逍遥游》）的列子也有依凭和借据。真正的“无待”者只有道、天地以及极少数得道的“至人”“真人”。庄子致力于刻画与描述的主体以“有待”者占大多数，如身体残缺者、智识有限者、道德缺失者等，而其对“有待”者的生存境遇的揭示，也使得艰辛、无奈、困顿等的悲况与悲像尽显。

“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杨国荣教授以“井蛙”“夏虫”“曲士”比喻不同存在形态的人，认为“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分别对应“受制于特定环境”“为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片面性的思想、观念对人的影响”^③。在生之局限性上，人与井蛙、夏虫并没有本质差别，区别在于人之束缚和局限往往是主客观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④受制于外物和自身的限制，人总要面对不可预测和无法抗衡的“不得不”之“悲态”。在《庄子》中，智识、视野和道德的“有待”既是“悲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悲态”的根本原因。

① 谢柏梁：《中国悲剧美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② 黄周星、王岱：《黄周星集·王岱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62页。

③ 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④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页。

“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夫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面对接輿对“藐姑射山神人”的“质疑”,连叔以目盲、耳聋之人的感官局限对应接輿浅显的见识,表明凡俗之人与得道者认识层次的天壤之差,从而勾勒出“藐姑射山神人”令人心生向往的生存样态。智识有限,不解与疑惑便难以消解,由此引发的心理、思想、精神、行为之紧张、局促、困顿等“悲态”也便是“常态”。针对蜩与学鸠对鲲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的不解与嘲笑,庄子用“行路备粮”的隐喻揭示芸芸众生重眼前实际而忘长远未来的局限视野。这也是“小大之辩”对个体局限性的形象揭示。视野之差别导致人们观念与行为之差异,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嫌隙、矛盾旁生不断、此起彼伏,此无疑是现实中人时常面临与应对的“悲态”。“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机事”者究其根本是“人为”之事,为则伪矣。“机心”重则“道心”浅,道德发展便难入无为之妙境。在老庄语境中,硬性、人为、外在的“机事”必然损伤与戕害柔软、自然、内在的道德,“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机心”导致的道德危机始终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增加与深化着人类“悲态”的形式和内容。

三、《庄子》“悲态”美学价值的生成路径

在对“悲态”的描述和表达方面,庄子是毫不保留与淋漓尽致的;在对“悲态”的态度和方式上,庄子无疑极为积极与乐观。庄子重“悲”却不迷执于“悲”,而是积极寻求多种突围“悲态”的方式和途径。经由“下沉—升华”的过程,庄子将“悲态”与大化流变的宇宙人生相关联,从“悲态”中超拔与升华出关乎个体自我、宇宙自然的积极精神体验和价值观念。勇于突破、消解和超越天赋或后天“悲态”,此既是《庄子》“悲态”哲学的内在归旨,也是其现实关怀的真切表达。

(一)怒生:化悲为力

区别于“无为”“自然”“顺应”等的道家概念,“怒”是理解《庄子》的独特维度。倘由“虚无”“顺命”中可导出消极“避世”或“出世”思想主张的话;在“怒”处,则可明确得见庄子对主体性的高度持重与认可,从而也能够抽绎出庄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内涵和特点。以“怒”的方式打破“生”之种种“悲态”,促成“生”之“绽放”,是庄子“怒生”观的核心意旨。

“怒”字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在描述“鲲鹏南徙”时,“怒而飞”用以表明“鹏”之飞的动作与态势。“怒,鼓怒翮翼”^①,以“怒”为修饰,“鲲鹏之化”是鲲鹏奋力突破局限并实现超越的主动行为。“‘怒’中有主动的奋发、振起,在‘怒生’中充盈着的是上达之冲动与不可遏制的生长趋势”。^②鲲鹏之“怒”飞是一种在原始力量促动下的行为,其中蕴含着机体的勃勃生机与奋力行动。在主动之“怒”中,鲲鹏实现“图南,且适南冥”的宏愿,达至“逍遥”之高美意境。

不同于鲲鹏的“怒而飞”,蜩与学鸠之“飞”是“决起而飞”,斥鴳则是“腾跃而上”。“怒而飞”“决起而飞”“腾跃而上”虽在形式和状态上存在差别,但蜩与学鸠之“决起”、斥鴳之“腾跃”与鲲鹏之“怒”都是对奋力、竭力之主体行动的摹写与表达。如同鲲鹏、蜩与学鸠、斥鴳也是在竭力的“决起”与“腾跃”中突破各自之局限而实现“飞之至”,达到观念与行为的极致境地。庄子善以自然事物比拟个体

① 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 陈赞:《〈庄子〉“小大之辩”两种解释取向及其有效界域》,《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人生,郭象注“春雨日时,草木怒生”(《庄子·外物》)曰:“青春时节,时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动而生。”^①鸟兽、草木尚且“怒生”“怒飞”,人之“怒生”更是促成个体摆脱局限、实现自我的根本方式。

(二) 显用: 以悲为用

符合中国古典哲学“藏体显用”的一贯特点,庄子重视“用悲”。《庄子》中的诸多人物和事物都能凭借“用悲”而尽性全生。比如,“匠者不顾”的“樗”、“无用”之“大瓠”(《庄子·逍遥游》)、“支离疏者”(《庄子·人间世》)等皆因“悲”生“喜”,由世俗之悲处得其天年。

《庄子·逍遥游》中,庄子在指出惠子“瓠”“樗”之困的根本原因在“拙于用大”后,给出疏解郁结的根本方式——“以无用为用”:“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顿哉!”以“无用”为“大用”,关键在于积极转变对待“无用”的消极与否定态度,改变看待“无用”的视角,从而发现“无用”之妙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皆因“无用”而悲戚,庄子却因“无用”而欢欣,“以无用为用”体现出老庄的“反向”思维进路。

庄子不执著于“有”之用,而是在否定“有”之暂时与不确定性后,将视野集中在“无”处,认为生万物的“无”乃是真正的“大用”。“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一旦意识到事物发展的“反向”“返回”的必然规律,则由消极否定的世俗“无用”之“悲”处必然能够导出积极美善之“喜”与“乐”。面对“大瓠”与“樗”,庄子生发的不是极端的“掙之”与挥之不去的“困顿”,而是乘“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以及“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逍遥”心境,其中之畅然自适不可不谓高美之境。

(三) 待时: 悲中候运

《庄子》的“待时”具有顺应时势和等待时机的双重含义,其以对外部时势的顺应为前提,实质则是在顺应时势的前提下等待机缘以行动。“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齐物论》)以及女偶答南伯子葵问话(《庄子·大宗师》)中多次出现的“守”字,皆确证了“顺时”“待时”之于“得道”的重要意义。由于“悲态”总是以必然和偶然的形态持续存在,故而以“顺时”的方式积极应对“悲态”是庄子极力倡导的理想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是“顺时”者。庖丁之“顺时”可被理解为“顺势”,即顺应牛之机体的内在走势。在“见全牛”至“不见牛”的漫长历程中,庖丁定然面临和经历过诸多疑惑与困顿,所幸之处在于庖丁始终秉持“顺势”的原则不断精进技艺。经由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庖丁之技艺最终通达“游刃有余”之道境,传递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和谐美感。至于庖丁解牛后的“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则可被视作个体经由消解或化解“悲态”而实现理想预期后的积极心灵享受和精神体验。

《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同样经由顺应和把握时势而实现突破与超越。“徙于南冥”确实不能凭借“鲲鹏”一己之力实现。“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②“海运”并非鲲鹏“徙于南冥”的原因,而是垂天之翼依凭而起的条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艮·象》)倘

^① 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26页。

^② 林希逸:《庄子庸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页。

若没有“海运”这一契机,单凭“不知其几千里”的“鹏之背”和“若垂天之云”的“翼”,绝不可能“适于南冥”。然而,倘若鲲鹏没有“绝云气,负青天”的意志、能力和行动,徒有“海运”之条件,则亦不会“适于南冥”。“鲲鹏之化”的隐喻表明,在“顺时”的前提下通过自觉而合理的行为突破“悲态”的限制,是实现与超越自我的必然途径。

(四)顺命:安悲若命

人人都有突围“悲态”的内在需求,也有各不相同的“突围”方式。有身体力行者,有善于转化和利用客观条件者,有善待时而动者,也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者。庄子认同并主张“顺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在庄子看来,接受与顺应命运是道德达至高点的标志。

以庄子之力倡“自然”而言,“安之若命”无疑最“自然”;以人对宇宙天地本源和终极地位的体认,个体也定然是“不可奈何”者。“不可奈何”是对人之势能的否定,其之于人而言是必然性的“悲”。然而,由必然之悲转向“安之若命”的柔和生存样态,既非逃避或回避“悲态”,亦非在“悲态”中沉沦与堕落,而是以一种柔性迂回的方式安置自我身心。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是传达“被动”的人性和人生观,而是意在彰显人对合于“道”之理想生存样态的主动选择权。人不是被动的“不可奈何”与“安之若命”,而是在理性确认的基础上,主动回归自然、平静、淡泊的生存理念与生活方式。诚然,只有在主动与主体的意义上,人才能成为区别于动物与事物的“德之至”者。

《庄子》中的主体因“顺命”“安命”而受到关注与认可。《庄子·大宗师》中静待造物者施化的“畸人”意而子,将自身缺陷的补救完全诉诸于造物者：“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锤之间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之以随先生邪?”面对身体的残缺之悲,意而子并非毫不在意,否则不会在“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的“悲”例中寻求自我安慰,也不会因对诸此之“悲态”的思索而总结出“皆在炉锤之间”的原理和规律。然而,对比世俗之人沉浸于“悲”乃至于为“悲”所摧毁的情形,意而子的“安之若命”充满着乐观与豁达。这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因身体缺陷而导致的心理和思想困境,从而使人生充满希望与期待。“畸人”意而子的“顺命”既是大悲之后的觉醒,也是个体思维观念不得已的“大转向”。由此“转向”,人之生才能真正摆脱外物的牵绊与束缚,从而驶向豁然通达的自我一自由之境。

四、《庄子》“悲态”美学的现实镜鉴

有学者指出,“在人性面前,三千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威力”“有时古典文学作者比现在的文士还要更明智勇敢”^①。《庄子》的学说魅力和艺术光华在历史长河中的持续蔓延,与其颠扑不破的时代通用性密不可分。庄子的“悲态”与现代社会的“悲态”在实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互通性,既是促成庄子“悲态”哲学现代性表达的基础,也可为现代人理性体认、预防、消解和利用“悲态”提供有益镜鉴。

(一)认识自我:“悲态”的解蔽与澄明

无论是在专门的哲学理论中还是经由对日常生活的体悟,人们都会时常感受和经历作为人生有

^① 钟叔河:《周作人文选 1898—1929》,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机组成部分的“悲态”。以消极和否定为特性的“悲态”是人们无可逃脱的生存环境。既然“悲态”之于人是必然现象,那么个体对于“悲态”的理性认识则是个体获悉自我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逃避”对于“悲态”的感知,虽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和普遍的心理现象,但忽略或否定“悲态”也是拒绝认识自我的表现。其结果是自我人生的模糊和失控,以及人们在“悲态”中的麻木与沉沦。由“悲态”的消极和否定性而言,认识“悲态”即是勇于与不理想的自我“照面”,由此关于自我的模糊认识会得到“澄明”;由“悲态”作为哲学思索的结果而言,认识“悲态”也即经由哲学沉思走向自我“解蔽”,由此自我意义与价值会获得更加清晰的显现。

认识“悲态”就是认识自我,“风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人各有悲,悲各不同,认识“悲态”需要坚持个体性原则。以自身之悲为认识对象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感官和心理的作用,从而更有助于个体从中获知生存与发展的真谛,并赋予自身之悲态以特殊而切己的意义和价值。《庄子》中具备自然德性的主体都能在对自身“悲态”的中肯认识中掘发出有关自我人生及社会人世的一般原理,从而能够随性养身、符道合德。“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鸇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庄子·大宗师》)以对宇宙自然之强力与自我身心之局限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人才能够合理对待和安置自我。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人是群居者,对于自我的认识既可以通过体认自我之“悲”的途径实现,也可以通过间接感受与体认他者之“悲”的方式获得。“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庄子·德充符》),与他人共处是人的必然本质和天然需求。这种个体的群居宿命使得“悲态”往往具有“群体”属性。庄子对个体“悲态”的描述背后隐藏的是“群像之悲”。抑或说,个体之“悲态”是他人乃至全体之“悲态”的典型代表与具体呈现,由个体之“悲态”可推至群体之状态与处境。人对他人之悲的体认并非全然依靠“有意而为”,心理机制的相通性为人们的感同身受提供原始依据。“恻隐是一种道德感情,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的道德感情。”^①由同情心和同理心引发的共鸣与共情,为人们以“悲”为内容的交流和沟通提供可能。有鉴于此,人们既对自身“悲态”进行积极主动的觉察和认识,又借助对他者之悲态的体认而生发切己的感触,可谓全面有效“认识悲态—认识自我”的途径与方法。诚然,“悲态”究其根本是符号动作的结果,这意味着人们对同一悲态的觉察和体认不可避免的存在个体差异。这种经由认识他者之悲而明晰自我处境的方式、过程和效用也往往因人而异,需要人们加以灵活调控和把握。

(二) 关怀自我：“悲态”的消解与珍视

“关怀自我”是贯穿中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先秦道家阐发自然人性的目的在于促成人们对原初本性的体认与回归。道家“复归”的根本意义不是“返回”,而是对原初自我的回望、珍视与坚守。西方哲学家福柯通过赋予“自我技术”以“个体通过自身努力或凭借他人帮助,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身,以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②的定义,以及追溯古典犬儒主义者的生存样态,构建出其哲学思想“自我关怀”的主旨。“左

^① 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②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Patrick H. Hutt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8:17-18.

右一切行为的规则是,生命体总是会本能地保护或增强其生命力。一言以蔽之,支配一切行为的生理原则乃是自我保护。”^①突破与消解“悲态”是人的原始需求,经由消解“悲态”而关怀自我则是人们实现理想生存的重要途径。

消解“悲态”既源自“关怀自我”的需求和动力,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方法。基于“自我关怀”的动机与目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实现对悲感的重新叙述、忘却、转移、转嫁,从而成功地把悲感化解^②。比如,积极运用个人或群体的力量主动改变不良处境、转化和利用周围环境间接改善不良态势、顺应和把握时机一举打破束缚和限制、经由体认他人处境提前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借鉴他人观点解决自身困境、用开阔的心境和视野在逆境中寻求自我发展等,皆是现实中人消解“悲态”的重要方式。由“悲态”的不可逃遁性而言,消解“悲态”是人生的永恒课程,具备应对和消解“悲态”的能力既是人之主体性确认与彰显的重要标志,也是人达至精神高境的必然要求。

“悲态”之于个体人生的消极影响是消解“悲态”的本原依据。然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2章),缺乏或没有“悲态”的人生定然充满缺憾和危机。“对人的力量持乐观信念,常常容易滋生对外部世界(包括社会领域)过强的支配、主宰等意向,并导致各种形式的理性僭越。”^③人生浩瀚纵横的欲望需要借助“悲态”予其以收煞和消止。个体人生需要“悲态”这盆“冷水”作为镇静剂,从容的人生从来不会只有积极乐观一种旋律。面对不可避免的悲态,人们既要及时消解“悲态”的负面影响,又要合理看待并珍视蕴藏在“悲态”中的积极意义,从而通过恰当地转化与利用“悲态”而达成积极乐观之结果。这种“消解—珍视”“既消解又珍视”的“悲态”观,既是庄子“悲态”哲学欲意传达的核心观念,也是现实中人关怀自我必须依凭的手段与方式。

(三)实现自我:“悲态”的转化与利用

以“苏格拉底主义者”著称的安提斯泰尼,经常借用医学隐喻指出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病态特点。在安提斯泰尼看来,那些对财富、饮食、性过于贪婪,生性妒忌且又无知的人其实是患了严重的疾病,需要用理性来拯治。道家庄子也善用“疾病”的隐喻,其常借用身体畸形却道境高尚之人,表明“悲态—道德”之间的转化关系。朱光潜先生谈及艺术形式之“悲”道:“这种悲色彩对读者情绪的净化作用正在于将世俗意义上的怜悯和恐惧转变成为合于美德的思想情感。”^④“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51章)。“道德”是中国古典哲学尤其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悲态”哲学转化与利用的最终指向是“道德”。

作为表达和呈现“悲态”的艺术形式,“悲剧是最上的艺术,就因为它能教人‘退让’,能把人生最黑暗的方面投射到焦点上,使人看到一切都是空虚而废然思返”^⑤。悲剧艺术所传达的“退让”精神实质和道德观念,与老庄“柔性”“不争”的道德主张互为贯通,是理解“悲态”向“道德”转化的重要介质。“老庄思想是一种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弱者的哲学,是试图用最消极的方式积极把握人生的生命

① [美] 乔治·萨拜因著, [美] 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上)》第4版, 邓正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第129页。

② 谭光辉:《论悲感的叙述学原理、作用和化解方式》,《兰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③ 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④ 朱光潜:《悲剧与心理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⑤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哲学。”^①道家之“德”的内在特性是“柔”而非“刚”，以“柔”的方式面对困境并非退让与躲避，而是以“无声”的方式达至转化和利用“悲态”的“胜有声”的理想效果。“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東西，不是人而是物件。”^②道德之境从来不会自发形成，而只能是道德淬炼的结果，尤其是主体在“悲态”中以道德安置与回应自我、他人和宇宙万物的结果。由对“悲态”的沉思中获得伦理启示和道德指引，而非沉溺于“悲态”中不能自拔，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阿德勒(Adler)认为，悲感的被动性中隐含着主动性，“这种情感充分展现了以退为进、反弱为强的奋斗过程，展现了个体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想要规避无力感和自卑感的意图”^③。面对消极否定的悲态，来源于生命的“强力意志”往往“逼迫”人们由对“悲态”的感受与体验中生发出无限的生命期待并将其诉诸于真实行动。这种主动弱化、克服、超越“悲态”而走向理想生存境遇的观念和行为时刻离不开理性的指引与规约。转化与利用“悲态”必须建基于对“悲态”的理性关照。理性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和确证悲态，也在于转变和改善悲态。以理性调控和运载悲态，而非停留在对“悲态”的感性认识中，能够促成“悲态”积极效用的最大化。“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只有经由“理性的沉淀或融化”的“悲态”才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与价值。经由诉诸理性而体认、转化和利用“悲态”，方能真正成就与乐享理想人生。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Turn and Transcendence of "Beauty":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s Thought on "Sad State"

Wang Kangning¹ Xue Zhenyu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 General Department, Xinxing Cathay International Group,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incisive writing of the "sad state" and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t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Zhuangzi's "sad state" aesthetics. The realization of ideal life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ad state" as the inevitable way, but also takes the precipit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sad state" as the foundation. To realize individual and social values, it is an urgent task for modern people to face and respond to the "sad state" and discover and resettle themselves in it so as to reduce the bitter and evil fruits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narrow living space and the continuous collapse and decline of the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 Zhuangzi; "sad state"; aesthetics; beauty

① 郭忠义：《道家文化内核——复兴的原因浅谈》，《求是学刊》1992年第2期。

②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③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汪洪澜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税收激励与企业资本结构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证据

谭小芬¹ 王可心² 朱梦珂³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1; 2. 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3;
3. 中央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税收激励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分析考察“营改增”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杠杆率, 结果表明: 该项政策显著提升了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杠杆率, 相比于交通运输业, 政策效应在现代服务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 “营改增”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促进企业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提高杠杆率, 符合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异质性分析发现, 这一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强研发能力、高盈利水平、轻资产和负债不足的企业中, 相较于不受“营改增”政策影响的企业, 实施“营改增”政策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研究为税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 也为未来减税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政策思考。

关键词: 营改增; 资本结构; 杠杆率; 权衡理论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54-19

一、引言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凸显, 银行流动性持续收缩, 企业贷款意愿和投资意愿持续转弱, 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根据《2023 年一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公布的数据, 2023 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较 2022 年末上升 8.6 个百分点, 从 273.2% 增至 281.8%。尤其是非金融企业, 杠杆率上升幅度最大, 涨幅为 6.1 个百分点,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①。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债务的增加并未转化为相应的企业投资增长。2022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精准减税降费, 落实提高质量和效益的积极财政政策。在 2023 年 9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新闻发布会上,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继续优化和完善减税降费措施, 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如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利率时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防范研究”(20&ZD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谭小芬, 男, 江西萍乡人, 经济学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金融和跨境资本流动研究; 王可心(通讯作者), 女, 山西太原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公司金融和风险投资研究; 朱梦珂, 女, 安徽蚌埠人, 经济学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

^① 数据来源:《2023 年一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 e70df6bd-a65d-450d-b4e1-519bc605439a.pdf(nifd.cn)。

何通过财政政策持续优化实体经济结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使信贷资源配置从低效、缺乏竞争力的领域转向高效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领域是助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任务。

众所周知,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方面,税收是一项主要的政策手段。从企业层面看,税收政策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改变企业自身的融资环境而影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与资本结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有形性或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角度分析其变化对于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影响^①。而关于税收激励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最早是 Modigliani 和 Miller 等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②。近年来,一些文献多是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切入点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③,仅有少部分文献涉及增值税。这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税收收入主要是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为主,增值税占比很小,有的甚至没有设立增值税^④,而在中国的税制体系中,则是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据较高比重^⑤。企业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其资本结构势必会因增值税的调整而受到影响,加之中国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发展程度与其他国家也有显著不同,使得对西方发达国家适用的资本结构理论不能简单套用到新兴经济体上。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的税制背景研究税收政策的调整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中国基于自身经济体制的原因,在税收制度上一度采用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其中,制造业以增值额为税基计征增值税,服务业以营业额为税基计征营业税。该项税制安排,顺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以间接税为重的税制设计对纳税能力具有放大作用^⑥,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两税并行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阻碍作用越发凸显,对服务业企业的重复征税不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分工融合。为此,中国实行了增值税扩围改革,于2012年1月1日以上海为试点实施“营改增”,行业范围涵盖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⑦),“营改增”改革于201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涉及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等领域。至此,营业税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① 姜付秀、黄继承:《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钟宁桦、刘志阔、何嘉鑫等:《中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Rajan, G. R., Zingales, L., "What Do We Know about Capital Structure? So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50(5): 1421-1460.

②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3): 433-443; Miller, M. H., "Debt and Tax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77, 32(2): 261-275.

③ Faccio, M., Xu, J., "Taxe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5, 50(3): 277-300; Fan, J. P. H., Titman, S., Twite, 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Debt Maturity Cho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2, 47(1): 23-56; Graham, J. R., "Proxies for the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2(2): 187-221; Graham, J. R., Schallheim, L. J. S., "Debt, Leases, Taxes, and the Endogeneity of Corporate Tax Statu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53(1): 131-162; Mackie-Mason, J. K., "Do Taxes Affect Corporate Financing Decis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0, 45(5): 1471-1493.

④ 例如,美国没有设立增值税,且2010年以来其间接税占比始终维持在5%以下,而日本间接税占比则不超过40%。数据来源:Wind。

⑤ 根据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这六项主要税种测算,2010年以来中国间接税占比始终维持在60%以上。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⑥ 吕冰洋、郭庆旺:《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⑦ “1+6”行业是指:交通运输业和六大现代服务业(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服务)。

“营改增”是近年来中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关键之举。作为税制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带来的短期减税效应与长期税制优化对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和创新型企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外购原材料、设备以及应税服务得以抵扣进项税额,从而有助于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活力。当前学术界关于“营改增”政策对微观企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改增”政策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意向及 R&D 创新的作用^①,对企业现金管理和税负转嫁能力等的影响^②,以及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③。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税收征管能力大幅提升,反而使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上升,违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初衷^④。然而,关于“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⑤。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0—2016 年的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中国“营改增”政策的实施这一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税收激励对非金融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杠杆率水平,相比于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政策效应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影响更为明显;第二,渠道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会通过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促进企业杠杆率水平的抬升,符合权衡理论预期;第三,考虑企业不同特征后,“营改增”政策促进杠杆率提升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研发能力强、固定资产占比低、盈利能力强以及负债不足的企业中;第四,实施“营改增”政策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探讨“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丰富了税收激励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补充了公司金融领域关于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文献。(2)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不仅会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间接影响企业杠杆率,还会直接促进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发现了与资本结构权衡理论相一致的经验证据,为运用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对中国企业负债率加以解释提供了新的证据。(3)本文的研究佐证了税收政策对信贷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为进一步调整减税结构与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资本结构合理与杠杆率水平稳定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进一步分析;文章的结尾部分给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① 袁从帅、刘晔、王治华等:《“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研发及劳动雇佣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5年第4期;袁建国、胡明生、唐庆:《营改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税务研究》2018年第3期;赵连伟:《营改增的企业成长效应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

② 乔睿蕾、陈良华:《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武志勇、王鸿博、李春波:《营改增对服务外包企业投资效应及税负转嫁的影响》,《税务研究》2018年第8期。

③ 陈钊、王旻:《“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李永友、严岑:《服务业“营改增”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吗?》,《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倪红福、龚六堂、王茜萌:《“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

⑤ 姚宇韬、王跃堂:《“营改增”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非债务税盾的视角》,《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基于非债务税盾的视角,发现“营改增”政策主要降低了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水平,但其研究重点在债务期限结构而非企业总体杠杆率。

二、理论机制分析

(一) 制度背景

中国分税制改革后,营业税与增值税分立并行。作为流转税最主要的两大税种,两者在征收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征收管理方法上均有所不同。营业税为地方税务局管理,是企业提供应税劳务、无形资产转让、房地产出售等按销售额为基数计算税额,计算简便且便于征管,属于价内税,无法抵扣或退税,因此在商品流转过程中具有多次重复性征收特点。增值税为国家税务局管理,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为价外税,虽“环环计征但层层抵扣”,实际税负不随商品流转次数的增多而增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商品在市场中的流转频率较低,营业税作为价内税的缺点并不突出。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重复征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为顺应国际税收制度整体发展趋势,2011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共同发布了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意见。2012年1月,上海“1+6”行业率先实行“营改增”,其中涉及交通领域和一些现代服务业领域。当年9月到12月,改革在北京市、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等八省市进行了推广,并新增广电作品的制作、发行等产业。2013年8月1日,又逐步将铁路、邮政、通信等行业包括在内。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全面实施,将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业最终也纳入改革范围。至此,营业税永久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彻底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拉长了产业链,使增值税征税范围覆盖到所有行业和产业,有效缓解各行各业重复征税难题。对于制造业等原有增值税纳税主体而言,抵扣范围进一步扩大,销项税额中所含的增值税税金可全部纳入抵扣。对于新增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尤其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广告宣传等现代服务业来说,会走出重复征税困境,减少成本费用,有效促进企业在技术咨询、研发及品牌、商誉等领域加大投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企业的竞争力。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底,“营改增”政策累计实现减税6412亿元,全国营改增试点覆盖纳税人592万户^①;截至2018年初,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②。该政策所释放的减税红利,不仅有效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激发市场活力,更是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潜能,引导社会生产向专业化协作方向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二) 理论机制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杠杆率的本质是资本结构决策问题。当前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③,即企业考虑到发行债券的风险与成本会优先进行内部融资,当内部资本不足时,公司再进行债务融资,最后考虑股权融资。另一种是权衡理论,即公司会通过衡量债务的成本和收益来决定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当债务的成本和收益正好抵消时,企业达到目标杠杆率水平。其中,持有债务的收益包括“债务税盾效应”和控制自由现金流水平,债务的成本则涉及预期财务困境成本和股东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成本等。这两种理论均

① 数据来源: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18/content_5055337.htm.

② 数据来源: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118/c1004-29772937.html>.

③ Myers, S. C.,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4, 39(3): 575-592.

表明企业杠杆率会随其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变化而改变^①,通常,税收政策会影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状况,进而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因此,在理论上,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杠杆率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税收调整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Modigliani 和 Miller 提出的修正的 MM 理论^②。即在考虑公司所得税之后,由于负债利息具有税盾效应,企业价值会随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因此税率更高时企业将倾向增加债务融资。此后学者们对这一理论研究不断加以完善^③。在实证方面,不少文献证实了税收和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统计关联^④。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 Li 等通过建立动态契约模型^⑤,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对企业最优杠杆率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在较低税率水平下,企业杠杆率才会对税率的变化做出反应。具体到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吴连生和岳衡探究了税制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⑥,认为我国现行“先征后返”税收制度会推升企业财务杠杆。王跃堂等基于 2007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⑦,研究了税率变动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特别是针对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政策,其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探讨。例如,申广军等发现中国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会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⑧; Zou 等通过对中国中部 26 个城市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探讨,发现企业为应对期限匹配和市场约束,在购买固定资产时会更多依赖长期负债,导致长期负债上升,短期负债下降^⑨。

从中国的税制体系来看,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在中国税收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相比于之前以企业实际税率衡量减税效果的做法,通过对政策评估可以更有效地克服企业税率内生性问题。然而,从目前文献看,关于“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虽然同属于增值税减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和“营改增”的改革对象存在巨大差别,前者覆盖的行业为制造业等第二产业,而后者以服务业为主,行业性质的不同必然使得税收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路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有必要专门讨论“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会通过两个渠道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渠道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当期自由资金,改善企业盈利能力进而影响资本结构。“营改增”政策

① Ovtchinnikov, A.V.,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Deregulated Industr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2): 249-274.

②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3): 433-443.

③ Miller, M. H., "Debt and Tax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77, 32(2): 261-275; DeAngelo, H., Masulis, R. W.,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under Corporate and Personal Tax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0, 8(1): 3-29.

④ Graham, J. R., "Proxies for the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2(2): 187-221.

⑤ Li, S., Whited, T. M., Wu, Y., "Collateral, Taxes, and Leverag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6, 29(6): 1453-1500.

⑥ 吴连生、岳衡:《税率调整和资本结构变动——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1期。

⑦ 王跃堂、王亮亮、彭洋:《产权性质、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⑧ 申广军、张延、王荣:《结构性减税与企业去杠杆》,《金融研究》2018年第12期。

⑨ Zou, J., Shen, G., Gong, Y., "The Effect of Value-added Tax on Leverage: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4: 135-146.

实施后,纳税人不再承担购进货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的“进项税额”,只对企业增值部分征税,且增值税作为价外税所具有的直观透明特点,避免了以往营业税的重复征税给企业造成负担。这就使得企业应纳税额减少,当期经营成本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裕了企业当期自有资金、缓解了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根据优序融资理论,随着企业内部自有资金的不断增加,企业利用外部资金为新项目融资的需求减小,外部融资需求的下降最终表现为企业杠杆率的降低。但根据权衡理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有助于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使其面临较低的预期财务困境成本,进而更加倾向于利用债务融资来发挥“债务税盾效应”以及控制自由现金流^①。

另一个渠道是“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会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影响资本结构。“营改增”实施之后,改革试点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和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这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意愿。袁从帅等利用2007—2013年239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证实了“营改增”显著促进企业总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企业研发投入^②。王志勇等也发现“营改增”政策对我国服务业外包企业的投资意向有明显促进作用^③。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在经营好的时候将储备现金或少量举债,以试图在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预期中保持较低的杠杆率水平,避免未来采用昂贵的外部融资方式,则“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企业的杠杆率很可能会下降。在权衡理论下,“营改增”之后企业债务收益的增加与债务成本的降低将促进企业举债。一是因为由于“进项税额抵扣效应”,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增加,债务收益上升;二是因为企业投资支出的上升会扩大企业未来的资产规模,增加未来的经营收入,使预期财务困境成本下降,杠杆率上升。

可见,“营改增”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不同理论下是不同的。在优序融资理论下,“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会降低企业杠杆率;在权衡理论下,“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会降低债务成本,增加债务收益,企业为把杠杆水平调整至最优,将增加杠杆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H1a:“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

H1b:“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由于A股公司和B、H股公司编制财务报表时遵循的会计准则不同,财务指标不具可比性,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避免中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改革以及2009年全面执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本文以2010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度。考虑到政策影响的时滞性,本文包含政策实施之后3期的数据,最终数据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10—2016年。此外,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

① Jensen, M.,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2): 323-329.

② 袁从帅、刘晔、王治华等:《“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研发及劳动雇佣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5年第4期。

③ 王志勇、王鸿博、李春波:《营改增对服务外包企业投资效应及税负转嫁的影响》,《税务研究》2018年第8期。

金融和保险类企业;(2)剔除*ST和ST企业;(3)剔除样本期内财务数据缺失企业;(4)剔除资不抵债、账面资产为负、营业利润长期为负的企业。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主要连续变量按1%和99%的水平进行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

本文选择双重差分法,通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非金融上市企业杠杆率是否存在差异变动,探究“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造成何种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ev_{ispt} = \beta_0 + \beta_1 treat \times year + \beta_2 X_{isp,t-1} + \mu_i + \varphi_{st} + \varepsilon_{ispt} \quad (1)$$

其中, Lev_{ispt} 表示 p 省 s 行业的企业 i 在 t 期的杠杆率,用企业的账面总负债除以账面总资产来表示。处理虚拟变量 $treat$ 用来区分实验组与对照组,若企业位于实验组则 $treat$ 取值为1;若企业位于对照组 $treat$ 取值为0。 $year$ 用来区分政策实施期间,2013之前的年度, $year$ 取值为0;2013年及之后的年度, $year$ 取值为1。 β_1 是双重差分估计量,反映了受“营改增”政策影响和未受“营改增”影响的上市公司在“营改增”实施前后杠杆率水平的差分。 $X_{isp,t-1}$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所有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 μ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φ_{st} 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ε_{ispt} 为回归残差项。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时间序列依赖,为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对标准误差进行公司层面聚类处理。

(三)变量选择

1.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实验组定义为“营改增”首批试点行业中的上市公司(“1+6”行业上市公司),对照组设为其他不受影响的上市公司^①。部分学者指出,制造业虽然自始至终未进行“营改增”改革,但“营改增”实施之后,企业抵扣链条的延长将使制造业受到影响,不适合作为稳定的对照组,故本文将制造业从对照组样本中删去^②。“1+6”行业上市公司前后分三次完成,为提高实验准确性,本文借鉴Schandlbauer的思路^③,以三次改革颁布的时间作为划分“营改增”时间的依据^④,三批实验组开始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2013年和2013年。第一批实验组的样本量过少,对结果影响作用不大,故删去;最终设定实验组开始时间统一为2013年^⑤。

① 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截至2016年12月31日,对于2013年8月新增的“营改增”试点行业广播影视服务业和2014年1月新增的“营改增”试点行业铁路运输业、邮政业和电信业企业样本数量少,删去不作比较。对于2016年3月23日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企业政策变化影响尚未显现,故归为未受影响对照组。

② 陈钊、王旻:《“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李永友、严岑:《服务业“营改增”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吗?》,《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Schandlbauer, A., "How d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act to a Tax Increases?", *Journal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7, 30(4): 86-106.

④ 三次改革颁布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16日、2012年7月31日与2013年5月24日。划分标准为:若改革颁布时间在上半年,则改革开始年份记为当年;否则记为下一年。

⑤ 未使用多期DID方法的原因有:(1)存在样本量过少的问题。第一批实验组企业,即可纳入实验组的上海上市企业共19家,占全部实验组样本的不到10%。(2)如果采用多期DID方法,适合使用企业季度数据,而三批实验组企业的改革时间密集,周期波动不易剔除,且净资本支出等数据缺失严重。

2.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选取方面,参考钟宁桦等学者的做法^①,本文选取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Size*),用账面总资产取对数衡量;盈利性(*ROA*),用资产报酬率衡量,即税后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固定资产占比(*PPE*),用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值表示;市场价值(*TobinQ*),用托宾*Q*值表示;流动性(*Cr*),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衡量;企业税负(*Tax*),用企业实际缴纳税费除以利润总额表示。

(四)描述性统计

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得到 5454 个年度样本,共计 1054 家上市公司。其中实验组上市公司,即“1+6”行业上市公司 316 家;对照组上市公司,即除“1+6”行业外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 738 家。在实验组样本中,交通运输业企业共 69 家,现代服务业企业共 247 家。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改革前				改革后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i>Lev</i>	500	0.3360	1643	0.5450	881	0.3450	2430	0.5460
<i>Size</i>	500	21.6500	1643	22.2500	881	21.9400	2430	22.6600
<i>ROA</i>	500	0.0590	1643	0.0408	881	0.0523	2430	0.0294
<i>PPE</i>	500	0.2030	1643	0.2010	881	0.1740	2430	0.1920
<i>TobinQ</i>	500	2.3280	1643	1.6120	881	3.8530	2430	1.8770
<i>Cr</i>	500	4.6100	1643	1.9120	881	3.2070	2430	1.7250
<i>Tax</i>	500	0.1530	1643	0.2130	881	0.1420	2424	0.2120

四、实证结果

(一)“营改增”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 2。表 2 列(1)是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会提升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水平,并且“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十分明显,相比于不受影响企业,“营改增”后改革企业的杠杆率提高了 10.17%。列(2)为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效应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所上升,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营改增”后改革企业的杠杆率相比于其他企业提高了 12.62%,并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 H1b 成立。

“营改增”首批试点行业中涉及部分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两个大类。实施“营改增”前,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征收的营业税税率分别为 5% 和 3%;“营改增”后,二者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为 6% 和 11%。虽然税率提高,但相比于以营业额为税基的全额征税,“营改增”后仅对增值额征

① 钟宁桦、刘志阔、何嘉鑫等:《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税,税基大幅降低,所以长期来看企业税收负担是下降的。不过,“营改增”政策对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对前者影响更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税率前后基本没变,但交通运输业税率有明显上升,税基缩小后,现代服务业企业的税负变化更明显。其二,“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不仅允许服务业抵扣外购材料、设备、劳务等的“进项税额”,避免服务业企业与上游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还将抵扣范围扩大到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大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相比之下,交通运输业已具有规模相当大的有形固定资产,购进频率极低,可抵扣成本十分有限,并且定价灵活性差^①。因此,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杠杆率受“营改增”政策影响可能更大。为此,本文将实验组企业进一步分为现代服务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分样本进行检验,表2列(3)、列(4)为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对于现代服务业企业而言,“营改增”政策效应是显著的,与全样本回归结果接近,“营改增”后改革企业的杠杆率相比于其他企业提高了12.02%;而对于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的政策效应不显著。由此可见,“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与企业无形资产和有形固定资产所占的比重密切相关。

表2 基准回归

变量	(1) 全样本	(2) 全样本	(3) 现代服务业	(4) 交通运输业
<i>treat × year</i>	0.1017*** (2.7507)	0.1262*** (3.6230)	0.1202*** (3.3873)	0.0003 (0.0047)
<i>L.Size</i>		0.0408*** (4.3318)	0.0440*** (4.7917)	0.0414*** (3.6257)
<i>L.ROA</i>		-0.4123*** (-4.6030)	-0.4562*** (-6.0481)	-0.4388*** (-4.4369)
<i>L.PPE</i>		-0.0214 (-0.6156)	0.0113 (0.3048)	-0.0266 (-0.6729)
<i>L.TobinQ</i>		0.0017 (0.5282)	0.0042 (1.4346)	-0.0017 (-0.3664)
<i>L.Cr</i>		-0.0066*** (-3.7037)	-0.0058*** (-3.1594)	-0.0052* (-1.7927)
<i>L.Tax</i>		0.0391*** (3.5012)	0.0409*** (3.5266)	0.0410*** (3.4985)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54	4413	4067	3694
修正后的 R^2	0.0820	0.1380	0.1480	0.1260

注:括号内为t值,误差为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前提。由图2中杠杆率的变化

^① 乔睿蕾、陈良华:《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趋势可以看出,政策实施之前两组企业的杠杆率变化趋势相近。政策实施之后,杠杆率的趋势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企业杠杆率的抬升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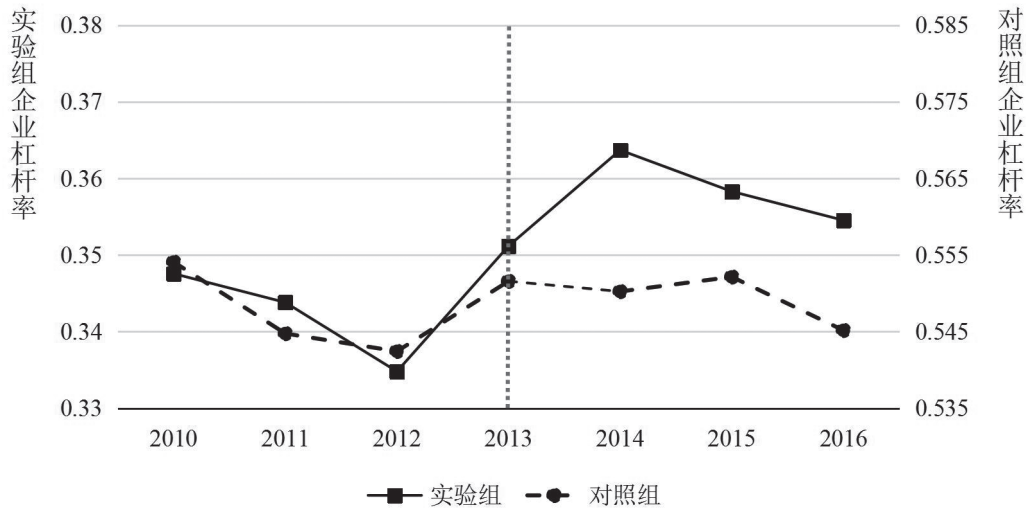


图 1 杠杆率趋势图

同时,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意在说明改革发生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杠杆率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组别间杠杆率的差异是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发生的。模型如下:

$$Lev_{ispt} = \beta_0 + \beta_1 treat * yrdum_T + \beta_2 X_{isp,t-1} + \mu_i + \varphi_{st} + \varepsilon_{ispt} \quad (2)$$

其中, $yrdum_T$ 为“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两年间各个年份的虚拟变量, T 的取值为 -2 、 -1 、 0 、 1 和 2 , 分别对应 2011—2015 年; $treat * yrdum_T$ 代表处理虚拟变量与各个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余变量与上文解释相同。如果 $treat$ 与政策实施前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前的系数不显著, 其他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 则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结果显示^①, 对于全样本和现代服务业样本, $treat * yrdum_{-2}$ 和 $treat * yrdum_{-1}$ 的系数均不显著, 而 $treat * yrdum_0$ 和 $treat * yrdum_1$ 的系数均正向显著, 说明“营改增”政策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杠杆率没有显著的趋势差异, 而政策实施后差异显著, 表明本文设定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交通运输业样本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也从某一方面说明“营改增”政策效应对于交通运输业企业并不明显。

(三) 稳健性检验

1. 匹配后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在“营改增”发生之前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固定资产占比等方面已存在一定差异, 试点企业的选定并非随机。因此, 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 以减小“混淆效应”^②。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六个企业层面特征进行比较, 通过 Logit 模型计算每个样

① 限于篇幅问题, 检验结果在此省略, 具体可向作者索取。

② Carlson, M., Shan, H., Warusawitharana, M., "Capital Ratios and Bank Lending: A Matched Bank Approach",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3, 22(4): 663-687.

本在政策实施前对应的倾向得分,随后依据得到的倾向分数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进行邻近匹配^①。

匹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在除固定资产占比之外的各个控制变量上均有显著差异,且至少在1%的显著水平下成立。处理后两组各变量的均值间差异显著缩小,各变量标准化后的均值偏差也显著降低,除流动性、企业税负之外均缩小到15%之内。根据t值检验,无法拒绝两组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固定资产占比、市场价值的均值相等这一原假设,但流动性和企业税负这两个控制变量的匹配效果不是很理想^②。本文基于配对成功的新样本,再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列(1)所示, $treat \times year$ 前的系数依旧显著。

2. 改变解释变量计算方式

本文在主要回归中衡量杠杆率的方式是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比。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企业总负债除以股东权益的方式衡量企业杠杆率,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营改增”政策效应变量前的系数依旧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企业的总负债与股东权益之比相比于对照组上升了199.56%。

3. 平衡面板

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的企业进入/退出现象可能导致一定样本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本文在表3列(4)中只保留了始终存在于样本中的企业所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结果依旧稳健,且系数0.1213与基准回归结果中的0.1262十分接近。

4. 剔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影响

在样本期内(2010—2016年)与本文关键变量相关的政策还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该政策自2014年起开始分行业逐步推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允许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在税前扣除折旧。诸多研究表明,该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加速技术升级^③。由于“营改增”政策的推行时间和涉及行业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所重合,为了排除后者的可能影响,本文剔除了营改增试点政策中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重叠的行业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表3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即便考虑了这一同期政策的影响,“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依旧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杠杆率。

5. 改变样本区间

为避免实证结果会受到2015年股市崩盘的干扰,我们将2015年及以后的数据剔除,发现结论依旧成立,如表3列(5)所示, $treat \times year$ 前的系数0.1648甚至比基准回归结果中的系数0.1262更大。

① 限于篇幅问题,匹配前后数据在此省略,具体可向作者索取。

② 根据表2列(1)的回归结果,流动性和企业税负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符号相反,所以其均值偏差对杠杆率的影响会被部分相互抵消。通过计算也可发现,流动性和税负的均值偏差对企业杠杆率总的影响非常小,为 $(3.7466 - 2.8744) \times (-0.0066) + (0.1520 - 0.1098) \times 0.0391 \times 100\% = -0.41\%$,不会对结论产生实质影响。

③ 刘行、叶康涛、陆正飞:《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期;刘啟仁、赵灿、黄建忠:《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	(1) PSM-DID	(2) 改变杠杆率 计算方式	(3) 平衡面板	(4) 考虑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政策	(5) 改变时间范围
<i>treat × year</i>	0.0996*** (3.3768)	1.9956*** (3.5859)	0.1213*** (3.9025)	0.1174*** (3.3093)	0.1648*** (5.34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087	4413	2934	4108	2850
修正后的 R^2	0.1430	0.1220	0.1550	0.1270	0.1290

6. 控制其他冲击和地区差异

双重差分模型要求政策具有外生性,即省份/行业的选择是随机的。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只考虑了行业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但这仍有可能遗漏一些重要变量。本文继续增加省份—时间以及省份—行业固定效应,结果如表 4 列(1)和列(2)所示,和基准模型结果相近。

此外,考虑不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可能同时影响“营改增”政策实施的效果及企业杠杆率的变化,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行业杠杆率中位数(*MLEV*)、行业竞争度(*HHI*)与地区市场化程度(*MD*)以控制行业因素和地区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结果如表 4 列(3)至列(5)所示。其中,行业竞争度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计算方法为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占比)的平方和;地区市场发展程度以《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地区市场发展程度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根据表 4 列(3)至列(5)的结果,不难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地区的差异之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进一步体现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2

变量	(1) 省份—时间 固定效应	(2) 省份—行业 固定效应	(3) 加入行业 杠杆率中位数	(4) 加入行业竞争度	(5) 加入地区 市场化程度
<i>treat × year</i>	0.1232*** (2.9841)	0.1103*** (3.1344)	0.1165*** (3.0516)	0.1168*** (3.1613)	0.1172*** (3.1670)
<i>MLEV</i>			0.1316*** (3.3327)	0.1111*** (2.6620)	0.1114*** (2.6743)
<i>HHI</i>				-0.1018* (-1.7155)	-0.1013* (-1.7099)
<i>MD</i>					0.0010 (0.20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否
观测值	4108	2850	4294	4294	4294
修正后的 R^2	0.1270	0.1290	0.1570	0.1580	0.1580

7. 安慰剂检验

虽然前文尽可能控制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因素,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印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但考虑到仍可能忽略无法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对结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进行了如下安慰剂检验。本文参照 Li 等的做法,将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打乱并重新随机分组,设置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以避免实验结果的偶然性^①。重复 1000 次随机分组实验,根据每一次的实验结果画出 $treat \times year$ 对企业杠杆率影响的系数及其 t 值,如图 2 (a)和(b)所示。可以看出,1000 次随机分组实验后得到的估计系数显著异于表 2 第(2)列中的真实系数 0.1262,且大多数样本的 t 值落于 0 附近的区间,几乎都小于基准回归中 $treat \times year$ 前系数对应的 t 值 3.62,充分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并非由模型以外其他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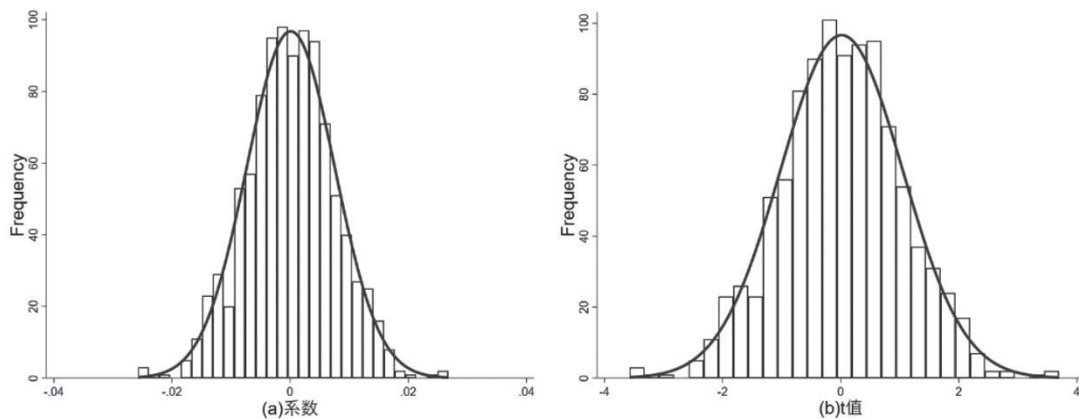


图 2 随机分组试验

(四)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可能通过改变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水平与投资意愿,影响企业杠杆率。为此,本文构建自由现金流量($FFCF$)和投资意愿(NCE)两个指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对潜在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其中,针对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这一变量,本文采用“企业的息前税后利润加上折旧及摊销等非现金支出,减去营运资本的追加和资产方面的投资”来表示;针对企业投资意愿这一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净资本支出除以期初总资产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列(1)可以看出,政策效应变量 $treat \times year$ 前的系数为 0.08,这表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在列(2)中将“营改增”政策效应变量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一起引入方程,结果显示,企业自由现金流水平对杠杆率呈显著正向影响,且“营改增”政策效应依旧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表 2 列(2)相比,系数大小有所降低。这说明,“营改增”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而对企业杠杆率产生影响。

从表 5 列(3)和列(4)可以看出,“营改增”虽然可以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意愿,但投资意愿对杠杆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考虑到受“营改增”政策影响更多的主要集中在轻资产型的现代服务业中,因此,“营改增”并没有通过企业投资意愿渠道对杠杆率产生影响。以上结论表明,“营改增”通过现金

^① 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 123(11): 18-37.

流量渠道对企业杠杆率产生影响,它为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税收环境,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从而促进企业进行资本结构的调整,符合权衡理论预期。

表 5 杠杆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1) <i>FFCF</i>	(2) <i>Lev</i>	(3) <i>NCE</i>	(4) <i>Lev</i>
<i>treat × year</i>	0.0829*** (3.0327)	0.1145*** (3.3571)	0.0451*** (3.0208)	0.1243*** (3.5488)
<i>FFCF</i>		0.1538*** (7.7267)		
<i>NCE</i>				0.0167 (0.26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413	4413	4357	4357
修正后的 R^2	0.0760	0.1720	0.1430	0.1400

五、进一步分析

上述结果证实了“营改增”政策的实施通过增加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杠杆率的促进作用,本文将考虑企业的不同维度特征,判断这种影响效果是否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此外,本文也将进一步对权衡理论进行验证,以此判断“营改增”对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 异质性讨论

1. 研发能力和固定资产占比异质性

“营改增”政策涉及的企业以服务业为主,“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企业不但可抵扣材料、设备等有形资产的“进项税额”,与此同时,服务、专利及其他无形资产也在抵税范围之内,因而企业间研发能力和固定资产占比的差异将直接影响“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发挥。通常,研发能力强的企业无形资产占比相对更大,研发支出相对更多,因此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可抵扣的税额也随之更多,这部分企业受“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更显著。而固定资产占比相对较大的企业,例如交通运输业企业,其固定资产更新速度较慢,可抵扣成本十分有限,对“营改增”政策的敏感度也较低。由此,本文按照“营改增”实施之前企业研发能力(*RD*)和固定资产占比的平均值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研发能力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固定资产占比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根据表 6 列(1)和列(2),相比于未受“营改增”政策影响的企业,研发支出占比较高的改革企业其杠杆率增加了 11.03%,这一影响效果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而研发支出占比较低的改革企业,其杠杆率并无显著变化。从列(3)和列(4)可以看出,相比对照组企业,“营改增”政策对固定资产占比低的改革企业影响显著,其杠杆率增加了 10.89%,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改革企业与其他企业在“营改增”实施前后没有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占比越小,“营改

增”之后企业杠杆率上升得更明显。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由于“营改增”试点行业企业中主要受影响的是现代服务业企业,相比于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其他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拥有大量无形资产,研发支出占比高,然而轻资产的特性使得这些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支持^①。“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这部分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起到了缓解此类企业面临的信贷困局作用。

表6 按照企业研发能力和固定资产占比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研发能力		固定资产占比	
	(1) 高	(2) 低	(3) 高	(4) 低
<i>treat × year</i>	0.1103*** (2.6546)	-0.0508 (-0.8697)	-0.0994 (-0.9499)	0.1089** (2.33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77	1000	1953	2150
修正后的 R^2	0.1370	0.2600	0.1480	0.1640

2. 企业盈利能力和负债水平异质性

通常,盈利差、经营不善的企业会伴随较高的财务风险、破产风险,倾向采取更为保守的融资决策,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有更稳定的现金流水平以及良好的财务表现,获得外部融资的约束较小。当“营改增”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内部可用资金时,对于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只是起到流动性缓冲的作用,并不能改变其面临的外部融资状况,从而对杠杆率水平影响较小,而对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则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外部融资能力,从而改变其杠杆率水平。本文使用企业营业利润增长率作为企业盈利能力(*Prof*)的代理变量,依其平均值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检验“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否在不同盈利能力的企业间存在差异。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营业利润增长率高的组别中,“营改增”实施后,改革企业的杠杆率相比于未受影响的企业增加了13.54%,这一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而在营业利润增长率低的组别中,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杠杆率的变化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营改增”政策只对高盈利能力企业的杠杆率有明显的拉升作用。此外,我们也实证检验了“营改增”政策对于企业未来的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报酬率情况^②,结果发现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改革企业的相关指标均没有明显恶化,说明在该政策影响下企业杠杆率的增加没有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进一步,本文针对企业过度负债或负债不足两种情况,探究“营改增”政策对其差异化影响。当企业过度负债,即实际杠杆率高于目标杠杆率时,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此时即便“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充裕企业自有资金,企业也不愿向上调整杠杆率。相反,当企业负债不足,即其实际杠杆率低于目标值时,企业本就有动机向上调整杠杆率,“营改增”政策的

① 余泳泽、潘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之谜——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析》,《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限于篇幅问题,检验结果在此省略,具体可向作者索取。

实施很可能将助力这一过程。表 7 列(3)和列(4)汇报了依据企业负债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其中企业实际杠杆率高于回归拟合的目标杠杆率时,划分为过度负债组;反之,则划分为负债不足组。从中可以看出,“营改增”政策对过度负债组别企业的杠杆率无显著影响,然而相比于对照组企业,“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负债不足的改革企业的杠杆率增加了 17.86%,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成立,这一增加幅度明显高于表 2 列(2)基准回归中 12.62%。说明“营改增”政策有效缓解了负债不足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不会增加过度负债企业的债务风险。

表 7 按照企业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盈利能力		负债水平	
	(1) 高	(2) 低	(3) 过度负债	(4) 负债不足
<i>treat × year</i>	0.1354*** (3.6280)	-0.1127 (-0.9385)	0.0171 (0.3758)	0.1786*** (3.90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53	1950	1986	2117
修正后的 R^2	0.1510	0.1800	0.2580	0.2080

(二) 权衡理论的验证

在不同场景下,权衡理论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解释力不同,二者之间建立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之上^①,孰优孰劣难以直接比较。从本文的基准回归和中介效应验证的结果来看,“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符合权衡理论。且已有很多研究证实,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优序融资理论对我国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解释力不强^②。

这里将实证检验资本权衡理论以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再次验证说明。根据动态权衡理论,由于融资摩擦的存在,企业不会始终保持目标杠杆水平,只是偶尔进行资本结构的调整,只有当杠杆率调整收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才会改变杠杆率水平^③。“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融资约束问题得到缓解,相应地,企业将缩短最优杠杆率范围,更加频繁地调整资本结构^④,因

① 优序融资理论放松的是 MM 定理中的完全信息假设,本质是时间序列假设;权衡理论放松的是 MM 定理中的除完全信息假设之外的其他所有假设(包括税收、风险、破产成本等),本质是横截面假设。
 ② 肖泽忠、邹宏:《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和股权融资偏好》,《经济研究》2008 年第 6 期;蒋殿春:《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倾向》,《世界经济》2003 年第 7 期;陆正飞、叶康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偏好股权融资就是缘于融资成本低吗?》,《经济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③ Stiglitz, J. 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287-295; Fischer, E., Heinkel, R., Zechner, J., "Optimal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ory and Tests", *Journal of Finance*, 1989, 44(1): 19-40; Leary, M. T., Roberts, M. R., "Do Firms Rebalance Their Capital Structur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6): 2575-2619; Strebulaev, I. A., "Do Tests of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Mean What They Say?",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62(4): 1747-1787.
 ④ Ovtchinnikov, A. V.,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Deregulated Industr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2): 249-274.

此“营改增”将显著提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构建标准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以检验“营改增”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是否满足动态权衡理论^①:

$$Lev_{ispt} - Lev_{ispt-1} = \lambda(Lev_{ispt}^* - Lev_{ispt-1}) + \varepsilon_{ispt} \quad (3)$$

其中, λ 即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Lev_{i,t}^*$ 表示公司*i*在*t*年的目标负债率,由模型(4)计算得到,模型(4)如下:

$$Lev_{ispt}^* = \gamma_0 + \gamma_1 X_{ispt-1} + \gamma_2 Y_{st} + \gamma_3 Z_{pt} + \mu_i + \varphi_{st} \quad (4)$$

模型(4)中, X_{ispt-1} 、 Y_{st} 、 Z_{pt} 分别为决定资本结构的公司、行业、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同模型(1)一致; μ_i 、 θ_t 、 ψ_{s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已有研究指出,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会部分地而非完全趋向目标资本结构,因此同时估计目标资本结构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方法更加合理^②。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首先,将模型(4)代入模型(3)中,得到模型(5),同时估计目标资本结构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Lev_{ispt} = (1 - \lambda)Lev_{ispt-1} + \lambda(\gamma_0 + \gamma_1 X_{ispt-1} + \mu_i + \varphi_{st}) + \varepsilon_{ispt} \quad (5)$$

其次,将模型(5)估计得到的参数向量带入模型(4)中,得到目标资本结构 Lev_{ispt}^* 。最后,将计算出的 Lev_{ispt}^* 带入模型(3),通过在模型(3)中添加 $treat \times year$ 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的交互项,进行OLS回归,即可考察“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改进后的模型(6)如下:

$$Lev_{ispt} - Lev_{ispt-1} = (\lambda_0 + \lambda_1 treat \times year)(Lev_{ispt}^* - Lev_{ispt-1}) + \varepsilon_{ispt} \quad (6)$$

表8列(1)汇报了对模型(6)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其中 $Dev = Lev_{ispt}^* - Lev_{ispt-1}$,表示企业上期资本结构与本期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 $treat \times year \times Dev$ 前的系数为0.1077,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成立,相比于对照组企业,“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增加了10.77%,从总体看,“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样本进行检验,列(2)和列(3)分别汇报了现代服务业样本和交通运输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营改增”政策对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现代服务业企业的调整速度更快,与前文分析一致。

① 黄俊威、龚光明:《融资融券制度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9年第10期;郑曼妮、黎文靖、柳建华:《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世界经济》2018年第8期;Li, S., Whited, T. M., & Wu, Y., "Collateral, Taxes, and Leverag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6, 29(6): 1453-1500.

② 黄继承、姜付秀:《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世界经济》2015年第7期;Huang, R., Ritter, J., "Testing Theories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Estimating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44(2): 237-271; Faulkender, M., Flannery, M. J., Hankins, K. W., Smith, J. M., "Cash Flows and Leverage Adjust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3(3): 632-646.

表 8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变量	(1) 全样本	(2) 现代服务业	(3) 交通运输业
<i>Dev</i>	0.6174*** (19.9492)	0.7323*** (13.1234)	0.5600*** (13.3965)
<i>treat × year × Dev</i>	0.1077*** (3.4756)	0.2298** (2.5213)	0.0808*** (3.4210)
<i>Constant</i>	-0.0002 (-0.5120)	0.0879*** (11.9019)	-0.0646*** (-10.5287)
观测值	4294	2189	2105
修正后的 R^2	0.2900	0.2240	0.1840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内部经济增长动能的不足与外部经贸形势的复杂多变对经济发展形成挑战,这需要稳中求进谋发展。202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税收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为市场主体纾困、化解市场主体风险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上,税收政策的调整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由此也会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营改增”政策改革为切入点,利用 2010—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实施对于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显著提升了改革组企业的杠杆率,且影响效果对现代服务业企业更为显著。渠道效应检验表明,“营改增”会通过增加企业自由现金流,促进企业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进而提高企业的杠杆率,符合资本结构权衡理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提高企业杠杆率的这种影响效果主要体现在研发水平高、轻资产、盈利能力强、负债率较低的企业中,且政策实施后改革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这一税收政策的调整效果与“激发企业活力、调节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改革初衷不谋而合,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未来进一步深化税收政策调整助力结构性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第一,税收激励政策也可以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减税政策的实施可降低企业预期财务困境成本,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缓解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与压力。对于一些经营能力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轻资产、高附加值为典型特征的企业而言,减税政策的实施更有可能使其扩大融资规模,合理灵活地调整资本结构。对于这种信贷效率高,信贷密度低的行业,理应成为金融资源再配置的方向。如此也是促改革、调结构,实现资金效率提升的应有之义。

第二,减税降费政策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宏观经济增长重要的“先手棋”。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之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加大税费优惠力度,精准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和科技创新,对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流向中小微企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本文研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以“营改增”政策为例,显著受影响的主要是研发能力强、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更具活力。政策的调整不但没有抑制优质企业的负债率水平,反而会为其释放资本结构

调整的空间,从而契合政策要适当靠前发力、精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因而税收政策的加持应旨在为效益好、偿付能力强的企业“加杠杆”,让效益差、僵尸企业“去杠杆”,由此降低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激发企业动力活力,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稳定宏观经济增长。

第三,“营改增”政策完成后,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在增值税的减税方面也陆续经历了简化合并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水平等阶段。未来还需要进一步聚焦在增值税留抵退税,针对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减免以及税收征管环境的完善中,能够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支持市场主体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真正降低企业债务风险,实现信贷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使杠杆率水平维持在合理有效的区间中,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Tax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Based on the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Tan Xiaofen¹ Wang Kexin² Zhu Mengke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Wudaokou School of Fi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ax incentives ar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A-shar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6 as a sampl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on the leverage ratio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AT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overall leverage ratio, particularly in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compared to transportation, with the impact being more noticeable in the former.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VAT reform raises firm leverage ratio by increasing the cash flow of business opera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e-off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VAT reform is much stronger for firms with high R&D capabilities, high-profit level, a low proportion of fixed assets and less-than-sufficient debts. In addition, the speed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reformed firm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after the reform.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ights on the adjustment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capital structure; leverage ratio; trade-off theory

银行竞争与公司价值

——基于银行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

高昊宇¹ 谢秉原¹ 李梦²

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2.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 银行竞争加剧对借款公司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降低借款公司的融资成本,提升公司价值;另一方面,削弱银企关系,减少银行对借款公司的监督动力,损害公司长期价值。基于2009年出台的银行管制放松政策,运用标准的事件研究法,发现短期内价值提升效应主导,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公司表现出更为正向的累计超额收益;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价值损害效应占主导地位,银行贷款依赖度高的公司表现出更为负面的累计超额收益。进一步发现,在政策实施年度,融资约束严重的公司的托宾Q值明显较高,而银行贷款依赖度较高的公司的托宾Q值明显较低。结论启示监管方在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在提高市场竞争的同时保持对银行牌照价值的激励,避免出现由于银行自律能力和监督动力减弱而产生非预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银行竞争; 公司价值; 融资成本; 银行监督

中图分类号: F832.33; F27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73-13

一、引言

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我国初步形成了由四大国有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但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四大行仅负责特定行业的信贷投放,银行间的竞争程度比较低。1987年,随着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的相继成立,传统银行业的垄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打破。然而,中小商业银行由于受到区域准入限制等多方面的监管约束,仍未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2009年4月16日,《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下称《调整意见》)发布,旨在促进中小银行的区域发展,进一步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增加银行业竞争。

已有丰富的研究讨论发达经济体中银行竞争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贷款合约设计、银行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考虑共享出行的新型交通均衡分配模型与算法和实证研究”(71901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共享经济的视角”(19YJC6300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昊宇,山东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银行与金融中介、金融风险研究;谢秉原,男,广西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银行与信用市场研究;李梦,女,新疆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交通行为经济学、数字经济研究。

定性和经济增长等方面。例如,银行竞争会影响银行信用和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①、银行稳定性^②、银行贷款发放、贷款质量及存贷款利率等^③。此外,已有研究还表明银行业竞争对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和区域犯罪率控制等方面产生影响^④。然而,关于中国银行业竞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银行竞争程度,并提供了银行竞争带来某种积极经济影响的证据。例如,边文龙等指出,银行竞争的加剧能够增加中小企业的贷款^⑤,谢露等发现在银行竞争很强的地区,银行的盈利能力更低^⑥,严楷等利用省级层面银行分支机构刻画银行竞争程度,发现竞争加剧显著提高当地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⑦。

然而,目前的文献中缺乏直接证据来证明银行竞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由于受到指标选择的限制,银行竞争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Gao等首次利用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准入标准的降低进行了研究,系统地阐释了银行竞争对银行和企业产生的多重经济影响^⑧。基于此,本文采用标准的事件分析方法,以2009年银监会出台的中小银行跨区域市场准入条件放宽的政策为冲击事件,计算上市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研究银行竞争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银行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银行竞争可能会降低贷款利率、减少融资成本,提高信贷融资水平^⑨,从而促进公司投资和增长,提升股东价值。另一方面,Boot和Thakor通过详细讨论交易型贷款及关系型贷款的特点,建立了银行竞争与关系借款的理论依据,认为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银行对公司施加外部监督的动力及效率显著下降,依赖“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会明显减少,进而导致银行已有客户公司的长期价值受到影响^⑩。因此,银行竞争对企业价值

-
- ① Leon, F., "Does Bank Competition Alleviate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 57: 130-142; Ruckes, M., "Bank Competition and Credit Standard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4, 17(4): 1073-1102.
- ② Goetz, M. R., "Competition and Bank St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8, 35: 57-69; Akins, B., Li, L., Ng, J., Rusticus, T. O.,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6, 51(1): 1-28; Jiang, L., Levine, R., Lin, C., "Competition and Bank Opacity",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6, 29(7): 1911-1942.
- ③ Jayaratne, J., Strahan, P. E.,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Bank Branch Deregul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111(3): 639-670; Braggion, F., Dwarkasing, N., Moore, L., "Nothing Special About Banks: Competition and Bank Lending in Britain, 1885 - 1925",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10): 3502-3537.
- ④ Chava, S., Oettl, A., Subramanian, A., Subramanian, K. V.,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109(3): 759-774;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1667; Garmaise, M. J., Moskowitz, T. J., "Bank Mergers and Crime: The Real and Social Effects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2): 495-538.
- ⑤ 边文龙、沈艳、沈明高:《银行业竞争度、政策激励与中小企业贷款——来自14省90县金融机构的证据》,《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
- ⑥ 谢露、王欣、张敏:《区域竞争与商业银行的盈余质量——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6年第7期。
- ⑦ 严楷、杨箐、赵向芳等:《银行管制放松、地区结构性竞争与企业风险承担》,《南开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
- ⑧ Gao, H., Ru, H., Townsend, R. M., Yang, X., "Rise of Bank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Banking Deregulation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2019(25795).
- ⑨ 何熙琼、尹长萍、毛洪涛:《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与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5期。
- ⑩ Boot, A. W., Thakor, A. V., "Can Relationship Banking Surviv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2): 679-713.

的影响方向是待检验的实证问题。中国是研究银行竞争机制的理想实验场,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程度不对称,各个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依然具有很大的差距。不仅有利于凸显银行竞争和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还有助于丰富相关研究结论。

因此,本文以《调整意见》实施的资本市场反应作为切入点,采用标准的事件分析方法,研究银行竞争增加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确实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而这两种作用在短期和中长期分别占据主导地位。在短期内,银行竞争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而从中长期来看,银行竞争的增加则主要表现为减少对公司的监督投入,从而降低公司价值。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相对外生的政策变动冲击,为银行竞争与企业价值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二是证明了银行竞争的经济影响具有双重性,为监管主体实施进一步银行业改革提供了更有效的政策建议。政府通常围绕消除某项金融摩擦制定政策,但往往未能全面考虑其可能产生的未预期负面后果,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全面评估经济政策,综合考虑政策出台的中长期影响。

本文在第二部分梳理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第三部分详细介绍样本和主要变量的构造;第四部分报告主要实证结果;最后部分是本文的总结。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相关文献

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相关监管政策对经济发展,包括银行信用投放、贷款合约、企业运营决策、缩小贫富差距和区域犯罪率等方面均有显著经济影响^①。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普遍关注于银行分支结构准入政策的放宽,及银行竞争的加强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尤其是对公司贷款的发放以及利率变动的积极影响。而现有研究表明,银行分支机构准入政策放宽带来的银行竞争加剧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银行准入限制的降低对银行自身发展以及公司融资有着积极的影响。比如,Goetz认为降低银行准入的门槛限制能够显著地提高银行的稳定性,且能提高银行的利润并减少不良贷款的发放^②。Akins等指出银行间竞争的增加会使银行更偏好较低风险的投资,且偏向持有较多的现金及其他流通性较高的资本以助于银行的稳定,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尤其显著^③。Leon综合研究了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发现在供给方面,竞争的加剧使银行信息更加透明,银行可以提供更好的贷款

① Chava, S., Oettl, A., Subramanian, A., Subramanian, K. V.,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109(3): 759-774;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495-538; Garmaise, M. J., Moskowitz, T. J., "Bank Mergers and Crime: The Real and Social Effects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2): 495-538.

② Goetz, M. R., "Competition and Bank St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8, 35: 57-69.

③ Akins, B., Li, L., Ng, J., Rusticus, T. O.,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6, 51(1): 1-28.

和更多的机会以吸引资本;在需求方面,由于银行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可选择的贷款质量更好、更易获得^①。

而另一方面,银行竞争程度提高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Jiang 等发现,银行间竞争的增加会减少银行的流动性创造^②。Ruckes 的研究指出,尽管银行间竞争的增加使得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但在经济极为景气或者极为不景气的时候,银行都会放宽对个人信用的审核,反而有可能降低贷款的质量^③。Braggion 等发现,虽然准入政策的放宽依然使银行利率显著降低,有利于公司融资^④,但与 Akins 等^⑤结论不同的是,Braggion 等认为在竞争的压力下,银行为了发展业务,容易做出更不谨慎的风险决策,导致这些贷款可能流向风险更高的公司^⑥。此外,不同层面上的银行准入限制的降低有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影响。Jayaratne 和 Strahan 仅对每个州内部的政策开放进行了研究,发现银行分支结构准入政策的放宽通过提高银行贷款的质量,增加投资效率,增加金融行业的创新等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⑦。但在 Chava 等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每个州内部政策的放宽对于初创企业的创新具有积极效应,但在全国层面上的政策放宽却正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⑧。

已有文献通常将特定事件的市场反应与公司价值联系在一起^⑨。本文研究银行间竞争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一方面是对市场反应与公司价值方面现有文献的补充,另一方面为银行竞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直接证据。本文将中国市场作为自然试验场,对银行竞争造成的多方面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2009年4月16日,为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这一政策对中小企业银行分支结构的准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放宽,包括放开分行和支行的数量指标限制、不再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等等。在审批方面,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单家分支机构的设立事项的审批,可由拟设地银监局根据申请机构的风险状况和经营状况审批,不必再报银监会审签,也不必再征求属地银监局的意见。《调整意见》对银行分支机构的准入有极大的影响,从审批到规模再到经营的全面放宽将会对各个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本身产生巨大的影响,增加中小商业银行间的竞

① Leon, F., "Does Bank Competition Alleviate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 57: 130-142.

② Jiang, L., R. Levine, C. Lin, "Competition and Bank Liquidity Cre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9, 54: 513-538.

③ Ruckes, M., "Bank Competition and Credit Standard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4, 17(4): 1073-1102.

④ Braggion, F., Dwarkasing, N., Moore, L., "Nothing Special About Banks: Competition and Bank Lending in Britain, 1885-1925",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10): 3502-3537.

⑤ Akins, B., Li, L., Ng, J., Rusticus, T. O.,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6, 51(1): 1-28.

⑥ Braggion, F., Dwarkasing, N., Moore, L., "Nothing Special About Banks: Competition and Bank Lending in Britain, 1885-1925",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10): 3502-3537.

⑦ Jayaratne, J., Strahan, P. E.,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Bank Branch Deregul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111(3): 639-670.

⑧ Chava, S., Oettl, A., Subramanian, A., Subramanian, K. V.,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109(3): 759-774.

⑨ 朱凯、林旭、洪奕昕等:《官员独董的多重功能与公司价值》,《金融研究》2016年第12期;姚颐、赵梅:《中国式风险披露、披露水平与市场反应》,《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争,给它们的发展提供更多机遇,极大地促进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

综上所述,考虑到《调整意见》的颁布对中国的经济市场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将此调整意见的颁布作为事件窗口,以事件分析法为基本手段,主要将2009年4月30日作为事件发生日^①,通过市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来研究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状况产生的政策性影响。

(二)研究假设

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可能会导致两种相互冲突的影响。首先,竞争的加剧有可能降低企业的存贷款利率,银行将倾向于发放更高质量的贷款以提高其信誉。这些因素可能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因此,基于银行竞争加剧降低企业成本的假设,《调整意见》的实施可能总体上会对公司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即银行竞争的加剧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

然而,另一方面,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对公司价值产生不利的影晌,主要体现在银行监督作用的减弱上。Yildirim发现,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违约风险并提高经营效率,进而表明了银企关系对公司经营的重要性^②。当银行处于一定的区域性垄断地位时,它们可以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这种垄断利润使得银行愿意付出足够大的成本对企业以及贷款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然而,当市场性竞争加剧时,银行不得不以降低利率等手段提高竞争力,从而降低了银行的利润。随着这种垄断利润的减少,银行进行监督的相对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银行监督的积极性,并损害了银企关系。公司的贷款来源从少数有固定合作关系的银行转变为向更多相互竞争的银行借款,而向多家银行借款将会使公司的道德风险上升,管理层更容易做出高风险的投资决策。从这一角度来看,银行竞争的加剧不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因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H1: 银行间竞争的增加导致公司融资可得性增加、融资成本降低,因此将提高先前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公司的价值。

H2: 银行间竞争的增加导致银行信息沟通动力下降,损害现有银企关系,因此对先前依赖银行贷款的公司将造成价值损害。

进一步考虑到两种可能同时存在的影响,但投资者对其的反应时间不同,因而导致上述两种影响分别在短期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首先,竞争带来的贷款利率下降,即贷款利率降低,这种影响途径较为直接,而银行也更容易快速发布公告以抢占市场,从而导致投资者能够迅速接受并做出反应。因此,短期内,公司融资成本的降低会首先在股价上表现出来,使得在事件发生时,公司短期事件窗口内的超额收益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相反地,银行竞争增加所带来的银行外部监督的减少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需要市场较长时间的反应和检验,投资者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例如通过季度报告、半年报等方式观察公司的财务及经营表现才能判断公司是否受到此类不良影响。因此,长期来看,银行监督降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并在长期事件窗口内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以上

①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各大媒体对该《调整意见》的广泛报道均发生在2009年4月30日,包括新华网、人民日报等。因此,本文认为,该《调整意见》对市场带来广泛冲击和显著影响发生在4月30日前后。因此,本文将2009年4月30日作为事件发生日进行研究。本文以2009年4月16日作为事件发生日进行稳健性估计,其结果是一致的。

② Yildirim, A., "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Banking on Firm Efficiency and Default Risk",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0(65):101500.

逻辑分析,本文做出进一步的假设:

H3: 银行间竞争增加隐含的两种作用机制都会对市场产生显著的冲击,但显现的时效不同。银行竞争的影响在短期内主要表现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在长期则表现为银行减少对公司的软信息收集和监督动力。

二、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及事件分析法,以2009年4月30日的中小商业银行市场准入的放宽为外生冲击,选取事件日前后存在交易日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研究银行竞争对公司价值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CSMAR与WIND,并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估计窗口期不足30个交易日和事件窗口期不足20日的公司样本以及截至2009年4月30日上市时间小于250天的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和ST处理公司样本;(3)剔除在事件日发布财务报告的公司样本;(4)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缩尾处理。本文最终获取了1210个上市公司观测值。

首先,为了分析短期及长期影响,本文选择累计超额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观察在政策实施后的市场反应,利用投资者的预期以及股票收益率的变动代表公司价值的变化。根据经验以及Berkowitz等使用的方法^①,本文选择事件前的[-220,-11]作为估计窗口,使用市场模型(Market Model)估计在假定事件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的正常收益率(Normal Return),再计算事件发生时,窗口中每一天的超额收益率(Abnormal Return),最后将窗口期内的每天超额收益率加总得到累计超额收益(CAR,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其次,为了衡量公司的不同特征,从而探究不同特点的公司对市场反应上的差别,本文首先选取了一系列变量代表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如果这些变量和CAR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表现出融资难度较大的公司的正效应更大,则佐证了银行竞争的增加能够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的假设。模型设定如下:

$$S_CAR_i/L_CAR_i = \gamma_0 + \gamma_1 X_i + \gamma_2 Control + \mu_{i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μ_{it} 代表公司所处行业的固定效应以及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账面市值比、市盈率、流动比率以及是否持有长期负债等公司基本特征。 X_i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其系数 γ_i 测度了不同特点的公司对市场反应上的差别,主要包括如下变量:

1. 融资约束指标FinConstrain^②、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公司融资成本的代理变量。首先,FinConstrain越大代表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若银行竞争增加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则这类公司将受到更加显著的利好冲击,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超额收益率,系数应该显著为正。其次,总资产收益

^① Berkowitz, D., Lin, C., Ma, Y., "Do Property Rights Matter? Evidence from a Property Law Enact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6(3): 583-593.

^② Kaplan S N, Zingales L, "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1): 169-215.

率代表了公司的资产管理及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越大的公司,越容易被银行看好从而具有天然的吸引银行贷款的能力,具有较低的融资限制。而总资产收益率较低的公司,其融资成本也相应较高。因此,如果银行竞争的增加对公司融资成本的降低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则本文预计总资产收益率(*ROA*)的系数也应显著为负。

2. 为了衡量银行竞争的加剧是否影响到了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本文从公司是否此前已经取得银行贷款、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验证。首先,本文将公司 2009 年初的银行贷款余额(包括短期和长期)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公司越依赖银行贷款,则在银企关系损害前,银行对公司的监督就越重要,此类公司在银企关系因竞争的增加受损后,受到的不利影响会更大,因此,本文预计银行贷款依赖度(*Balance*)的系数理论上应该为负。其次,本文利用公司年龄衡量公司所处的阶段,公司年龄越大,也即发展越成熟的公司,一般会形成较为完备的内部监督以及自律性管理体系,在银行的监督作用降低时,能够依靠良好的自律性管理机制进行内部监督,从而缓冲银行监督的降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银行竞争的增加在长期内表现为减少银行对公司进行的有效监督,公司年龄(*Age*)的系数也应显著为正。

最后,本文运用 DID 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在事件分析法的基础上,为考察投资者市场反应捕捉的估值效应是否反应在上市公司的运营绩效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受政策事件影响的公司 2006—2009 年的数据,设计了 DID 模型考虑银行竞争对公司 *Tobin's Q* 的影响:

$$Tobin's Q_{it} = \gamma_0 + \gamma_1 Treat_FC_i \times Year2009_t + \gamma_2 Control + \mu_i + \delta_t + \epsilon_{it} \quad (2)$$

$$Tobin's Q_{it} = \gamma_0 + \gamma_1 Treat_BM_i \times Year2009_t + \gamma_2 Control + \mu_i + \delta_t + \epsilon_{it} \quad (3)$$

μ_i 和 δ_t 分别表示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本文按照公司融资约束指标 *FinConstrain* 设置融资约束的对照组和实验组,以 2009 年初的融资约束为参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位于 75 百分位数以上的为有融资约束的实验组,位于 25 百分位数以下的为对照组,以此设定变量 *Treat_FC*; 按照银行贷款依赖度 *Balance* 设置银企关系的对照组和实验组,若 2009 年初的银行贷款依赖度位于 75 百分位数以上的即为实验组,位于 25 百分位数以下的为对照组,以此设定变量 *Treat_BM*。若银行竞争的增加能够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则会为面临较大融资约束的公司带来更快的公司价值的增长,因此模型中的交叉项的系数应该为正;若银行竞争的增加会损害银企关系从而降低银行对公司进行外部监督的动力,则此前曾严重依赖银企关系的公司,公司价值损害应该更大,因此模型中的交叉项的系数应该为负。所有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 变量	累计超额收益率(短期)	<i>S_CAR</i>	以 2009-04-30 为事件发生时间,从 [-220,-11] 窗口估计的 [-1,2] 天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累计超额收益率(长期)	<i>L_CAR</i>	以 2009-04-30 为事件发生时间,从 [-220,-11] 窗口估计的 [-1,180] 天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解释 变量	托宾 Q 值	<i>Tobin's Q</i>	公司总市值与总资产之比
	融资约束指标	<i>FinConstrain</i>	融资约束指标 KZ 指数
	总资产收益率	<i>ROA</i>	公司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银行贷款依赖度	<i>Balance</i>	公司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之比
	公司年龄	<i>Age</i>	公司的成立年份

续表 1

控制 变量	公司规模	<i>Size</i>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Ins</i>	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	<i>Lev</i>	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账面市值比	<i>BTM</i>	公司权益与市值之比
	市盈率	<i>PE</i>	公司平均股票价格与每股收益之比
	流动比率	<i>L</i>	公司流动性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长期负债哑变量	<i>Debt</i>	2009年初若公司有长期负债则取1,反之为0
	国企哑变量	<i>SOE</i>	国有企业取1,反之取0

三、实证结果

(一) 银行竞争环境影响贷款发放的典型事实

本研究首先观察了银行竞争的直接影响,即观察政策颁布前后银行贷款利率以及与单个公司同时发生贷款关系的银行数量的变化。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前后10个月的贷款利率均值和前后15个月的银行数均值,对政策前后平均贷款利率和平均贷款银行数进行了均值T检验,发现政策实施后平均贷款利率明显呈现下降趋势,并且长期来看使得公司的贷款银行数增多,将可能损害银企关系。

表2 政策颁布前后贷款利率及公司平均贷款银行数比较

	(1) 政策颁布前	(2) 政策颁布后	(3) 差值	(4) T值	(5) p值
贷款利率	7.457	5.778	1.679	3.254	0.009
贷款银行数	2.278	2.735	-0.458	-2.249	0.041

(二) 银行竞争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事件研究法结果

首先,表3呈现了银行竞争的短期影响。本研究选用公司融资约束指标(*FinConstrain*)以及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公司融资成本的代理变量。其中,*S_CAR*以百分比为单位,代表了公司短期获得的超额收益率;*FinConstrain*为按公式计算出的融资约束综合指标;*ROA*为未百分比化的总资产收益率。第(1)列的结果显示,公司的融资约束指标每增加1个单位,累计超额收益率将增加1.129%。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总资产收益率每增加1%,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将减少0.069%。这两个结果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当本研究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两个代理变量时,如第(3)列所示,本研究依然可以得到十分类似的结论。即,公司的融资约束指标每增加1个单位,累计超额收益率将增加1.151%,而总资产收益率每增加1%,累计超额收益率将减少0.071%。实证结果表明,*FinConstrain*的系数显著为正,但*ROA*的系数显著为负,结果符合预期。因此可以说明,受到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其积极的资本市场反应要显著优于其他公司。这也佐证了在短期内,银行竞争对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然而,观察第(3)列中表示银企关系的变量*Balance*和*Age*,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说明短期内资本市场投资者并没有立刻挖掘到银行竞争的增加对银企关系和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

表3 银行竞争的短期影响

变量	<i>S_CAR</i>		
	(1)	(2)	(3)
<i>FinConstrain</i>	1.129*** (3.89)		1.151*** (3.99)
<i>ROA</i>		-6.924*** (-2.80)	-7.138*** (-2.89)
<i>Balance</i>			0.029 (1.02)
<i>Age</i>			0.009 (0.85)
<i>Size</i>	1.320*** (3.62)	0.233 (1.42)	1.497*** (3.99)
<i>Ins</i>	-1.162* (-1.67)	-1.134* (-1.65)	-0.961 (-1.41)
<i>Lev</i>	1.655*** (2.92)	0.763 (1.10)	0.738 (1.05)
<i>BTM</i>	1.340*** (4.87)	0.607*** (3.41)	1.299*** (4.72)
<i>PE</i>	-0.089* (-1.74)	-0.065 (-1.11)	-0.074 (-1.35)
<i>L</i>	-0.084 (-0.03)	-0.144 (-0.05)	0.044 (0.01)
<i>Debt</i>	-0.009 (-0.03)	-0.208 (-0.62)	-0.009 (-0.03)
<i>SOE</i>	0.041 (0.13)	-0.112 (-0.36)	-0.039 (-0.12)
<i>Constant</i>	-17.770*** (-3.70)	-3.971 (-1.61)	-19.810*** (-4.02)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1210	1210	1210
<i>Adj. R²</i>	0.110	0.105	0.11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t 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下同。

本文进一步验证了银行竞争的长期影响,结果如表 4 所示,本文分别使用公司银行贷款余额 (*Balance*) 以及公司年龄 (*Age*) 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作为银企关系的代理变量。其中, *L_CAR* 代表半年窗口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Balance* 为公司 2009 年初银行贷款余额与总资产之比; *Age* 为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值。第(1)列的结果显示,公司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每增加 1%,事件发生时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就会下降约 0.06%。第(2)列的结果表明,公司的年龄每增加 1 年,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将增加 0.066%。这两个结果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样,在第(3)列的模型中,本研究同时加入了 *Balance* 以及 *Age* 两个代理变量,依然可以得到十分类似的结论。实证结果表明, *Balance*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 *Age* 的系数显著为正,均符合预期。因此,可以说明,从长期来看,银行竞争的增加降低了银行对公司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减少了银行对公司的软信息收集动力,从而对那些需要维持良好银企关系获得软信息贷款的公司产生了更为不利的影响。此外,本研究同样在第(3)列纳入代表融资约束程度的变量 *FinConstrain* 和 *ROA*,发现系数的统计显著性维持不变,但在数值大小上大幅下降,说明长期来看,虽然投资者能持续反应短期利好,但也逐步意识到区域银行竞争加强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产生了一些回调。

表4 银行竞争的长期影响

变量	<i>L_CAR</i>		
	(1)	(2)	(3)
<i>Balance</i>	-0.057*** (-4.01)		-0.067*** (-5.00)
<i>Age</i>		6.649*** (3.97)	7.411*** (4.40)
<i>FinConstrain</i>			0.854*** (4.09)
<i>ROA</i>			-3.027*** (-4.59)
<i>Size</i>	-5.348*** (-4.38)	-4.783*** (-4.03)	-5.719*** (-4.69)
<i>Ins</i>	16.920*** (2.90)	17.910*** (3.11)	17.980*** (3.14)
<i>Lev</i>	14.020*** (6.11)	12.960*** (5.41)	12.180*** (4.94)
<i>BTM</i>	5.732*** (4.31)	5.535*** (4.23)	5.156*** (3.91)
<i>PE</i>	0.079 (0.13)	0.199 (0.33)	0.106 (0.18)
<i>L</i>	0.298 (1.01)	0.361 (1.19)	0.359 (1.16)
<i>Debt</i>	-4.807** (-2.00)	-4.847** (-2.03)	-4.829** (-2.02)
<i>SOE</i>	1.195 (0.53)	-0.233 (-0.10)	-0.403 (-0.18)
<i>Constant</i>	59.730*** (3.16)	37.360** (2.02)	50.690*** (2.69)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1210	1210	1210
<i>Adj. R²</i>	0.085	0.093	0.099

综合上述两表的结果,本文得出初步结论:在短期内,银行竞争的增加所带来的两方面影响中,公司融资可得性增强的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本身面临较大融资困境的公司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而长期来看,对银行监督动力下降和银企关系破坏产生的负效应开始显现并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竞争的增加反而不利于依赖银行挖掘软信息的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良好的自律性管理以及市场监督的公司。

(四) 银行竞争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双重差分法结果

在前述部分,本文已经利用事件分析法对银行准入政策放开的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为考察投资者市场反应捕捉的估值效应是否反映在上市公司运营绩效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银行竞争增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本文以事件分析法中运用的融资约束代理变量 *FinConstrain* 和银企关系代理变量 *Balance* 为依据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针对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本文将 *FinConstrain* 指数高于 75 百分位数的公司设置为实验组,位于 25 百分位数以下的公司设置为对照组;针对公司的银企关系,本文将 2009 年初银行贷款依赖程度高于 75 百分位数的设为实验组,位于 25 百分位数以下的为对照组。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对比银行管制放松政策发生前后,面临更大融资约束的公司,其公司价值相对于融资约束较小的公司有显著地增长,并且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如第(2)列所示, *Treat_FC* × *Year2009* 的系数为

0.239,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同时 $Treat_FC \times Year2008$ 和 $Treat_FC \times Year2007$ 的系数均不显著。同时,依赖银行贷款的公司相较于不依赖银行贷款的公司表现更差。如第(4)列所示, $Treat_BM \times Year2009$ 的系数为 -0.074,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同时 $Treat_BM \times Year2008$ 和 $Treat_BM \times Year2007$ 的系数均不显著。通过 DID 模型,本研究验证了投资者的市场反应确实反应到了公司价值的变化。无论是以融资约束程度分组还是以银企关系分组,本文都得到了十分一致的结果。

表5 银行竞争对 Tobin's Q 的影响

变量	Tobin's Q			
	(1)	(2)	(3)	(4)
$Treat_FC \times Year2007$		-0.087 (-0.79)		
$Treat_FC \times Year2008$		-0.163 (-1.53)		
$Treat_FC \times Year2009$	0.380*** (6.55)	0.239*** (3.68)		
$Treat_BM \times Year2007$				0.020 (1.05)
$Treat_BM \times Year2008$				0.011 (0.42)
$Treat_BM \times Year2009$			-0.067*** (-4.87)	-0.074*** (-4.92)
<i>L</i>	-0.006 (-0.57)	0.016 (1.49)	-0.230 (-0.74)	-0.228 (-0.73)
<i>PE</i>	0.029** (2.44)	0.035*** (2.65)	0.014* (1.85)	0.014* (1.85)
<i>BTM</i>	-3.997*** (-26.24)	-4.126*** (-40.31)	-3.800*** (-37.80)	-3.804*** (-37.53)
<i>Size</i>	-0.082 (-1.50)	-0.017 (-0.68)	-0.091** (-2.11)	-0.091** (-2.11)
<i>Age</i>	0.133*** (3.25)	0.109*** (5.26)	0.015*** (2.61)	0.015*** (2.62)
<i>Constant</i>	2.897*** (6.92)	2.946*** (13.93)	4.804*** (14.97)	4.798*** (14.98)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5065	5065	10304	10304
<i>Adj. R²</i>	0.550	0.538	0.547	0.547

四、稳健性检验

(一) 更换事件窗口及超额收益率计算方法

在这一部分,本文对前文中得到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首先更改了事件窗口长度并使用三因子模型重新估计了累计超额收益率。基准模型中,本文选择了 [-1, 2] 作为短期的事件窗口,而选择了 [-1, 180] 作为长期的事件窗口。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 [-1, 3] 作为另一个短期的事件窗口同时即将 [-1, 90] 作为另一个长期的事件窗口,并使用三因子模型重新估计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 S_CAR2 以及 L_CAR2 分别为新增加的 [-1,3] 短期事件窗口和 [-1, 90] 长期事件窗口。 $TCAR$ 为基于三因子模型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S_TCAR 、 S_TCAR2 分别表示基于三因子模型的以 [-1, 2] 和 [-1, 3] 为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率, L_TCAR 、 L_TCAR2

分别表示基于三因子模型的以 $[-1, 180]$ 和 $[-1, 90]$ 为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在列(1)–(3)中,本文分别将 S_CAR2 、 S_TCAR 、 S_TCAR2 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来验证本文得到的银行竞争的增加在短期内能够增加企业价值的结论是否稳健。在列(4)–(6)中,本文分别将 L_CAR2 、 L_TCAR 、 L_TCAR2 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验证银行竞争的增加在长期会损害企业价值的结论是否稳健。即使选用不同长度的事件窗口以及使用不同的模型估计累计超额收益率,依然可以发现与前文所选事件窗口结果相一致的结论,说明前文得到的结论是十分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更换CAR估计方式

变量	S_CAR2 (1)	S_TCAR (2)	S_TCAR2 (3)	L_CAR2 (4)	L_TCAR (5)	L_TCAR2 (6)
<i>FinConstrain</i>	1.351*** (3.96)	0.981*** (3.43)	1.107*** (3.26)			
<i>ROA</i>	-7.898*** (-2.86)	-6.660*** (-2.71)	-7.136*** (-2.59)			
<i>Balance</i>				-0.0463*** (-4.99)	-0.0523*** (-4.12)	-0.0368*** (-3.94)
<i>Age</i>				5.195*** (4.18)	6.075*** (3.67)	4.598*** (3.69)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Ind FE</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Region FE</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i>Adj. R²</i>	0.114	0.111	0.104	0.111	0.102	0.093

(二)更换解释变量

最后,本文在表7中展示了将公司有形资产(*Tangible*,公司有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及将分析师出具的研报个数(*Report*,公司的个股研报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软信息收集难度的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有形资产作为优质抵押物,能够帮助公司更容易地进行外部融资,因此有形资产越多的公司,其进行融资的难度越低,而具有较少有形资产的公司则经常面临着较严重的融资困境。因此,如果银行竞争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则对于本身拥有较少有形资产的公司将会产生更为显著的短期正效应,预期有形资产密集度(*Tangible*)的系数显著为负。另外,公司研报的数目越多,表明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基本面等信息被研究的更加全面和透彻,同时披露给了大量的投资者,使得银行也不再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以及时间去挖掘公司未被市场所反应的信息。公司信息越透明,对银企关系的依赖程度越低;反之,公司信息披露越差,越依赖于银行对这部分信息的挖掘和监督。因此,如果银行竞争的增加使得银行对公司的信息收集动力显著降低,则对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则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市场反应也会更大。反之,信息透明度较好的公司,由于受到银企关系破坏所带来的负效应更小,其市场表现将会优于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具体表现为分析师给出的研报数目(*Report*)的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出*Tangible*的系数显著为负且*Report*的系数显著为正,符合预期,说明本文的结果是十分稳健的。

表7 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

变量	S_CAR (1)	S_TCAR (2)	L_CAR (3)	L_TCAR (4)
<i>Tangible</i>	-1.377*** (-3.88)	-1.214*** (-3.44)		
<i>Report</i>			0.299***	0.243**

续表 7

			(3.09)	(2.57)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i>Ind FE</i>	是	是	是	是
<i>Region FE</i>	是	是	是	是
<i>N</i>	1210	1210	1210	1210
<i>Adj. R²</i>	0.111	0.105	0.095	0.117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事件分析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银行竞争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理论上,银行竞争的增加可能对市场和公司价值产生双重影响。首先,银行竞争的增加可能迫使银行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等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公司价值。然而,另一方面,银行竞争的增加也可能对公司价值造成损害。在银行竞争环境较弱时,银行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和牌照价值,可以获得一定的超额垄断利润。为维持这种超额利润并降低风险,银行会对放款企业进行严格的外部监督和信息收集。然而,当银行间竞争加剧后,垄断利润消失,银行对公司的软信息收集和监督动力可能减弱,导致依赖银企关系获得贷款的公司无法续贷,进而损害公司价值。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两方面影响在不同时期分别起主导作用:在短期内,原本面临较大融资困境的公司具有更良好的资本市场反应,佐证了本文提出的在短期内降低融资成本的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然而,从长期来看,依赖银企关系的公司表现出更为负面的资本市场反应,银行信息收集和外部监督动力的减弱对公司价值造成的损害开始显现。政府通常围绕消除某项金融摩擦制定政策,但往往未能预测其可能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因此,相关监管部门在制定此类增加银行竞争以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到其短期内带来的效果,也要评估长期是否会带来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Bank Competition and Firm Valu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Banking Deregulation in China

Gao Haoyu¹ Xie Bingyuan¹ Li Meng²

1.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bank competition has dual effects on the borrowing companies: on the one hand, it reduces the financing cost of the borrowing companies and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compan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reduces the incentive for banks to supervise borrowers, and damages the long-term value of companies. Based on the bank deregulation policy introduced in 2009, using the standard event study method,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value enhancement effect is dominant in the short term, and companies facing seri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 show more positive cumulative excess returns. However,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value damage effect dominates, and companies with high dependence on bank loans show more negative cumulative excess returns.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in the year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Tobin Q value of companies with seve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while the Tobin Q value of companies with high dependence on bank loan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regulators should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while maintaining incentives for the value of bank licenses in the process of bank market reform so as to avoid the unexpected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apital market due to the banks' weakening self-discipline and supervisory power.

Key words: banking competition; firm value; financing cost; bank supervision

中国红十字会“京会”辛亥革命救援行动述论

池子华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京会”依托协和医学堂,组织四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同时与所属天津分会采取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整体而言,尽管“京会”不比“沪会”那么成绩卓著,且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救护效能的全面释放,但“京会”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关键词: 中国红十字会;辛亥革命;人道救援;“京会”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86-09

在辛亥革命伤兵伤民救护中,虽然有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社等人道救助组织投入其中,但中国红十字会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大系统中,上海红会是救援行动的主体,成绩卓著,理所当然赢得社会各界赞誉,聚焦“沪会”,开展深入研究也是极其自然的。相比之下,北京红会黯然失色,被忽略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京会”并非无所作为,虽然已有成果有所涉及^①,但并没有深究。本文谨就“京会”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援中角色与事功进行专门考察,冀能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京沪两会:被撕裂的“统一体”

“京会”“沪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矛盾”的“统一体”。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统一性”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性”何以被撕裂?何至于有“京会”“沪会”之别?有必要稍加梳理。

1904年3月10日,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同胞,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联络旅沪英、法、德、美等国爱心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虽为五国合

作者简介: 池子华,男,安徽涡阳人,浙大城市学院讲座教授,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红十字运动史研究。

^① 相关成果参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建侠:《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马强、池子华主编:《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

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①正因为如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②随后,在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支持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展开广泛的人道救援,直到1907年使命完成。人道救援成效显著,46.7万人得到救助,赢得各界称许。^③1907年7月21日,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代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组织者上奏朝廷,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结,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④在沈敦和等创会董事的苦心经营下,19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在上海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基础初步奠定。2月27日,清廷应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任命大臣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以昭郑重”之请,“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⑤盛宣怀成为官方任命的首任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性”得以强化。

然而,盛宣怀出任会长不久即奏请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大清红十字会^⑥,把原本民间主导的社会救助团体转化为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官方附庸机构,这与红十字运动“中立性”宗旨背道而驰。5月20日,军谘处又会同外务部等衙门联署的《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否定上海总会的地位,建议“请将总会移设京师,而各省省会及沿海商埠各设分会一所,以期相互联络,逐渐推广”。^⑦这些举措引起沈敦和等的不满。后沈敦和在给吕海寰的一通电文中抱怨称:“查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善举。上年夏钦派盛官保(盛宣怀——引者)为会长,并拟改名大清红十字会,当经敦和力陈利害,按大清红会应归陆军部筹办,如遇战事,仅止随本国军队后救伤,与和(沈敦和)等所办瑞士缔盟万国承认之中立红十字会宗旨不同,且沪会系募中外捐款而成,殊难归并”。^⑧既然“殊难归并”,那就意味着各行其是。“京会”“沪会”之别端倪初显,尽管大清红十字会仍维持着表面上的全国“统一性”。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使红十字会发生“裂变”,“京会”“沪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江苏、上海等地纷起响应。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伤兵伤民亟待救护。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组织,红十字会责无旁贷。一方面,10月24日,沈敦和置大清红十字会于不顾,在沪另行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织甲乙丙三支救护医疗队驰赴武汉战地开展伤兵救护^⑨,秉持“中立”立场:“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凡革

①《晚清关于红十字会开创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②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诞生记》,《中国红十字报》2014年4月1日。

③参见池子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述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④《本会开创时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内部资料),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1924年编印,第2—3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⑥《奏请遵铸红十字会关防》,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页。1910年6月5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⑦《军谘处奏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⑧《沈仲礼观察自上海来电》(1911年10月30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影印本,第605—606页。

⑨《红十字会大会志盛》,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180—181页。

军受伤医治送还革军,官军亦然”。^①另一方面,盛宣怀因铁路风潮——辛亥革命导火索,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10月26日被清廷革去包括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在内的所有职务,“永不叙用”。^②11月13日,任命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廷罢免盛宣怀并把“大清红十字会”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京会),希图兼并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沪会),吕海寰也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沪会”不为所动。双方均以“正统”自居,分庭抗礼。^④于是辛亥革命期间“京会”演化为以吕海寰为会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及所设各分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以及东北地区,有着浓重的“官办”色彩;“沪会”则是以沈敦和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及所设各分会,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依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中立”原则开展人道救援行动。而在救援行动中,“沪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发展之快,为“京会”所望尘莫及。^⑤

回到问题的原点,尽管“沪会”业绩辉煌,但“京会”毕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不容忽视。

二、动员人道资源,构建后援保障体系

“京会”拥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其官方背景,同时,吕海寰也尽力动员人道资源,构建后援保障体系,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寻求官方最大可能的支持

与“沪会”相比,“京会”最大优势在于其官方背景。1911年10月26日,“监国摄政王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设立慈善救济会,著赏宫中内帑银三万两以资拯救”。同时,鉴于“盛宣怀现已革职,著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并督饬派往各员于医伤救难两事认真救济”。^⑥这笔经费,吕海寰以其中的一部分开办慈善救济会和经营红十字会,一部分支持“沪会”的救援行动,希图借此笼络加以“兼并”,据《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捐款汇总志谢》披露,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捐务处“经收北京红十字会第一批拨助银五千廿五两六钱九分,北京红十字会第二批拨助银三千四十五两”^⑦,这对上海方面而言,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此“恩惠”未能如愿达成“兼并”之目的。

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库空虚。吕海寰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推广慈善救济会,仍需官方的支持。为此他向朝廷提出“变通”之法,云:“查定例,绅富捐银一千两者,准其请旨建坊,自应照旧办理。现拟凡捐助棉衣及他项救济物品,核有银数实逾一千两以上者,比照前案,由臣具奏请旨,准其建坊,略事推广。又从前捐银万两至数万两者,准其请奖四五品京堂候补或赏给卿衔以示优异。

①《红十字会大会志盛》,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②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9页。

③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④池子华:《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8—163页。

⑤《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199页。

⑥《谕旨》,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⑦《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捐款汇总志谢》,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240页。

现拟变通办理,如有捐此项巨款者,准由臣随时比较(照)成案,奏请特旨施恩”。^①如此等等。通过“捐纳”获取资助,在清王朝大厦即将倾覆之时,显然不合时宜。

其二,社会资源的动员

刊印捐册,派员劝募,为社会资源动员惯常手段,为此吕海寰委派候选道李春湘负责,并于11月29日在《大公报》刊登“札委”：“照得本会长奉旨派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事繁款绌,亟应遴员分头劝募,藉资补助。查有该道早游欧美,热心祖国,见义勇为,不辞劳怨,堪以派为本会会员,臂助一切。为此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遵照联络中外绅富慈善大家,广为劝募,俾成巨款,接济灾区,实行救护,使数百万生灵不致尽浩劫,庶可推广皇仁而全善举,本会长有厚望焉。”^②

同时,吕海寰也深知媒体力量的巨大,希望得到臂助。南方的《申报》是沈敦和的“舞台”,而北方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自然成为吕海寰的首选。为此吕海寰致函《大公报》,称:“海寰奉命派充中国红十字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款绌事繁,虑难策应,业经奏准刊启劝募。惟收集款项必须按期登报方昭信实,现拟请贵界诸公勉尽义务,共襄善举。凡有本会收款报告及关于本会他项宣布文件,一经函送即为排登,俾供众览,免致隔阂。想诸公分天职,见义勇为,当必乐于赞助,专布区区,祇请中国报界诸位善长公鉴”。^③《大公报》不负所望,及时发布捐赠信息。

吕海寰的社会动员,取得一定成效。《大公报》发布三次“会长吕海寰谨启”的收款广告^④,总收入计银15904两,洋2175元。捐款构成中,固然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但最引人瞩目者是官员或其家属的捐款,这一方面得自于清廷的倡导,另一方面是吕海寰的人脉。“官味十足”,不难理解。而普通市民的捐款则少得可怜,海外捐助更是难得一见。这是否如有贺长雄所说辛亥革命“战事一起,北京之红会除少数官吏外,其他一般人民均不肯入会,即此可知中国国民于革命一方面深表同情”?^⑤但相比于“沪会”的“有会员近二千人,纳捐善士数千人,捐款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余元,分会六十余处,进步迅速”^⑥，“京会”社会资源动员无疑缺乏“广泛性”的特点,说明其动员机制不够健全,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这对“京会”的救援行动,不能不产生影响。

其三,整合分会,厚集人道救援力量

分会是遂行人道救援行动的重要依托。但与“沪会”分会组建的遍地开花相较,“京会”在分会组建方面显得沉寂,少见积极推动,更多的是北方一些地方组建分会后与吕海寰联系,获得认可。

例一:1911年11月11日,张家口都护溥良、盛桂、崑源致电吕海寰,告以牧政公所科员张毓芳、电报局委员赵宗诒、洋务局委员董玉书、张绍曾、沈惟馨等会同美国传教士海保尔筹办张家口红十字

①《宣统政纪》第63卷,沈阳:辽海书社,1934年。

②《札派红十字会会员》,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1页。

③《来函》,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0页。

④《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收款广告》《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收款广告》《中国红十字会第三次收款广告》,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0、82、87页。

⑤有贺长雄:《日本赤十字社及中国红十字会》,原载《日本赤十字日报》,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第38页。

⑥《红十字会开会纪》,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283页。

会,仿照京师教会附设救济妇孺慈善会,请电咨先行立案等情。鉴于“该会系慈善宗旨,相应会同电请允准立案,分咨电复,并将章程颁发飭遵”。^①14日,吕海寰复电,称“贵处拟办红十字会附设妇孺救济善会,事属可行,请将开办章程咨送备案,再由敝处将钤用关防、编列号数之旗章寄备应用。先此电复,惟希公鉴。”^②

例二:1911年11月14日,山东中西医院总办刘崇惠(字荔孙)致电吕海寰,告以“山东现办红十字会,请将章程迅速赐寄”。^③15日吕海寰回复:“现办红十字会,均遵守陆战时救护病院条约,即日来弗(日内瓦——引者)红十字会条约,可查照酌行。敝处未立另章。”^④

例三:奉天学政卢靖、盐运使熊希龄派道员吴剑丰等专程赴京与吕海寰联系,欲设立救济分会,但11月1日吕海寰回复主张暂不设立,原因是“经费支绌,多一名目,即多一耗费。”^⑤

天津、保定、开封等分会的设立,大多如此。分会组织建设,总体而言,“京会”显得较为被动,只是进行必要的引导、整合。尽管如此,分会对“京会”救援行动的支持,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天津分会,助益良多(详下文)。

三、“京会”救援行动概观

辛亥救护,“沪会”行动迅速而“京会”动作迟缓,“以致外间啧有繁言”,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探得确实原因”为:“当该会成立之始,已由部允拨十六万两充作经费,嗣部中库储已竭,未能照拨。”不得已,吕海寰设法劝募,“故日来始见著手布置云。”^⑥

“京会”救护的“靠山”是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史料记载说,“时吕先生海寰办理红十字会,商请敝协和医学堂襄理会中事宜”,得到协和师生的响应,举英国医师吉义布为总队长,谢恩增为襄理,选拔教习12名、医士8名、学生34名,共54名,分编4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⑦

“京会”救护医队的组织,吕海寰委托福开森经办,10月25日《申报》有“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日内将率中外医生起程赴汉”的报道^⑧,吕海寰也在11月4日分别致电鄂督王占元、河南巡抚宝

①《张家口溥都护来电》(1911年11月11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影印本,第611—612页。

②《致溥、盛、崑都护电》(1911年11月1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31—732页。

③《济南刘崇惠来电》(1911年11月1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14—615页。

④《致刘荔孙观察电》(1911年11月15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32页。

⑤《致沈阳卢学台、熊运台电》(1911年11月1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25页。

⑥《红十字会出发迟滞之原因》,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7页。

⑦《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3页。

⑧《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179页。

芬,请给予医队保护、照料^①,照此速度,10月底11月初当能开赴战地。但如前引《大公报》报道,因经费牵绊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直到一个月后的12月1日,福开森致电沈敦和,通报北京医队行程:“北京红会组织第一医队,西医劳赉、卜尔脱、麦鲁乃、刘君四人,佐理员十二,京汉专车,驻孝感。第二队医士温含、维楼、乌伯兰、张医及佐理等,初十专车出发,驻信阳,并转电汉分会医院柯师联合”。^②这里提到的第一队实为第二队,因第一队驻守京师。第一队出发时间,应为发电报的同一天,即12月1日。第二队“初十专车出发”,阳历应为11月30日。

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救护医队的组织、派遣以及行程安排自然牵挂于心。12月4日他在《致连仲甫方伯电》中谓“敝处(阴历十月)十一日请胡竹筠中翰乘军用火车前往汉口,属(嘱)其先到遵处晤谈”救护事宜。^③其中的“十一日”即阳历12月1日,时间与《大公报》报道正相吻合。萧家港为孝感属地。同日吕海寰接到连甲(字仲甫)回电,告以该医队已乘专车前往汉口。^④同日吕海寰又收到汉口胡瑞中来电,得知第二队于12月3日抵达汉口以及“刘大夫留孝感,沿途调查。信阳养伤兵四百,孝感三百、汉口各医院均共五百”等伤情报告。^⑤至于第四队,据12月8日吕海寰透露,“石家庄虽未开仗,亦备有第四队”。^⑥说明12月8日第四队已经组织起来,次日即出发石家庄。

第二队、第三队的目的地都是武汉。此时武汉硝烟散去,战地救护已经结束,主要工作转为伤兵医治及难民救助。至于与上海救护医队的合作,基本谈不上,有报道说,“日前北边派来红十字会员二十余人,皆服西装,气象尚觉文明,惟闻其中混有满人在内,故南边红十字会不与联络,以防奸谋”。^⑦南、北存有芥蒂,北京医队只能独自开展活动。

救助行动的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12月4日,负责汉口接洽等事宜的内阁中书胡瑞中致电吕海寰,除告知北京医队的行程外,并称“此间死尸已由军队及鄂会掩埋过半,即拟设局雇人埽净。工物奇贵,乞速汇款若干”。^⑧12月6日,吕海寰即通过汇丰银行汇兑银5050两,“俟此款收到,即先照来电办理掩埋及雇人埽净等事”。^⑨这些方面,当然不是医队的主要事务。根据胡瑞中报告,12月10日,第三队已在武昌设立医院,第二队在汉口兵站医院服务。但没过两天,第二队不辞而别。据12

①《致鄂督电》(1911年11月4日)、《致河南抚台电》(1911年11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26、727页。

②《北京红十字会专电》,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第28页。

③《致连仲甫方伯电》(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3—744页。

④《萧家港连方伯来电》(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29页。

⑤《汉口胡中翰瑞中来电》(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30页。

⑥《致天津军医学堂徐静澜观察电》(1911年12月8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9页。

⑦《民军与北军停战议和记》,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第216页。

⑧《汉口胡中翰瑞中来电》(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30页。

⑨《致连仲甫方伯电》(1911年12月6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7页。

月13日胡瑞中致吕海寰电称：“二队由孝感到汉兵站备房屋招待，旋闻黄陂有战事，前往约定，事竣回汉。念二日来电，嘱租楼房另住，当觅定念余间大房，并雇人包伙食，兵站预备器具，忽来电二十二日晚已回京，诧甚。或中等办理不善，惟有自罪”。^①12月15日吕海寰复电抚慰，云二队“刘大夫今午到京来谒，云实因无事可办，故暂回京，并无他意，二公万勿介意”。^②这样武汉只有第三医队继续工作，据15日胡瑞中电称，“三队在武昌极得力，拟日内移至汉，与绅合办医院”。^③据何亮标报告，三队拟于1912年1月10日“专车北上”，但没有成行，直到1月23日，何亮标报告称，“孝感下铁路不通，会员回京，临时再酌”^④。第三队何时回到京城，《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谢恩增的报告，“(正月)二十六日第三队始由武昌遄返”^⑤，这里所说的正月，应该是阳历，即1912年1月26日才得以回返，可谓辛苦异常。第三队所取得的成绩，谢恩增报告称“医愈者三百余人”。^⑥谢恩增报告还提及其他医队的行踪：1911年12月9日“第四队发至石家庄，值两军轰击，遂乃冒烟突弹同赴阵前，不论南军北军，凡负伤者，一概立行救治。十五日第二队送伤兵至长沙；十九日第四队入太原；二十六日调第二队至洛阳；应潼关之招，本年(1912年)正月三号第四队由太原返京，旋复开往徐州；嗣复遣医队至保定，手术受伤兵士多名。”^⑦这里的“本年正月三号”实为阳历，即1月3日。4日第四队开赴徐州，但并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与天津分会联合行动。

四、亮点与遗憾

“京会”救援行动中，有一大亮点，就是与所属天津分会的“联合”行动。

1911年11月10日，天津红十字会成立，不久与“京会”确立了隶属关系，成为“京会”旗下的一个分会。某种程度上说，天津分会的人道救援行动成为“京会”人道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京之战失败后，张勋退守徐州负隅顽抗，但徐州革命党人酝酿起义，以林述庆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三路北进，剑指“五省通衢”战略要地徐州，徐州之战不可避免。“京会”联手天津分会合力开展救护行动提上日程。

1912年1月2日，吕海寰致电张勋，告知医队行程日期，请其妥为保护，电文称：“敝会医员徐道清华、洋医士吉义布前谒麾下，极承关照。现派本会第四医队及天津分会医队，前往徐州，相机进行，以补军医不足之用。准于十六日(阳历1月4日)由津乘津浦火车南下，请派委员开车北上探接，并

①《汉口胡中书来电》(1911年12月13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39页。

②《致汉口胡瑞中、徐鸿宾电》(1911年12月15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57—758页。

③《汉口胡瑞中来电》(1911年12月15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40页。

④《何道亮标来电》(1912年1月23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67页。

⑤《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页。

⑥《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页。

⑦《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页。

望代备宽洁屋宇及看护妥役,实勿公谊。”^①

1月3日,吕海寰致电天津分会会长徐华清表示谢意,云“贵分会医队明日偕本会第四队南下,感荷无似。天寒路远,极盼一切平安,早日蒞事,至为祷祝。”^②

安排妥当,“京会”第四医队于2日抵天津,与天津分会医队汇合,4日南下徐州。1月5日《大公报》报道说,“天津红十字会已于昨早七钟乘津浦火车偕同北京总会医官、看护生等开往济南,再由济南开抵徐州。是日,除该会各职员董事及东西洋友人送行照料外,并有广济医院日本两商人携酒两瓶为之饯别云”。^③联合医队由25人组成,规模可观。

1月5日,医队抵达徐州后立即投入战事救护。1月10日,天津分会接到战地救护报告,知徐州一带“土匪蜂起,官革两军时有捕匪受伤事”^④,医队给予及时救治。12日,天津分会第一队庶务员汪贵生由徐州返津报告救护详情。据云:“该同人初到徐州时,即由中外医士谒见张军门勋,说明该会对于官民两军均应一体救护之宗旨,已为张军门允许且极欢迎优待,军士将官尤其感戴。该队暂驻徐州西关内美国教堂,刻已救痊二十余人,徐州城内之官绅尤为非常欢迎。盖以此项善举,该人民尚属创见也。继又报告云,该处为民军北伐必争之路,倘和议不成,徐州定为一大战场,应于城外设备病院,以免临时仓卒,然则一切铺张及供养伤军之饮食被褥等费需款必巨等语。”^⑤

徐州之战并不是很激烈,伤亡无多,因此,1月22日联合医队回到天津。24日天津分会在事务所举行欢迎会,“函请中西董事诸君报告阵前治伤情形,并据看护生归述该会在徐州颇蒙张军门优待。路过济南,又承刘观察优遇。该会极为感激,业已专电申谢矣”。^⑥鉴于“医官、救护生等奔走勤劳,慈善之怀不可泯没”,2月10日天津分会“特给与褒状,以彰善举。”^⑦

但徐州之战并未结束,革命军的北伐之师日益逼近,1月26日,接徐州来电,“内云该处将次开战,即请出发等语”。^⑧因此,天津分会派出第二队救护人员于27日早晨“会同北京红十字会队乘坐津浦火车出发徐州”。^⑨2月5日,天津分会接徐州医队来电,“言今日有受伤四十五人,该处缺少被褥,请即运往,则徐州又有战事可知”。^⑩2月9日,天津分会即派干事员曾栋臣“携带药料等物赶赴徐州”^⑪,进行接济。2月11日,北伐军抵达,张勋北撤济南,徐州光复。第二天,即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联合救护行动结束。

①《致徐州江防会办张少轩电》(1912年1月2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74页。

②《致天津徐静翁观察电》(1912年1月3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76页。

③《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4页。

④《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6页。

⑤《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9页。

⑥《红十字会返津》,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3页。

⑦《发给褒状》,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6页。

⑧《红十字会将出发》,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4页。

⑨《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4页。

⑩《徐州又有战事消息》,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5页。

⑪《执事易人》,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6页。

“京会”与天津分会,相互协作,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总起来说,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援中,据“京会”不完全统计,“全治活者,约千有余人”。尤其“京会”各医队“诸医士学生,一本热诚,不畏险阻,负囊携药,冒枪烟(林)弹雨以争先,宿露餐风当雪地冰天而竞进,东至于青岛、济南,西抵于潼关、河洛,南达于武昌、汉口,北及于宣化、大同,凡遇伤痍,靡不竭力救治,刀圭甫毕,痛楚立捐,计所全活,为数甚广,以故医队所莅,到处欢迎,事毕将行,更相留挽。略可见在事诸君,备历艰辛,而不敢少负其责任也”。特别是总队长吉义布,更是尽心尽责,他与“襄理谢恩增,于各医队出发后,亲往各战地详细调查情形,斟酌办理一切,随于徐州、泰安、登州、营口普济医院、秦皇岛矿务、唐山矿务医院、昌黎医院七处,业经商明各该院长,改设红十字会医院,以备有事之用”。^①毫无疑问,“京会”在辛亥革命救护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其中天津分会的“助力”值得肯定。

当然,由于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而“统一体”的撕裂,也不符合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这是一大遗憾。因此,辛亥革命救护使命完成后,“京、沪两会本须合并也”^②。1912年9月19日两会达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约》^③,并于9月29日在沪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上通过,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走向了“统一”。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the Rescue Op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i Zihua

Zhejiang Red Cross Movement Research Center,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Beijing organized four medical teams to relieve the servicemen in the battlefields, with its activities based in 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Meanwhile, it took joint action with its affiliated Tianjin branch, exerted some scale effe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Beijing were less outstanding than those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Shanghai. Acting separately, they were unable to coordinate their efforts effectively, which limited the rescue teams' ability to perform at their best. But the role that the former had played could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Revolution of 1911; humanitarian aid;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Beijing

①《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1993年,第273页。

②《上海沈仲礼来电》(1912年4月2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16页。

③《直隶巡警道为奉札发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约通飭知照文》,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33页。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张登德¹ 宋均荣²

1.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民国初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先进分子没有放弃对中国富强道路的追寻,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受到关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常引用斯密学说;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时,《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杂志刊文予以纪念;刘秉麟写《亚丹斯密》,系统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一些学者翻译的日、英、德、法等国的文章和著作中,涉及斯密学说。民国初年,留学归国者成为斯密学说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社、课堂等媒介,促进了斯密学说进一步传播。

关键词: 亚当·斯密; 民国初年;《东方杂志》; 刘秉麟; 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095-11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创造了条件。“除少数革命党人继续酝酿新的武装斗争以外,大多数人已转移到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大规模的传播西方文化”。^①因袁世凯政权提倡尊孔读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后来直系、皖系、奉系为了争夺对北京政府的领导权,不断发生战争。为了建立真正的民国,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但中国先进分子前仆后继,继续寻找能够帮助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外国经典著作和学说,所以斯密学说在这一阶段仍然受到持续的关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了宣传革命理论的需要,多次引用斯密学说;《东方杂志》《学艺杂志》《太平洋》等杂志刊载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和《国富论》出版150周年的文章;刘秉麟撰写《亚丹斯密》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些学者翻译的日、德、英、法、美等国著作中涉及斯密。与晚清相比,民国初年外国传教士对斯密学说的传播变得微不足道,而起主要作用的是从欧美和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通过大学讲坛和有关报刊、出版社等媒介,使斯密学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23BZS13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张登德,男,山东昌乐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宋均荣,女,山东威海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

^①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一、民国最初十年斯密学说的传播

近代中国人知晓斯密始于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大英国志》。之后,斯密学说在晚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①在民国最初成立的四年中,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报刊。1912年5月,《大共和日报》发表“中央”(黄宗仰)“致章太炎先生书”中说,“尝考欧西强盛之由,曰学曰政,其两大纲也。……若孟德斯鸠,若伯伦知理,若斯密亚丹,讲求殖民理财之政术者,大都起自十七世纪以后,由此以观,政术固为立国要图,而学术尤为孕毓政术之元素”^②。这应为进入民国之后最早出现的斯密传播。之后,《申报》1912年11月11日“自由谈游戏文章”中载有问天生的“财神上财政部书”,其中有“斯密《原富》可束之高阁,真大快也”之语;《申报》(1914年5月2日)“旧书中之理财新法”,《申报》(1915年6月24日)“平民生计中之习艺所”等文中曾引用斯密学说。1912年,《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刊载《资力集合论》中谈到19世纪之后欧美国家工商业发展日新月异,主要得益于斯密倡导的“分业之利”。1913年,《东方杂志》刊载《理财学沿革小史》指出:“继重农派而起者,曰正统派,即斯密亚丹也。斯密氏尝游于法,与格斯尼诸名士游,故其著书多本自然学说。如谓‘国助不如人助’,‘自由竞争自剂于平’之类是也。然斯密氏虽主张自由,而不重农以抑工商。如篇首先论分功,分功工业最宜之事,于农业不适宜者也;其论生利不生利也,以农工商三者并称;其论航海律也,以为英国当时所不可少,是其证矣。至其学说,具详《原富》一书。”^③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涉及到斯密的生平游历、自由贸易思想、分工学说、生利不生利之说、航海律等内容。同年,《独立周报》第2期刊载《欧洲经济学思想变迁论》一文,介绍从重商主义开始到亚当·斯密为止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变迁,其中重点介绍斯密的资本学说。

除了报刊涉及斯密学说之外,民国初年不少著作中也有对斯密学说的评论。1912年8月,上海科学书局出版《经济原论表解》,以表解形式说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者谈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思想界时指出:“斯密亚丹著《国富论》,其影响于经济界,实非浅鲜”;第四章谈论“近世之经济思想”时指出:“斯氏所著之《国富论》,为经济书中之最良者,其所说多祖述重农派之主义。世人为其著述宏大,立论周到,咸推为经济学之祖。”^④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源廉等编《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本教材由民国教育部审定,遵照部定教育宗旨及小学校校则第三条:“各项编纂任务以养成儿童记叙事物,发表思想之能力兼导其智德。”为了向学生介绍世界著名科学家,传播科学知识和西方历史文化,同时适应高小男女分别授课的需求,范源廉等人编写了这本专为女生使用的教科书。该书第3册第38课为“斯密亚丹”。^⑤这是教材中首次出现的斯密传记。作为小学课本,普及率高,使民国初期更多的人了解斯密及其学说。另外,黄可权编辑的《法政讲义》(1912年)的第一集第六册“财政学”谈论租税原则时,肯定了斯密的四大租税原则。

① 张登德:《亚当·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考察与分析》,《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②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20页。

③ 棠公:《理财学沿革小史》,《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6号。

④ 胡愿深:《经济原论表解》,上海:上海科学书局,1912年,第9、91页。

⑤ 沈颐等编:《民国老课本·女子国文》,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183—184页。

1912年10月,孙中山应上海中国社会党的邀请,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及其派别的演说,其中多次引用斯密学说。“英国斯密亚丹(Adam Smith)氏出,始著经济学,文极有条理,其主脑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其英人之功利派,遂根据此而倡个人主义,求合于达尔文进化之理。”^①孙中山分析斯密为代表的旧经济学派与马克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学派,认为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说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工人生活困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家适值存亡之秋,周恩来写了《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一文,将斯密学说与孟子的思想进行对比,认为二者不可偏废,需折衷取之,曾子的“言义不言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亚当·斯密的“言利不及义,斯富国之左证”,所以“二氏之说尽善”,但如果分而行之,只能“促吾国之亡”。^②周恩来能将古今中外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中国国情评析其适用性,说明了周恩来在中学时代即对斯密学说有了足够的认识。

在民国成立的最初四年中,国家政体经历了从共和到帝制的变化,文化上从传播西方文化到尊孔复古,影响国人对斯密学说的了解。随着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同时,随着报刊的大量创刊,为斯密学说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是单纯介绍、引用斯密学说。1915年,《青年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译作《现代文明史》,其中谈到18世纪的经济学者,“二人最知名”,一是法国的杜尔阁,一是英国的斯密,“亚当斯密士以明晰之文章,辑散见之学说,于一卷书中,即《国富论》……社会得此,始知此种新学问之重要。”^③1916年,罗佩宜引用斯密的生利与分利学说,分析生活上的协力与依赖^④。1918年,张家骥编辑《最新财政学》,第17章为“租税之大原则”,评述斯密的四个税则。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编述的《经济学原理》,在绪论第三节“经济学之发达”中谈到斯密《国富论》刊行为经济学建立之始,以斯密主张的“放任之说”为代表形成了“放任派”。1921年,刘秉麟出版《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比较李斯特、斯密与马克思的学说的相关内容。1920—1922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近世欧洲史》讲到“资本主义及工厂制度”时,曾以斯密学说中制针为例分析“生产增加”;讲经济学时说工商界人因不满意政府限制工商之政策,“中流社会中人遂发达经济学原理以谋自利,亚丹·斯密即此派学者之首创者,主张营业自由,政府不得横加干涉。凡物价之高下,物质之优劣,工作时间之长短,工资之多寡等均听其自然。”^⑤这些论述,有的出现在杂志上,有的出现在课堂上,虽然不属于斯密学说的专门研究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

二是专门研究斯密学说的文章。1917年,《太平洋》第1卷第3—5号刊载的《斯密亚丹与理财学》一文,称斯密“为理财学之祖”,分析《原富》写作经过和主要内容,以及与经济学的关系。1919年,杨昭愬在《法政学报》上发表评论斯密租税原则的文章,认为斯密所提出的租税四个原则有不合实际之处,并介绍了分担说等租税方法^⑥。1921年,仲祖龄论述斯密学说中“工资之大小,由于职业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11—512页。

②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92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③ 陈独秀译:《现代文明史》,《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④ 罗佩宜:《论生活上之协力与依赖》,《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2号。

⑤ 何炳松:《近世欧洲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0页。

⑥ 杨昭愬:《评斯密亚丹租税原则》,《法政学报》1919年第1卷第11期。

之不同而起”的五个原因,以探究斯密的工资学说^①。次年,施督辉在《钱业月报》第2卷第6号发表《斯密亚丹租税四大原则与华格那氏租税九大原理之比较》,将斯密的税则说与德国经济学者华哥那(Wagner)的九大原理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后者之主张虽为近世各国所采用,实际不过利用斯密之主张而稍加扩充与发挥。1922年11月,赵兰坪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史密斯的经济学说》一文,主要从斯密的“小传”,谈到斯密的分工论、自然主义等学说。

三是出于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推动了斯密学说的传播。1917年底,李大钊入职北京大学后,经常撰写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经济学的派别分为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人道主义经济学,其中评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时,称斯密是这一系的鼻祖,并介绍其根本思想和主要内容,将斯密的资本观点与马克思进行比较,谈到两者在资本的论述上具有共同之处。次年,他在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演讲会时,将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与斯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了对比。除了李大钊之外,陈独秀、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中也涉及斯密学说。1922年4月,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文章,其中引用《原富》的相关内容来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同年,李汉俊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其中指出:“在欧洲是有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底发生,才发生亚丹斯密(Adam Smith)底经济学说;有了资本主义底生长,才有空想的社会主义”^②,即在剖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时,将斯密学说作为论证资本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依据。另外,针对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少人撰文将斯密和马克思进行比较。例如,1921年,瑞鼎在《亚丹斯密斯和马克思略史》文中,介绍斯密和马克思的生平,以及两人思想的形成,并进行了对比^③。同年,朱公准将斯密、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观察进行比较分析。^④这些论述,尽管目的多为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人对斯密学说的了解和认识。

二、研究斯密的第一次热潮

19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200周年。国际学界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或陈列斯密的肖像、遗著、纪念品,或开纪念会,或在报刊发文纪念。“这事虽与斯密氏的学术名誉,无关重要,但也不算得是世界学术史上一件很有趣的事。”^⑤当时我国很多报刊谈到世界各国对斯密的纪念。^⑥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顺天时报》也有记载。^⑦这些纪念活动,表现了国际学界对斯密的尊重和敬仰;我国报刊的及时报道,体现了国人对国外学术前沿的认识自觉。同时,我国学界发表一些纪念斯密诞辰

① 仲祖龄:《述亚丹斯密之论工资问题》,《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8号。

②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92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6页。

③ 瑞鼎:《亚丹斯密斯和马克思略史》,《东南日报》1921年12月6日。

④ 朱公准:《亚丹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观察及批评》,《学林杂志》1921年第1卷第3号。

⑤ 黄典元:《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⑥ 黄慰华:《亚丹斯密与现代思想》,《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6月26日;黄典元:《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⑦ 黄惟志:《二百年诞辰纪念之亚丹斯密》,《顺天时报》1923年11月17日。

200周年的文章。1923年6月26日,《民国日报·觉悟》刊载黄慰华的《亚当斯密与现代思想》,文中指出:“本年6月5日,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底诞生二百年纪念日,世界各地学术界大概多有纪念,祭了。经济这个问题,现在早成为世界的思想问题,吾人于此,不能不试述所感”。这应为民国初年学界最早提及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1923年9月,《东方杂志》刊出了朴之的《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今年六月五日,是经济学始祖斯密亚丹的二百年诞辰纪念,全世界各国的学术团体大多有热烈的纪念会,各报纸杂志也大多有颂扬的文字,以追念他过去在学术上的功绩。只有我们学术饥荒的中国对此竟不闻有一点小小的表示,这是我们所十二分不满意的。因此,我们就在这期略将斯氏的一生及其学说叙述一番,以略表我们纪念先哲的微忱。”^①该杂志推出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专集,发表了叶元龙的《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自斯密亚丹至二十世纪之经济学说》、李权时的《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黄惟志翻译的《斯密亚丹评传》、朱朴的《斯密亚丹以前之经济思想》5篇文章。同时刊出斯密的照片,可惜张冠李戴,将美国的乔治·亚当·史密斯的图像当成了亚当·斯密,而且将斯密的出生年1723年写成了1732年。

除了《东方杂志》刊载纪念斯密专题论文,同年《学艺杂志》第5卷第3号发表“征集亚当斯密纪念号文稿启事”的通讯:“本年为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氏二百年纪念,本志拟于十月特出专号,如蒙社内外斯学专家惠寄大作,不胜欢迎。兹定九月十号为收稿截止日期,特此通告。”后来,《学艺杂志》第5卷第7号不仅刊载“亚当斯密先生的笔迹(照片)”“亚当斯密先生全身画像(画图)”“亚当斯密先生全身塑像(雕塑)”“亚当斯密先生六十四岁时半身塑像(雕塑)”“亚当斯密先生在卡各得所进的学校(照片)”“亚当斯密先生油绘半身像(画图)”等与斯密生平有关的资料,同时发表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12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名称与作者(译者)分别是《亚当斯密之根本思想》(阮湘)、《亚当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黄典元)、《亚当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之经济思想之差异》(萨孟武)、《亚当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郭心崧)、《亚当斯密之价值论》(史维焕)、《亚当斯密之租税四大原则》(周佛海)、《亚当斯密年谱》(周佛海)、《亚当斯密之工资论》(戴时熙)、《亚当斯密之中国经济观》(李超桓)、《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资耀华)、《亚当斯密先生传》(河上肇著林骥译)、《亚当斯密经济学之渊源》(孙倬章)、《最近公表的亚当斯密的一封信》(淑清)、《亚当斯密先生的著作》(孙德修)。这期纪念斯密诞辰200年的专刊,曾引起一些杂志和出版机构的关注。例如,1924年第9期《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在“中文定期出版物中论文介绍”中介绍《学艺杂志》刊载的“亚当斯密纪念专号”;商务印书馆单独出版这期专号,后《申报》曾予以推介。

本年度《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4号刊发了杨端六的《斯密亚丹小传》,该文的标题前写有“二百年周年纪念”,同时作者在文前谈到此文受《太平洋》杂志之约而作。《青年进步》第66期刊载日本学者出井盛之著、善哉翻译的《二百岁亚当斯密的不朽》,译者在文末表明“本年六月五日,是亚当斯密氏诞生后第二百年的纪念”。《顺天时报》在这一年11月17—24日连载《二百年诞辰纪念之亚当斯密》文。《益世报》(3月25日)《劳银论》中介绍“亚当斯密之五种原则”,《益世报》(11月13日)载有《读原富感言》,《京报》(5月5日)发表《马克思与达尔文和亚当斯密斯》,《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1923

^① 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年第17号)刊登了正声的《珊氏的经济学说他同斯密亚丹的关系》、贾祝年的《亚丹斯密士之分工论》等文。

在1923年发表的这些论文中,有的表明为纪念斯密诞辰而作,有的虽然没有表明,但都是近代中国专题研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一批重要成果。不管是褒扬,还是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了斯密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这些成果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有一定的联系,是国家进步的一种表现。

三、大革命时期的斯密传播

从1924年开始,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国共两党合作建成革命统一战线,通过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当时中国出现南北政府的对立和角逐。受时局影响,虽然人们更关心时局的走向而不是文化问题,但学界对斯密的关注并没有因此停止。

1926年是《国富论》出版150周年。西方经济学界为此举行隆重纪念会,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亚当·斯密:1776—1926》。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富论》发表150周年纪念仪式上,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雅各布·瓦伊纳提出了制度学派的斯密形象。^①同年,中国的《东方杂志》刊载了胡善恒的《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该文为作者在英国伦敦留学期间所写。作者首先论述了《国富论》出版之后的重要性和影响,并分析《国富论》未能及时传播到中国的原因,然后分为斯密“小传”,《国富论》的版本、译本,原书大意,古典学派对斯密学说的评价、思想变化,“自然的自由”,对中国的认识等内容进行评述。同年,叶元龙从重商主义之衰微、斯密思想及《原富》的酝酿、《原富》的内容等方面,探讨了斯密的经济学说。^②施督辉介绍了斯密学说之弟子,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者兼有之“第三类学派”等^③。刘炳荣在《西洋文化史》第三篇“近古期之文化”中将魁奈为代表的“土地学派”和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进行简单比较。^④中华学艺社编辑的《唯物史观研究》(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收录资耀华的《亚丹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

除了1926年较为集中的斯密研究论文之外,在大革命时期还出现一些比较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论文。1924年,杨定铤对重商派、重农派、亚当斯密派的得失进行分析,认为“学说常因时势环境而产生,时势环境常因学说之影响而改变”,指出重农派、重商派、亚当斯密派为“一重商、一重农、一重工者,皆当时环境使之也,三者环境不同,故主张各有所偏,各有得失”^⑤。同年,《京报》(7月30日)刊载《斯密亚丹之自由贸易学说》,评析斯密的自由贸易说的产生和主要内容。1927年,德佑分析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指出两人虽然学说不同但出发点是相同的。^⑥唐庆增探讨了斯密的《原富》和马尔萨斯的

① 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② 叶元龙:《亚丹斯密之经济学说》,《政治家》1926年第1卷第4号。

③ 施督辉:《最初宗奉斯密氏学说之高徒》,《钱业月报》1926年第6卷第4号。

④ 刘炳荣:《西洋文化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第41—42页。

⑤ 杨定铤:《评重商派重农派亚当斯密派三者之得失》,《商学》1924年第37期。

⑥ 德佑:《亚丹斯密和马克思》,《澄衷学生半季刊》1927年第1期。

《人口论》版本。^①龙守成研究了斯密的工资论,认为斯密的工资论的中心点是生存费说,并从“在进步社会中的工资现象”“在停止的社会之工资现象”“在退步的社会之工资现象”介绍其大要,并作简短的批评。^②通过这些比较性的文章,推进了我们对斯密学说的认识。

围绕着北京政府开展的关税活动,学界出现了部分与斯密税则有关的论文。1925年,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虽然这一问题最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对于税则问题的认识还是出现这一时期的学界中。1927年,唐庆增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38期发表《论斯密斯四大税纲》,围绕当时形势介绍和评析斯密的税则内容。次年,黄铁铮在《台中半月刊》第2期发表《评亚丹斯密之租税四大原则》,分析了斯密租税学说的渊源及存在的缺点。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斯密的专著,即刘秉麟写的《亚丹斯密》。该书为作者在1924年7月写成,由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1月出版。作者在导言中表明写作此书的主旨:“本书的主旨,可以分为三点以说明:第一,从当时经济状况方面,去观察他。第二,从各种思潮,有影响于他的方面,去研究他。第三,陈述他的经济学说,并从客观方面去批评他。”全书共分4章:“一七六〇年前后之英伦经济状况与亚丹斯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哲学上经济学之思潮与亚丹斯密”“亚丹斯密的行状及著作”“亚丹斯密之经济学说”。前2章主要分析1760年前后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当时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思潮,阐明斯密学说的时代背景及其渊源;后2章主要介绍斯密的生平、著述及学说。该书是对斯密及其学说的系统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出现了1930、1933、1945年版。

四、译作中的斯密

民国初年,外国传教士作为传播主体对斯密学说的介绍情况有所减少,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除了撰写的相关论文和著作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外,他们翻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学者的论著中也涉及斯密学说。

1. 以翻译日本作品居多。1915年,群益书社出版津村秀松著、马凌甫译《国民经济学原论》一书。该书第七编结论中谈论经济思想之发展,指出个人主义第一款“非束克拉塞(通译重农主义)”,第二款为斯密学派,提到斯密的生平和《原富》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斯密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主张: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创造价值为生产、以一国之富源在劳力、主张自由贸易主义。1917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联合出版小林丑三郎著、宋教仁译述的《比较财政学》上卷。该书第一编在谈论财政学的历史时,其中第五节为亚丹斯密派,指出斯密《原富》“论究财政学者甚详尽”“贡献于财政学者甚大”,并简介了斯密租税学说。192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河上肇著、李培天译《近世经济思想史论》(1922年第2版,1927年第4版)。本书系河上肇在日本信州大学时的讲演稿,其中第一讲“亚丹斯密士”,第三段“亚丹斯密士之自由放任论”。1925年,三浦藤作著、谢晋青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第三篇第五章谈“英国经验学派的发达”时专门分析了斯密的伦

^① 唐庆增:《亚丹斯密原富与马尔塞斯人口论版本考证》,《民铎杂志》1927年第8卷第5号。

^② 龙守成:《亚丹斯密之工资论》,《四川留日同乡会年刊》1927年创刊号。

理思想。1928年,何上肇著、林植夫译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一章“亚当斯密之先锋”,作者列出了魁奈、康替龙、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孟第维尔、休谟等人;第二章“亚当斯密”,分三节介绍了斯密的生涯及其论著、斯密的根本思想、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

除了以上译著外,还有中国学者翻译的相关斯密研究论文。在斯密诞辰200周年即1923年时,《学艺杂志》刊登了河上肇著、林骥翻译的《亚当斯密先生传》。文前表明“此传自河上肇先生《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中所载亚当斯密章摘要译出”,主要分为“由出世到大学毕业之时期”“大学教授时代”“法国旅行时代”“著作《原富》”“斯密的晚年”“遗物及纪念品”6个部分,介绍了斯密的生平。同期杂志还刊有《最近公表的亚当斯密的一封信》,为作者自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发行的《经济论丛》而译成。同年,出井盛之写的《二百岁亚当斯密的不朽》,由善哉翻译,发表在《青年进步》第66期。1925年,《京报》(2月10日)刊载王清彬译自小川乡太郎《租税论》,分“亚当斯密之四原则”“亚当斯密以前之租税原则”“亚当斯密以后之租税原则”,介绍和分析了斯密前后以及斯密的租税学说。1926年,《厦大周刊》第136、138期连载了日本的工藤重义著、T.Y生翻译的《亚当斯密的租税原则》。

2. 法国译作。1915年,陈独秀翻译法国学者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的《现代文明史》,该书第三章“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中指出,斯密为“十八世纪之新思想”的“最知名”经济学者之一,认为《国富论》“驳正土地为唯一富源之说,且以明工业所以致富者,变更原料之形态故也。是等经济学者之所说,全然合理与否,非今日所能断定。听任私人之自营,恒为所最利。此说亦未必尽然。彼等以为利者,往往适得其反。工商业者,以浅识或怠慢之故,恒於可以致富之时,失其完备方法,或扩张贸易之机会。多数经济学者,恒不计及业主及顾客之利害。且自由竞争,对于劳动者本非最有利益之制度。善良法规之利,视绝对放任,即所谓法规全无者。生产之费加廉,而分配财富,亦较趋平等。然是等经济学者反对当时之政府,亦非绝无理由。”^①1923年,法国经济学家吉特(C.Gide)、里斯脱(C.Rist)合著,王建祖翻译的《经济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二章“亚当士密(理士原著)”,分为“分工又曰分业”“士密之自然观及乐观”“经济自由及国际贸易”“士密学说之效果及其传布塞氏与士密之关系”四节,介绍和评论斯密的经济学说。同年,《学艺杂志》刊载《亚当斯密经济学之渊源》一文,为孙倬章节译自基德(Charles Gide)著《经济学说史》中的论亚当斯密的首段内容。

3. 英国译作。黄惟志节译英国伦敦经济杂志记者倍局德而成《斯密亚当评传》,发表在《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从13个方面对斯密的生平进行了评价。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伦敦大学教授坎农(Edwin Cannan)著,陶因、史维焕译《富之研究》,涉及斯密学说。

4. 德国译作。李士特著、王开化译《国家经济学》,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涉及李斯特对斯密学说的评价。1928年,罗撒·卢森堡著、陈寿僧译《新经济学》,由中国新文社出版,该书第四章谈论“由单纯商品生产到资本家的生产”时,首先提到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是商品交换的基础。

5. 美国译作。韩讷(Lewis H. Haney)著、臧启芳译的《经济思想史》,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四部分评述了经济思想史的性质、起源、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学史、从重农学派到奥地利学

^① 陈独秀译:《现代文明史》,《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派、19世纪下半期的各主要经济学派。其中第十章为“斯密亚丹：斯密亚丹之直接前辈及工业革命”，重点分析斯密的学说，分为“斯密亚丹之直接前辈”“斯密亚丹之身世及其与重农学派之关系”“原富”“劳力及分工之重要”“物值”“社会之各团体及其利益”、工资、赢益及利息、地租、财政学、国家干涉与放任主义、斯密亚丹之哲学及方法、斯密亚丹之实际影响、满切斯达学派、学者对于《原富》之评论等15部分予以分析。同时，书后附录“经济思想史人名索引”，其中涉及斯密之处有六七十处之多，可为涉及与斯密有关的人名之最多者之书。

这些译作代表了当时这些国家对斯密的认识，同时它们在这一阶段被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斯密学说的重视，希望通过译作对斯密学说进一步了解。这些译者和译作为民国初年的斯密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斯密学说的传播特点和效果

（一）传播主体基本都有外国学习游历背景，且以留日背景居多

在这16年间，传播斯密学说的队伍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及国内新式学校培养的人才的成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把学习西方看作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主动承担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成为西方经济学向中国传播的重要主体。“传播动力则来自于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寻求一条使中国摆脱列强欺凌、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努力。”^①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他们“自外国携带回国之礼物——各种经济学说——亦日多，而国内各大学亦特设专科或专系，请东西洋留学生担任讲席，将自外国携回之礼物，分送于国内之青年学子，而青年学子并转送于家族或乡间戚友，至是经济学之声誉，始渐远播。”^②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成为这一时期传播斯密学说的主体。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杨端六、阮湘、史维焕、郭心崧、赵兰坪、资耀华、黄典元等人，皆有在日本学习的经历；留美的马寅初、李权时、杨昭愆、唐庆增；留法的孙倬章；留日、英的杨端六；留英、德的刘秉麟；留美、英、法的叶元龙；在美、英、日宣传革命多年的孙中山等，皆在斯密学说传播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他们在传播斯密学说时，有的还在外国学习，有的已经回国后在高校任职，有的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工作。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充满了斗争和冲突、希望和激情”的1920年代中国，^③成为斯密学说的重要传播者。

（二）传播媒介

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所以，在这一时期内各地出现了办报热潮，民国初年全国新闻报业多达500多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期刊更是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下增加400多家。”^④涉及斯密学说的报纸主要包括《申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杂志

① 岳清唐、周建波：《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② 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1941年第5卷第3期。

③ 李里峰：《1920年代和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史林》2021年第1期。

④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主要包括《东方杂志》《独立周报》《商学》《新青年》《言治》《太平洋》《法政学报》《钱业月报》《学林杂志》《澄衷学生半季刊》《学艺杂志》《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青年进步》《民铎》《厦大周刊》《东南论衡》《科学》等。其中以《东方杂志》和《学艺杂志》的刊文较为集中。《东方杂志》刊载5篇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1923),1篇纪念《国富论》出版150周年的文章,表明“东方杂志社以介绍斯氏平易近人之学说为己任”^①,“表示本志对于斯密亚丹之敬意焉。”^②《学艺杂志》原在日本创刊,后迁回上海,该刊在1923年曾刊载12篇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

出版机构。刘秉麟的《经济学原理》《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亚丹斯密》等关于斯密学说的著作,以及涉及斯密学说的译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泰东图书局也出版过类似著作。所以,这些出版机构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斯密学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材、课堂。1914年出版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包括“斯密亚丹”。1921年,南京高师在举办暑期学校时,指明开设的课程中即有《国富论》。1920—1922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近世欧洲史》,曾讲到斯密的自由放任说。1924年,安体诚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时,讲到由亚当·斯密创立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由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三)传播效果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前景。随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例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强调“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表达了倾慕西方近世文明与其共进的思想;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的文章,皆是当时国人希望引进西方文化以救中国的一种表现。在这16年中,学界有的宣传斯密的个人主义,有的推崇李斯特的国家主义,有的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三足鼎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刘秉麟表示“经济思想在今日最占势力者”,主要有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李斯特的国家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③斯密学说能够在这段时间内的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主要原因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纪念斯密诞辰和《国富论》出版、学术研究、开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对于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以及一战使国内民族资本工业迅速发展,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使不少经济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财政问题上。“20世纪初更显著的趋势是,学术界对应用经济学,特别是财政学、金融学和管理学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这种变化与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财政的窘迫和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意愿具有密切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国富论》作为理论经济学,在传播上略显放缓趋势。”^④所以,斯密学说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当时的中英关系和文化交流。例如1920年10月下旬,英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来华讲学,影响较大,引起了中国不少人对英国学说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在1923年7月3日,英国政府向各国提议国际共管中国,引起举国震惊。而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

① 李权时:《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② 黄惟志:《斯密亚丹评传》,《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③ 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④ 张中:《〈国富论〉及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东方早报》2016年10月18日。

胜利中看到了新的曙光、新的希望,试图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探讨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所以五四以后出现了翻译俄国文学的热潮。加之 1923 年 1 月,孙中山和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联合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联俄政策。所以,国人对苏俄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从 1924 年开始,中国进入国共合作时期,南北两个政权并存,很多学人投入到社会改造运动之中。另外,在 1919-1924 年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五位外国学者先后应邀来华讲学。“名哲讲学不仅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传达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积极热情地回应充满新知渴望的中国思想界,故其讲学实际上已超越了单纯学术交流的层面,而形成了与后者的互动。由于国人见智见仁,各取所需,名哲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① 不过,有人对于这些偏重哲学的学者来华产生了疑问,希望结合中国实际邀请经济学者来华讲演。“哲学在中国最容易流于清谈。……要救这个弊病,……经济的学问和有名的经济学者讲演,也是不可少的。梁任公先生等创办的讲学会,每年请外国名人来华讲学,我以为不可过偏于哲学,救中国危机的经济——尤以应用经济——的名家,也须请几个来讲演,方才适用于中国。”^② 所有这些因素,皆对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侯德彤

A Study on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Adam Smith's Theo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Dengde¹ Song Junrong²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Library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were continuous wa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me advanced Chinese people did not give up their pursuit of China's path to prosperity, and West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Adam Smith received attention. Sun Yatsen, Li Dazhao and Chen Duxiu often cited Smith's theory in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socialism and Marxism. Magazines such as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nd *Wissen und Wissenschaft* published articl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Smith's birth and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iu Binglin wrote *Adam Smith* to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and study his theory. Some scholars translated articles and works on Smith's theory from Japan,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ose who returned after studying abroad became the main force further disseminating Smith's theory through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publishing houses and classroom lectures.

Key words: Adam Smith;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astern Miscellany*; Liu Binglin; dissemination

① 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陈震异:《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太平洋》1921年第2卷第9号。

“兄弟之邦”：现代中国的朝鲜想象

韩琛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在现代东亚,中朝两国之间关联甚深,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体现。基于反帝、反殖民的共同需要,中朝兄弟共同体想象得到广泛书写,表现朝鲜兄弟的烈士精神与英雄气质,则是其中最为引人侧目的内容。其实,塑造朝鲜英雄是为召唤中华英雄,想象“兄弟之邦”是为强化中华认同,表征中朝反帝共同体则蕴含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现代中国的朝鲜书写构成一个内外纠结、古今交织的文学地缘学图景。当然,兄弟邦国总是在连带性中纠结对抗性,在亲缘性中包含疏离性,中朝两国各自的现代国家主体意识,便生成于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纠葛中。

关键词:朝鲜;英雄兄弟;华夏历史心性;中华民族主义;文学地缘学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106-13

1933年9月,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创作小说《鸡之归去来》。题材应该取自现实经验,主要讲述一只白鸡的去而复返。最后,小说结束于对朝鲜人的议论:“我”听到日本女人们说,白鸡的失踪肯定是朝鲜人的作为;不过,当“我”出其不意地几次听出“朝鲜人”三个字时,居然激动地在心底叫起来:“——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我”进而想象了一个解释:住在附近的朝鲜人,深夜偷走我的白鸡。但他的伙伴们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于是在第四天夜里,白鸡失而复返。^①在这个交织现实与想象的小说中,郭沫若以中朝两国人民为邦国兄弟,并认为朝鲜兄弟是反抗日本帝国的英雄。不止郭沫若的《牧羊哀话》《鸡之归去来》,朝鲜英雄兄弟也是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书写对象,主要作品有台静农的《我的邻居》、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巴金的《发的故事》以及无名氏的朝鲜人抗战三部曲《红魔》《龙窟》《幻》等^②。朝鲜英雄兄弟形象的广泛出现有其现实背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与朝鲜的历史连带,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由此形成的朝鲜想象因此意味深远,在与现实世界形成共振的同时,亦不乏指向大同未来的激情。塑造朝鲜英雄是为召唤中华英雄,想象兄弟邦国是为强化中华认同,表征中朝抗

作者简介:韩琛,男,山东龙口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① 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5—378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的朝鲜书写的资料整理、文献编目及文学研究,可参见李存光、金宰旭等学者的著述。详见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存光、金宰旭:《“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文献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使用朝鲜而非韩国的国名,乃是遵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指称惯例,其在地域上涵盖今天的整个朝/韩半岛。

日共同体则蕴含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现代中国的朝鲜书写构成一个内外纠结、亲疏交织的文学地缘学^①图景。

一、受难、离散与兄弟共同体

在1918年完成的《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认为“一战”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折,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从此占据世界舞台,中国人要自觉建设一种“国际主义的国家”,以对全体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我们的爱国,一方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一方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在参加巴黎和会期间,他觉得最奇怪的第一件事是各殖民地自主权扩大,居然直接办起外交;另外,一些前殖民地或欧洲弱小民族纷纷独立,成为巴黎和会上“面生可疑的国家”^②。弱小民族的独立自主与中国的国际主义立场是并行不悖的,这意味着在促进中国自身的进步之外,也需要理解并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独立与自由。

“一战”的残酷后果导致对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质疑,一种交织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式国家观念,成为此一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鲁迅认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让人们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③周作人晚年在谈及早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时,以为其可以与1921年《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相提并论,二者皆是介绍弱小民族文学、抵抗帝国压迫的翻译运动^④。周氏兄弟以弱小民族文学为中国借鉴的翻译活动,一方面是以之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借镜,另一方面也是共振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运动。作为殖民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来说,中国与“弱小民族”具有国际主义连带性。老舍认为,他创作小说《小坡的生日》,便是要“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⑤。缔结“弱小民族”联合阵线,实现反帝、反殖民的目标,显然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性事业。相对于其他遥远国度,邻邦朝鲜对中国而言,应是最为切近而现实的弱小民族代表。吴藻溪在《朝鲜童话》前言中写道:“我希望你们从这本小小的童话中,想到朝鲜的小弟妹们的心理和现在所处的境遇,并且联想到东方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小弟妹们的心理和现在所处的境遇。”^⑥

从历史上看,朝鲜的“弱小”一以贯之。李朝时代,朝鲜作为中国王朝的藩属国,不得不采取“事

① 文学地缘学是指从地缘政治学视角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致力于从历史化的时间政治学转向地缘论的空间政治学,从而在文学研究的历史/时间轴线之外增加一个地缘/空间轴线。即在与地理、疆域、国族等因素相关的空间政治视野中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国族认同、区域政治、世界想象、域外书写、传播效应、历史转型等等。在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彼此联结、互动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本土现代文学生产与地缘政治空间重组往往存在着联动关系,文学地缘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缘空间政治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现象梳理、文化诠释与政治分析,既试图通过文学分析来理解现代地缘政治空间的形成与变化,也要通过地缘政治思想重构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最终意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之立足本土、着眼周边、跨界全球的空间政治特征。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1—64页。

③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

④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06—208页。

⑤ 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⑥ 吴藻溪:《给小弟妹们》,《朝鲜童话》,北平:北平世界科学社,1936年,前言。

大主义”的策略。近代以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朝鲜迅速从附庸国沦为殖民地。正因为“弱小”带来的屈辱,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极为激烈,经常会采取暗杀等激进手段。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感应于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从实现民族解放的内在需求出发,朝鲜爆发要求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并一直存续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石建国认为,两国间自古以来的“兄弟般的情谊”,“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发展”^①。两国间兄弟情谊是否自古如此可存而不论,但需要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有关朝鲜的文学书写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顶峰,便是这一历史状况的反映。“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当时属于不同政治集团、思想立场和文学流派的中国作家,虽然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的分野明显,甚至互不相容,但是在关注韩国人民的苦难,支持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方面,各方面的作家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这一情况是为当时韩中两国面临的相似的国情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是那个时代给与中国文学的特别恩赐。”^②

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书写就会发现,除了《牧羊哀话》等不多的作品,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在华朝鲜人的,而且超过半数都是表现在华朝鲜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即便是那些以朝鲜为背景的作品,如《牧羊哀话》或者无名氏的小说,作者也大多没有居留朝鲜的亲身经历,而是根据二手材料的想象与虚构。无名氏创作的几部朝鲜人抗日题材小说,就是根据朝鲜军人李范奭的生活加工而成。虽然匮乏对于朝鲜的真实体验,但是在华朝鲜人却是可知可感的现实对象,这些朝鲜流亡者的抗日英雄事迹,给予正面临日本威胁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精神鼓舞。于是在很多作品中,如郭沫若《牧羊哀话》、台静农《我的邻居》、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蒋光慈《鸭绿江上》、巴金《发的故事》等等,中国作者都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出现的。这种置身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既虚拟出一个“客观性”情景,形成“我”在场的强烈现实感,又建构起一个对话情景,造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感应。事实上,在华流亡朝鲜人的确曾与中国作家一起并肩生活、战斗。1936年,巴金在谈及小说《发的故事》时说:“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斗争,但是我也认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至少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我多少有一点点了解。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斗争的方式。但是我仍然尊敬他们。”^③至于无名氏与李范奭之间的接触与友谊,则是他创作朝鲜人抗战作品的直接动因。

日本殖民造成的国破家亡、受难离散,既是这些小说着重书写的主题,也是展开反帝反殖民叙事的前提。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描写了一个朝鲜孩子的遭遇。这个没有祖国荫蔽的儿童,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欺凌,不仅有来自日本人的凌辱,也有来自苏联孩子的歧视。这个小说再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东北/满洲地缘政治空间,日本人、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杂居其间,并形成了一个层级性的国族结构。日本人、苏联孩子对朝鲜孩子的凌辱与歧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就反映着这个国族结构体的分层状况;“没有祖国的朝鲜孩子”,明显居于这个层级结构的最低端。巴金在散文《一封公开信》里也曾谈及,中朝两国人在东北地区承受着来自日本和苏俄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在《没有祖国的孩子》的结尾,当这片土地也最终沦陷时,苏联人可以自由返

① 石建国:《中韩合作抗日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意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当代韩国》2015年第2期。

② 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第107—108页。

③ 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回祖国，“我”也可以回到中国内地，朝鲜孩子却无处可去，只能继续流落异乡他国。当然，作为流亡者的“我”，最终与朝鲜孩子一样，其实都是“没有祖国的孩子”，他的屈辱也是“我”的屈辱。

同样的，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也虚构了一个离散他乡的故事背景。“我”、一个波斯人、一个朝鲜人和一个中国人，一同住在苏联学校宿舍里；在围炉夜话中，朝鲜人李孟汉讲述了自己国破家亡、爱人牺牲的遭际，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失国的“亡命客”。在台静农的小说《我的邻居》中，“我”将朝鲜人邻居称为“异国的漂泊者”，而且生出许多没有根据的猜想：“我无端地感到我这不幸的邻人身世的悲哀，他怎样地遭遇恶人的毒手，他怎样地逃开恶人的罗网，他含泪地别了祖国，别了慈母，别了他的爱人！”台静农的中国台湾人身份和舒群的中国东北满族人身份，让他们关于朝鲜人受难、流亡的书写，也充满来自他们自己的“流亡者”体验。中国台湾和东北自1895年之后先后被日本占领。从反帝反殖民、争取国家独立的角度来看，共同的失国、受难、流亡的历史体验，让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彼此联合抗争，成为并肩战斗的反帝反殖民、争取各自国家自由解放的“兄弟共同体”。在1926年3月发表的散文《一封公开信》中，巴金深情地写道：“亲爱的高丽弟兄们，自那时以来，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却你们了。”^①穆木天的诗歌《献给朝鲜的战友》，着力表现中朝人民是比邻而居的战友：“我的家和你们的家 / 只隔着一道水 / 那白浪滚滚的鸭绿江。 / 我的家和你们的家 / 只隔着一道山 / 那高高的哈尔巴岭。”^②力扬的《朝鲜义勇队》则直接以朝鲜和中国为“最亲切的兄弟”：“从辽远的年代起， / 中国和朝鲜 / 就是最亲切的兄弟 // 今天， / 中国和朝鲜， / 呼吸着同一的痛苦， / 呼吸着同一的仇恨； / 日本帝国主义 / 带给我们朝鲜的 / 一切灾难 / 也在带给 / 亲爱的中国”。^③

一致的日本敌人、相似的殖民屈辱、共同的流亡体验，让中朝两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反帝联合战线。当然，在“民族兄弟共同体”想象之外，也存在另外一种超越国族的“阶级兄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东亚 / 世界资本主义视阈中展示了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复杂性。在这个方面，以日本为背景的两篇小说——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和梅娘的《侨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基于个人现实体验的写实主义风格，其实更为接近旅日华人、朝鲜人的日常生活。与描写“在华朝鲜人”的文学作品不同，《鸡之归去来》《侨民》以“在日朝鲜人”为书写对象，至于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则将“我”与朝鲜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鸡之归去来》中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侨民》中的“我”，则身份相对含混，是一个“满洲国人”。国族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篇小说对于在日朝鲜人书写的不同。前者试图与朝鲜劳工形成一个“被压迫者共同体”，后者则再现一个竭力将“我”与朝鲜人区隔开来的满洲人，然而最终却从相反方向上证明了满洲人“我”和朝鲜人都是“被殖民者”的事实。

在全球拓殖的过程中，帝国从殖民地掠夺的不仅是原材料，而且也包括劳动力。与被一次性消耗的前者相比，后者作为可以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廉价劳动力，才是保持帝国运转的真正动力。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便讨论了朝鲜劳动力给日本帝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近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

① 巴金：《一封公开信》，《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② 穆木天：《献给朝鲜的战友》，《朝鲜民族战线》第4期，1938年5月25日。

③ 力扬：《朝鲜义勇队》，《新华日报》1939年2月5日。

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①不独朝鲜人在日本从事低阶劳作,中国劳工也一度把日本当成做工的目的地。自1918到1923年,为解决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本招募中国劳动者到日本从事体力劳动,至1923年8月,在日底层华工总数已逾7000人。与朝鲜人的遭遇一样,在东京大地震期间,在日华工也遭到屠杀、遣返,导致日本华工群体在1923年10月即顷刻瓦解^②。在日中国劳工与朝鲜劳工一样,既是底层劳动力的即时补充,也是特定时刻转移社会危机的对象。当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中表明,我和朝鲜人都是被日本人欺凌的对象时,不仅仅是立足于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思,而且也隐含着—一个阶级共同体的认同。从阶级立场来衡量朝鲜劳工的意义与价值,显然与郭沫若的身份相关。在小说的结尾,郭沫若还浪漫的畅想,朝鲜人“吃人肉”的流言中隐含着反抗与革命的种子。

与朝鲜抵抗者抗日复国的海外流亡不同,朝鲜和中国劳工为生计而侨居日本的务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离散状况。而这最为普遍的一方面,却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因为这个事实偏离乃至颠覆了那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暗示了被殖民者对于帝国政治的潜在认同。与郭沫若《鸡之归去来》不同,梅娘的《侨民》几乎没有任何中华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小说题目“侨民”所表征的国族认同身份,却又直接将民族认同问题摆到明处。《侨民》的主人公是位侨居日本做速记员的满洲人,周末去海边度假,在电车上遇到一对朝鲜族劳工夫妇,朝鲜男人强迫妻子为女主人让座,引发了主人公作为帝国边缘人的复杂感受。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让座引发的被殖民者共同体认同,是纠结了阶级认同、国族认同与阶级区隔、国族歧视的复杂想象。“我”和朝鲜一家人虽然极力融入日本社会,但是却依然被当成低等异族他者看待,而“我们”作为贫穷底层工作者的阶级身份,又强化了这种低等族群身份。为摆脱这种被殖民——既包括国族层面也包括阶级层面的被殖民——的劣等感,“我们”没有抵抗来自宗主国的压迫以寻求最广泛的平等,反而在“被殖民者共同体”内部再生产了殖民主义政治,被殖民者往往把殖民者的歧视话语内在化而分断自己人^③:朝鲜男人通过强迫朝鲜女人让座而生产出自己的优越感,“我”则通过羞辱朝鲜男人的贫穷而高人一等,在小说中初露端倪的“被殖民者共同体”顷刻瓦解,“我们”并不能在殖民主义压迫体系之外想象其他身份政治的可能。

共同的受殖经验未必会让不同国族结成反殖民联合体,相似的离散体验也并不能让流亡者们变得四海一家,对于普通中朝大众而言,生存压力远比民族主义情怀要来得现实可感。梅娘、李辉英等人的小说就充分展示出中朝“兄弟共同体”的复杂性。不过,基于激发中华民族主义情感以及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现实政治需要,各种建构于国族、阶级、受难、离散等经验之上的中朝“兄弟共同体”想象还是蔚为潮流,并呈现出一种极为简单、刻板的浪漫主义叙事形式。在其中,呈现朝鲜兄弟的勇于牺牲的烈士精神与英雄气质,则是最为引人侧目的内容。

① 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0卷》,第375页。

② 郑乐静:《二十世纪初旅日浙南籍下层华工商社群的历史变迁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③ 岸阳子、郭伟:《试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2007年。

二、朝鲜烈士：现实与虚构

1926年2月26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的《李完用与朴烈》中,以李完用为“确实的逆徒”,而以朴烈为“烈士”“朝鲜的忠良”,并将对朴烈的钦佩投射于朝鲜民族:“我对于这亡国的朝鲜不能不表示敬意……朝鲜的民族,请你领受我微弱的个人的敬意。”朴烈系旅日朝鲜人,1922年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指示,策划暗杀日本天皇计划,未及实施便被告发逮捕,后被判“大逆罪”而处以死刑。周作人赞美朴烈、朝鲜的目的在于讽刺中国人。他认为中国多有李完用一般的“逆徒”,少见朴烈这样的烈士,继而悲叹:“我们看了朝鲜的往事,不能不为中国寒心。”^①1920年代,随着日本殖民东北的“满洲危机”不断恶化,歌颂抗日朝鲜志士的文字有逐步增多的倾向。吴敏认为,周作人笔下的朴烈形象,完全不同于消极贬义的——作为中国“集体想象物”——朝鲜认识,而是一个不屈不挠、浴血战斗的朝鲜人新形象^②。

不过,就郭沫若1919年发表的《牧羊哀话》来说,英雄的朝鲜兄弟形象已经被确立起来,并与那些消极贬义的朝鲜认识一道,共同构成了一种相对复杂的朝鲜想象。更早之前,黄世仲以“世次郎”为笔名在《南越报》上连载的小说《朝鲜血》(又名《伊藤传》)^③,则描述了1909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情况,讴歌安重根是“弹药轰开新世界,风潮造出好男儿”,以之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当然,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帝国年代,天演就是法则,强权便是正义,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似乎并无不妥,黄世仲因此也把伊藤博文视为日本民族英雄。李腾渊认为,《朝鲜血》采取中立的“双绝”叙事,安重根与伊藤博文是“英雄对英雄”的对立,二者都是中国所缺少的英雄人物^④。“绝代双骄”式的英雄想象,也体现于梁启超1910年完成的《秋风断藤曲》,其中称颂安重根、伊藤博文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贤者,而堂堂中华则“空见危楼袖手人”^⑤。

1895年至1945年间,朝鲜人的各种抗日复国行动在中国激起反响,中国的新闻舆论、文艺创作对这些事件多有关注。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朝鲜人暗杀日本军政要人事件的屡次发生,更给中国人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安重根事件、朴烈事件之外,又有1932年李奉昌在东京向天皇马车投掷炸弹、尹奉吉在上海暗杀日军将领等抗日事迹。至于朝鲜人群体性的抗日复国的运动,如1919年的“三一运动”,则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彼此共振,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反帝反殖民风潮。这些英雄事迹也许真的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弱小”朝鲜的认识,至少在很多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表述中是这样。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中,苏联孩子嘲笑朝鲜孩子“果里”是没有国家的人:“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祖国,那不是耻辱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那么,安重根呢?”安重根改变了懦弱朝鲜的想象,显示出英雄朝鲜的别样可能。舒群不仅以安重根为朝鲜民族英雄图腾,而且自安重根开始设置了一个英雄系谱:“没有祖国

①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晨报副刊》1926年2月26日。

② 吴敏:《台静农、周作人笔下的韩人形象》,《当代韩国》2008年第2期。

③ 世次郎:《朝鲜血》,《南越报》谐部,1909年底—1910年5月7日。

④ 李楠、徐金柱:《近代有多现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⑤ 梁启超:《秋风断藤曲》,《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37—38页。

的朝鲜孩子”其实拥有一个因为反抗日本殖民被枪杀的父亲,他是英雄的后裔。也许,安重根、果里的父亲、果里都是“没有祖国的人”,但是他们的“英雄”壮举,却构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国族英雄血脉”,是朝鲜永远不会灭亡的证明。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的主人公李孟汉,与他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实际上也是反映朝鲜人反日复国事业的绵延不断。另外,朴烈事件可能是台静农小说《我的邻居》的原型,尹奉吉事件之后,以其事迹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也屡屡出现。

1910年之后,由于大批朝鲜志士流亡中国,中国作家得以与朝鲜人士近距离接触,从而了解到朝鲜抗日运动的一些情况,文学创作素材经常来自于朝鲜流亡者的自述。在谈及涉及朝鲜人抗日斗争的小说《发的故事》时,巴金承认自己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行动,而只是有“一点点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思想^①。在小说《火》第一部的后记中,巴金认为《火》是“一本宣传的东西”,自己并没有写出他们的主要精神^②。不过,巴金所谓“他们的主要精神”,其实也多源自传说和想象,也是一些“宣传的东西”,这就导致相关书写总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朝鲜兄弟往往被描述为道德纯净的“贵族英雄”。小说《牧羊哀话》中的朝鲜烈士尹子英生于仆役家庭,却在叙事中被转换为朝鲜子爵的“儿子”,从而具有了象征性的贵族身份。他的名字“子英”是子爵所起:“子爵十分喜爱他,常叫他作‘英儿英儿’。英儿比佩萸小姐大一岁,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儿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萸妹。他们两人你怜我爱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样。”^③在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中,主人公李孟汉说自己 and 爱人云姑都是“贵族的后裔”;舒群小说《海的彼岸》则塑造了一个因为暗杀日本将军而流亡中国的“朝鲜的贵族之子”。无名氏小说《北极风情画》《荒漠里的人》《露西亚之恋》,大都取材于朝鲜人李范奭的经历,李氏乃朝鲜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朝鲜皇族的后裔。人物身份的贵族化可能反映出:一方面中国作家所接触的朝鲜流亡者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想象朝鲜贵胄隐含的是对自我身份的期许。

朝鲜英雄兄弟的“贵族”身份塑造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在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想象中,为国殉难者的血统必然高贵纯净、不同凡俗。于贵族身份想象之外,诸多小说中也致力于宣扬朝鲜兄弟的雄性气质,令这些抗日英雄书写往往充斥着一种吊诡的男权政治。无名氏的朝鲜题材小说往往激荡着难以遏制的男性气质,“抗日英雄”无不具有超级男性气质。于是,《北极风情画》中的波兰女人最终为“他”自杀,变成“他”生命传奇中的一个故事。同样,郭沫若小说《牧羊哀话》中朝鲜白衣牧羊女的存在,不过是为要以其贞洁无瑕来陪衬“朝鲜兄弟”的英烈之举。当然,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则呈现出——与国族政治、国家关系相关的——更为复杂的性别政治图景:在其他国家的人们眼里,朝鲜流亡者李孟汉像一个“女性”。这个二十几岁的美少年“实在带有几分女性,……在同学面前,我时常说他是我的老婆”^④。在“我们”这些异乡客的围炉夜话中,李孟汉讲述了他与云姑在朝鲜国内的恋爱故事,这个故事以李孟汉去国流亡、云姑为国牺牲而告终。小说在“我”、李孟汉与云姑以及中国与朝鲜之间建构起一个等级性的性别政治关系:中朝两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权力差序,被共同的反帝反殖民诉求掩盖起来。

实际上,中国作者相当清楚本国的朝鲜认识充满大国偏见,中朝之间也存在着差序权力关系。

① 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卷,第110页。

② 巴金:《火·第一部·后记》,《巴金全集》第7卷,第173—174页。

③ 郭沫若:《牧羊哀话》,《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④ 蒋光慈:《鸭绿江上》,《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89—90页。

鲁迅曾经谈到的“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①，意指中国对朝鲜的蔑视自古如是。在演讲稿《无声的中国》中，鲁迅又特别提及在弱小民族中，朝鲜也是没有声音的一个^②。他认为要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也意味着无声的朝鲜需要变成有声的朝鲜，一切弱小民族都应有发声的权力。也许就是为证明一个“有声的朝鲜”的存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往往也具有代朝鲜民族立言的倾向。巴金说，写作《发的故事》是为不忘那殉道者的血^③，写作《火》是为有机会向朝鲜朋友表示敬意，并期待有第4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④。在《关于〈荒漠里的人〉》中，无名氏认为，人们太不了解“韩国革命与韩国民族的伟大”，并要为他们写一本书，“来扫除世人对韩国民族的种种偏见”；在《露西亚之恋》文末，无名氏更将亡国之难当成历练韩国民族的“试验”：“对于这个饱经亡国痛苦而始终奋斗不息的白衣民族，我寄予最大同情与敬意，并愿意把这本与韩国民族多少有些瓜葛的小书献给她。只要历史的轮子不后退，我相信韩国民族一定能够再生，犹如从黑暗深渊中升起的红日。”^⑤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韩国烈士的英雄义举，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朝鲜民族的推崇、钦佩之情。在中国作者的浪漫主义想象中，朝鲜民族“更将化成千万个战斗的安重根！/千万个安重根的热血，/冲开了鸭绿江的源水，/溅红了大韩古国的国门！”^⑥

在弱者无声的世界中塑造一个“有声的朝鲜”，是中国现代文学朝鲜书写的一个主要叙事策略。在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以及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中国人“我”，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倾听者、转述者，而朝鲜人则是自己家国悲情的主动倾诉者。这虽然是中国作者的有意设计，但是依然能够说明“有声的朝鲜”是一个积极的意象，对于他们的倾听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朝鲜志士的刺杀行动，也是一个向世界发声的行为：被殖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往往需要通过激进主义运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独立与尊严。渲染朝鲜烈士的贵族身份、雄性气质、殉道精神，是为赋予“想象的英雄朝鲜”以有形的肉身，进而将之营造为一个普遍的形象。然而，梅娘的《侨民》、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则提醒我们，这些精英主义的朝鲜抗日烈士形象只是极为特殊的个体，更多的被殖民者实际上已经内化为日本帝国臣民，他们不但试图在帝国体系内重构身份认同，而且极其努力地向帝国中心进取。在这里，不是哪一个状况是事实的问题，而是更愿意接受哪些事实以及国家如何记忆自身历史的问题，事实与虚构往往只有一线之遥。当然，一些相对负面的朝鲜人形象在东北作家笔端的不时出现，也在不断地地质疑主流抗战作品塑造的正面朝鲜形象^⑦。

也许正是意识到虚构的限度与现实的复杂，一些小说的朝鲜英雄往往被描写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这些英雄兄弟的刻板化塑造符合期待视野，陌生则是源于中国作者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朝鲜，基于隔阂、误读的朝鲜书写成为常态。中国作家甚至有意将“隔阂”状况设置于文本中，以期待形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台静农小说《我的邻居》就是其中典范。在小说中，隔壁租客虽然与

①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卷，第212页。

②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

③ 巴金：《关于〈发的故事〉》，《巴金全集》第11卷，第111页。

④ 巴金：《火·第一部·后记》，《巴金全集》第7卷，第174页。

⑤ 无名氏：《〈露西亚之恋〉后记》，《露西亚之恋》，北平：中国编译出版社，1942年。

⑥ 万众：《我怀念你的祖国——给朝鲜金满昌同志》，《大路》第2卷第1期，1940年6月1日。

⑦ 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第122—123页。

“我”一墙之隔,但是却咫尺天涯一般,邻居的沉默、精悍、冷静,让“我”如遇魔鬼般的不寒而栗,“我”对他的所有了解就是——“他”是一个朝鲜人。后来,“我”真正认识他是通过报纸报道——“他”是一个谋划炸日本皇宫的朝鲜人。显然,“我”更愿意承认报纸上的“英雄”是真正的“他”,不过,“英雄壮举”仅仅是这个“人”的特殊面向,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陌生人的状况。这就是纪念碑效用。人们对于矗立于公共空间的纪念碑熟悉无比,但是往往不清楚它们纪念的具体是谁,更不必说“无名英雄纪念碑”。在无名氏小说《北极风情画》中,朝鲜主人公在小说伊始就被“我”形容为“野兽”“陌生怪客”“陌生汉子”。“我”对他的“熟悉”,实现于他对自己传奇人生的讲述,故事讲完之后,他即刻不知所踪。“我”于是产生了一些疑问:“他究竟是真人?还是个魅影?他的故事,是真实事迹,还是一座海市蜃楼?我再想,此时此刻的我,我自己,究竟是一个真我?还是一个幻影?”^①也许,《我的邻居》才真实反映了中国作者对于朝鲜英雄兄弟的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英雄认识,不是源于熟悉,而是因为陌生。个体的自我认识,也需要在陌生化的一面出现之后,才真正开始。

在《李完用与朴烈》一文中,周作人称颂朴烈夫妇、贬低掉李完用之后,则直指中国的苟安无能。“特别在现今这个中国,满洲的情形正与合并前的朝鲜相似,……我相信中国可以有好些李完用,倘若日本(或别国)有兴致来合并中国,但我怀疑能否出一两个朴烈夫妇。”^②自安重根以降,朝鲜志士的英雄主义事迹的确给了中国作者以很大刺激,让他们试图通过书写朝鲜英雄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不过,书写朝鲜英雄除了反帝的现实诉求之外,亦有更深刻的历史渊源蕴含其中。

三、朝鲜英雄兄弟与中华民族主义

朝鲜英雄的文学生产并非例外,而是与中华英雄的文学生产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世界,塑造民族英雄及其系谱是发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策略,国族历史及其开端总是由民族英雄来创造的。在谈及中国现代转型的困难时,鲁迅认为原因就是缺少“敢于最先”并“不耻最后”的“傻子/英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③前述各个文本中的朝鲜英雄,就符合鲁迅的英雄想象。与鲁迅一样,周作人的《李完用与朴烈》同样也意在颂扬朝鲜民族的英雄面向,进而反向召唤勇于牺牲的中华民族英雄。

历史发明国族,国族制造英雄。重构辉煌历史、创制伟大现实、设计光明未来,是现代国族叙事的应有之义。民族英雄的历史发明、现实生产与文学赋形,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英雄系谱的历史建构。自晚清以降,通过书写民族英雄系谱来建构中华民族,是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面向之一。黄帝、屈原、岳飞、郑成功、史可法等汉族英雄符号的历史生产,皆是通过英雄神话来打造国族精魂,以之为基干形成中国的脊梁。其次是抗敌民族英雄的现实生产。在现代中国,抗敌民族英雄典范的生产高潮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晚清排满革命过程中英雄人物的涌现。陶成章、

①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②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晨报副刊》1926年2月26日。

③ 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万福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汪精卫等，皆是此一阶段出现的汉族英雄，这些革命人几乎都是在暗杀行动中完成英雄形象的建构。暗杀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行动，其以只身挑战强权的孤胆行动体现出崇高的民族意志，而且能够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刺客英雄如高渐离、荆轲等产生共鸣。另一个是民族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涌现与宣传。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英雄主要是在对日战争中出现的典范人物，较少孤身刺杀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无论是历史英雄还是当代英雄，他们最终都在文学修辞中被建构成型并广为传播，国家以之作为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象征符号和情感资源。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朝鲜英雄形象，仍处于中华民族英雄想象的整体脉络之中。其一，朝鲜英雄形象多具有中华传统的“侠”气质。离散、流亡的境况，则强化了其“游”侠的形象。无论是现实中的朝鲜烈士安重根、朴烈、尹奉吉，还是小说中的朝鲜志士，无不具有游侠气度与牺牲精神。其二，朝鲜英雄以民族国家为“义”之所指。诸多小说中的朝鲜英雄，实际上都通过效忠于一些“民族主义原型”例如君主、族群、传统、礼教、血统等等^①来凸显其精忠报国的诉求。现代民族主义往往需要向历史传统征召文化、思想符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国族共同体想象。其三，朝鲜英雄往往具有“儒”家色彩。朝鲜民族主义的现代兴起，一方面以建立区隔于中华帝国的“朝鲜性”为自身独立自主之起点，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儒教思想体系的文化根基，甚至是一个比中国本邦更为儒教化的“小中华”。其四，朝鲜英雄也是华夏英雄。各种文学文本似乎一直在暗示，“朝鲜英雄兄弟”依然是华夏之一员，以共攘日本夷狄而捍卫华夏本邦。陈寅恪、朱自清在诗歌中指认朝鲜是“箕子的子孙”，小说、诗歌频频以朝鲜人为“兄弟”，就是最为显著的症候。这是一个纠结历史因素与现实状况的中华中心主义叙事，支持朝鲜独立、颂扬朝鲜英雄叙事终要指向中国的解放、复兴与强大。

以朝鲜英雄叙事来表征中华民族主义，不仅是立足反日抗战的现实需要，也有其可供参照的历史渊源。虽然都处于反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中，中国现代文学鲜有书写苏俄、蒙古、美国兄弟的，但朝鲜兄弟的文学叙事却绵延不绝。这是因为在“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中国天下体系中，朝鲜、越南、琉球作为“藩属国”，也是汉化程度极高的诸夏之国，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边缘。当然，越是文明边缘之地，越会极力坚持文明中心的政教意识形态，以证明自身作为文明成员的合法身份。古代朝鲜的“小中华”认同，其实就是强调自身的华夏身份，古代中国王朝也视朝鲜为文明教化之地。近代以来，朝鲜虽然一直努力去中国化，进而塑造一种朝鲜性本质。但是，就像魏建功 1920 年代侨居汉城所观察到的，已经被日本合并 20 余年的朝鲜，依然处处蒙受中国的“嘉惠”：“海外无事，总想看一点‘大国’化育群小的‘恩泽’究竟是什么。我也许自己功力不深，所觉到的都不是些‘嘉惠’于别人家的，而以为处处只见得人家受了我们的累。”^② 独立建国之后的朝鲜，并未摆脱“小中华”意识，而致力于反日复国的朝鲜抗战志士，也将中国看成他们避难、抗争的广阔腹地^③。总之，叙述华夏边缘的朝鲜英雄兄弟，是为镜照中华民族认同，并反映出学者王明珂谓之“民族心性”的“隐藏的景”^④。

王明珂以“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三种叙事结构来分析华夏历史。其中，“历史心性”是建构历史的核心理念，“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兄弟祖先历史心性”则是中华历史叙事的两个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4—78 页。

② 魏建功：《侨韩琐谈》，《魏建功文集》第 5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86 页。

③ 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 11 卷，第 111 页。

④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2—13 页。

核心范式。正是凭借“英雄兄弟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产生的历史叙事,诸夏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华夏空间。王明珂认为,这些历史叙事结构在现代已经失去效力,“最后还是由民族史以及语言学、民族学、体质学、考古学等等之新知,在主流观点上完成了近代中国的边缘再造”^①。不过,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历史叙事,依然依赖于营造新的“历史心性”。语言、种族、宗教等要素不是建构民族的决定性条件,“并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②,但是可以以之为素材想象民族共同体。晚清以降的中华民族主义叙事,对于“汉族英雄叙事”与“中华兄弟叙事”的强调,显然延续了两个主要的“历史心性”。晚清汉族革命党人建立的排满民族主义叙事,以种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营造出各种“汉族英雄系谱”,从而发明一个汉族主体的中国史。与此同时,梁启超则扬弃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述,提出了超越小民族主义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以中国境内诸民族为兄弟而组成一大中华民族^③。民国初建,革命党人从排满革命到五族共和的转变,同样也是用大民族主义取代小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的“汉族英雄叙事”是一种排他的种族民族主义叙事,而“大民族主义”的“中华兄弟叙事”则不免是一种现代帝国民族主义论述,二者实际上皆继承了中华传统历史叙事范式,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叙事的潜在结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亦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表征之下,潜藏着中华传统帝国叙事的“历史心性”,并与民族国家叙事构成对话关系。

与现代历史叙事重视塑造历史英雄系谱不同,现代文学中的英雄书写以反映现实人物为主。这也许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现代版本,现实民族英雄也是祖先英雄的当下表征,古典英雄神话转换为现代英雄神话。这不是抹杀民族主义实践的现实性,而是说像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等这些朝鲜烈士的壮举,必须在个人英雄实践之后的一系列历史叙事建构中,才能作为国族典范被铭刻并记忆下来。即通过小说、诗歌、纪念碑、祭祀日等文化再生产,让这些人物及其历史实践构成新的现代神话。朝鲜英雄之所以被认为是“我们”的英雄,一方面是因为中朝两国需要面对着共同的日本敌人,另一方面,根据“箕子奔朝鲜”的“英雄徙边记”神话,朝鲜本是华夏一脉,朝鲜志士流亡中国,亦不过是“英雄还乡记”,朝鲜民族是与中华我族分享共同的创伤、历史与光荣的兄弟。虽然中国和朝鲜今天是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宗藩关系、文化连带等情况的影响,导致双边关系中总是隐含遗留自中华帝国时代的政治无意识。特别是对于曾经作为东亚中心帝国的中国来说,虽然已经完成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在其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一直保存了无边的帝国想象,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中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④,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论述就是传统帝国意识结合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与朝鲜、日本等族群相对单纯的国家不同,脱胎于多民族天下帝国的现代中国,其民族主义意识其实兼具排他性与开放性。

①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19—186、204页。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73页。

③ 1903年,梁启超论述道:“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详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75—76页。

④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29页。

在王明珂的研究中,古典时代的“英雄兄弟”神话象征性地建构起中华认同的核心与外延,“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系大一统的华夏认同的表征,“兄弟祖先历史心性”则表征出华夏边缘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虽然是现代叙事,不过依然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帝国意识,朝鲜虽然被承认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独立身份,但是依然被投射了其作为华夏边缘—中国藩属的历史无意识,并具有依附于中华政治文化腹地的倾向。郭沫若的小说《牧羊哀话》非常直接地表征出朝鲜的“慕华”意识,至于各种文本对于中朝“兄弟之谊”的不断强调,亦不免带有以朝鲜为华夏边缘的立场。不过,“英雄兄弟”的历史心性作为“隐藏的景”,除却底定华夏中心与边缘的“大一统”认同之外,其中也存在被刻意忽略的“反一统、去中心”的“另类的杂音”,并对主流的华夏认同构成持续的挑战。如果华夏认同的确成型于春秋战国时代,并构成区别于外“夷狄胡戎”的“内华夏”,那么“内华夏”诸夏之间亦有不可忽略的区隔与对抗。特别是对于大国周边的诸小国而言,如何在合纵连横、臣服抵抗中避免为大国吞并,是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问题。

故此,“华夏兄弟”不仅是“共御外辱”的“兄弟怡怡”,也是“内争霸权”的“同室操戈”。于是,在建立起大一统华夏帝国的帝王英雄——秦皇汉武之外,亦有反抗帝国霸权的弱者英雄——如屈原、荆轲、高渐离等;在华夏帝王神话原型黄帝之外,也有对抗黄帝的炎帝、蚩尤神话。因此,在“华夏英雄兄弟祖先”的“历史心性”之中,不但存在着华夏一统的集体认同意识,也存在着以区域/地方/诸侯国为认同基础的华夏分离意识。特别是对于华夏边缘的区域/族群/藩国而言,承认或否认华夏身份,往往是根据现实功利需要作出的权益性调整。据此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在彼此认同之中,亦隐含彼此分离、区隔、对抗的倾向,这种状况也是一种范式化的“历史心性”的现代生产。各种文本中对于朝鲜英雄兄弟的“陌生化”再现,未必不是这个反帝国、反霸权、反中心化的“华夏历史心性”的现代文学表征。

从表层上看,朝鲜英雄的中国文学塑造是为召唤中华民族英雄并构成一个华夏兄弟联手共御外辱的共同体想象;而朝鲜历史上与中华王朝间的紧密联系、李氏朝鲜王朝的极端儒家化倾向、李氏朝鲜与明朝中国在“壬辰倭乱”中联合抗击日本的历史事实,以及中朝两国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作,无疑强化了这一个“英雄兄弟”想象的合历史性。与此同时,也可以从这些朝鲜英雄兄弟叙事中,抽象出“英雄兄弟祖先历史心性”的现代转化形式。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但意味着通过否定过去而表明自己空前的现代性,也需要通过继承过去而持续发明自己永恒本质,在历史叙事中创造中华民族的“英雄兄弟系谱”,并在民族主义斗争实践中再生“英雄兄弟典范”,自然是振兴国魂、再造国民的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疆拓土、构建天下帝国过程中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通过与现代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转换为中华民族主义意识的一部分,其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绝对性以及对外扩张的必要性,抗击外侮与对外扩张、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并构成了一种自我背反的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诸夏自主、多元共存的“兄弟祖先历史心性”亦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与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民族国际主义”理想。中国现代文学的朝鲜书写虽然游荡着帝国的幽灵,但是也并不缺少国际主义的精神。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威胁,除却以启蒙革命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外,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询唤建构民族国家也是必须达成的任务,发明民族

英雄历史系谱、塑造现代民族英雄典范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由中朝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关联,有关朝鲜英雄兄弟的文学书写得以不时出现。当然,这些文学也表征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范畴的国际主义立场,但是也依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倾向,并在总体上并未脱离中国视野。

余论 远东的曙光

1952年2月,郭沫若完成灯影剧《火烧纸老虎》。该剧以正在发生的朝鲜战争为背景,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情朝鲜人民正义战争,进而确立中国“抗美援朝”的道义合法性。该剧中,郭沫若结合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从历史上中朝两国的密切关系出发,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之邦”,“朝鲜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要保家卫国,我们要抗美援朝”,“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这不仅是救了朝鲜,不仅是救了远东”^①。在该诗剧中,朝鲜、中国、远东、世界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朝鲜是同心圆的中心。朝鲜兄弟的解放,不但关乎朝鲜自身的独立,连带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现代以来,朝鲜半岛成为远东火药桶,不同帝国霸权皆以之为跳板争夺远东霸权,朝鲜半岛事关世界局势、中国安全的地缘政治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未能终结。郭沫若的灯影剧《火烧纸老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抗美援朝”叙事,既接续了民国时代的民族国际主义立场,又在冷战境遇中建立起新的政治连带性,有关中朝兄弟之谊的叙事别有时代新意。当然,“兄弟之邦”的朝鲜想象固然合乎情理,但是也隐含难解的结构性矛盾:兄弟是手足,也是对手。兄弟邦国总是在连带性中纠结对抗性,在亲缘性中包含疏离性,中朝两国的现代国家主体意识,便生成于彼此亲疏交错的地缘政治纠葛中。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Brotherly Nation": Modern China's Imagination of North Korea

Han 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is repeatedly reflect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ommon needs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the imagination of a fraternal community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s been widely written about. The martyrs' spirit and heroic temperament of the North Korea brothers are the most eye-catching aspects. In fact, the creation of North Korea heroes is to summon Chinese heroes, the imagination of "a brotherly na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identit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ti-imperialist communi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mbodies a strong spirit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writings about North Korea by modern China constitute a literary landscap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anglement, ancient and modern interweaving. Of course, as far as brotherly counties are concerned, solidarity is always entangled in confrontation, and estrangement is always entailed in affinity. The modern national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China and North Korea is generated in this complex geopolitical entanglement.

Key words: North Korea; hero brother; Chinese historical mentality; Chinese nationalism; literary geoborderology

^① 郭沫若:《火烧纸老虎》,《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32页。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

——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李伟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的改编,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创作和关注的热点。编剧既要遵循小说原著的精神,又要勇于开拓和创新,让文学经典走近人们的当前生活,以满足不同年龄时段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由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拓展叙事时空、展现地域风貌、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民生形态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和现代化元素,从而有意地突破小说原著叙事时间的局限,拉近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文学原著的主题精神深入和延续于当下社会,继续发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该剧的成功价值所在。

关键词:《人生》;电视剧改编;《人生之路》;时代性;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2; I2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119-09

近年来,随着诸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涌现出一系列广受好评的热播剧作,如2015年毛卫宁执导的《平凡世界》、2017年刘进执导的《白鹿原》、2020年李少飞执导的《装台》、2022年李路执导的《人世间》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热潮,使得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2023年热播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根据路遥小说《人生》的部分内容改编,在尊重和再现经典文学原著精神的同时,也融入了电视剧改编的现代化元素,呈现出文学原著改编的时代性特征,彰显出从文学创作到影视改编的积极发展势态,引领了经典文学作品视觉媒介传播的新趋向。

一、融合社会改革大潮的时代性背景

电视剧《人生之路》在遵循小说《人生》主题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时代性背景,续写和展望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对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也进行了延续与拓展。该剧前20集基本再现和还原小说《人生》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后17集把主要人物的生活背景从农村转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子课题“百年乡村文化变迁对乡土小说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伟,女,江苏连云港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研究。

移到城市,续写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期待和未实现的人生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小说叙事的时空局限,拉近与当前社会的距离感,让经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走近人们的当下生活,拓宽了时代变迁背景下不同观众群体的多元审美视野,凸显电视剧改编文学经典作品的创新性原则。

其一,电视剧《人生之路》对小说原著改编最为特别之处,是在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下呈现一种展望式的叙事时空与人生追求状态。有研究者指出:“比较而言,小说叙事多以时间为线索结构全篇,空间的营造受制于时间因素,其历时性相当明显;而影视叙事作为固定单位时间内展示直观形象的艺术,其叙事往往是以空间形象的关系为链条,在空间的转换中实现时间的流动,具有共时性的特点。”^①小说《人生》中叙事时间基本是定格于1980年代,而电视剧扩大了叙事时空,从改革开放初期延续到经济化时代的新世纪,通过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主要人物追求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变化,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青年群体的奋斗状态,突显影视叙事的共时性。电视剧创作者改编文学作品,需在充分尊重原著的主题内涵和人文精神追求的同时,融合社会发展变迁时代背景下的审美意识,适当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开创和突破,“才能在迭代的过程中以多元化的创新表达打造出优秀作品”^②。

电视剧《人生之路》基本再现了小说《人生》中农村青年追求人生理想和信念,努力改变当前生存状态的主题精神。剧情前半部分大致忠实于原著内容,塑造了高加林、高双星、马栓等一群试图通过高考来改变人生命运的农家青年形象,表达了1980年代农村青年向往城市、走出农村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望。小说《人生》中开篇讲述高加林因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回到家中失落郁闷的情绪,加上暴雨来临之来的烦躁与阴沉背景的烘托,带给读者一种压抑和沉重之感。相对于此,电视剧《人生之路》开头却是一幅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乡村青年高加林和高双星骑着自行车奔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两人相约而行的赛车如同骏马飞驰、翻山越岭,另有刘巧珍驾驶拖拉机紧追不舍,整体给观众带来了陕北后生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剧中展现了1980年代特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二八杠自行车和四轮拖拉机以及陕北高原农村的生活场景,整体营造了欢快的叙事基调。由此可见,编剧和导演有意识地融合了特定年代的现代化元素,凸显其时代性特征,拉近了接受群体回忆性的审美视角。可以说,“电视剧使传统文学重新回到观众和读者的关注视野中,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和生长点”^③。

电视剧《人生之路》后半部分的故事情节,呈现出对小说原著中高加林人生结局的一个展望性续写。对此,总制片人魏巍以为,“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选择及个人精神,我们是带着时代回望的视角去创作剧版的,实际上是给《人生》做一个全传的续写”^④。路遥在小说《人生》中最后一章(并非结局)点明,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方式,也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相应的创作空间。虽然高加林再次丢掉工作回到乡村,但他不甘于留在农村生活的性格和信念,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进城谋

①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② 蔡骥、赵雪:《文学作品电视剧改编的迭代创新》,《中国电视》2023年第2期。

③ 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15页。

④ 李夏至:《〈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以时代回望视角为原著续写全传》,《北京日报》2023年4月4日,第8版。

生和发展的机会增多,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高加林是极有可能再次进驻城市重新谋求新的发展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让高加林的人生发生改变,从陕北来到上海,作家路遥也是通过读书和创作,脱离农村走向城市,因此这其中也带着作家自身励志经历的原型启发。高加林上大学名额被顶替后,先因校外事故导致民办教师职务被解聘,又因被举报痛失县委通讯干事职务,他被迫返回农村、面对昔日恋人巧珍已嫁他人的现实。经历三起三落的人生波折后,在老师景若虹的启发和引导下,高加林悟出自己人生数次起落的原因;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农民的他,立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寻找一条走出农村奔向更大世界的人生之路。

电视剧《人生之路》以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为聚焦点,以高加林的人生命运转变为叙事主线,把剧中主要人物都汇集于上海。高加林因文学创作获奖而前往上海领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留在了上海;黄亚萍跟着父亲调动工作返回上海,高双星因上大学而定居上海,巧珍和丈夫马栓为给孩子看病来到上海。编作和导演设计各种巧合,把生活在陕北高原的一群青年人,转移到大城市上海,继续演绎和追求他们的人生之路。由此引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背景下人们都有着追求和改变人生命运的观念,体现出当前电视剧创作彰显的新时代主题精神。新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成真的机会,都会有人生出彩的高光时刻。电视剧《人生之路》立足于小说原著中 1980 年代的社会背景,并延续和拓展到 21 世纪的新时代,增强了从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电视剧创作的现代意识与时代特征。

其二,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呈现和凸显社会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追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意识的变化。剧作再现了 1980 年代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域景观与农村生活的人情面貌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追寻的生活形态。在那个整体都不富裕的年代,农民一边在土地里辛勤劳作,一边期盼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脱离和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因此剧中的父辈农民高明楼、高玉德等,不辞劳苦全力支持子辈寻求更好的出路。尤其是高明楼,为让儿子高双星脱离农村走向城市,他通过走关系让高双星顶替高加林奔赴上海读大学,留在城市工作,娶妻生子,真正地变成城里人。这是高明楼作为父亲最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当然,这种望子成龙的行为背后却映照出人情的可悲和冷漠:父母花费一辈子心血培养儿子,却因农民与城市人的门第差距,连参加儿子婚礼的资格都没有,母亲到死都未见过上海的儿媳妇和孙子。这也反映了 1980 年代城乡差距悬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追求和向往城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此不同,巧珍和马栓是通过继承家庭传统手工生意寻找发家致富之路。巧珍的父亲刘立本善于经营小本生意,以做白粉丝送往县城小吃店养家;而马栓在高考失败后,回家继承父业以烧陶为生。由此,剧作反映出 1980 年代的社会现实:陕北农民在遵循传统土地为本生存原则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商品经济的波及和影响。

电视剧《人生之路》整体延续时代发展的脚步,让高加林等农村青年随着改革发展的大潮进入城市,展现出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大都市上海的人文精神面貌、城市的繁华和新潮、寻找和实现人生追求机会的多元化等。一方面,剧作围绕高双星来到上海读大学的故事线索,展现城乡文化差异以及城市人和农村人的隔阂感。高双星娶了上海本地媳妇,却受到岳母曲金娣的百般嫌弃和鄙视。她因女儿找了农村女婿而感到没面子,不仅抱怨高双星在出租房中结婚让自己女儿受委屈,甚至直接要求他不让自己父母来参加婚礼。但是高双星通过努力,取得事业成功,谋得更高职位,买了属于自己

的房子,且善待妻子和岳父母,最终得到曲金娣的认可,使她对这位农村女婿的态度从鄙视转变为真诚善待。当然,这体现了电视剧改编者有意对城乡关系的温情化处理。另一方面,通过高加林、刘巧珍进入城市的叙事线索,剧作展示了在社会发展前行中城市对于有志青年的接纳以及为有志青年提供的更好发展机会和更大发展空间。农村青年高加林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与时俱进的视野,最终立足上海并成为《大众晚报》的主编,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实现了人生理想。乡村女性刘巧珍因给女儿治病来到大城市上海,历经生活的艰难和几次创业失败的困境,最终以勤劳和坚韧开创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事业有成。

由此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努力寻找和开拓创作空间,抓住和结合了社会演变的时代性元素,推进叙事时空的共时性,符合接受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期待,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电视剧与观众审美之间的良性互动。可见,“电视剧改编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改编者们既依靠文学的审美经验选择和理解影视剧,更广泛地传播文学名著、有效地扩大文学思潮和运动的影响;而观众也并不会因此远离文学,而是通过电视剧改编发现新的文学世界,或重温曾经阅读的作品以验证自己的审美想象,提升自己的审美经验,感悟着文学和电视共同带来的精神给养和美的享受”^①。

二、追寻人生奋进励志的现代精神

电视剧《人生之路》彰显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人生成长的励志故事,颂扬现代青年追逐人生理想的坚定毅力,他们通过个体的不懈奋斗、自强不息与勇于攀登的精神,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实现了人生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影视作品的叙事问题包含微叙事、共叙事、大叙事三个层面,大叙事“和影视作品中的社会相关,即作品影射的社会背景到底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富有阶级,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作品所展示的是什么社会价值观念,倡导的是哪一种道德规范”^②。电视剧《人生之路》正是建构于电视剧创作的“大叙事”层面,试图以个体追寻的人生历程来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发展特征,即通过剧中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农村青年的人生追求,来展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道德追求的发展形态。

电视剧《人生之路》融合了时代发展的现代元素,塑造了一批追求更高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的现代青年人物形象,展现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奋进拼搏、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向往更大的外部世界,不甘固守农村生活,为了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寻找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他不惜放弃一心爱他的巧珍和在黄土地上劳作半生的父母,并认为这是他为脱离乡村必须付出的代价。小说中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关系,更多夹杂着关乎改变个人前途的功利性目的,而并非单纯的情感追求。正如作者所说:“现在,当黄亚萍向他表示了爱情,并准备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了。……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他

^① 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10页。

^② 郝朴宁:《影视剧作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权衡了一切以后,已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亚萍远走高飞了!”^①小说中的高加林选择了看似更有利于其个人发展的现实因素,但殊不知寻求依附于他人的捷径终归是走不长远的。在遭遇张克南母亲的报复后,他从“公家人”变回了农民,不仅失去了事业,也失去了巧珍的爱情,生活又回到了原点。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也因现实身份的改变而立即结束,等待他的又是不甘于面对现实人生的痛苦境地。可见小说中高加林的人生选择和性格中带有青年人的自负和浮躁,缺乏对现实的认知和生活的沉淀,沉湎于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难免会陷入脱离实际和抱怨命运不公的纠结中。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加林形象,在立足于原著的基础上,更多彰显农村青年立志改变自我命运的决心和勇气、信念和毅力。有学者认为,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应忠实于改编者对原著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著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②。电视剧塑造的高加林在不安于现状的同时,又有着一股不屈服于现实的韧劲。遭遇数次波折回到乡村后,他也曾感慨命运的不公,但是当老师景若虹带他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赵飞在失去双臂后仍然立志植树造林、发挥自我价值的感人事迹后,高加林备受鼓舞,决心通过文学创作来改变人生。如果说初入社会的高加林是浮躁的、急功近利的、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和生活现状的,那么在经历人生挫折和生活沉淀后的高加林,变得更加沉稳和勇于面对现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后,他脚踏实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作为记者的他,热情地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高加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于若干年后当黄亚萍让他一起出国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时,他能够冷静思考,觉得上海比国外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从而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道路。电视剧《人生之路》结合了时代发展的现代化元素,让小说中的高加林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到新时代发展的当下生活,让他通过个体努力走向更大的人生世界、实现了人生追求,从而给年轻的观众群体提供了积极的正能量引导。正如总制片人魏巍所说:“今天的年轻人身处一个蓬勃的、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年代。如果高加林在那种巨大痛苦中,仍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辉煌,那么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③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马栓、巧珍等勤劳奋进的农民青年形象同样彰显出新时代背景社会青年拼搏奋斗的时代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④这表明,奋斗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视剧《人生之路》紧跟时代精神,有意丰富和深化了马栓这个农村青年形象。在经历几次复读高考失败后,马栓回乡继承家业,成为当地有名的烧窑能手,走上发家致富的创业道路。马栓善良老实,勤劳能干,对巧珍的感情是真诚和平等的,在得知巧珍有自己的心上人时,非常尊重她的选择;但当得知巧珍被心上人高加林抛弃后,他又主动向巧珍表白,并在婚后始终与巧珍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生活幸福。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者准确把握和感知时代脉搏,颂扬了追寻人生理想、奋

① 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35—136页。

② 仲呈祥:《应当“忠实于”什么——略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中外电视》1990年10期。

③ 沈杰群:《专访〈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 时代“续写”高加林》,《中国青年报》2023年4月10日,第4版。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4—45页。

进励志的时代精神,真正做到“既要面对原作所负载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又要立足于自己所处的当代立场,站在当今时代的新的认识高度、认识水平和审美趣味上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①。

电视剧对农村女性巧珍的改编,更是凝聚传统和现代双重因素,凸显了人生奋进的现代精神。巧珍形象在保留乡村女性质朴的传统美德的同时,更多融合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现代特征。总制片人魏巍谈到:“我们认为中国女性不应该只有传统的隐忍包容的一面,她应该是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这也符合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女性的特征。”^②小说《人生》中的巧珍善良纯朴,对爱情无私奉献,总是以仰视的姿态崇拜和爱恋着高加林,有着不求回应的卑微和谦让,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她与高加林之间的差距。当高加林进城接触到现代女性黄亚萍后,很快便投入到新的恋情中,忘却了这位留在乡村照顾他父母的恋人;而巧珍只能无奈接受高加林的背叛,在心灰意冷中嫁给前来求婚的马栓。虽然小说把巧珍描述为一位凝聚真善美于一身、金子一样的好姑娘,但是仍然无法回避她作为乡村女性的卑微。她之所以被高加林抛弃,主要原因还是两人社会身份、人生追求的不对等,不管巧珍如何真诚、善良和美丽,都无法改变被抛弃的结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乡村女性巧珍,是一个融合了诸多现代观念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彰显出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洒脱个性。对此,总制片人魏巍说:“我们给刘巧珍赋予了陕北高原孕育出来的旺盛生命力、生命的韧性和活力,也赋予了她在社会大潮冲击下靠着自我奋斗在新时代立足、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③剧作开篇就是巧珍开着四轮拖拉机奔驰在陕北乡间小道上,她一直关注和爱慕着同村青年高加林,大胆示爱时表现得大方自信,意识到高加林喜欢看《大众电影》杂志上明星时髦的着装和发型后便主动去县城烫了头发,不惧成为全村瞩目的焦点。虽然备受父辈和村人的争议和批评,巧珍却为自己的大胆行为而感到骄傲。电视剧中,巧珍对于爱情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意识,喜欢高加林是因为他符合自己心中理想型对象的标准。她全心全意地支持男友所做的一切,但当高加林表明分手态度后,她虽痛苦,却也深刻领悟出:她与高加林根本就不是同道人,与马栓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因而巧珍真心实意地选择嫁给马栓,并在婚后一直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过上了富裕又幸福的生活。即便后来为了给孩子治病来到上海务工,巧珍仍然给予丈夫温暖的情感慰藉,让马栓深知他是个好男人和好丈夫并因一家三口能够相聚而感到满足。当马栓因车祸意外去世后,巧珍坚强地完成丈夫生前的心愿,不仅治好女儿的病、独立把女儿培养成人,还经过不懈坚持和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立足于上海。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巧珍形象,已经跨越了1980年代的时空限制,与新时代背景下现代乡村女性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并深刻融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因素。

对现代城市女性黄亚萍形象,电视剧《人生之路》给予温和化处理,使她突破了小说中的高干子女形象,彰显了其追求人生理想的积极态度。剧中的黄亚萍成长于经济条件良好的单亲家庭,父女

① 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77页。

② 李夏至:《〈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以时代回望视角为原著续写全传》,《北京日报》2023年4月4日,第8版。

③ 沈杰群:《专访〈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 时代“续写”高加林》,《中国青年报》2023年4月10日,第4版。

俩相依为命,但父亲长年身体不好,父亲的突然生病让她错过了高考,她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随调动工作的父亲返回上海后,她选择自己热爱的舞蹈事业,并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艺术。对于与高加林的爱情关系,编剧融合了诸多外在因素,凸显两人的真心相爱,但因陕北县城工作期间的诸多现实因素而在不得已中结束恋情;在上海相遇后,两人再续前缘。虽然黄亚萍最终选择出国深造和与母亲团聚,高加林选择留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两人没有走到一起,但是两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现代青年为事业和理想坚持自我原则、追求认同的人生道路的精神,集中体现了弘扬奋发进取精神的现代元素。

三、新时代演进中的社会民生形态

电视剧《人生之路》在遵循小说《人生》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有意地结合时代发展变迁背景,以人物叙事为主线,呈现出诸多不同社会时期引发关注的民生形态,体现出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改编,注重当下生活的时代性特征。剧作融合和反映出时代演进过程中高考改变命运、乡村教育、农民工进城、高考顶替事件、城乡互动与差异等社会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文本的叙事视野,深化了电视剧改编的现实意义,“给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扎实的心理逻辑,也正好对应年轻人的现实焦虑,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①。剧作呈现的历史年代感和社会演变的现代化,既唤起中老年观众对过往时代的历史记忆,又激起青年观众对当下社会民生问题的热切关注。

首先,呈现1980年代高考对于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性,并让这一话题延续到新时代背景下“高考”的社会意义。电视剧开端就给予观众一种紧张和悲壮的高考备战场景,从县政府对高考的高度重视到教育局马股长声嘶力竭地发表高考动员讲话、再到高考前夕考生笼罩于鲤鱼跃龙门的紧张情绪,都再现了高考对于社会青年改变人生的现实意义。编剧还从不同农村青年人物的视角,进一步展现出1980年代中国农村知识青年期待以高考来改变人生命运的社会现实及其重要意义。高加林把所有的希望和出路都寄托于高考,他定下的目标是必须考上大学,否则等待他的是回乡当农民。连续复读多年的马栓在预考中落榜,情绪几近崩溃,甚至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只能流浪街头,等待高考完毕后,再给父母交待高考的失利。高双星也备受父亲高明楼望子成龙的急切重压。当然,高考在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剧作选择高考为叙事开始,凝聚着前瞻性的改编视野,更多让观众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性价值。

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高考”是贯穿整个剧情发展的叙事主线,高加林和高双星因高考而改变了各自的人生命运。高加林因高考被顶替而回乡务农,历经种种波折和困境,感受到身为农民志在远方的无奈和无助,最终以坚强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高双星则在父亲高明楼的暗中操作下,顶替高加林来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上海安家立业后又考取研究生,调到教育局工作,转为国家公务员。可以说高双星人生的一切重大转变都是源于高考,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原本是属于高加林的。因此在与高加林共同参与的许小萍高考冒名顶替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① 李蕾、牛梦笛:《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五年来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述评》,《光明日报》2021年12月5日,第1版。

高双星经历了情绪和心灵的双重拷问。许小萍因高考被顶替而生活悲惨,虽然无法改变现状却仍然坚持为自己的人生讨公道、最终使顶替者受到应有惩罚的事实,让高双星深受感触,他担心自己偷来的美好人生随时可能面临毁灭,从而陷入后悔和崩溃的痛苦煎熬之中。可以说,电视剧《人生之路》以社会高度关注的高考话题开起叙事,又以高双星和父亲主动接受处分、重新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来结束叙事,以社会热门话题作为主线串联全剧,增加了电视剧叙事时空的共时性特征。

其次,以高加林高考“落榜”后做乡村民办教师的经历,再现了1980年代西部农村教育条件落后和师资薄弱的社会问题。高加林到马店小学做代课教师,发现小学教室极其简陋和破旧,几乎没有教学设施,桌椅全部由学生们从家中自带,甚至上课用的黑板都得临时搭建。师资方面,一位是马上就要退休、一心期盼转正的老教师周初心,对于农村教育的落后现状他早已习以为常;另一位是留守乡村、背着孩子的代课教师华晓娟,微薄的收入和困苦的生活让她无法继续坚守,因而决定进城与务工的丈夫团聚。面对这样的现状,高加林竭尽全力努力改善农村教育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孩子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最终却因在带学生到县城开阔眼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而错失转正机会和教师资格。剧中也展现了年轻教师高加林与老教师周初心对转正名额的争夺,反映了乡村民办教师转正的艰难,特别是奉献乡村教育事业老教师获取最后转正机会的不易。电视剧《人生之路》呈现的乡村教育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民办教师转正难等问题,正是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性问题。

再次,以高双星来到上海读大学的叙事线索,引出农民工进城务工遭遇拖欠工资和生存困境的民生问题。质朴老实的农村青年高双星来到城市读大学,很难适应与同学相处的校园生活;特别是原本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让他因囊中羞涩而在一次与同学聚餐时遭遇尴尬。幸亏同级新生陈秀礼借钱相助,并真诚地告诫上海物价高,尽量不去校外餐馆吃饭。为了挣生活费和还账,高双星来到老乡高双奎的工地做小工,通过深切接触,得知作为包工头的高双奎面临工程老板长期拖欠工资、陷入停工的生存困境。感受到农民工生活的艰难,高双星想方设法帮助老乡讨回工资,写了一篇反映农民工现实生存困境的文章,与陈秀礼共同商议投递给《社会焦点》。临近年关,因难言之隐无法回家过年的高双星,与因借钱负债发工资让农民工返乡过年、自己却不得不留在上海继续讨薪的高双奎相聚于工棚,却意外得知文章发表并引起社会相关部门的关注,从而帮助高双奎解决了讨薪问题。农民工进城大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民生形态,其工资和待遇问题也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更多结合时代演进的社会背景,关注不同时期的社会民生形态,延续经典文学作品精神内涵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性元素,增加电视剧改编的创新性和社会现实感。

当然,电视剧《人生之路》还彰显出新时代背景下城乡互动的温情化叙事格调。农村青年高加林来到上海后,面对大城市的热闹繁华与陌生,数次得到城市人的热心帮助和鼓励。到早点摊吃面结识摊主姚阿姨,她非常理解年轻人初到上海的窘迫,格外地关照高加林的日常生活。当高加林应聘报社工作,因没有固定的住所而留了姚阿姨小吃店的地址,并希望她帮忙留意接收信件。正当高加林由于太久等没有等到报社的回复而准备赶回老家时,姚阿姨却收到录取通知,一路追着高加林来到火车站,并将信件送到高加林的手中。如果没有姚阿姨的热心帮助,高加林很可能就此错失在报

社工作的机会。当然,高加林能够留在上海工作,得益于曾到陕北调研的大学生陈方明提供的招聘信息,并鼓励他积极应聘。高加林入职报社后,又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帮助和提携,并鼓励他参加成人大学,提升学历促进业务水平。这些热心人的友好行为,让农村青年高加林感受到城市的人情温暖。同样,农村青年刘巧珍为照顾孩子治病而留在上海做保姆,结识了付老太太,在相知和相处中产生如同亲人般的情感。付老太太的生活态度和认识眼界启发和鼓励巧珍开面馆创业,并在马栓去世后给予巧珍亲情的关照和心理的开导,成为巧珍在城市中的坚强依靠。

另外,电视剧《人生之路》对人性的自省意识也采取了温和化处理。高双星父子对高加林的忏悔和自省,主动投案自首接受法律惩罚;高加林对当年抛弃巧珍的心理愧疚,两人上海相聚轻松化解过往等等。当然,电视剧改编为了凸显时代主题,对于一些情节的处理难免存在理想化色彩,比如高双星通过发表一篇文章就解决了农民工的讨薪问题,高加林在《中国农民报》发表反映农村教育的文章引发巨大反响,但是关乎反响结果的落实并没有呈现,剧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电视剧《人生之路》延续和开拓了小说原著的叙事空间,突破 1980 年代人物生活故事的时间局限,围绕高加林的陕北农村生活和高双星读大学的城市生活双线叙事并行,最终汇集于上海,演绎着社会发展背景下农村青年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波折和困境,勇敢坚定地立志、追逐和奋进,从而拼搏出属于新时代青年的人生理想和志向。同时,剧作融合了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民生元素,彰显现代社会青年要勇于树立人生目标,向往和追求更高更远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总体来说,电视剧《人生之路》体现出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改编,在尊重路遥小说《人生》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现和阐释了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审美元素和现代人文精神,更好地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让文学经典的审美精神永流传。

责任编辑:潘文竹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aptation of Classic Literary Works: From *Life* as a Novel to *The Road of Life* as a TV Drama

Li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adaptation of classic literary works into TV drama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film and TV drama creation and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reenwriters have not only followed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novels, but also have been courageous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so that literary classics can be brought close to people's current lives and meet the aesthetic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TV drama *The Road of Life*, adapted from Lu Yao's novel *Life*, presents a background with a contemporary nature and a set of modern el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by expanding its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showcasing a regional style, shaping character images and reflecting social and livelihood forms. Thus, it has intentionally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narrative time of the original novel,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terary classic and modern life, allowing the them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to merge and continu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us exerting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literary classic. This is also the success and value of the drama.

Key words: *Life*; TV drama adaptation; *The Road of Life*; contemporariness; modernization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演变的理论机制 和路径选择

韩永辉 彭渤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经贸合作是中德关系的基石, 对中德双边关系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自 1972 年新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中德两国间经贸往来始终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自 2017 年起,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总额波动和投资结构不稳定的问题, 对中德经贸往来的平稳运行造成威胁。本文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研究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量与结构的演进机制, 以及中国吸引德国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 影响中德投资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德国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优势突出引致投资总额提高、中德双边关系重塑引发政府区位优势衰减、人力成本变化和投资结构转变引发的不稳定性风险加大。为此, 中国宜打出破除市场隐性壁垒、加强双边沟通合作、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促进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提质增效, 稳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助力中国建设贸易强国。

关键词: 德国; 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128-13

一、引言

德国^①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伙伴, 经贸关系是中德双边关系的“基石”, 中德双边经贸关系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伴随中国影响力的迅猛提升和德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中国和德国的经贸条件相较于过去出现了明显改变, 引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从快速增长到震荡波动的新形势。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和欧盟“轴心”之一^②, 中德经贸交往的阶段性转变必然影响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环境。中国有必要根据要素新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究”(21&ZD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永辉, 男, 广东佛山人, 经济学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产业经济研究; 彭渤扬, 男, 辽宁沈阳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欧洲学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

^① 本文提及的“德国”概念是指 1990 年前的联邦德国和 1990 年以后统一的德国。

^② 李青、韩永辉、张双钰:《德国政府经济角色转变的表现特征、动因分析和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以〈德国工业战略 2030〉》,《东方论坛》2022 年第 3 期。

化,把握德国投资新阶段的特征,优化调整中德合作的战略路径和协作模式,做出科学有效的路径选择。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制造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把握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与制造业发展的有机联系具有鲜明的导向意义。德国制造业水平全球领先,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演变,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进入新阶段以来,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特征从过去的持续增长转变为震荡波动,具体表现为投资项目数量的激增和回撤并存,中德双边经贸关系正在经历重塑过程。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体制差异、政治关系、外部冲击等方面就中德经贸往来的新变化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德两国经贸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两国存在体制差异和价值观分歧,意识形态等差异是导致德国重新界定中德经贸关系的主要因素^①。有观点认为中德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造成中德经贸往来出现裂痕的关键因素,中德两国的政治地缘相互靠近与经济地缘的让位是主要原因^②。一些研究认为,中德之间的经贸往来受到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干预,中美两国的关系恶化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中德双边经贸往来产生了负面影响^③。

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溯 50 余年来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演化情形,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解释框架,从可持续发展优势、政府区位因素、技术内部化需求三个方面入手,解释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新变化的原因,为中德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路径选择。

二、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特征性事实

自中德建交 50 余年来,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演化情形经历了三个阶段(如图 1)。从 1972 年到 2004 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投资总额在低位徘徊。从 2004 年到 2017 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投资总额大幅增加,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大幅提升,并日益呈现出高端化发展的特征。从 2017 年至今,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震荡波动阶段,具体表现为直接投资流量的激增和回撤并存。2017 年以后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体表现出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标志着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了新阶段。

① 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 50 年:成就、问题与前景》,《德国研究》2022 年第 6 期;熊炜:《失重的“压舱石”? 经贸合作的“赫希曼效应”分析——以德俄关系与中德关系为比较案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熊炜、姜昊:《“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 期;寇寇、史世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国际论坛》2021 年第 6 期;Yu J, Männlein M, Kroymann B, et al., "Deutschland und China: Investorenbeziehungen unter Komplexen Rahmenbedingunge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21: 261-270。

② 熊炜:《从“超脱”到“碰撞”:德国对华政策 50 年》,《欧洲研究》2022 年第 6 期;陈兆源:《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3 期。

③ 孙恪勤、侯冠华:《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国际展望》2020 年第 5 期;寇寇、史世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国际论坛》2021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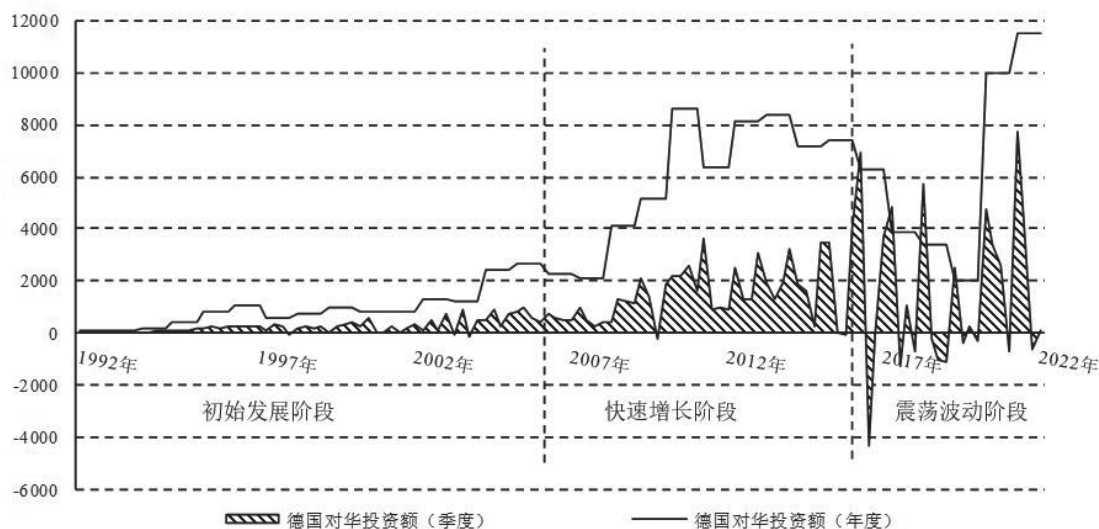


图1 1992—2022年德国对华季度/年度投资额(单位: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自行整理,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 访问日期:2023-08-11。

(一) 初始发展阶段: 投资总额低位徘徊, 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占据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潜力吸引着无数海外投资者,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演进。德国大众集团于1984年与上海三家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上海大众”,由此开启了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先河^①。1992年德国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投资流量也出现了提升^②,这一时期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不大,但中国的制度建设突飞猛进,为后续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德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投资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精良的机器设备,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③。

这一阶段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处于低位。由于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持观望态度,部分德国企业对公司知识产权问题存在担忧,中国国内产业链不完善,国内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无法满足德国企业的品牌需要,导致了投资总额相对较低。其次,两国政府对经贸关系缺乏重视。虽然科尔政府在1992年调整对华政策,并在1993年制定了以中国为重点的亚洲战略,但两国的相互接近以政治地缘的相互靠近为主,经贸往来并非中德两国的重点合作领域。最后,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德国制造业企业降低成本的需要,而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恰好与德国的需求相适配,因此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劳动力要素为驱动,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集中于产品生产环节,对产品研发的投资相对较少。

虽然在这一阶段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达成了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是由中国市场驱动,并以德国企业为主导的投资,两国政府层面缺乏相应的投资支持政策举措。同时由于刚刚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市场尚不能同国际接轨,在吸引和利用德国投资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面临法律法规、外汇平衡、知识产权等多重障碍。

① 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50年:成就、问题与前景》,《德国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毛蕴诗、B.N. 科玛(Kumar)、埃瑟琳(Ensslinger):《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5期。

③ 周利萍:《谱写中德合作新篇章——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述评》,《中国外资》1995年第6期。

(二) 快速增长阶段: 双边投资快速增长, 投资结构向资本密集产业过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日益凸显,且中德双方的政治往来逐渐密切,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也迎来了较大规模的增长。政治地缘的逐步靠近推动了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开展,2004年开始,中德两国在中欧全面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关系。2010年中德双方签署《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同意建立政府磋商机制。2014年中德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双方的政治地缘逐步靠近为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开展提供了助力,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额稳步上升,外交的良好互动推动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

这一阶段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显著增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为德国企业带来了投资新机遇,大量德国龙头企业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德国中小企业也开始布局中国市场,为龙头企业搭建完整产业链。德国企业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带动了投资总额的上升,2004年到2017年之间,德国对中国年均投资额从20亿欧元稳步上升至80亿欧元,并始终保持在60亿到80亿欧元之间小幅波动。其次,中德两国政治地缘逐步靠近。中德双边外交关系在这一阶段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施罗德执政期间多次公开称赞中国扮演的日益重要的国际角色,并对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寄予厚望,在中德双方的努力下,中国自2002年起成为德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在科技、投资各方面的合作全面深入发展。默克尔执政的第一个任期意图改变德国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中德双边关系出现了疏离,但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默克尔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国对德国和欧洲的重要意义,德国政府对中国态度出现了重新调整,两国关系更加紧密^①。中德两国政治地缘的相互接近为两国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助力,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机遇。最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共同发展。随着中国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完善,加之德国中小企业为龙头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原材料补充,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在上一阶段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两个领域的投资额快速增加,推动了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提升。

这一时期中德两国的政治地缘开始相互靠近,两国之间的良好外交互动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经营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通过构建并完善符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提升了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这一时期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额较上一时期有较大提升,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相对稳定,两国之间的投资往来从过去的企业主导转变为政企联合驱动。

(三) 震荡波动阶段: 投资总额起伏不定, 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大量迁出

大国博弈程度日益加深,德国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方针发生改变,直接投资流量出现震荡波动的态势。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始,德国也受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自2017年开始,德国政治家便不断提出“中国是德国的威胁”的言论。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执政之初发表了著名的“时代转折”(Die Zeitenwende)演讲,开始调整德国对华政策。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提升引发了德国对中国的恐慌^②,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相继爆发也使全球经贸受

① 熊炜:《从“超脱”到“碰撞”:德国对华政策50年》,《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Matthes J., "China-Abhängigkeit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Mit Volldampf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IW-Kurzberichte*, 2022, No.68: 1-3.

到严重冲击,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受到了负面影响。中德经贸关系也遭受打击,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虽始终保持上升态势,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了较多次回撤。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投资订单回撤增加、投资总额震荡上升的现象。这一阶段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出三个特点。

首先,投资总额先降后升,制造业投资占比增加。进入2017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下降,投资订单出现了大量回撤,直到2020年后,投资总额才重新回归高位。德国制造业行业直接投资占比呈上升趋势,制造业行业直接投资占全行业比重始终保持在60%左右,制造业投资额占全行业投资总额比重有所提升。德国在华投资多为生产型项目,投资金额较大,技术含量较高^①。德国制造业龙头企业西门子集团、拜耳化工集团、巴斯夫化工集团、汉高集团、大众汽车集团、戴姆勒和德固赛等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增长显著。2022年,英飞凌、大众汽车、戴姆勒等德国制造业龙头企业的中国市场份额约占30%,在市场份额占比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7家属于制造业企业。总体而言,虽然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流量出现了震荡波动的新变化,但德国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积极向好,中国市场对德国制造业企业仍有较大的吸引力。

表1 2011—2021年德国在中国制造业投资总量及增长率

单位:百万欧元

年份	对中国全行业投资额		对中国制造业投资额		投资比重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2011	37870	30.7%	21750	37.7%	57.4%
2012	42609	12.5%	24531	12.8%	57.6%
2013	48147	13%	28266	15.2%	58.7%
2014	63125	31.1%	39021	38%	61.8%
2015	71518	13.3%	44271	13.5%	61.9%
2016	76529	7%	47135	6.5%	61.6%
2017	81610	6.6%	51496	9.3%	63.1%
2018	88348	8.3%	56967	10.6%	64.5%
2019	89923	1.8%	55572	-2.4%	61.8%
2020	92096	2.4%	55901	0.6%	60.7%
2021	102694	11.5%	61513	10.1%	59.9%

数据来源:根据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统计数据整理, <https://www.bundesbank.de/dynamic/action/de/statistiken/zeitreihen-datenbanken/>,访问时间:2023-08-11。

第二,中德双边关系经历重塑,两国经贸关系受政治关系影响出现波动。德国在经济领域同中国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引发了国内的普遍担忧,部分德国政治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应与中国脱钩^②。德国外长、绿党联席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认为,德国不应将其经济命脉同中国相绑定;德国气候和经济事务部部长、绿党联席主席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认为,德国应当减少对中国能源、半导体和电池等行业的依赖。德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德国经济学界认为,过分渲染与中国脱钩的观点并不符合德国自身的利益,尤其在俄乌冲突引发能源危机的背景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德国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2/1/1,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

^② Jürgen M., "Die europäische Handelspolitik und China: Schritte zu einer neuen Balance mit fairem Wettbewerb", *IW-Analyse*, 2020, No.138: 1-81.

下,中国的能源价格和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为德国企业的经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德国龙头企业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对中国市场的态度,2022年11月,朔尔茨率12家企业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体现了德国商界对中国市场仍充满信心。德国对华关系呈现出左右摇摆的倾向,但德国对华外交政策并未对中德双方的经贸往来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仍看好中国市场,但由于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减少德国对华经济依赖,德国企业扩大在中国投资或将遭遇一定阻碍。

第三,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减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增加。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看,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结构与过去相比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劳动密集型投资逐渐撤出中国市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出现较大规模的增长。从2010年到2021年,德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总体上涨了289.4%,其中汽车产业增幅最大,达到了460.4%,化工、机械、电气设备等高端制造业产业投资额均有较大涨幅。高技术产业外资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和德国高端制造业企业加大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力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022年,德国化工企业巨头巴斯夫集团主席、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örg Wuttke)在采访中称,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市场无法被替代,该集团在湛江的项目也明确提出加速双方的合作,将在2030年投资100亿欧元建设湛江一体化基地。宝马集团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也于2022年正式开业,项目共计投入150亿元。德国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对中国投资总额的增加,对中国的制造业向高端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中高端发展阶段,德国高端制造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为中国制造业高端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遇。同时德国企业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入也有显著增加,具体表现为对华研发项目投资显著增多。大量德国制造业企业在中国市场布局研发部门,加大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力度,增加研发资金投入。根据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2/2023》,德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用于生产设施和研发,其中50%的企业将投资用于新的生产设施,另有41%的企业将投资用于研发^①。

表2 2010—2021年德国在华制造业领域投资行业分布

单位:百万欧元					
年份	总体	化工	电气设备	机械	汽车
2010	15796	1876	3139	2192	6544
2011	21750	2649	3478	2839	10011
2012	24531	2708	3933	3092	11576
2013	28266	3394	4318	3430	13889
2014	39021	4302	9108	3822	17930
2015	44271	5361	10135	4000	20389
2016	47135	5389	7978	4122	25142
2017	51496	5141	7148	4041	29892
2018	56967	6441	7228	3760	33634
2019	55572	6336	6108	4035	32892
2020	55901	*	4924	4698	33751
2021	61513	*	*	5066	36674
2010—2021年增幅	289.4%	237.8%**	56.9%	131.1%	460.4%

数据来源:根据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统计数据整理, <https://www.bundesbank.de/dynamic/action/de/statistiken/zeitreihen-datenbanken/>,访问时间:2023-08-11;(*)表示未披露数据和缺失数据;(**)表示至最近年份的增幅。

^① 中国德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2/2023》,2023/12/15, <https://china.ahk.de/cn/rocky-roads-ahead-business-confidence-of-german-companies-in-china-reached-a-historic-low>.

三、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演变的理论机制演绎

(一) 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外投资则是企业跨越国界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认为,企业需要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具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①。以往的直接投资理论都只是从某个角度对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片面的解读,OLI理论解决了以往直接投资理论中存在的片面问题,利用折衷理论将有关理论综合起来解释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并认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随着诸多社会性问题日益突出,对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ESG)的关注逐渐成为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参考^②,完善的可持续化发展技术和战略逐渐成为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的外交关系对所有权优势形成了补充。在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将研发环节内部化,以减少因外部市场不完全而导致的核心竞争力丧失。

新的社会问题催化社会出现新变化,进而导致企业在开展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出现全新的考虑,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化,OLI理论在解释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时存在一定困难。本文通过对现实情境和理论的分析,在OLI理论上引入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投资国和东道国外交关系、研发内部化优势三方面因素,并将其纳入OLI理论,分别对OLI理论的所有权特定优势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内部化优势理论形成补充,丰富了对外投资理论,为解释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的变化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

1. 可持续发展技术和声誉成为企业所有权新优势

可持续发展引致的社会责任要求重塑企业的生产经营理念,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流,企业的经营从过去以牺牲环境为理由的无限制追求利润,调整为在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有节制的获取利润^③。企业生产经营理念的改变导致跨国公司在关键技术竞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可持续发展技术和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将更易在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具体而言,跨国企业通过完善对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关注度,提升对能源的利用效率,掌握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工艺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合法性问题,围绕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形成的源自社会责任的内生制度优势,有助于企业嵌入东道国价值链^④。同时跨国企业ESG表现也将为企业提供声誉价值,并随着消费者和股东对ESG的追求而为企业增加无形资产优势,助力企业提升自身形象和品牌信誉,有助于助力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⑤。

① John 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88, 3(1): 21-66.

② 谢红军、吕雪:《负责任的投资: ESG与中国OFDI》,《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③ 谢红军、吕雪:《负责任的投资: ESG与中国OFDI》,《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④ Bryan H., David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838-849.

⑤ Caroline F., "Doe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os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rade Lib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0(36): 1469-1485.

2. 投资国和东道国外交关系成为区位因素新考量

逆全球化浪潮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遭遇理论困境,国家间经贸往来不再以利润作为考量,多国出于国家安全问题强势干预本国企业在他国的投资经营,在国际经贸问题中增加政治因素的干预,造成企业在开展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新区位优势考量。在企业的经营选择中,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政治互动程度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重点考虑的因素^①,东道国同投资国开展良性的外交互动将有利于为投资国企业提供更有利于其发展的营商环境和政策优势,确保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得到后者的支持,有利于保护投资国企业的经营利润,减少投资争端。反之,若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政治互动相对缺乏,或出于历史原因,东道国同投资国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则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将面临制度挑战、政策歧视、民族主义情绪和资产被没收的威胁^②,将不利于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和生产,增加投资争端。

3. 研发内部化成为跨国公司内部化战略的新选择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愈发频繁,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不断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选择。其中,研发环节内部化成为了跨国公司内部化战略的新选择。研发内部化是指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直接在东道国开展,从而实现对技术、人才和市场信息的内部化。采取这种战略的原因在于,技术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又受到地域、文化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将研发活动内部化,可以有效掌握当地的市场信息和人才资源,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同时避免技术外流和知识产权纠纷。同时,研发内部化还可以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升级,通过与东道国科研机构 and 高校开展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应用范围,从而更好的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为企业提升在东道国的竞争力提供优势。

(二) 理论分析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从稳定增长到震荡波动的三个阶段。进入新阶段以来,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依托上文的理论创新基础,结合可持续发展所有权优势、东道国政府区位优势、企业技术研发内部化优势三个角度,探究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新阶段的投资机制,对研判德国未来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可持续发展所有权优势凸显,对华制造业投资总额显著提升

德国制造业行业在世界范围内极负盛誉,企业所有权优势凸显。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德国制造业企业具有技术垄断优势,更易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德国企业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方面,推动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提升。

第一,德国企业在有形资产方面具有技术优势。德国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制造业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为德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推动了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有形资产优势显著提升。2011年,德国制定“工业4.0”产业政策,积极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经过几年的发展,德国制造业企业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资本回报率获得了显著上涨,在德国所

^① Chris W., "Deducing a State-of-the-Art Presentation of the Eclectic Paradigm from Fou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2020,70(1): 51-96.

^② Jason L., Tamara S., Anne V., Joanna J.,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Denmark: Testing the Eclectic Framework and Internalization Theory",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3, 21(1): 65-86.

有“工业 4.0”相关行业中,硬件解决方案增长了 14% 以上,软件解决方案增长了 23%,IT 服务增长了 22%^①。在“工业 4.0”的框架下,德国政府、州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大型企业设置了高科技创业基金,对制造业企业的研发给予风险投资支持,创新资金的增加为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提供了支持,提高了制造业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以“工业 4.0”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化战略的成功实施,使德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产业智能化改造的领头兵^②,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有形资产优势凸显。德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 2030》制造业产业政策,对重点工业领域进行针对性扶植,提高德国工业企业产值,该政策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制造业企业,大力支持突破性创新活动,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德国工业的整体竞争力^③。德国《国家工业战略 2030》政策将进一步提升德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将为德国制造业企业创造更大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助力德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德国产业政策的精确制定和成功实施为德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发展条件,有效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制造业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从而确保了制造业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技术垄断优势。随着德国制造业行业的不断升级,德国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展数字化转型,凭借德国制造业企业的先天优势,德国企业抢抓生产力转型的新增长点,以其技术垄断优势实现了在华直接投资额的大幅提升。

第二,德国企业的无形资产方面具有品牌效应。德国企业的无形资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高质量”为特征的品牌效应。“德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行业的闪亮品牌,由德国生产的产品经常被打上质量上乘的标签。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世界 500 强品牌榜单》显示,上榜的德国制造业企业以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大众、奥迪、保时捷、博世等传统汽车制造品牌为主,在制造业品牌中,德国企业具有较为充裕的历史积累^④。德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品牌效应也为德国品牌带来了更多的积极影响,提升了“德国制造”的知名度,部分德国中小企业也因此收益。德国制造业企业的品牌效应属于德国企业的无形资产优势,在同类商品竞争中,德国制造业品牌可以依靠其制造业品牌效应在商品竞争中获得领先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对德国生产的优质制造业产品需求也与日俱增,德国制造业依靠其无形资产优势可以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吸引了大量德国制造业企业对中国开展直接投资。

第三,德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成就突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推动助力企业有形技术优势的凸显。同时投资者和消费者对 ESG 的追求也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⑤,推动企业树立起负责任的形象和良好的声誉,缓解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资本约束难题,促进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⑥。德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起步较早,具有较好的

① 王罗汉、王伟楠:《德国工业 4.0 近十年的进展评估及启示》,《现代国企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② 王德显:《德国工业 4.0 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启示》,《税务与经济》2016 年第 1 期。

③ Schnellenbach J., Schwuchow S., "Die Nationale Industriestrategie 2030: Eine kritische Diskussion", *ORDO. Jahrbuch für die Ordnung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019, 70(1): 340-371.

④ 薛君、许雷鑫、张利:《数字经济下制造业升级的德国模式及借鉴》,《宏观经济管理》2023 年第 4 期。

⑤ Caroline F., "Doe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os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rade Lib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10): 1469-1485.

⑥ 谢红军、吕雪:《负责任的国际投资: ESG 与中国 OFDI》,《经济研究》2022 年第 3 期。

可持续发展基础,企业 ESG 政策法规相对完善,在推动私营企业落实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也更为有力。中国积极开展同德国制造业企业在绿色可持续技术领域的合作,德国朗盛集团电动汽车和循环经济总监表示,朗盛集团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构建以绿色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推进原材料和生产环节的低碳化转型。德国西马克集团首席执行官表示,西马克集团正在利用其在减碳生产和循环经济领域的技术,助力绿色中国建设。德国企业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技术领域受到中国的青睐,推动了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提升。

2. 政府区位优势正在经历重塑,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热情遭平抑

传统区位优势优化是德国对中国开展直接投资的关键考虑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区位优势积极向好发展,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市场潜力、政策环境等区位优势的提升助推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力度,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扩大生产。然而不同企业所需的区位各不相同,中国的区位优势变化对不同产业的企业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影响,致使一些企业因成本提高而退出中国市场。同时,由于政府区位因素的改变也使得部分企业在客观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退出中国市场。

第一,中国营商环境加速优化。中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政府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吸引德国企业对中国开展直接投资的关键。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显著,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从 2013 年的第 96 位提升到 2020 年的第 31 位,营商环境位次高于许多欧盟成员国,如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吸引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关键所在。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实行制度性开放,以积极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正在加快在多领域放宽对外商准入的限制,2019 年,中国通过用“外商投资法”替代原有的“外资三法”,破除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壁垒,为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第二,中国劳动力向高端转型。中国劳动力结构性变化也导致了德国企业投资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结构出现了由过去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且劳动力素质偏低向劳动力价格适中且劳动力素质提升的转变。对于德国制造业企业而言,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显著提升有助于其更好适应德国高端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生产和研发劳动工作,德国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第三,中国技术型劳动力成本提升。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一直以其低成本劳动力吸引着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例如,德国服装品牌阿迪达斯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生产成本走高,将生产线从中国迁至越南。德国玩具生产企业 Autec 也因为成本问题不得不将生产转移至德国本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中国区位优势变化的体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升导致了部分德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退出中国市场,从而导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发生改变。

第四,中德双边关系变化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发生改变。德国企业在开展投资的过程中,受到了政府区位因素变化的影响,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提出了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德国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在地缘战略上开始遏制中国。德国认为,中国在德国开展的直接投资对其国内的安全

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以此为由提出了中国是“体制对手”的定位^①,而对中国的身份界定进一步影响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政府和舆论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对关系让德国企业感受到了在中国投资的“危险”,部分企业出于政治区位因素而中断了在华的投资。德国车企欧宝于2022年宣布暂时搁置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同美国和欧盟间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欧宝难以进入全球最大的销售地区,因此欧宝母公司Stellantis的负责人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 Tavares)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决定暂停欧宝在中国市场的商业计划^②。

3. 产业投资结构出现全新调整,德国对华投资额下行风险陡增

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导致德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转移至其他国家,进而导致总额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德国制造业企业为寻求内部化优势,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总额,研发投资成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产业投资结构的全新调整引致了投资总额的下行,进而为投资带来一定风险。

第一,德国企业通过内部化减少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影响。进入新阶段以来,国际产品要素市场不完全性日趋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物流成本和能源成本的飙升。德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物流受阻和能源成本的飙升对德国制造业企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大大增加了德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德国制造业产品丧失价格优势。为此,德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对中国开展直接投资,在中国投资建厂,将企业生产环节内部化,利用中国的物流网络和供应链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依靠中国相对廉价的能源,进一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德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优势。

第二,德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内部化保存技术优势。科技创新是制造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由于在外部市场交易技术这种中间产品存在技术泄密的风险^③,投资国企业选择将研发部门转移至东道国,将企业的研发环节内部化,从而保障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了减少国际市场不完全性对德国企业的影响,保护自身技术领先优势,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德国制造业企业纷纷在华布局研发机构,将涉及技术的生产活动控制在企业内部完成,从而降低企业在中国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同时减少了与外部企业进行交易获取技术的诸多交易费用,减少市场不完全性对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研发投资存在一定风险,企业开展研发投资或面临研发失败带来的投资资金损失风险,研发投资的投入产出相对较低,短期内无法有明显的投资成效,或将挫伤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导致投资总额的进一步下降。

① Görg H., "Ausländ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 - die große Angst vor China",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2019, 68(1): 28-35.

② Tagesschau, "Opel legt Expansion nach China auf Eis", 2022/9/16,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opel-stoppt-china-expansion-101.html>.

③ Xiangdong C., Guido R.,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Investment of German Firms in China", *Technovation*, 2006, 26(3): 407-415.

四、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演变宜采取的路径选择

德国对中国投资领域与中国未来行业发展高度互补,中德两国经贸关系具有互利共赢、合作竞争并存以及引领中欧经贸合作的特点^①。德国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宜根据德国直接投资的特点,科学制定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以稳定中德政治关系、优化德资营商环境、打破市场隐性壁垒,吸引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一)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协同共建标准化体系

完善外商投资规章制度,破除外资企业入市隐性准入壁垒。继续清理不符合外商投资法的有关规章制度,及时修订依据原“外资三法”制定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废止无法律依据的特殊管理制度,为外商直接投资营造开放包容互惠的制度环境。完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制度,规范告知性备案程序。继续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和细化相关特别管理措施,提高负面清单的精准度。建立科学的外商投资认定标准,明确外商间接投资的种类、投资新建项目的具体涵义。通过健全相关市场准入法律法规,降低德资准入门槛,拓宽德国企业的投资领域。

鼓励中德资企业共建标准化体系,促进中国行业标准的国际化。推动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相结合,鼓励德企同中资企业共建标准化体系。紧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需求,适时推动对德标准化合作,邀请德国高校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中国标准化战略制定,不断完善国家计量体系。促进德资企业公平参与中国标准化工作,积极开展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制造业标准化试点工作,进一步发挥标准的示范引领效应,以重点领域标准化项目带动中德产业发展。鼓励德国制造业企业同中国共建标准化体系,推动中国制造业标准化迈上新台阶,倒逼国内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二)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

中国政府需充分利用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加快对德国制造业企业实施“引进来”战略^②。进入新阶段以来,德国对中国经贸领域呈现出合作和遏制并存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对中德经贸关系的界定。一方面,由于产业竞争、高技术领域博弈、地缘政治博弈、俄乌冲突等原因,德国政府在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抵触的态度。朔尔茨政府执政期间将中国视为体制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的做法,对中德两国的经贸往来和中德政治关系造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德国制造业企业对中国投资热情度有明显提升,制造业企业积极开展投资,扩大在中国的产品生产规模,对中国市场的信任度也有明显提升。

中德双方应当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关系,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沟通 and 交流,积极主动化解经贸合作中的摩擦,加快形成协调解决贸易纠纷机制,提升两国之间的互信。双方政府和企业宜继续依托于双边高级别对话等重要合作沟通机制,积极探索更多人文交流的交汇点,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以民间交流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建立

① 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 50 年:成就、问题与前景》,《德国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② 韩永辉、麦炜坤、王贤彬等:《稳健外交关系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双边联合声明公报签订的证据》,《国际经贸探索》2022 年第 5 期。

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秩序,巩固和加深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中德两国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将“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鼓励双方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以项目建设助力中德经贸发展。

(三)优化外商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项目中,严格禁止根据企业性质、所在地对供应商设置不合理条件或歧视性要求,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在制定标准过程中,除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情况外,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制定各种标准。制定外资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相关办法,支持有条件的外资企业申请国家科技计划、科技创新重点课题,参与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建立市场公平竞争制度,为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条件。

健全外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重振德企对中国投资信心。保障德商投资企业依法公平利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同等享受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和快速维权等服务,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简化数字资源版权保护的行政流程和司法效率,明确和细化滥用认定标准,健全相应的惩戒制度和信息监控机制,建立相对完善的处罚程序保护体系,进一步提高行政保护效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加大对技术、发明、商业秘密保护力度。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ath Choice of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n Yonghui Peng Boya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bilateral rel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1972,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m have always maintained a momentum of steady growth. Since 2017,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but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issues related to fluctuating total investment and an unstable investment structure, which poses a threat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Sino-Germa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ompromise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total amoun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DI in China and China's path choice of attracting German FDI.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in total investment due to the outstan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attenu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location advantage because of the reshaping of Sino-German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instability risk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of labor cos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ment structur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nvestment change in the new stage. To this end, China should break down hidden market barriers, strengthen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teadily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help China build itself into a trade power.

Key words: Germany; manufactur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rade-off theory; path choice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研究

王娟 张翔 李燕

广西大学 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外资进入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基于2005—2019年24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政府效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独资型FDI显著促进了地方政府效率提升,而合资型FDI不显著;独资型FDI对地方政府效率具有正面空间溢出效应,而合资型FDI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环境下两类FDI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不同;门槛回归显示,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门槛值时,两类FDI均对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由负转正。文章澄清了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理,对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来提升地方政府效率提供了思路借鉴。

关键词: 独资型FDI; 合资型FDI; 地方政府效率

中图分类号: F832.6;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1-0141-16

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给予了较多关注,并在工作报告中多次阐述了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虽然目前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达成了较多共识,但是关于FDI对东道国非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近些年来,随着FDI对主权国家影响的不断加深,围绕FDI如何影响东道国政府治理的文献研究也随之增加。不少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不仅会导致东道国产权体系变革^①和经济制度变迁^②,而且对东道国政府效率具有促进作用^③。但也有学者指出,外资可能利用贿赂手段进入被保护领域从而加剧东道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壁垒研究”(17BGJ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娟,女,陕西西安人,管理学博士,广西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研究;张翔,男,江西上饶人,广西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研究;李燕(通讯作者),女,广西钦州人,广西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研究。

① Pomfret R, Kamath S.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Comment on Kama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4, 42(2): 413-418.

② Chuck C.Y. K., Tadesse S., "The MNC as an Agent of Change for Host-Country Institutions: FDI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767-785.

③ 刘畅:《基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变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9期。

国腐败程度^①,以及给东道国政府效率带来负面影响^②。本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较大意见分歧,除了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以及人文地理等因素有关之外,既有研究相对忽略了外资进入模式的异质性。外资进入模式不同不仅意味着股权结构^③和技术创新能力^④不同,而且意味着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主体和谈判结构不同^⑤,这说明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东道国政府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持续吸引外资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外资进入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为重新探讨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7 年进入我国的 FDI 总计为 452.57 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股份制与合作开发分别占 35.77%、43.08%、19.73%、0.64% 和 0.79%。至 2019 年,我国 FDI 规模达到 1381.35 亿美元,相应比例调整为 67.77%、23.01%、0.24%、5.85% 和 1.22%,外商来华投资独资化倾向愈发明显。因此,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并据此给予相应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政府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制度变迁领域,认为外资进入促进了东道国产权保护和经济制度变迁^⑥。随着外资进入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东道国政府对财产权和契约制度的重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的非经济效应被给予了较多关注。不少研究发现,东道国政府对于外商投资者而言并不是完全外生的,而是一种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表现为多领域的博弈和讨价还价行为^⑦。在与外资谈判过程中,东道国政府也能从与跨国公司交往中受益,逐渐变革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⑧。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 FDI 是影响东道国政府的重要渠道,但迄今为止在 FDI 对东道国政府的影响层面,学术界一直存在“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争论,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一方面,Wayne 和 Gray 察觉到外资进入东道国后,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往往不会像本土企业

① Malesky E.J., Gueorguiev D.D., Jensen N.M.,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59(2): 419-439.

② 祁毓、郭均均:《FDI 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③ 李维安、李宝权:《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成因分析:基于股权结构战略的视角》,《管理世界》2003 年第 1 期。

④ 刘斌斌、李梅羲子:《政府质量、FDI 进入方式与区域技术创新》,《经济问题》2022 年第 12 期。

⑤ 张永军、郑少锋、谢毅:《外商投资方式变迁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张蕾、李晖:《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进入模式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⑥ Pomfret R, Kamath S.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Comment on Kama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4, 42(2): 413-418; 王雷、韦海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制度变迁》,《财经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⑦ 柴正猛、张岩贵:《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多阶段正和博弈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3 年第 5 期;陈利霞、刘守亮:《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论析》,《山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 9 期。

⑧ 傅家荣、罗海石:《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治理的影响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5 期。

那样习惯于向东道国政府支付贿赂等额外费用^①。Kwok 和 Tadesse 也发现外资进入会减少东道国的腐败程度,以及来自母国和国际商务界的规制压力效应、给当地商业实践带来的溢出或示范效应以及在国际商务实践中年轻一代带来的专业化效应则是其主要路径^②。刘畅通过构造一个三主体模型来解释跨国公司如何推动中国地方政府的效率变革,并认为跨国公司通过积极争取外资优惠政策、投资区位选择和本土化战略对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③。黄玖立等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总体上有利于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④。而另一方面,Hellman 等研究了外商投资者与转型国家治理的关系,发现外资企业为维护其比较优势会采取各种形式的贿赂行为^⑤。Malesky 等基于越南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管制领域进行行贿以获取租金^⑥。杨艳红和卢现祥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发现,FDI 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⑦。祁毓和郭均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认为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与外商接触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吸收其有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的缘故^⑧。

综合上述文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 FDI 与东道国政府腐败、政府规模以及政府效率等关系,但存在一些观点分歧,且相关文献鲜有关注到外资进入模式的异质性。由于不同外资进入模式在控股权及资产专用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独资型 FDI 与合资型 FDI 在交易成本、技术禀赋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东道国政府管理效率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缺乏关于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的讨论。

(二) 研究假说

随着博弈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FDI 对东道国政府的影响也被解释为外商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相互博弈和讨价还价的结果。外资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包括拥有强大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以及来自母国的支持等,也被视为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筹码^⑨。考虑到不同进入模式 FDI 在技术禀赋、管理制度以及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不同^⑩,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可

① Sandholtz W, Gray M.M.,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3, 57(4): 761-800.

② Kwok C.C.Y., Tadesse S., "The MNC as an Agent of Change for Host-Country Institutions: FDI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767-785.

③ 刘畅:《基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变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9期。

④ 黄玖立、房帅、冼国明:《外资进入与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6期。

⑤ Hellman J. S., Jones G., Kaufmann D., "Far From Home: Do Foreign Investors Import Higher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Development and Comp Systems*, 2003, 2(2): 373-402.

⑥ Malesky E. J., Gueorguiev D. D., Jensen N. M.,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59(2): 419-439.

⑦ 杨艳红、卢现祥:《外资开放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⑧ 祁毓、郭均均:《FDI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⑨ 柴正猛、张岩贵:《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多阶段正和博弈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易志高:《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间的竞合博弈分析》,《唯实》2007年第5期。

⑩ 刘兴亚、李湘宁、缪仕国等:《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与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分析》,《金融研究》2009年第3期;王进猛、沈志渔:《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化改善了绩效吗?——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11年第3期;卢汉林:《国际投资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能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

首先,从交易成本或者谈判成本角度。合资型 FDI 交易治理结构涉及内资企业、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一个合资项目的形成和运行涉及到多个交易环节和交易主体,交易主体的多元性和合同契约的复杂性往往容易引起谈判成本高^①。独资型 FDI 谈判主体少和谈判经历阶段较短,投资所涉及到的各个谈判环节都通过开发区一揽子服务来解决^②,这使得独资型 FDI 相较于合资型 FDI 更能显著减少政府审批环节和谈判费用,从而提高政府办公效率。其次,从技术禀赋角度。独资型 FDI 一般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技术知识更有可能对地方政府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合资型 FDI 不仅无益于地区创新产出数量提升,而且会降低地区创新产出质量^③,加上合资型 FDI 一般不拥有母国关键技术的独立知识产权^④,因而合资型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并不明显。最后,从企业管理角度。独资型 FDI 往往会受到母公司完全控制,资产专用性也会毫无保留的让渡给子公司,这使得独资型 FDI 对东道国政府而言可能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谈判力。而合资型 FDI 则要与当地合资企业特别是国企分享管理权限,同时也面临着战略目标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和股权分散等方面问题^⑤,容易产生管理冲突以及协作成本,不易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影响。不仅如此,独资型 FDI 一般都实行国际化的企业制度^⑥和按国际惯例进行经营管理^⑦,拥有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更有利于东道国政府管理理念的进步和管理模式的创新。而早期合资企业中投资方多由政府选定,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和政府意图^⑧,加上与母公司内部制度要求相对剥离^⑨,在谈判过程中不易对东道国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因此,提出假说 1。

H1: 独资型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具有促进效应,合资型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已有研究表明,独资型 FDI 承载母公司较为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拥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和先进的母公司管理制度^⑩,因此独资型 FDI 往往不会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投资项目。为获取投资利润最大化和占领更多市场份额,跨国投资者也会频繁与邻近地方政府进行国际经贸交流和国际商务合作,从而导致其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可能被邻近地方政府进行模仿和吸收。而合资经营模式下,合资型 FDI 虽然在适应东道国投资风险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其附载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相对有限,不易对周边地方政府管理技术进步和管理模式创新产生实质影响。从交易成

① 张永军、郑少锋、谢毅:《外商投资方式变迁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 张蕾、李晖:《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进入模式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③ 刘斌斌、李梅羲子:《政府质量、FDI 进入方式与区域技术创新》,《经济问题》2022年第12期。

④ 卢昌崇、李仲广、郑文全:《从控制权到收益权:合资企业的产权变动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1期。

⑤ 丁勇、朱彤:《跨国公司在华 FDI 的独资趋势和我国利用外资对策》,《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⑥ 沈佩萍:《“浙江现象”解读》,《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期。

⑦ 管恩琦、刘建涛:《外商独资企业党员管理模式探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⑧ 王进猛、沈志渔:《外资进入方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及政策建议》,《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7期。

⑨ 张婷婷:《中国区域制度发展水平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基于外资进入模式标准的中介效应分析》,《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⑩ 刘兴亚、李湘宁、缪仕国等:《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与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分析》,《金融研究》2009年第3期;王进猛、沈志渔:《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化改善了绩效吗?——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11年第3期。

本角度,合资企业往往涉及多元投资主体和投资环节,投资过程中交易的低速度和多环节容易引起交易成本高^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制约合资企业对周边政府项目进行投资以及对政府管理模式施加积极影响。例如,有研究者察觉到合资企业比独资企业的市场交易费用更大,在开拓国内市场上会承担更大的广告、营销渠道投入费用、与当地政府建立关系的费用^②。而外商独资企业不存在组织内合作方,避免了双方谈判行为的出现,决策时需要相应顾及的因素较少^③。组织的灵活性和高效率也会激发外商独资企业对邻近地区政府重大项目进行投资以及国际商务谈判,推动其先进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地方政府部门扩散,提高其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提出假说2。

H2: 独资型 FDI 对周边地区政府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合资型 FDI 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总体而言,跨国经营的困难要远甚于国内经营,因为跨国企业要不可避免地面对于语言、传统习惯、政治和市场体系差异而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④。受地理、历史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外资企业往往对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社会风俗等不甚了解,导致外资企业相较于内资企业而言存在可预期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理念的制度设计,往往能够促进知识创造^⑤和技术创新^⑥,推动东道国信息和技术的传播,这有助于缓解外资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克服“外来者劣势”。不仅如此,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往往也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一个强有力的司法系统不仅能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地降低违约风险和交易成本^⑦。伴随着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上升,外资企业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下也会更多地考虑在东道国进行投资,采用全球领先技术和管理方式组织生产,为东道国政府管理方式进步和管理模式创新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此外,知识产权保护衍生的契约精神也会促使 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府契约行为进行监督,增加政府的寻租成本和谈判过后的违约风险,倒逼政府进行管理方式变革和管理模式创新。因此,提出假说3。

H3: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两类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地方政府效率(*Effi*)。现有研究主要从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行政管理成本、

① 张永军、郑少锋、谢毅:《外商投资方式变迁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 王进猛、沈志渔:《外资进入方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及政策建议》,《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7期。

③ 刘斌、傅欣璐:《外商独资是否会提高企业生产率》,《财贸研究》2019年第5期。

④ 潘镇、鲁明泓:《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文理解释》,《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⑤ 孙旭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理论学刊》2010年第7期。

⑥ 胡凯、吴清、胡毓敏:《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技术交易市场视角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2年第8期。

⑦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政府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衡量政府运行效率^①。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政府效率视为在既定资源投入条件下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最大化的运作过程,故采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产出导向 DEA—Malmquist 模型对地方政府效率进行测度,地方政府效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投入变量沿用祁毓和郭均均^②的做法,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三个方面进行选取。产出变量参考贺宝成和熊永超^③的研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共同编撰的《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2019)》,从公共安全、基础教育、科学技术等9个维度进行选取,具体情况见表1。考虑到 DEA—Malmquist 指数测算的地方政府效率是相对于上一年的平均变化率,本文借鉴唐天伟等^④的做法将 Malmquist 指数转换为地方政府效率,即假定基年(2005年)地方政府效率为1,其余年份地方政府效率等于上一年度地方政府效率与 Malmquist 指数相乘获得。

表1 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
投入变量	人力投入	每万人公职人员数量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财力投入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
	物力投入	人均固有及国有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公共安全	交通事故死亡率倒数	中国统计年鉴
产出变量	基础教育	(小学师生比+初中师生比)/2	中国统计年鉴
	科学技术	每万人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中国统计年鉴
	文化体育与传媒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社会保障与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倒数	中国统计年鉴
	医疗卫生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环境保护	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倒数	中国统计年鉴
	农业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
	交通运输	(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各省陆地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独资型 FDI (dz)与合资型 FDI (hz)。虽然 FDI 进入模式在我国包括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股份制与合作开发等,但近些年来主要是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这两种

① Helliwell J. F., Huang H., "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38(4): 595-619; 李明:《国家审计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兼评地方国家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年第3期; 杨野:《高铁开通能否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率:事实与机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祁毓、郭均均:《FDI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贺宝成、熊永超:《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Tobit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④ 唐天伟、刘文宇、江晓婧:《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12期。

形式为主^①。考虑到地区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参考杨艳红和卢现祥^②的研究,分别采用人均外商独资企业直接投资额与人均中外合资企业直接投资额表示。

3. 门槛变量

门槛变量为知识产权保护(*intel*)程度。参考李俊青和苗二森^③的研究,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数据库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表示。该指数包含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三个层面,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财政分权程度(*fed*),参考严雅娜和谭建立^④的研究,采用省份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表示;转移支付水平(*trans*),借鉴赵永辉和付文林^⑤的做法,使用人均转移支付表示,转移支付采用“中央补助收入”近似替代;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名义GDP增长率水平进行表示,名义GDP增长率是相对于上一年度GDP总量计算获得;产业结构升级(*stru*),产业结构升级是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逐渐上升的过程^⑥,采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其余控制变量包括公职人员薪酬(*wage*)、人力资本水平(*hum*)、信息发展水平(*infor*)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分别采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平均工资取对数,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占比,电信业务总量与GDP比值和人均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表示。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象征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关系到地方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调配能力。经济增长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往往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进步,对政府办公理念和行政效率都会提出更高要求。公职人员薪酬往往与公职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密切联系,能够对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力资本、信息化发展和地区开放程度有助于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播,或多或少地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及运作。

(二)模型的构建

1. 基准模型及门槛模型

本文参考祁毓和郭均均^⑦关于FDI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关系的实证模型,构建基准回归模型(1)来考察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考虑到不同进入模式FDI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2)。

$$Effi_{it} = \delta_1 + \alpha_1 fdi_{it} + \beta_1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Effi_{it} = \delta_2 + \alpha_2 fdi_{it} I(ipp_{it} \leq \gamma_1) + \alpha_3 fdi_{it} I(\gamma_1 < ipp_{it} \leq \gamma_2) + \alpha_4 fdi_{it} I(\gamma_2 < ipp_{it}) + \beta_2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① 刘斌斌、李梅羲子:《政府质量、FDI进入方式与区域技术创新》,《经济问题》2022年第12期。

② 杨艳红、卢现祥:《外资开放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③ 李俊青、苗二森:《知识产权保护的选择效应、竞争效应与企业低加成率困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④ 严雅娜、谭建立:《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⑤ 赵永辉、付文林:《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与地区公共品供给》,《财政研究》2017年第5期。

⑥ 马正兵:《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路径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3期。

⑦ 祁毓、郭均均:《FDI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式(2)中, δ 为常数项, α 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 β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X 为控制变量, ipp 为门槛变量, γ 为待估算的门槛值。 $I(\cdot)$ 为指示函数, 当括号里条件满足时取 1, 否则取 0。 μ_i 、 v_t 和 ε_{it} 则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因素。

2. 空间面板模型及权重矩阵

考虑到本地区政府效率可能受本地区 FDI 和邻近地区 FDI 共同影响,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来考察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基本形式如下:

$$Effi_{it} = \delta_3 + \rho_1 WEffi_{it} + \alpha_4 fdi_{it} + \beta_3 X_{it} + \theta_1 Wfdi_{it} + \theta_2 W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 ρ 为被解释变量空间自回归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θ 则为空间溢出系数, 其他变量意义同基准模型相同。空间权重矩阵 W 涉及到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分别用于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计算方法如下:

$$W_{ij}^a = \begin{cases} \frac{1}{|Pgdp_i - Pgdp_j|},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4)$$

$$W_{ij}^b = \begin{cases} 1/d_{ij},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5)$$

$$W_{ij}^c = W_{ij}^a \times W_{ij}^b = \begin{cases} \frac{1}{|Pgdp_i - Pgdp_j|} \times \frac{1}{d_{ij}},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6)$$

其中, W_{ij}^a 为经济距离矩阵元素, 采用样本年份内人均 GDP 均值之差倒数绝对值构成, $Pgdp_i$ 和 $Pgdp_j$ 分别代指省份 i 和省份 j 在样本年份内人均 GDP 均值。 W_{ij}^b 为地理距离矩阵元素, 采用各省会城市之间球面距离 (d_{ij}) 的倒数构成。 W_{ij}^c 为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元素, 嵌套矩阵通过将经济距离嵌入到地理权重矩阵中计算获得, 嵌套矩阵元素为地理距离矩阵元素与经济距离矩阵元素对应相乘获得。

(三)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由于吉林、辽宁、西藏、四川、广西、广东、宁夏、台湾以及港澳台地区 FDI 进入模式数据缺失, 加上多数省份 FDI 进入模式数据至 2020 年不再公布, 本文选取 2005—2019 年我国 24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分省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以及分省统计年鉴等。鉴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口径差异, 2005—2011 年公职人员采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衡量, 2012—2019 年公职人员则采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衡量。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数据 2017 年之后不再公布, 本文沿用了安树伟和李瑞鹏^①对缺失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计算方法补齐了 2018—2019 年的缺失数据。对于变量中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数据, 均采用美元兑人民币市场汇率(年平均汇价)折算成人民币进行处理。经计算整理后所有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2 所示。

^① 安树伟、李瑞鹏:《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 ——1978 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中国软科学》2023 年第 4 期。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效率(<i>Effi</i>)	360	0.7617	0.4353	0.1483	2.8511
	独资型 FDI (<i>dz</i>)	360	7.7602	10.3550	0.0048	67.5539
解释变量	合资型 FDI (<i>hz</i>)	360	2.9071	4.3344	0.0013	35.5305
门槛变量	知识产权保护(<i>intel</i>)	360	6.2216	3.3018	0.9260	14.2970
	财政分权程度(<i>fed</i>)	360	2.6240	1.1073	0.4000	5.7000
	转移支付水平(<i>trans</i>)	360	0.3862	0.3151	0.0162	2.0973
	经济发展水平(<i>gdp</i>)	360	0.1314	0.0608	-0.0395	0.2651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stru</i>)	360	0.8945	0.0590	0.6724	0.9972
	公职人员薪酬(<i>wage</i>)	360	10.7262	0.5519	9.4930	11.9779
	人力资本水平(<i>hum</i>)	360	0.1558	0.1070	0.0301	0.6220
	信息发展水平(<i>infor</i>)	360	0.0556	0.0342	0.0147	0.2311
	对外开放程度(<i>open</i>)	360	1.8252	3.0477	0.0308	13.7877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实证中还加入了混合回归和个体固定效应,表 3 汇报了模型回归结果。在混合回归模型中,独资型 FDI 估计系数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不显著。逐步考虑个体因素和时间因素后,独资型 FDI 估计系数显著性与符号未发生改变,合资型 FDI 仍不显著,说明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合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证实了假说 1。从模型拟合效果看,逐步考虑个体和时间因素后,拟合优度(R^2)随之上升,说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独资型 FDI 在交易成本、技术水平以及管理制度上存在明显优势,在和地方政府进行国际交流过程中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更有可能对政府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产生积极影响。合资型 FDI 承接的母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相对有限,加上资产专用性较差以及管理权分散等原因,不易对政府效率产生实质影响。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回归		个体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i>dz</i>	0.0122*** (0.0039)		0.0081*** (0.0029)		0.0073*** (0.0021)	
<i>hz</i>		0.0134 (0.0116)		0.0001 (0.0052)		0.0025 (0.00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i>N</i>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R^2	0.2788	0.2608	0.7928	0.7861	0.8261	0.821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 空间效应

1. 莫兰指数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之前,需要考察被解释变量空间自相关性以评价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考虑到2005年地方政府效率数值均为1,在莫兰指数检验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中则使用了2006—2019年的样本数据。表4描述了样本年份内中国地方政府效率莫兰指数(Moran's I)的变动情况。从中可知,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全局莫兰指数均在至少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效率在经济空间上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性。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表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表4 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全域 Moran's I	P 值	年份	全域 Moran's I	P 值
2006	0.172	0.058	2013	0.265	0.005
2007	0.395	0.000	2014	0.260	0.008
2008	0.370	0.000	2015	0.252	0.010
2009	0.379	0.000	2016	0.289	0.004
2010	0.357	0.000	2017	0.308	0.002
2011	0.258	0.006	2018	0.332	0.001
2012	0.250	0.006	2019	0.329	0.001

为更加详实地考察地方政府效率的局部关联特征,本文计算各地区局部莫兰指数并绘制了莫兰散点图,限于篇幅仅呈现2006年和2019年政府效率莫兰散点图。从图1和图2可知,2006年和2019年多数省份局部莫兰数值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呈现“高一高”和“低—低”集聚特征。不仅如此,相比于2006年散点值分布,2019年政府效率散点值分布更为紧密,说明地方政府效率的经济空间关联性总体得到了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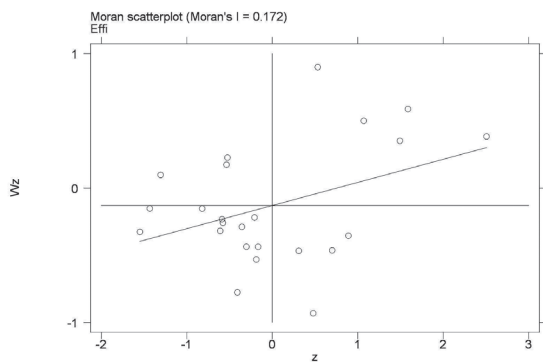


图1 2006年政府效率的莫兰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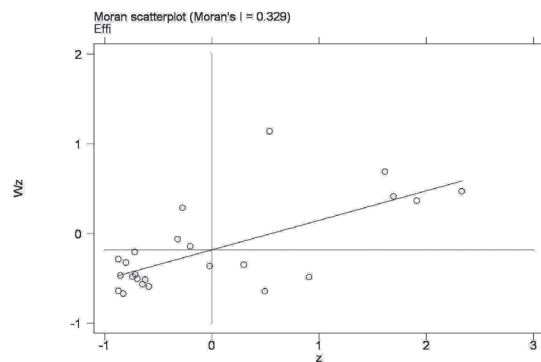


图2 2019年政府效率的莫兰散点图

2. 模型设定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之前,需要对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形式进行检验。表5汇报了经济距离矩阵下空间计量模型设定性检验情况。从中可知,LM检验与稳健LM检验均在至少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可以考虑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两类FDI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Hausman检验、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LR检验均在至少10%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最后阶段LR检验和Wald检验均在至少5%水平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空间计量模型应选择时空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

表5 模型设定性检验

模型检验	<i>dz</i>		<i>hz</i>	
	统计值	P 值	统计值	P 值
LM (SAR)	3.814	0.051	3.683	0.055
Roubust_LM (SAR)	22.621	0.000	21.939	0.000
LM (SEM)	7.015	0.008	6.369	0.012
Roubust_LM (SEM)	25.823	0.000	24.625	0.000
Hausman	1628.19	0.0000	353.30	0.0000
LR (个体固定效应)	31.87	0.0447	29.30	0.0819
LR (时间固定效应)	225.98	0.0000	230.10	0.0000
LR (SAR)	53.71	0.0001	32.60	0.0373
LR (SEM)	56.80	0.0000	33.59	0.0291
Wald (SAR)	57.60	0.0000	33.89	0.0001
Wald (SEM)	59.50	0.0000	33.89	0.0001
最优模型	时空双向固定 SDM 模型		时空双向固定 SDM 模型	

3. 空间效应分解

为更加直观地展示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政府效率的空间效应, 本文将空间效应划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6 所示(嵌套矩阵用于模型稳健性估计)。经济距离矩阵和嵌套矩阵下空间自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效率存在经济与地理因素上的空间相关性。独资型 FDI 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正, 表明独资型 FDI 不仅对本地政府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而且还带动了周边地区政府效率的提升, 证实了假说 2。独资型 FDI 往往具备国外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对周边区域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更有可能对政府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出更高要求。合资型 FDI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合资企业具备的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优势相对不足, 对邻近区域政府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影响也会相对有限。

表6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嵌套矩阵	
	(1)	(2)	(3)	(4)
<i>dz</i> (直接效应)	0.0053** (0.0022)		0.0079*** (0.0024)	
<i>dz</i> (间接效应)	0.0407*** (0.0093)		0.0526*** (0.0125)	
<i>dz</i> (总效应)	0.0460*** (0.0102)		0.0605*** (0.0139)	
<i>hz</i> (直接效应)		0.0038 (0.0041)		0.0059 (0.0043)
<i>hz</i> (间接效应)		0.0219 (0.0135)		0.0320 (0.0208)
<i>hz</i> (总效应)		0.0257 (0.0158)		0.0379 (0.02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i>N</i>	336	336	336	336
<i>R</i> ²	0.3174	0.2070	0.2745	0.0043
<i>rho</i>	0.3852*** (0.0843)	0.4190*** (0.0824)	0.4678*** (0.0743)	0.5070*** (0.0723)
<i>Log-L</i>	147.9378	135.4066	158.4996	147.0299

(三) 门槛效应

1. 门槛效应检验

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两类 FDI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即可能存在着计量经济学上的门槛效应。为进一步验证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运用门槛模型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门槛检验,通过自助法反复抽样 500 次来计算 F 值与 P 值,检验结果见表 7。从表中 F 值和 P 值可知,独资型 FDI 在 10% 置信水平上通过了双门槛检验,但未通过三门槛检验,说明独资型 FDI 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合资型 FDI 双门槛不显著而单门槛显著,说明合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单一门槛。

表 7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门槛	F 值	P 值	10%	5%	1%
dz	单门槛	47.69	0.0100	21.4418	26.2198	43.5451
	双门槛	19.85	0.0780	17.3244	22.7149	43.3907
	三门槛	25.12	0.4740	47.0492	54.0865	69.7468
hz	单门槛	35.52	0.0040	18.9210	24.2225	30.1444
	双门槛	13.40	0.1640	15.4631	19.9998	27.6672

2. 门槛回归结果

结合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采用双门槛模型和单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在双门槛模型中独资型 FDI 的知识产权保护双门槛值分别为 8.895 和 10.855,在单门槛模型中合资型 FDI 的知识产权保护单一门槛值为 8.895,故在双门槛模型回归中将样本划分为三组,在单门槛模型中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具体划分详情及回归结果见表 8 所示。当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 8.895 时,两类 FDI 估计系数均为负值,即两类 FDI 均对政府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过门槛值 8.895 后,两类 FDI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发挥两类 FDI 对政府效率的促进效应,证实了假说 3。在知识产权保护较为薄弱的环境下投资者合法权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投资者在成本—收益权衡下会选择减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客观上减少了东道国政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有效途径。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上升,跨国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也会降低,投资者在成本—收益权衡下会更多地考虑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国际经贸交流和国际商务谈判。不仅如此,与知识产权保护相伴而生的契约精神也会激励外商投资者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技术变革和管理模式创新,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表 8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z (intel ≤ 8.895)	-0.0038 (0.0069)	
dz (8.895 < intel ≤ 10.855)	0.0189*** (0.0063)	
dz (10.855 < intel)	0.0080** (0.0029)	
hz (intel ≤ 8.895)		-0.0400* (0.0201)
hz (8.895 < intel)		0.0021 (0.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N	360	360
R ²	0.5285	0.4687

(四) 异质性分析

1. 产品市场环境

产品市场环境往往与商品流通的有序性、商品市场的竞争性以及市场交易的公平性有着密切联系,在不同产品市场环境下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为验证产品市场环境的异质性,采用分省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中“产品市场发育”指标衡量产品市场环境,数值越大表明产品市场环境越优。依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产品市场发育低和产品市场发育高两组,回归结果见表 9。

从表 9 中列(1)和列(3)可知,独资型 FDI 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促进作用。此外,列(1)估计系数明显高于列(3)估计系数,说明改善产品市场环境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促进效应。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往往有助于产品信息、人才以及技术的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优质外资企业进入,提升外商投资者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质量与合作潜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政府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的管理和吸收。列(2)和列(4)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合资型 FDI 附载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相对有限,加上合资过程中国有企业占比往往较高,不易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对政府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出更高要求。

表 9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产品市场发育高		产品市场发育低		要素市场发育高		要素市场发育低	
	(1)	(2)	(3)	(4)	(5)	(6)	(7)	(8)
<i>dz</i>	0.0114*** (0.0061)		0.0059*** (0.0017)		0.0062*** (0.0021)		-0.0082 (0.0073)	
<i>hz</i>		0.0144 (0.0146)		0.0023 (0.0042)		0.0021 (0.0035)		0.0073 (0.01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8351	0.8323	0.9139	0.9076	0.8806	0.8765	0.8785	0.8778

2. 要素市场环境

要素市场环境往往与要素流动的有序性、要素配置的公平性及要素企业的竞争程度有着密切联系,故在不同要素市场环境下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可能略显差异。为探讨要素市场环境的异质性,采用分省市场化指数数据库“要素市场发育”指数衡量要素市场环境,数值越大表明要素市场环境越优。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要素市场发育低和要素市场发育高两组,回归结果见表 9。

从表 9 列(5)可知,独资型 FDI 估计系数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列(7)为负且不显著,说明要素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促进效应。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往往意味着要素资源的流通成本和配置成本较高,外商投资者面临较高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客观上减少了东道国政府学习外商先进技术和知识的管理和交流机会。随着要素市场环境改善,投资者也会更多地考虑在东道国进行投资以及以独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方式组织生产,为东道国政府管理理念进步和管理模式创新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列(6)和列(8)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五) 稳健性检验

一般而言,前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也属于稳健性分析。为使估计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以及增加控制变量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政府效率的高低往往决定着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①,故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政府运行效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借鉴了刘俸奇等^②的研究成果,采用熵值法对政府绩效、法治水平,监管质量、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五个维度指标进行计算。表10列(1)和列(2)回归结果表明,独资型 FDI 回归系数在 10% 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10 稳健性分析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法		增加控制变量	
	(1)	(2)	(3)	(4)	(5)	(6)
<i>dz</i>	0.0013* (0.0007)		0.0115*** (0.0037)		0.0067*** (0.0020)	
<i>hz</i>		0.0005 (0.0011)		0.0014 (0.0036)		0.0020 (0.00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8.842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0.0460			
<i>N</i>	360	360	336	336	360	360
<i>R</i> ²	0.9554	0.9539	0.4945	0.8450	0.8313	0.8276

第二,工具变量法。考虑到政府效率与 FDI 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引入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列(3)汇报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知,独资型 FDI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大于 10) 检验结果也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和弱工具变量问题,说明工具变量有效。考虑到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不显著,采用合资型 FDI 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列(4)结果表明,合资型 FDI 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前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第三,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本文尝试增加城市化水平、财政收入分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增加的控制变量分别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表示。从列(5)和列(6)可知,在增加三个控制变量后,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合资型 FDI 促进效应仍不显著,再次证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① 李茜、李艳丽:《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的区域测算与演变趋势——基于 DEA 及 DEA-Malmquist 指数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19 年第 6 期。

② 刘俸奇、储德银、姜春娜:《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4 期。

五、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由此也引发了许多学者关于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政府廉洁度以及政府效率影响的讨论,但鲜有文章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 2005—2019 年 24 个省市面板数据,使用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了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实证考察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同时构建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对地方政府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 独资型 FDI 显著促进了政府效率的提升,而合资型 FDI 并不显著,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独资型 FDI 在交易成本、技术水平以及管理制度上存在明显优势,在与东道国政府谈判过程中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更有可能对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合资型 FDI 承载的母国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相对有限,加上资产专用性较差以及管理权分散,不易对政府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2) 独资型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具有正空间溢出效应,而合资型 FDI 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独资型 FDI 往往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对周边区域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国际商务谈判中更有可能对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提出更高要求。合资型 FDI 具备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势相对并不明显,对邻近地区政府管理技术和模式的辐射效应也会相对有限。(3) 两类 FDI 对地方政府效率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且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门槛值 8.895 时,两类 FDI 均对政府效率影响为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往往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增加投资预期收益,投资者在成本—收益权衡下也会更多地考虑在东道国进行投资以及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方式组织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拓宽东道国政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有效途径。(4) 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环境下两类 FDI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不同。在产品市场环境以及发育较好的要素市场环境下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在发育程度较差的要素市场环境下独资型 FDI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环境下合资型 FDI 均对政府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往往有助于信息、人才和技术的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外商投资者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质量与合作潜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地方政府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和吸收。

(二) 政策建议

文章不仅澄清了不同进入模式 FDI 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理,而且对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来改善政府效率具有一定的启示:(1) 完善外资进入政策。一是要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吸引高水平外商独资企业落地生根。优化中外合资企业合资项目,提升中外合资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优势,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引资质量与治理效率的有机结合与深度统一。二是要精准对标国际经贸高标准和高规则,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外资企业负面清单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既要把高质量外商独资企业留下来也要提升中外合资企业合资质量,促进地方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中对其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和吸收,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与全球治理模式接轨。(2) 强化地方政府引资合作。一是要健全地方

政府竞争与合作机制,完善区域间引资管理制度,推动地方政府形成“趋良竞争”和“以邻为善”治理新格局,协同推进地方政府对优质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良好模仿和有益汲取。二是要以区域自贸试验区和自贸试验田等为载体,推动多方地方政府主体与外资企业进行经贸交流和商务合作,切实提高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质量与合作水平,促进区域政府部门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经验的高效模仿和良性汲取。(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是要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和涉外管理体系,推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双向联动、多维并举,切实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法治营商环境新业态、新模式,为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知识溢出提供产权制度支持。二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引导,统筹落实知识产权保护问责制度,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模式,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守法、执法和用法的高效结合与有机统一,提高优质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信心与合作质量,助力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4)优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环境。一是要深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放管服”改革,破除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管理体制障碍和政策性壁垒,充分释放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主体活力,为吸引高质量外资企业进入提供制度环境支撑。二是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吸引高端信息、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作用,提升高水平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质量与合作潜力,协同推进廉洁、阳光和高效的有为政府建设,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Wang Juan Zhang Xiang Li Yan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5 to 2019, and using the DEA-Malmquist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uses fixed effect model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try modes of FDI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wholly-funded FDI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ose government' efficiency, while JV FDI does not, and that wholly-funded FDI ha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whil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JV FDI is not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wo types of FDI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product market environments and factor market environments.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shows that wh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bove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two types of FDI have a negative-to-positive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DI of different entry modes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vides ideas on how to improve local governments, efficiency through FDI policy.

Key words: wholly-funded FDI; JV FDI;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常建华,男,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五一奖章获得者。担任教育部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明清史研究,近年来关注日常生活史。著有《宗族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朝鲜族谱研究》《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明代宗族研究》《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清前期国家治理与民生政策》等学术专著,并有学术普及性书籍《清朝大历史》《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等问世,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等史料集,整理《郑天挺清史讲义》,编有《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中国乡村社会史名篇精读》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目前主持基地重大项目“多样性: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研究”。



谭小芬,男,1978年生,江西萍乡人,经济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首席专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中央财经大学“龙马学者”特聘教授(2020—2022年)。兼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青年会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特约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投资与证券》《财政金融文摘》编委、《金融评论》编委、《第一财经》特约评论员。

主要从事国际金融市场、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市场变化、金融风险、国际大宗商品、企业杠杆率研究。在《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等顶尖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6部,发表财经评论文章100余篇。担任《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等期刊匿名审稿人。受邀参加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德意志银行等政策咨询和研讨会议,提交的专题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8篇政策报告获得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教育部《智库专刊》等部门采纳使用。





姜守诚,男,1975年4月生,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玉章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姜守诚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道教史、道教文献、斋醮科仪、宗教考古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现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合著《历代高道传》《道教女仙考》,参编多部论著。其中,独著《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6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201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十大好书及重大出版成果”(2017年1月),并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宗教学类二等奖(2020年12月)。

目前,姜守诚教授承担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宗教礼俗的探索与创新:宋元道教拔度科仪研究”,主持并独立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分别是2017年度一般项目“台湾南部地区灵宝道派拔度科仪研究”、2014年度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2009年度青年项目“汉晋道教与方术民俗——以出土资料为背景”。



高昊宇,男,1992年生,山东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货币金融系副主任,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学者,第5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人。

主要从事银行与金融中介、金融风险管理、债务与信用市场和公司金融与中国资本市场等研究。代表性学术成果发表或接受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Finance (JF)*、*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RF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F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JFQA)* 以及《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国内外金融管理领域权威刊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评估为特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各1项。

